

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独特世界观探析

王开宝*, 汪功平

(皖西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六安 237012)

摘要:基于对中国式现代化独特世界观的把握,其独特性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从精神特质来看,坚持自信自立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精神动力之源;从价值层面来看,坚持人民至上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价值立场;从世界眼光来看,坚持胸怀天下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境界格局。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独特世界观既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也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世界观;自信自立;人民至上

中图分类号:G122;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3-0001-05

Exploring the Worldview Contained in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WANG Kai-bao*, WANG Gong-ping

(School of Marxism, West Anhui University, Lu'an, 237012, Anhui)

Abstract: Based on the grasp of the unique world outlook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its uniqueness can be summarized in three asp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s, adhere to self-confidence and self-reliance is the source of spiritual power to realiz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alue, adhering to the supremacy of people is the fundamental value position to realiz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vision, adhering to the heart of the world is the grand realm pattern realize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The unique world outlook contained in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not only enriches and develop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but also a major innovation i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world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worldview; confident and independent; people first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道路从根本上是其国情所决定的,与其文化传统、历史条件、发展战略、政治制度、外部挑战等各种因素紧密相联,形成一个复杂因素的综合体。实现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使命。“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伟大创新发展,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1]20},跑出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加速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范畴里,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总的看

法和根本观点,在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中具有统领作用。科学的世界观是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遵循。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怎样的世界观?究竟有何独特之处?这不仅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议题。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独特世界观展开理论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也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2024-10-30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三全育人”综合改革和思想政治能力提升计划项目(sztzsjh-2024-14-22;sztsjh-2023-10-15);皖西学院质量工程项目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研究一般项目(wxxy2023125)。

作者简介:王开宝(1987-),男,安徽淮南人,讲师,硕士。E-mail:1376191970@qq.com

1 坚持自信自立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精神特质

唯物辩证法认为,矛盾是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动力,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坚持自信自立的要义在于:始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走符合自身特点和实际的发展道路,使主观符合客观,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和主导权。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党的百年奋斗成功道路是党领导人民独立自主探索开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共产党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1]17-18}坚持自信自立是我们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所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精神特质,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及其发展历经波折,是党在付出巨大流血牺牲后取得的宝贵成果,是在与“左”倾、右倾等各种错误思想作长期斗争中确立和发展的。坚持自信自立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在百年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精神动力。

1.1 在坚持自信自立中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

1840年伴随着鸦片战争的炮声,中国国门被西方列强打开,中华民族进入了屈辱和衰败的历史,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遭到前所未有的劫难。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黑暗的中国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与洗礼中,党逐步成为全体中国人民坚强的主心骨和领导力量,带领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在党成立初期和革命事业早期,由于受理论理解、国情认识、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不够深刻等主客观因素制约,曾一度机械式、教条式、形而上学式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导致中国革命走过巨大弯路、遭受过重大挫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于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进行了艰辛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天地。

在长期革命实践中,毛泽东领导全党同各种“左”倾和右倾错误进行了艰苦卓越的斗争。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的一段时间,党内同时出现了严重“左”倾和右倾错误。党中央在八七会议上果断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思想,给处于危难中的党指明了新

的方向。1930年毛泽东在深刻总结革命斗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撰写《反对本本主义》,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重要观点,在党的历史上首次系统阐明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开启了我们党关注实际、揭示规律、把握历史主动、成功改造客观世界的先河。1937年,为更加深刻揭露和批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在大量实践经验基础上,集中全党智慧,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光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两篇著作从实际出发,分别重点阐述了认识与实践、共性与个性的统一问题,“两个统一”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哲学基础、提供了理论依据,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为进一步破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给革命事业带来的危害,毛泽东带领全党于20世纪40年代初开展了近4年之久的整风运动,目标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提高全党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和水平。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坚持问题导向,于1941和1942年先后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报告,彻底清除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得以真正确立。这是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为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指导思想地位奠定了理论和实践基础,也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奠定了思想根基。

1.2 在坚持自信自立中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外的风险挑战接踵而至,党和国家面临着复杂困难局面,我国工业基础极为薄弱,人民生活水平极为低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实际出发,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取得了巨大成就。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1953年12月,形成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阐述:“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2]495}1956年4月和5月,毛泽东先后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明确提出要以苏为鉴,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第二次结合”,成为党带领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1964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我国在二十世纪内分步骤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和“两步走”的战略构想。新中国成立后的 30 年中,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丰硕成果,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各项基本制度,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长足发展。但由于党的执政经验还不够丰富,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还不够深刻,再加之当时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党在推进现代化事业过程中历经艰辛和曲折。“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3]²²这一时期的艰辛探索和经验教训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提供了重要借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3 在坚持自信自立中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4]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具有转折性的重大意义,标志着我国开启了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而如何跟上世界现代化步伐、快速增强国家综合国力成为当时乃至现在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重大时代课题。邓小平在这一重大历史关头,从具体国情出发,推动思想大解放,团结带领党和人民进行了长期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1979 年 3 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首次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这一明确概念。同月,他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委会代表团时,提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为进一步抢抓机遇,实现快速发展,邓小平于 1987 年 4 月和 10 月,分别提出并确定“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经过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创业、团结奋斗,我国于 1987 年和 1995 年顺利完成了“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总体小康目标得以顺利实现,人民生活水平上了大台阶,创造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伟大奇迹。1997 年 9 月,江泽民在“三步走”战略基础上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对“第三步”发展目标的分步骤、分阶段实施的重要部署。2007 年 10 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完善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在党的十八提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将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更为重要的战略地位。这一系列成就的取得为中国式现代化稳健发展提供了更为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稳定成熟的体制机制。

1.4 在坚持自信自立中开辟中国式现代化新天地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办成了许多事关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大事要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和重要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践证明,中国式现代化走得通、行得稳,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5]概括提出并深入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这是党的二十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这一理论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由科学内涵、中国特色、本质要求、重大原则、重大关系、独特蕴含等组成,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优势、价值体系、文明形态等,使现代化发展战略和规划更加清晰明确、可感可知、可用可行。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现代化发展中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在理论与实践上加大创新力度,不断深化对中国式现代化内在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可以说,新时代伟大成就的取得,证明了坚持自信自立是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世界观,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优越性,也进一步坚定了全国人民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信心与决心。

2 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价值立场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物”的现代化,更是“人”的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如何认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历史观的重大问题。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体动力和决定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6]⁴¹¹坚持人民至上,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价值立场,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是我们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首次将“坚持守正创新”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原则之一,并加以深刻阐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7]¹⁵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最根本就是要始终坚守人民立场、坚持人民至上、永葆初心使命。

2.1 中国式现代化是坚守人民立场的科学理论

政治立场是一个政党观察、认识、分析、处理政治问题的立足点,突出反映了这一政党的价值属性、执政理念、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是第一个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为实现人民自由、解放、幸福事业而矢志不渝奋斗的科学理论体系。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这一立场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的精华,同时,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人民属性。“马克思主义是为人民立言、为人民代言的理论,是为改变人民命运而创立、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人民的创造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8] 马克思主义使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自身的地位和作用,第一次真正看到了人类的前途与希望。正因为始终代表人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才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具备深厚实践基础与旺盛生命力、经实践反复检验而始终保持真理性的根本所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人民的理论,是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人民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突出特征。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所包含的中国特色、本质要求、根本性质、重大原则等无不贯穿着人民至上的根本价值立场: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标志、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在发展中始终保持现代化的人民性,以高质量发展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始终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党和政府谋划工作、制定政策、推动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让现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2 中国式现代化过程是守护“民心”的过程

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这是关系中国共产党治国安邦的重大政治问题。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决定事业的兴衰成败。中国式现代化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追求现代化的历史,无论是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还是救国、兴国、强国,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要解决人民群众的所思所想、所期所盼、所急所忧。“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9],党的生命力在人民、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以人民为中心”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与人民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的承诺,是为群众纾解焦虑、排忧解难的实际行动,更是团结一心、风雨同舟的责任与担当。守护好“人心”是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带领人民创造更大成就的成功

密钥。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中国式现代化就难以顺利推进;赢得民心,中国式现代化就能行稳致远。新时代以来,党和政府在推动现代化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动态调整民生工程项目,着力促进就业、医疗、养老、生态环境、社会治安等民生事业发展,既立足现实、又考虑长远,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经过长期努力,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民生工作的实效性和针对性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显著提升,党的执政基础不断巩固,汇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2.3 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指引人民不断创造美好幸福生活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10] 一部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就是一部坚守人民立场与初心的历史,体现在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和急难愁盼问题的不断解决中。人的现代化总是随着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强调:“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将“人民至上”理念贯穿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全过程。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不断解决制约提升人民生活品质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可持续等问题;在推进民主和法治建设中,不断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机制,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持续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建设,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发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升和满足人民多样性、多层次、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这些举措充分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优越性,指引全体人民朝着更加美好幸福的生活阔步前进。

3 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境界格局

实现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胸怀天下的世界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高度,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统一起来,深入思考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 怎样才能实现现代化的重大时代课题? 世界各国是现代化道路上的同行者,政党作为引领和推动现代化进

程的重要力量,有责任回答好这个问题。2023 年 3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指出:“现代化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品’,也不是非此即彼的‘单选题’,不能搞简单的千篇一律、‘复制粘贴’。”“坚持胸怀天下”作为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就是既要勇于和善于学习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做到求同存异、兼收并蓄,又要为回应人类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和存在的突出问题的解决作出应有贡献,不断造福全人类,这体现出我们党崇高的精神境界和深邃的世界眼光。坚持胸怀天下对新时代新征程更好统筹“两个大局”、驾驭复杂局面、把握历史主动,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繁荣与发展提供重要精神动力和战略支持,为人类携手实现现代化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國方案,提供了全新选择。

3.1 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引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2018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强调:“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10] 1848 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在长期实践中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方向与指引。马克思主义在实践的基础上,科学总结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科学回答了世界的本源和状态问题,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的思维领域的规律和奥秘。“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也同样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0]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在于它的所有理论都从实践中产生,且经过实践反复检验,在无限发展的实践中不断进行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始终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破浪前行的理论之基和方向指引。“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指导思想,……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科学指引。”^[11] 恩格斯曾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12]^[69] 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党和人民战胜困难、赢得斗争胜利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中国式现代化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为指导的现代化,它通过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式现代化之“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解决中国式现代化相关问题,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之路。

3.2 中国式现代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1]^[145]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世界发展趋势和人心所向,强调以和平发展超越冲突对抗,以共同安全取代绝对安全,以互利共赢摒弃零和博弈,以交流互鉴防止文明冲突,以绿色发展呵护地球家园,与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追求与核心理念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相通性。中国式现代化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马克思主义从诞生起就站在广大人民的立场上从事人类最崇高、最正义的事业,始终为人类的自由、幸福、解放进行永不停歇的奋斗。恩格斯指出:“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更加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13]^[265] 中国式现代化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科学性 with 革命性的统一,是真理与道义的统一。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社会主义蓬勃发展,资本主义发生新变化,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深入发展,但整个世界依然处于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时代,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依然发挥巨大的指引作用。中国式现代化在促进自身发展的同时,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紧密结合起来,致力于促进人类进步与幸福的伟大事业,坚持独立自主,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坚持开放合作,推动共同繁荣;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不断开辟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新局面。

3.3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18 世纪中后期英国率先开始工业革命,由此开启了世界的现代化进程。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这也就意味着无法克服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和弊端,资本至上、弱肉强食、两极分化、霸道强权的本性无法从根本上消除。人类在漫长的历史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明,形成了具有不同国情、不同文化、不同性质的文明形态。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备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习近平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4] 中国式现代化是“两个结合”的光辉典范,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开出的绚丽之花,也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在具有世界各国现代化共性的基础上,更具自己特色,是对西方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超越和创新。作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克服了西方现代化老路的缺陷和弊端,创造了人类现代化 (下转第 28 页)

短视频赋能乡村治理的多维审视

陈 聪

(池州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 安徽 池州 247000)

摘 要:聚焦短视频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意义及现实关照,从而探寻具有发展前瞻性和科学指导性的行动方略。围绕乡村治理目标,通过明确短视频价值导向、优化短视频传播内容、提升短视频技术水平以及完善短视频评价体系,释放短视频媒介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的潜在效能,为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添砖加瓦,促成乡村社会的良序善治。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短视频;乡村治理;乡村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422.6;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3-0006-06

Multidimensional Review of Short Video Empowering Rural Governance

CHEN Co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Chizhou University, Chizhou, 247000, Anhui)

Abstract: The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short video participation were emphasized in this paper to explore an action strategy that is forward-looking and scientifically guided. Focusing on the objectives of rural governance, it release the potential effectiveness of short video media by clarifying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short video, optimizing its communication content, enhancing its technical proficiency, and improving its evaluation system, and ultimately contribute to the advancement of Chinese-style of modernization in rural governance, promoting the orderly and effective governance of rural society.

Key words: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short video; rural governance; rur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伴随城镇化、信息化、市场化的推进,在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急剧转型中,乡村社会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变革最为激烈的实践场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没有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1]可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不可忽视乡村地区,乡村地区的发展成果是衡量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质量的重要指标。2020年底,中国实现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在人类减贫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一项艰巨任务的完成,与党领导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密不可分;这一历史性成就的取得,也体现出以党的领导为本质要求的中国式乡村治理道路的优越性^[2]。随着移动社交的终端设备和数字平台在乡村社会的入场、扩散与应用,现代媒介逐渐成为

公共沟通的基础设施之一,是新时期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抓手。作为社会的中介系统,现代媒介是社会从权威控制转变为多元治理的核心协调力量^[3]。时下,5G、AI、VR等现代技术正以高歌猛进的发展态势快速且强势地渗透到乡村社会,给乡村治理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其中,短视频作为当下盛行的多种媒介实践中最活跃、最显著的类型之一,因其强烈的参与性、广泛的连接性和功能的复合性,给乡村治理提供了包容的、开放的、及时的互动场域,为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带来新的可能。

收稿日期:2024-12-14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2024AH052912);安徽省教育厅质量工程项目(2023jyxm0846)。

作者简介:陈聪(1990-),女,安徽池州人,讲师,硕士。E-mail:1182079460@qq.com

1 价值考量:短视频助力培育主体意识

在中国长期的主流叙事中,农民群众往往处于传播秩序的边缘,呈现出“失语”的状态。随着短视频的兴起,广大农民在技术赋权的加持下开启了个体的叙事重构时代,村民的主动性和创造力得以发挥、释放,并不断强化主体意识和身份认同,进而在激发聚力、活力与动力的基础上,更广泛、更深入、更最大限度地参与到乡村治理实践中。

1.1 短视频时代下的农民叙事新模式

在“视频化生存”的媒介生态下,内容精简的短视频高度契合现代受众的信息消费习惯与媒介使用行为,短视频平台成为人们分享日常、获取资讯、消遣娱乐的重要阵地。根据 CNNIC 发布的第 5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 2024 年 6 月,即时通信、网络视频及短视频的用户仍稳居前三,其中短视频用户规模达 10.50 亿,占整体用户比例的 95.5%^[4]。这一数据印证了短视频从出现到普及再到无处不在的强劲势头,型构出一道极具中国特色的媒介景观。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等头部短视频平台动辄数亿的日活跃用户,表征着短视频成为公众日常生活难以须臾或缺的存在方式,全民短视频时代已经到来。

短视频在本质上是一种“去深度化”表达,被认为是继文字、图片之后,掀起的第三次大众表达革命。这种以通俗的视觉语言趣解生活百态的平民媒介也在乡村社会广为流行。《2024 快手三农生态数据报告》显示,截至 2024 年 7 月,快手乡村用户的每日互动量高达 29.4 亿,乡村普及率不断创新高。作为集内容、场景、社交于一体的媒介应用,短视频不仅是一种诉诸视听感官的信息形式,还能一定程度激发乡村地区的内部发展动力与外部资源协同,是一种新型发展手段。在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短视频媒介所产生的助农价值,如传播乡村文化、助力脱贫攻坚、解读惠农政策等,不仅回应了乡村振兴战略的现实需要,也彰显其在乡村治理实践中的潜在可能。所谓乡村治理是指治理主体对乡村社会的调控、引导和规范,构建乡村秩序,推动乡村发展^[5]。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强调,“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建立健全“现代化乡村社会治理体制”^[6]。

作为“后文字时代”的新型视听媒介,短视频极具“参与式文化”特质,促成乡村建设过程中“沉默的大多数”历史性出场,其中有记录农家日常点滴的“田野小风”,有分享乡村传统美食的“二米炊

烟”,还有展现民间非遗文化的“山白”等。随着一个个“乡村网红”的出现,这种新生力量悄然改变着乡村能量场域,同时推动村民多边参与到乡村发展和乡村振兴的行动中来。例如,在抖音平台拥有 2000 多万粉丝的乡村守护人“大表哥”,自 2021 年拍摄短视频以来,不仅带领当地村民通过勤劳和智慧改善生活现状,还基于自身在网络社会的影响力,于 2022 年 3 月获聘为康都村“特聘村主任”,深度参与村庄发展公共领域事务,成为乡村治理的参与主体。由此观之,低技术门槛、低制作要求、低识读成本的短视频使得农民的叙事权得到解放,助力农民的话语权实现回归,这种赋权式的媒介为村民更加积极主动地参与乡村治理带来契机。

1.2 短视频增强治理主体的身份认同

中国具有悠久的村民自治传统,不同时期均有采取各种措施唤醒村民的自我意识,培育村民的公共精神,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自觉性。党的历次重要会议更是强调,将增强农民群体的内生发展动力作为农村农业发展的重要原则。作为一种具有自我话语赋权功能的媒介,短视频改变了村民在传统媒体时代“被言说”的命运,使得村民有了在社会公共领域畅所欲言的机会,这有利于草根民主、基层民主的实现,增加村民对乡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形成奠定村民基础。

在城镇化建设的浪潮下,越来越多的超地域因素汇入乡村空间,稳定的乡村行动空间逐步向外拓展,往返于城乡的打工人群的流动性增强;加之受农村式微城镇崛起的外力驱动,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留守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的认同度降低,导致村落公共活动的组织主体和参与力量不断缺失,农村的老龄化、空心化、离散化现象愈发严重,不可避免地出现农业生产困难、地域文化流失、社会关系断裂等乡村治理难题。随着农村社区衰落,乡村社会关联度进一步降低,曾经的“守望相助”成了一盘散沙,这是村落危机和村庄失范的重要原因之一。除此之外,受传统乡村治理模式的影响,村民长期处于被管理、被领导的地位,这种自上而下垂直化的治理结构导致在乡村治理实践的过程中,“政府做、村民看”是普遍现象,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意识薄弱。事实上,乡村民众既是参与乡村治理过程的关键性主体,又是分享乡村治理成果的直接受益者。

乡村善治的实质是还政于民,短视频生态下“去中心化”的现实语境,让更多“无名者”登场,突破性地在更广阔的空间获得直接表达利益诉求与主

动传播影像信息的权力,这种内生话语的表达促成村民乡村治理主体意识的生长。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加持下,简明、生动、有趣的短视频不仅易于及时表达还易于广泛传播,消解了乡村治理过程中由于信息差而引起的认知差,在充分给予乡村居民话语权的同时,还提高了乡村居民参与乡村治理的效率。例如,短视频以“云在线”的方式,为在外务工的村民提供便捷有效的参与途径,在“缺场”的条件下实现人不在村却可意见回村。此外,通过点赞、评论、转发等互动行为,短视频的社交属性使得村民实现线上社交,增强村民的粘性并为线下的引流积蓄能量,这为建立起县域所有治理主体间的多向度连接带来可能。在此基础上,村民乡村治理主体身份的认同得以在高速流动的现代社会锚定。如前所述,短视频自“出道”以来,其可视化、展演性、社交化特质既为普通村民提供讨论、行动的空间,也使多元主体拥有连接、互动的平台,促进村民之间、村域之间的互联互通,成为融合多方主体、解决治理隔阂的有效渠道,为乡村治理带来新的活力。

2 问题审思:短视频协同乡村治理的桎梏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短视频媒介的低门槛、易生成、强传播特质,既是其发展的优势体现,也是局限所在,往往导致短视频的价值导向模糊不清、文化内涵意义不足、内容质量良莠不齐等问题。在视觉文化消费盛行的时代,短视频协同乡村治理,打开了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新局面,但其发展过程中所暴露的泛娱乐化、内容同质化和过度商业化等行业乱象,会导致治理工作的本质目的、既有原则和行为逻辑被扭曲。

2.1 泛娱乐化倾向:治理初衷的背离

作为一个经由数据和算法武装的媒介应用,短视频先天配有完善的量化模型,能够准确地监测、调整与引导注意力的最大化,以实现流量变现的最大化。然而,正是这一底层逻辑异化了短视频博主和用户的行动价值取向^[7]。一时之间,诸多以庸俗、低俗、媚俗为表征的乡村形象涌现。例如以“贵州牙妹”“东北蛇哥”等为代表的乡村自媒体人,在视频中展示夸张的表情、另类的行为和荒诞的内容,包括生吃肉类、恶意指丑、舌头灭火等,以价值的畸零和肉身的丑化博取网络关注。如此吊诡的情形恰如鲍德里亚所批判的,“当代社会的身体已被商业所挟持。”^[8]正因如此,短视频场域中“导向不正,格调低俗”问题突出,这其中的短视频被反常和扭曲的视觉修辞所包装,求新求异、追求猎奇,甚至是打擦

边球和突破底线,不仅无助于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反而会带来乡村价值世界的进一步割裂,对村民价值观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和不良冲击。究其原因之一,在泛娱乐化现象的裹挟下,短视频内容生产在形式和内容上均发生悄然价值转向,表现戏剧化、内容浅薄化的短视频产品往往更受青睐,且能吸附更多流量,故此以“博取眼球”换取“流量密码”的短视频层出不穷。娱乐功能本来即是大众媒介的基本功能,但是当一切话语皆以娱乐至上为价值标尺,这既危害社会的公共利益,还剥夺用户的大量时间、挑战受众的思辨能力。

2.2 内容同质化趋势:治理内涵的削弱

如今,在由短视频平台所提供的技术模板和内容框架下生成的短视频作品普遍具有较高的相似度,特别是当某一类“现象级”短视频出现后,雷同作品更是接踵而来。例如,抖音达人“潘姥姥”爆火后,模仿其视频风格和叙事脚本的“徐姥姥”“张姥姥”比比皆是。随着乡村自媒体队伍的日益壮大,这种短视频内容同质化与类型化现象愈发凸显,诸多的短视频作品虽然“主角”不同,但是主题相近、素材相同、场景重复,长此以往会导致“灵韵”的消逝,最终破坏彰显事物个性化和距离感的气质^[9]。当短视频作品日渐成为文化工业复制品,具有鲍德里亚所描述的,“如同流水线上下来的符号”^[10],这将带来短视频的媒介功能弱化及价值导向失范,影响短视频协同乡村治理红利的发挥。具体而言,短视频内容的趋同化正逐渐降低短视频产品的创造性与独特性,同时所引发的“低质”狂欢,一方面挤压了对农村留守儿童、孤寡老人、教育和医疗等公共议题的展示空间;另一方面也缺失了对聚焦“三农”内容在主题、表达等的深入思考及持续关注,形成“热呈现”与“冷遮蔽”的失衡状态^[11]。换言之,短视频场域中“复刻式”内容的呈现方式,不但抑制了其作为传播媒介的功能作用,甚至削弱了其在推动乡村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生态文明协调发展方面的潜在可能。

2.3 过度商业化走向:治理规则的解构

时至今日,短视频的“下乡”,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技术、人才、资金等各类资源要素在乡村社会的再协调与再平衡,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但随之而来,在短视频平台“逐利性”的驱使下,乡村社会受到市场经济的规训,不同程度接受商业资本的怂恿,并逐渐在资源配置、生存竞争的劣势地位中,滋生出“小农机会主义”“实用个人主义”价值观^[12],这显然不利于乡村社会的健康发展以及乡村治理的

有效开展。当资本逻辑介入短视频场域,平台流量竞争愈演愈烈,短视频创作者们难免受到“市场效应”的吸引,将目光聚焦于流量和收益的快速增长。例如,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有一些短视频博主过度植入商业广告以谋取暴利,影响了短视频的可观赏性;还有一些短视频博主甚至是捏造事实、故意卖惨等,不仅损害了短视频内容的真实性,也对乡村社会风气产生了不良影响。正如有学者提出,“流量作为一种微观控制权力,已在用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社会的运行方式。”^[13]因此,必须警惕短视频场域中过度商业化的支配和操控,亟需通过“调控的手”,将市场逐利动机规制在一定的限度内。进而言之,加强对短视频的监管与整治,构建更清晰的利益赋予方案和更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避免出现因过度追逐短视频的“经济转化”而侵害乡村公共价值的情况发生。

3 进路探索:短视频赋能乡村治理的路径

乡村治理是长期性、系统性工程,打造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需要执着探索和持续积累。从乡村治理的历史演进中可以发现,传统的“通知—服从”式乡村治理逻辑,致使村民普遍缺乏参与意识。此外,囿于村民的文化水平以及知识构成,长篇累牍的文字公告难以唤起村民的注意。高质量的治理效能得益于高质量的治理形式。因此,借助短视频的清晰表达与即时传播,并以价值导向明确、传播内容优化、技术水平升级、评价体系成熟为驱动力,能够有效激活短视频媒介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的作用,助力乡村治理稳中有进、乡村发展持续向好。

3.1 明确短视频价值导向

作为精神交往手段的媒介,短视频不仅是内容生产与信息传播的沟通渠道,也是社会关系与意义共享的汇聚空间,参与社会秩序及价值观念的建构。在“加强和创新互联网内容建设,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营造清朗网络空间”^[14]的宏观背景下,做好短视频的定位,明确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遵循公共、合法、民主等价值标准,是短视频媒介嵌入乡村治理场域的根本准则,关乎到终极意义和目的。在由短视频搭建的乡村公共场景中,身着侗族服饰的“乡野丫头”,制作传统美食的“石村小月”和行走乡间田野的“乡愁沈丹”,无不展现出“新农人”们对乡村生活的热爱和乡土文化的自信。他们运用生动、形象的视听语言,既成为城市观者喜爱和认同的对象,也成为城市观者娱乐和模仿的对象,用淳朴、善良感染着屏幕前的现代人,唤醒受众的集体记

忆和情感共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城市向乡村输入技术和审美的同时,乡村也在向城市反哺着价值和信念,传播着中国乡村的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通过短视频的微观叙事,深入乡村社会意义空间,传承并激活“邻里守望”“代际孝道”“勤俭持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这些恰是对乡村社会所出现的失序问题的回应,是匡正现代化可能带来的负效应的良剂,在新时代乡村治理中显得尤为重要。作为具有公共性特质的大众媒介,必须对社会承担与履行相应的责任与义务^[15]。这就要求明晰短视频的媒介社会责任,将主流价值植入内容消费,确保短视频内容的健康化、无害化。因此,短视频在释放话语空间、实现自我赋权的同时,还需规范交往行为、凝聚乡情认同,实现乡村公共价值的回归,形成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思想观念、精神面貌、文明风尚,从而达到规范乡村内部秩序、增进乡村治理绩效的根本目的。概而言之,铭记社会责任,加强媒介约束,摆脱拙劣的、物化的、猎奇的表达,营造一个文明、和谐、绿色的短视频公共空间,因此,在价值层面指明短视频赋能乡村治理的导向是首要问题。

3.2 优化短视频传播内容

在注意力成为稀缺资源的媒介化社会,实现短视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是可以输出长期吸引并且影响用户的优质内容。因此,在新媒体语境下,深耕优质内容依然至关重要,内容的质量决定媒介的黏性。

一是加强短视频内容素材与农民需求的契合度,这是鼓励农民群体自然式融入乡村治理的必要手段。故从农民需求入手,聚焦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实用信息,在涉农政策解读、实用技术推广、致富信息宣传以及农村子女教育等方面持续发力,制作具有普及性、权威性、实用性的短视频产品。

二是短视频的内容呈现需要紧跟时代步伐,用村民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提高政策感染力、宣传吸引力与公众影响力,切实将党和国家的惠农政策传播到千家万户。依托互联网思维,突破政务系统严肃刻板的固有面具,做到去行政化、去模板化。例如,创办“驻村故事”“乡村云游”“选调生Vlog”等栏目,邀请广大村民记录家乡变化、讲述先进事迹,在文本语境与画面情境的建构中,引起村民广泛兴趣,激发村民媒介参与。

三是关于短视频的生产、制作和传播,要科学把握乡村的差异性,善用当地的农耕文化、民俗文化、村落文化等,助力乡村文化的振兴与出圈。从文化底层重塑乡村自信,运用颇具辨识度的方言、服饰、器物等在地化要素,丰富短视频的地方知识、地域特

征,在兼具传统文化与现代趣味中,有效传播、持续更新乡村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如此一来,以媒介技术为硬性基础,以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下的人文生活、自然景观等为软性包装,通过集体记忆整合乡村,汇聚“原子化”的村民,探索虚拟文化空间与现实治理场域的新秩序。

总而言之,短视频的传播内容既可以是村务、商务、政务等领域的任何议题,也可以是发生在“村友圈”的社交日常。通过短视频线上景观的存在方式,开展热点公共议题的“圆桌会”,搭建开放、平等、互动的新型对话平台,释放乡村治理的协同力量,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此外,还可以鼓励和促进农村电商发展,合理利用乡村题材短视频,盘活线上线下的资源要素,通过建设农副产品直播电商基地,助力乡村文化振兴和乡村经济发展的有机统一。

3.3 提升短视频技术水平

技术支持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前置条件,为乡村治理现代化建构技术语境。故此,善用技术的力量,促进短视频媒介承担更加综合的职能,为乡村发展凝聚力量,增添乡村治理活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回顾乡村治理历程,通过技术手段提升乡村治理效能的尝试早已有之,但往往因为技术目标、技术配置与技术供给的结构性脱耦,导致现代化工具悬浮于乡村场域之上^[16]。面对日渐复杂的乡村治理环境,借助短视频化解治理问题、增进治理能力,将短视频驯化成一种全民日常伴随物变得刻不容缓。在这个过程中,首先是加快短视频应用的适老化及无障碍改造。技术发展的宗旨是消弭“知识鸿沟”,然而实际上人们技术接纳的差异性和滞后性问题仍然比较突出。施拉姆在选择的或然率公式中提出,受众从一种媒介中获取的报偿越大,付出的成本越小,这种媒介被选择的概率就会越高^[17]。因而,技术降低乡村弱势群体短视频使用的成本,着力提升乡村老人、留守妇女等的媒介使用接近可得,例如通过界面清晰、操作简单等,使其能够轻松掌握平台使用方法,进而挖掘多元行动主体的治理行动潜力。其次是研发更高阶、更全面、更成熟的智能算法水平,包括可以构建敏感词语料库,继而通过机器算法快速审核含有违规字眼或视像的内容,努力实现算法审核的科学化、高效化、精准化;也可以通过人工智能发掘内容,然后调整算法进行适配,利用跨平台的传播优势,扩大优质信息推广渠道,以此破解政务题材短视频到达率低的瓶颈,实现在当前快速滚动的信息阵中推送重点;还可以通过在短视频平台嵌

入智能机器人,及时对公众诉求予以搜集、分选和回应。同时,建立网络舆情监测系统,及时化解社会焦虑,变负能量为正能量。最后是创新技术突破短视频场域中流量至上的互联网逻辑。一方面要减少对粉丝量、播放量、点赞量等评价性数据的依赖,摒弃以往过于强调量化数据的媒介语境;另一方面将乡村文化、生态、文明等价值贯穿于短视频技术的设计、研发与应用的全过程,以此驱动一个展示乡村价值意义的技术支持体系,在潜移默化之中促成技术在村庄场域的情境适应,助力形成科学合理的短视频价值取向。

3.4 完善短视频评价体系

正确审视短视频价值,科学构建短视频价值评估体系,决定了短视频在乡村治理实践中的操作方式。任何具体的行为皆有特定的价值取向牵引,治理的实现同样需要动态的评鉴行为引导^[18]。基于乡村社会的治理业态不断变化,对短视频治理价值的评估机制也需不断调整。随着媒介技术的快速更新迭代,将短视频背后的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各项技术真正地转化为赋能乡村治理的驱动力量,不仅是及时回应技术更迭与社会变迁的现实要求,也是推动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应有之义。正因如此,关于短视频评价体系的搭建,需要以更为开阔的视角来审视基层社会、村组织、村民在动态变化的技术环境中的相互作用关系。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义之一是解构传统单向式的治理机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增强多方治理主体的话语权和行动力。在媒介化的连接、协作、整合下,短视频所显现的权力扁平化和分散化之效应,给多元主体的全面参与和自治实践带来新的空间,这促进了短视频媒介的参与优势向治理效能的转化。所以在健全短视频价值评估体系过程中,理应由政府、平台和村民等共同建立,多方制定短视频价值评估标准,才能为短视频参与乡村治理提供更加具有公共性的指引。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要主动将媒介逻辑内嵌于乡村治理中,依托平台媒介重构乡村公共服务空间;平台要积极承担网络把关人角色,基于正向激励和负向惩罚的共同作用,切实塑造清朗的网络环境;村民要增强其乡村主人翁意识,通过短视频这一载体实现更为有效的村庄自治,展现中国“三农”新形象。此外,立足于短视频行业的发展现状,打破短视频场域中的唯流量论,亟需弱化以资本回报和市场占有为目标的单一指标体系,构建融入崇德向善、礼义廉耻、邻里和睦等价值的多维指标体系。换言之,

从流量至上引导模式转向公共利益驱动模式,形成涵盖经济指标、文化指标、美学指标等在内的综合评价体系。其中,还要强化乡村文化自信和传统文化传播所占比重,以此构筑短视频生态的文化理性,实现以和谐共生、发展共振为主导的短视频优质内容生态圈。

4 结论

在中国,乡村问题从来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乡村问题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19]。经过百余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治理道路。从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到脱贫攻坚目标的完成,再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推进,折射出我国乡村治理的能力及水平在不断提升。当前,在媒介化乡村的语境下,短视频影响着新时代的乡村治理,无论是重重红利,还是层层隐忧,都应当正视之、引导之、解决之,尽最大可能扬长避短。因此,充分发挥短视频协同乡村治理的优势,政府、平台和村民需要共同努力,在乡村社会内生秩序和外部力量的双向发力下,构建多元、民主、协调的现代化乡村治理模式,让充满活力、和谐有序成为乡村的关键词,擘画中国式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蓝图。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十九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157.
[2]陆益龙. 百年中国农村发展的社会学回眸[J]. 中国社会科学,2021(7):44-62,205.
[3]郑恩,杨菁雅. 媒介治理:作为善治的传播研究[J]. 国际新闻界,2012,34(4):76-83.
[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IC 发布第 54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4-08-28) [2024-09-10]. <https://cnmic.cn/n4/2024/0828/c208>

-11603. html.
[5]周郎生. 治理的理论诠释——从治理到乡村治理[J]. 兰州学刊,2008(7):57-59.
[6]习近平. 把稳方向突出实效全力攻坚坚定不移推动落实重大改革举措[N]. 人民日报,2019-03-20(1).
[7]魏景霞. 乡村短视频多重价值冲突与协同[J]. 新闻爱好者,2022(8):98-100.
[8]让·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M]. 刘成富,全志钢,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20.
[9]瓦尔特·本雅明. 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M]. 孙善春,译. 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21:219.
[10]让·鲍德里亚. 消费社会[M]. 刘成富,全志钢,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06.
[11]栾轶玫,苏悦. “热呈现”与“冷遮蔽”——短视频中的中国新时代“三农”形象[J]. 编辑之友,2019(10):38-48.
[12]李竹筠,宋宗余. 传统存续:乡村文化建设的短视频实践[J]. 河南社会科学,2020,28(12):92-98.
[13]刘威,王碧晨. 流量社会: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形态[J]. 浙江社会科学,2021(8):78-83,158.
[14]新华社.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EB/OL]. (2019-11-05) [2024-09-10]. https://www.gov.cn/zhengce/2019-11/05/content_5449023.htm.
[15]弗雷德里克·S·西伯特,西奥多·彼得森,威尔伯·施拉姆. 传媒的四种理论[M]. 戴鑫,译. 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62.
[16]王云龙. “技术悬浮”: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困境及其应对——基于云南省 H 县的经验考察[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125-137.
[17]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 传播学概论[M]. 2 版. 何道宽,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96.
[18]喻锋,甘清. “价值-组织-方法”框架下的城市区域发展评价体系探析[J]. 理论探讨,2018(5):161-170.
[19]丁志刚,王杰. 中国乡村治理 70 年:历史演进与逻辑理路[J]. 中国农村观察,2019(4):18-34.

数字人文视域下湖南高校海外孔子学院文化摆渡探究

扈启亮

(长沙理工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76)

摘要:在数字化与智能化时代背景下,湖南高校所承办的海外孔子学院作为文化摆渡的重要平台,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为更好地推动湖湘文化的全球传播,湖南高校海外孔子学院亟需通过数字人文技术赋能,在教学资源建设、文化摆渡模式创新、互动交流机制优化等方面进行系统变革。通过重塑文化摆渡理念,提升师资队伍数字素养,开发多样化、现代化的文化展示与体验方式,培养兼具深厚文化理解力与数字技术能力的国际人才,方可提升湖湘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推动世界不同文化的双向摆渡融合。

关键词:数字人文;湖湘文化;孔子学院;文化摆渡

中图分类号:G852;H1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3-0012-05

Cultural Communication of Confucius Institute Hosted by Universities in Hun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Humanities

HU Qi-liang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sha, 410076, Hunan)

Abstract: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ra, the overseas Confucius Institute hosted by universities in Hunan serve as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cultural bridging, facing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the global bridging of Huxiang culture, these Confucius Institutes urgently need to leverage digital humanities technologies to drive systematic reforms in areas such as teaching resource development, cultural bridging model innovation, and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mechanisms. By reshaping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bridging, enhancing the digital literacy of the faculty, developing diverse and modern methods for cultural display and experience, and cultivating international talent with both profou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digital technology capabilities, the global influence of Huxiang culture can be enhanced, and the bi-directional bridging of different world cultures can be promoted.

Key words:digital humanities; Huxiang culture; Confucius Institutes; cultural bridging

纵观世界,各国教育发展战略日益展现出数字化特征。美国通过数字技术重塑教育基础设施,强调师生的数字素养;日本在“社会5.0”概念下进行教育改革,培养适应未来的信息化人才;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国也积极实施各自的数字教育战略,提升教育系统的创新性。党的二十大首次将“推进教育数字化”写入报告,彰显了我国全面推进数字化的坚定决心。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作为融合计

算技术与人文学科的新兴领域,在教育和文化传播中展现出巨大潜力。面对数智教育的机遇与转型需求,全球孔子学院中文教育迎来了数智化发展的新阶段。2021年,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与华东师范大学合作建立了“语合智慧教室”,以支持智能化课堂教学;2022年,《体验汉语VR视听说教程》发布,为学习者提供了沉浸式的中文学习体验;2024年,顺应教育数智化进程,“孔子学院”App正

收稿日期:2025-01-15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规划项目(XJK24CJ001)。

作者简介:扈启亮(1981-),男,宁夏同心人,讲师,博士。E-mail:805693365@qq.com

式发布。通过这些数字化项目,孔子学院正逐步推动语言文化教育的全球化、互动化与高效化。

2006年,湖南省高校在韩国创办首所海外孔子学院。截止目前,湖南省高校在亚洲、非洲、欧洲、美洲各国已承办运营14所孔子学院,其中长沙理工大学3所、湖南大学3所、湖南师范大学3所、中南大学2所、湘潭大学2所、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1所。作为湖南国际中文教育和湖湘文化传播的重要平台,当下湖南各承办高校的学科特色和优势资源尚未在海外孔子学院的中文教学和文化活动中得到深度挖掘和彰显,所建孔子学院在推进湖湘文化对外传播、建构湖南海外形象方面意识、行动均显示不够^[1]。20年来,全球孔子学院在发展中不断传承创新,当下湖南高校的海外孔子学院建设要适应新变化,将过去单向外推的文化传播转向为中外文化的摆渡。我们提倡一种求同存异、文化融合的理念,更要重点关注和解决如何将海外孔子学院插上数智化的“翅膀”,与最新的智慧科技相结合,“联通融合,传承创新”,推动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

1 数字人文融合下湖南高校海外孔子学院文化摆渡的特征

数字人文通过人文探索与数字技术的持续对话,逐渐发展为一系列创新的融合实践^[2]。作为新文科建设的重要任务,数字人文与语言文化教育的结合呈现出即时性、个性化与互动性的新特征,为湖南高校海外孔子学院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数字人文技术的逐步应用,推动了国际中文教育方式的现代化转型,拓宽了传播渠道、丰富了传播内容、促进了交流参与,为海外孔子学院的文化摆渡开辟了多元且高效的路径。

1.1 即时性:拓宽传播渠道

《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鼓励教育与技术的深度融合,这为孔子学院利用数字人文手段开展文化摆渡提供了明确方向和技术支持,也开辟了新渠道。数字人文时代的传播具有显著的即时性特征,使得中文语言教育和文化互通不再局限于线下和物理空间,它可以通过在线课程、虚拟展示、数据分析等多样化形式,打破传统地域限制,构建跨时空的文化摆渡方式。文化摆渡内容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快速全球传递,与国际受众即时互动,从而提高传播效率。通过网络平台、社交媒体等多种数字媒介,孔子学院的文化摆渡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地方走向国际,全球受众都可以随时随地参与到湖湘文化课程与活动中来,有效扩展了语言文化传播的覆盖面。

1.2 个性化:丰富传播内容

借助数字人文技术,湖南高校海外孔子学院能够深入挖掘湖湘文化的核心精神,通过数字平台展示其所蕴含的“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并将其与现代商业文明相结合,打造兼具地域特色和现实价值的文化品牌,从而增进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数字人文技术支持多模态传播,采用文本挖掘和知识图谱等技术整合多元文化教育资源,以数字化教材、在线课程和虚拟文化体验,满足学习者的多样化需求。数字人文技术利用图片、视频、音频和VR等手段,可将湖湘文化中的历史古迹、地标建筑和民俗风情等文化元素沉浸式生动呈现。虚拟现实和3D建模技术让学习者仿佛置身于真实文化环境中,增强了文化内容的直观性和易于理解性。数据分析和算法推荐更是可根据学习者的兴趣和需求,实时反馈调整并精准推送语言文化内容,这种个性化方式极大提升了孔子学院文化摆渡的针对性和吸引力。

1.3 互动性:促进交流参与

数字人文时代,互动性已成为不同文化交流融合的核心要素之一。受众不再是异域文化的被动接受者,而是可以通过在线评论、分享等多种方式积极参与交流,与传播者形成紧密互动。通过数字人文技术,搭建具身化、互动性强的跨文化交流平台,借助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和在线平台,湖南高校海外孔子学院可打造出沉浸式文化学习场景,让学习者能够近似身临其境地体验湖湘文化,并通过实时互动增进参与感。数字平台为不同文化互动提供了便捷的交流渠道。通过在线论坛、社交媒体、博客、网络电台广播等多渠道、多层次方式,与语言学习者和文化爱好者建立起即时互动。这种互动性促进了文化内容的深度体验,使得湖南高校海外孔子学院能够进行持久的、良性循环的文化摆渡。

2 湖南高校海外孔子学院文化摆渡的路径

国内学者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数字人文的概念、特点、发展历程以及跨学科应用进行了广泛研究。数字人文技术的应用也从最初的人文资料和文献档案的数字化起步,逐渐扩展到文本挖掘、网络分析、可视化、空间人文等技术分支,探索了多样化的应用路径。在这一背景下,湖南高校海外孔子学院可充分借助数字人文技术,建设数字化教学资源库、开展在线文化课程活动、打造文化摆渡新媒体平台,推动文化摆渡路径创新,为全球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交往开辟新的方式和渠道。

2.1 建设数字化教学资源库

《文化数字化战略》提出通过构建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推动资源数字化,这为湖南高校海外孔子学院文化摆渡实践提供了有力支撑。通过 OCR(光学字符识别)、3D 建模等技术,可以将纸质资料有效地转化为数字格式,从而创建便于存储、查询和共享的教育资源库。例如,由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的《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2021 年版)线上查询系统,通过数据管理技术与关键词检索功能,为中文学习者提供便捷的资源访问体验。其次,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收集受众语言文化学习过程中的行为数据,并利用数据挖掘工具进行智能分析,以实现资源库的动态优化。这一过程能够使得资源库不断根据学习者的需求与反馈进行更新和改进。例如,学习者可以通过各孔子学院的官方网站随时访问和下载所需最新学习考试资源。学习过程中如对相关内容产生疑问时,教师可以及时添加讲解视频和练习题,助力学生深入理解并掌握知识点。这样,数字化教学资源库不仅提供了便捷的学习资料,而且满足了个性化的需求,提供了精准的学习支持。

此外,数字化资源库更应具有泛在化和开放性的特点,以便实现无缝衔接的学习体验^[3]。这要求湖南高校海外孔子学院与湖南本地文博机构、研究机构等进行合作,获取档案文献、田野调查和考古数据等专业资料,进一步丰富教育资源。同时,通过借助出版机构、数据服务商等市场主体,以多方参与的方式建立一个开放联通共享的生态系统,确保语言文化学习资源能够动态供给。

在管理体系方面,应建立“中心统筹、各院自治”的模式,由中心负责顶层设计,确保资源库建设的总体规划和标准化。海外各孔子学院需根据当地的文化特色和中文教育需求进行资源的开发和定制化调整,从而实现跨地区资源的共享与共建。为避免出现学习资源的“数据孤岛”问题,可以应用本体论、语义网和知识图谱等技术,构建统一的数字资源描述规范和元数据标准,从而提升数据的语义关联性和聚合能力,进一步优化资源库的整体效能。

2.2 开展在线文化课程和活动

在数字人文技术支持下,湖南高校海外孔子学院可探索打造多样化的在线文化课程和活动,利用多平台联动的方式,通过全景 VR 课堂和实境直播课堂,开展线上文化活动和沉浸式技能课程来为全球学习者提供深度的语言、文化、技能学习体验。例如,湖南第一师范学院与美国南犹他大学孔子学院

合作开设的数字化红色文化教育课程,利用虚拟现实技术重现中国革命历史场景,生动呈现青年毛泽东在湘求学过程。美国学生通过这一虚拟场景,不仅可以学到中文语言,近似身临其境感受湖南红色文化氛围,更能加深对近现代史和红色文化的了解。利用在线协作平台和项目管理工具进行项目式和研讨式教学可增强语言文化学习的互动性和实践性,使学生能够在实际探究中内化语言文化知识并付诸实践。例如,湖南师范大学与俄罗斯喀山联邦大学孔子学院合作设计的儒家思想大富翁游戏,将儒家经典名句的背诵、核心概念的解读和道德准则的内容融入游戏任务中,学生则在游戏闯关过程中探究、理解、学习儒家思想文化。

另外,湖南高校海外孔子学院还可通过在线直播、虚拟展览、文化竞赛等各类形式,融合跨学科资源,举办多元化的数字技能工作坊^[4]。在线技能工作坊将文化体验与技能学习有机结合,可逐步涵盖基础知识和应用技能,通过纵向深化和主题分层,实现内容的系统化和多样化。例如,湖南城市学院与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合作开设“中文+戏剧”在线工作坊,教授湖南地方戏曲及民歌;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通过 3D 动画和虚拟演示,开设“中文+职业技能”线上工作坊,讲解新能源汽车生产流程及汽车智能设备操作;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与马来西亚中车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联合开设“一带一路”铁路工坊,利用虚拟驾驶技术展示轨道交通装备,帮助学生提高中文应用能力和操作技能。这些在线活动和课程均拓展了海外孔子学院文化摆渡的灵活性和多样性。当下,海外孔子学院如何进一步依托各自的特色办学优势,围绕湖湘特色的创新应用和文化遗产保护等,打造各自专业化、特色化的线上中文行业中文课程,并能提供丰富的数字化技能资源,是海外各孔子学院亟待解决的问题。

2.3 运用新媒体加强文化交融

当今时代,以小红书、Youtube、微博、微信为代表的新媒体拓宽了文化摆渡的新渠道,同时也扩大了海外孔子学院文化交融的范围、广度和维度。湖南高校海外各孔子学院可联合在新媒体平台上成立数字化湖湘文化体验中心、纪念馆、博物馆等,通过 VR 视听和全息投影等数字技术,建立起具有真实感、全景式的文化体验场景。海外孔子学院学生可以随时虚拟游览欣赏张家界的奇山异石,或走进岳麓书院,学习了解湖南历史人文知识,实现与湖湘文化的广泛交流和深度融合。

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的视频直播更是可以

让不同文化实时交流融合。例如,在湖南举办苗族“四月八”节日活动时,通过新媒体平台直播,海外学生实时观看苗族人民的歌舞表演、传统服饰展示等节目,设置互动环节,学生可以提问、发表自己的感受,同时由专业教师进行讲解,帮助学生深入了解对比不同国家民俗活动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历史知识。这种真实而又贴近生活的文化活动直播互动,可以极大地激发广大海外中文学习者的参与感和对湖湘文化的亲近感。

2.4 运用人工智能优化语言文化教与学策略

人工智能能够根据受众的学习进度和理解程度,提供个性化的资源与反馈,确保因材施教^[5]。通过精准的学习者画像与智能推荐系统,跨越时间、空间以及语言障碍,人工智能让语言和文化学习内容更准确地触达目标学习者。湖南高校海外孔子学院可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和可视化手段,精准了解受众的学习进度、兴趣和学习模式,动态调整内容和教学方式与媒介,提升学习效果和学习体验。例如,开发 HSK 智能中文水平测试系统,系统可根据不同级别自动生成多样化的听力、阅读、写作等测试题目,利用算法对学习者答题进行分析,精准评估其中文水平,智能推荐和分发学习内容,为后续学习者提升中文学习提供路径规划建议。

人工智能还在海外孔子学院教育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自动化评分和即时反馈功能减轻了孔子学院教师负担,提高了教育管理的效率与透明度。人工智能的趋势不可阻挡,它正成为推动文化创新与文化摆渡的重要力量。然而,目前世界通用的大模型数据训练集中,中文语料占比不够,导致人工智能对中国文化理解有限。湖南高校海外孔子学院要加快推动语言文化相关语料库建设,推动优秀跨学科孔子学院教师的培养和选拔,将语言文化的建构与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有机结合起来,将中文语言文化推向更大的世界舞台。

3 构建文化摆渡共同体的对策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湖南高校海外孔子学院的文化摆渡面临多重挑战:技术人才短缺制约了数字化课程的高质量开发与运营;文化数字化质量的把控直接关系到文化摆渡的准确性与深度;文化差异与数字鸿沟的存在则对不同文化融合与教育公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为应对这些挑战,湖南高校海外孔子学院亟需制定科学对策,以技术赋能文化摆渡,以质量保障文化价值,以包容跨越文化差异,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更高效地进行文化交

流交融,传递湖湘文化的独特魅力。

3.1 应对技术人才短缺

数字化转型带来了技术人才短缺的挑战。具备数智素养的国际化人才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国际传播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6]。湖南高校海外孔子学院需要培养和引进具备信息技术和文化教育双重素养的复合型人才,完善孔子学院教师发展标准,将数字素养和跨学科研究能力作为教师遴选的关键指标^[7]。当前,湖南高校海外孔子学院应加强对教师和工作人员的数字技术培训,包括人工智能应用、Python 编程等技能,以提升他们在数字平台上的教学能力;同时推动跨学科融合,促进人文学科与理工学科的合作,构建“双师型”教学团队,鼓励人文学科教师与数学、计算机等理工学科教师协同开发数字人文课程,并探索人机协同的新教学模式,增强文化传播的创新性。

此外,打造人文教育创新共同体,构建复合型团队促进“群智涌现”,组建由不同专业背景人士组成的混合团队,充分发挥“团队科学”的力量,实现跨学科的整合创新,推动“智能脑与社会脑”的共建,培养人机共生环境,形成复合思维。发挥群智协同效应,整合与其他教育机构和技术团队的合作,各海外孔子学院可以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推动人机混合教学模式,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延展教师的认知能力,提供更丰富的教学支持。在管理层面,通过数智技术实现管理的透明化,增强管理的互动性和灵活性,赋予教师、学生和管理者更多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与此同时,需将人文精神融入新媒体平台的建设与文化互动中,确保交流过程中不丧失文化的核心与人文精神。通过在智能技术设计与应用中嵌入以人为本的原则、心忧天下的情怀、敢为人先的勇气、经世致用的学风,以文化自信塑造新媒体平台的文化摆渡灵魂。多方协同和人机共生的结合将为湖南高校海外孔子学院的湖湘文化全球摆渡交融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3.2 把控文化数字化质量

建立严格的数字化文化资源质量把控机制,对文化内容进行审核与评估,确保其符合对外文化交流摆渡的要求和标准。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了技术异化和伦理风险,湖南高校海外孔子学院在文化数字化过程中应注重人的主体地位,抵制技术对人文价值的异化,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爱、公正等人文精神融入数字内容的制作与传播中。同时,制定严格的伦理与质量规范,确保数字化文化内容符合道德标准,维护对外文化交流融合的质量与

完整性。运用大数据、学习分析等技术,提升湖南高校海外孔子学院文化摆渡和中文教育的评价机制,构建多元化、动态化的评价体系,加强过程性评价。依托教学管理平台和学习行为分析系统,评判文化摆渡效果与补齐中文教育短板,实现持续监测与反馈调整。文化数字化质量把控还需借鉴质量管理领域的“目的适切性”质量观,将外部适切性与内部适切性作为质量衡量的标准^[8],确保数字化资源既符合当地社会需求,也切合国际中文教育本身的使命和学习者的需要。美国质量管理学家克劳士比指出:质量即符合要求的标准^[9]。如果将质量视为目的适切性,意味着衡量标准即为预期目标的达成情况^[10]。因此,在衡量文化数字化的外部适切性时,湖南高校海外孔子学院需确保数字资源符合当地社会对中文教育的需求,满足不同地区学习者的实际文化理解需求;内部适切性则要求资源的设计与湖南高校海外孔子学院的国际中文教育使命相一致,在内容、呈现方式、技术手段等方面适应学习者的身心发展特点和学习偏好,同时兼顾教师对资源质量的要求及科学适用性评估。通过建立全面的质量把控体系,确保文化资源的高质量数字化,保障资源的外部与内部适切性,方能为实现湖南高校海外孔子学院文化数字化教育的长期效能奠定基础。

3.3 跨越文化差异与数字鸿沟

针对不同文化背景学习者的需求差异和技术资源不均的现状,湖南高校海外孔子学院应优化资源适应性,缩小数字鸿沟。《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通知》强调,要均衡教育资源供给,通过开放资源和技术支持减少数字鸿沟。在湖南高校海外孔子学院文化摆渡过程中,部分学生和地区可能因社会基础设施落后,缺乏技术条件而难以充分接触和参与文化交流学习,从而影响文化摆渡的效果和公平性。为此,海外孔子学院应积极整合资源,通过开放教育资源、提供多语种数字化学习平台等方式,降低技术门槛,提升文化教育的公平性和包容性,促进跨文化的公平互动。同时,开展数字素养教育,帮助数字技术落后地区的学习者提升数字技能,实现中文教育资源的均衡供给。在文化互动方面,应根据受众的特点进行个性化定制,提供适应性强的教学方案,并通过严格规范数据采集和应用,确保文化学习的公正性和信任度,避免因隐私问题影响学习者对孔子学院的信任与参与度。此外,采用数字人文模式,结合实证研究和传统研究方法(如田野调查和深度访谈),避免单一模式可能导致的偏差,确保文化摆渡的多元性与准确性。然而,数字化

手段在文化摆渡中往往过于注重效率和效果,容易忽视学习者的情感体验和深层次的文化理解。因此,湖南高校海外孔子学院在数字化文化摆渡过程中应平衡技术手段与文化摆渡理念,注重不同文化交融中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

4 结论

《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到“十四五”时期末,要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到 2035 年,则要建成高效搜索、全面共享的中华文化全景呈现,实现中华文化数字化成果全民共享。这一战略目标为湖南高校海外孔子学院的文化摆渡实践指明了方向。面对全球数字化浪潮,湖南高校海外孔子学院需以“技术+文化”双轮驱动,既借力数智工具提升文化摆渡效能,更要坚守人文精神内核,向世界展现湖湘文化的时代活力,将海外孔子学院打造为中外文明互鉴的数字化枢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数字化实践的“湖南智慧”。

参考文献:

- [1] 沈敏. 新时代汉语国际传播的湖南对策[J]. 湖南社会科学, 2021(2): 143-147.
- [2] 左娜, 张卫东. 数字人文跨学科共生因素及档案范式识别研究[J]. 档案学研究, 2021(4): 25-31.
- [3] 徐微. 面向高校数字人文教育的现代信息技术应用模式研究[J]. 山西档案, 2024(5): 103-105.
- [4] 吴飞燕, 吴军其, 文思娇. 数智技术赋能新质教育: 逻辑意蕴、现实挑战和实践路径[J]. 开放教育研究, 2024, 30(5): 54-62.
- [5] 祝智庭, 戴岭. 融合创新: 数智技术赋能高等教育的新质发展[J]. 开放教育研究, 2024, 30(3): 4-14.
- [6] 吴应辉, 袁羲.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国际传播数智化路径探讨[J]. 电化教育研究, 2024(4): 123-127.
- [7] 许晓彤, 张婧妍, 张伟霞, 等. 数智时代档案学专业人才培养的需求、困境与进路——基于教师视角的调查[J]. 档案学通讯, 2024(3): 104-112.
- [8] 王红, 罗小丹. “目的适切性”: 师范类专业认证何以促进教师教育课程质量观的转变[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1): 31-40.
- [9] 宋祥彦. 对克劳士比四项质量原则的思考[J]. 标准科学, 2009(7): 44-49.
- [10] JOHNSTON R J. Quality assessment of teaching: Inputs processes and outputs[J]. Journal of Geography in Higher Education, 1994(2): 184-193.

明代遗民身份与李焕章文学创作之关系探析

隆英洁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00)

摘要:明代山左遗民李焕章内心充满着黍离之悲,拒绝出仕清朝后过着访游、隐居的生活,专力于读书撰文。遗民身份不仅作用于李焕章书写亡国之思、忠义人物、隐闲生活的创作主题,对其悲愤、委婉、清雅的创作风格也产生了明显影响。对遗民身份与李焕章文学创作关系的探讨,有助于明清之际“山左文学”的研究,也为明代遗民文学研究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李焕章;遗民身份;文学创作;创作风格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3-0017-06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dentity of the Adherents of the Ming Dynasty and LI Huanzhang's Literary Creation

LONG Ying-ji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00, Shandong)

Abstract: Li Huanzhang, an adherent of Shanzuo in the Ming dynasty, was filled with sadness of separation. After refusing to serve as an official in the Qing dynasty, he led a life of visiting and living in seclusion, dedicating himself to reading and writing. His identity as an adherent not only influenced his writing themes, which included thoughts on national subjugation, loyal figures, and a reclusive lifestyle, but also had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his sad, indignant, euphemistic and elegant writing style.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 Huanzhang's identity as an adherent and his literary creation contributes to the study of "Shanzuo literature" during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y, and also provides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study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adherents of the Ming dynasty.

Key words: Li Huanzhang; the identity as an adherent; literary creation; writing style

明清易代之际产生了大量的遗民,其中不少人对故国深怀情感、坚不仕清,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抗新朝,山左遗民文人李焕章便是其中之一。李焕章字象先,号织斋,乐安(今山东广饶)人,其才名噪一时,著有《织水斋集》《龙湾集》等文集。李焕章自幼聪慧,然仕途不济,明朝时仅为诸生。明亡后他不再入仕,云游四方广交挚友,为人怀瑾握瑜,颇有时名,曾被称为“青州四大家”之一。李焕章的遗民情结较重,而这一情结对其文学思想与文学创作的影响十分明显。

1 李焕章遗民身份认同的基本表现

“遗民”一词在历史的变迁中多解释为被前朝遗弃之人,这是广义上的“遗民”概念。目前学界对“遗民”的概念多从狭义的角度认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要素:首先是对在易代前后人生选择的判断,“遗民”主要指“在旧朝有一定的名望和影响,或在旧朝有出仕经历”且“易代之后不愿出仕新朝或肯认新朝”^[1]的前朝士人;其次是对意识层面的关注,“内心深处必须怀有较强烈的遗民意识”^[2]成为判断是否为遗民的重要标准;最后,则要着眼于其对待

文化的态度,“关注他们对传统文化中的道统、学术等方面的强劲依附力与自觉性。”^[3]结合有关遗民身份的界定标准,李焕章明代时的士人身份以及其入清之后的表现与其作品中的相关内容,对其遗民身份的认同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1.1 故国之思,难忘旧朝

明朝覆亡,满族登上统治者舞台,因为交战的非正义性与固有的“华夷之辨”思想影响,李焕章不愿服从少数民族的统治,在战乱后流离失所的凄凉处境中,愈加怀念旧朝。其诗作《对酒有怀》中,“身世浮萍应莫问,且须呼酒意相亲”^[4]¹⁹⁴表明李焕章对于清朝并没有归属感,在明亡之后就像无所依的“浮萍”一般,只能借酒消愁;《清明》中提到“明朝已往,触良臣窃怀旧主”^[5]¹⁵⁸,文中还描述了当日热闹的景象,外界的繁华与自己内心怀念旧国的落寞形成强烈的反差,故国本就是记忆中难以割舍的一部分,于特殊的节日中愈显眷恋之感。李焕章对故国的思念,也在对清朝的批驳中表现得更加鲜明。在其文章《<徐汝廉先生与钱大宗伯书>书后》中提到清朝在面临着存亡的威胁时不提前做好防控,大臣进言竟遭到反驳并被定为乱言,这与明代时的尊贤养士并居安思危的情形正相反,在这样的对比中,对旧朝的思恋与肯定愈加显著。李焕章对明朝的怀念映射着他朝代交际时的心路历程,亡国之痛、忧患意识是其此时最渴望显露的感情。

1.2 崇尚气节,坚不仕清

不仕新朝是遗民群体亡国后最基本的人生选择,所以面对清王朝的软硬兼施,李焕章并不是一个顺从者。据《留溪外传》记载,李焕章与济阳张稷若、阳信毛桂甫面对清廷的召出“披发佯狂”以逃避在清朝做官;其在拒绝乐安县令的举荐时连写三篇《与邑侯邵公书》,文中“贫而易志,老而改节,焕章即不肖,不至此”^[6]⁶⁴¹既道出了自己讲求气节,又直接言明其不愿出仕。他以诗明志,在《志不二朝》中这样写道:“志不二朝惟织斋,皇家爵禄视如灰。白头到死披长发,甘做大明老秀才。”^[4]¹⁹⁵诗中简明地表述出自己不入仕清朝的坚决,对明朝的忠情白首愈坚。李焕章还善于利用佛道思想包装其不在清朝为官的决心,他陈说“某自宿命通来,不欲婚,不欲宦,得一大禅宗为之导师”^[6]⁶⁴⁵,从而放弃对他入仕的游说和推荐。后来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称李焕章“前世为某寺执爨僧”^[7],显然这种避仕方式取得了一定成效。

1.3 消极对抗,云游隐居

不入仕的自由身份给予了遗民群体充足的时间

交友游历。广交挚友,云游四方,盛览大好河山排遣忧虑,也成为遗民群体的另一种生活方式。在《再与马汉仪书》中,李焕章自述多次游江南、岱岳、京师等地,并指出“非无故而仆仆东西南北也”^[6]⁶⁴⁷,结合清初的统治状况,印证了其游隐是为了摆脱清朝的应召与排解亡国之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远离清初的统治。游历期间,正如李焕章自述,“猿鹤之盟既坚,泉石之志愈固,竭有用之心,思寄不情之竿牍”^[5]¹⁹⁵,在感受到远离新朝纷扰的宁静后坚定了归隐之心。这也与明清之际士人对于庄子思想的定位有关,虚无遁世和个性解放的思想在明季遗民“立节”的心理状态下成为了更深层次的情感需求。在云游归来后,李焕章采取消极对抗清朝的方式,隐居于法庆寺,“专肆力于古文辞”^[8]¹⁷⁷⁹⁵,以实现出道义等传统儒家文化的关注与传承。

李焕章遗民身份认同的基本表现与其浓重的遗民情结有密切的关系,即使选择隐居也并不意味着与当朝之人断绝来往,在他的结社交友活动中,除身世相似的遗民文人外,不乏在清朝为官者,他们之间是一种赏识与告诫的单向交汇。所以李焕章并非隐居后不问世事,他更期望沉浸于一种半仕半隐的状态,既不与清廷产生君臣关系,又能抒发自己的抱负。而这种始终眷恋旧朝,并且蕴藏着忠、义等品质的遗民情结,不仅影响到了他的言行举止,也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较为明显的影响。

2 遗民身份对李焕章文学创作主题的影响

2.1 对清朝统治的批判

清朝建立后一直都有战事存在,不断征用平民百姓去往前线的行为更加重了李焕章对清朝的不满。李焕章在很多文章中提到战乱不断的场景以及对此类现象的无奈和担忧,乃至特意写作文章谈及征夫与家人的生活状态。如《苦热赋》中“怅征人之离乡”^[5]³²描绘出烈日炎炎的正午,征人与家人走上一条不知何时重逢的道路,离家之人与送别之人在这酷暑中都显得额外焦灼;再如《鸡鸣赋》中“促征夫以前路”^[5]³²讲述了征人在刚破晓时就要匆匆离开,踏上征途的场景,阐发出对征夫的怜悯和同情,但更多的还是对清廷的披露。从上述文中表达对清朝的强烈谴责来看,李焕章即使选择归隐也没有真正遗世独立,其常态仍是“哀民生之多艰”,胸怀天下,看不得人间疾苦。所以由于清朝对地方的监管不利与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贼寇霸行发生时,李焕章对新朝的排斥愈来愈烈,如《书竹山寇事》用详尽的笔触讲述了城寨被贼寇所掠的惊险场面,于

无奈中裹挟着激愤。由此类文章来看,战乱后李焕章首先想要告知世人的是因被野蛮的军事征服后的愤懑与对清朝统治糟糕状况的批判。也是基于这种批驳,李焕章在许多文章中称清军为“乱贼”“逆闯”等,并且在《与邑侯绍公第二书》中表示:“一旦服官与铜臭儿为伍,更隶胥佣贩之流。朝夕焉,或横而居其上,抑首伏气,无复人理,此人世未有之辱。”^[6]⁶⁴¹他将清廷比作“铜臭儿”,更将入朝为官视为巨大的耻辱,可见当时的朝廷存在着弊端,并不能让前朝遗民信服。在无力反击清廷的情况下,李焕章寄希望于文学作品,以阐发自身对于时代兴亡中“小人物”的大情怀,让后人能够体会到遗民的爱国情怀与无助的悲叹。与这一文化心理相联系,在作为遗民文人的生命形态下,李焕章的作文被对抗强权的愤怒引导着,更加侧重于政治意义上的观念传输而非单纯的文化遗产,从而体现出属于遗民群体的民族文化精神。因为遗民对于明清之际的剧变来说,他们并不是旁观者,而是以亲历者的角色出现,所以要从造成自己遗民身份的源头——政治生活写起,将自己的故国之思、心头之痛蕴含在批判性的文章中,以此来调适几乎无法平复的心态。

2.2 以书写忠义人物明志

作为明代遗民,李焕章善于对忠义、孝廉等道德品质进行捕捉,这在《与刘君秋水书》中有所体现,他认为文章可以“为千百世明君贤相、忠臣义士、贞夫烈女之所归,乱臣贼子、金壬倾陷之所惧,天雨粟、鬼夜哭,眉山草枯,良有以也”^[5]⁸⁴。对于李焕章等遗民群体而言,未能保住故国是心头之痛,所以更愿意借助对为国效力的忠烈之士的赞扬,以抒发自愧之感与爱国之情,让人感慨良多。在李焕章的意识中,文章可以记录古今史实,所记之事蕴藏着治国治人的道理,可以成为后世的榜样,亦可提供鉴戒,所以他的文章常以忠烈之人为主角来表达对他们的敬仰。如《书汝州知州钱公忠烈祠碑后》中记载贼寇占据中州数十年,钱公在都臣已故、诸将远征的情况下与乱贼相战,殉难于疆场,这是忠烈之士的爱国情怀促使其竭尽全力以守护国家。忠义的女性也是其重点表述的对象。《周夫人传》中记载周夫人是山西总兵左都督的妻子,她随夫杀敌,令李自成等反贼闻风丧胆。但是左都督战事失利自杀后,夫人也自刎死于阵中。对这样将爱国与贞烈之情融入到骨头中的勇敢女性的书写,从侧面显示出李焕章对忠义优秀品格的认可与重视。被传统认识固化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女子尚可拥有为保国而殉难的勇气,屈服于清廷的士大夫却选择守护自身利益,在两者的对

比中凸显出李焕章忠于义节的遗民意识。

李焕章所写人物的品行之高,就像其在《古墓赋》中所评价:“忠臣孝子之名垂乡国兮,英雄豪隽之气壮河山。”^[5]⁴²明朝注重文学的启蒙作用,李焕章受此影响,他试图用所记之士感化当时背信弃义之人,为他们树立榜样也敲响警钟,以这种方式再为已故的明朝尽绵薄之力。古人崇尚立德、立言、立功,李焕章则认为“文字之重在立德立功之外”^[6]⁷⁰²,所以他热衷于著书立说,以在混乱世道中给予卓越的品行一席之地,但终究还是将着眼点放在执行高尚品德的人身上。

2.3 以记写云游隐闲生活避仕

云游、隐居不仅是为了避仕而存在。一方面,它是经历亡国丧乱后一种疏解忧郁悲愤心情的方式,站在这一角度来说,游闲生活是在有排遣自身情感的需要中进行。另一方面,今人沿用归庄有言:“逸民者,殆指居清平之世而隐逸之民。而遗民者,则处江山易代之际、以忠于先朝而耻仕新朝者也。”^[9]云游隐居是实现“遗”与“逸”之间转换的方法。

2.3.1 对云游经历的记述

李焕章常与声气相投的朋友游乐,相同的时代遭遇使他们拥有情感共鸣,能够信任彼此并吐露心声,他们也乐于沉浸在得到片刻宁静的喜悦中,成为相携度过困境的伙伴。李焕章对云游经历的记述主要是记叙游览景点与丰富先人传记两部分。

记叙游览景点。李焕章所记述的景点大多承载着时间的变迁,其更喜欢在今昔对比中表现自己对故国的怀恋。《步泽湖记》是一篇游记散文,记述少年时在崇祯年间与其兄浮玉及徐太拙等人“扣弦歌之”的悠闲画面,壮年时重返泽湖时与友人“酒酣乐作”的情景,年老后也是与友人同行前来,写作传记描述游览过程。但是在最后孤身来到泽湖时,却发出“人事迁更”的感叹,由今视昔,情随事迁,不免引起心中对故国的怀念之情,尤其是在独处时,这种思念愈加强烈。这篇文章在对自己和友人的悠闲生活书写与独身一人的对比中表现自我情感,也反映出明代遗民对于闲情的表达“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地域文化、思想传统等因素有密切关系”^[10],特殊的剧变时期唤起作者压在心底的爱国情感。

除大江大河、名山大川外,屋舍、庭院等也是友人常小聚的地方,同样承载了明清交际时山左文人的交友应和。当时山左有着“诸城十老”等文人群体,李焕章常寓居诸城,与他们一同相游,因为都于战乱中幸存,见证了一个朝代的灭亡和另一个朝代的兴起,相同的人生境遇使他们能够惺惺相惜。李

焕章对其中张衍、张侗等不入仕的明代遗民评价颇高,交际往来也很频繁,放鹤园、卧象山等地记录了他们踏歌作诗、欣赏美景的闲适场面,如《鹤园宴集记》等。

丰富前人记传。李焕章所游览之处,如有前人作传,他便丰富记文,增添时事或自我感受。比如关于超然台,苏轼在《超然台记》中表现的是不被外界所束缚的一种超然物外的情感,而在李焕章所作的《登超然台记》中,则更多地记述了超然台的历史,期间提及凤凰台等地,谈到各地所遭遇的历史变故,使人想起战乱之际的场景便“每过其下,眷恋留连,不忍舍去”^{[6]657}。文中李焕章借用苏轼的传记所表达的超脱思想与自己无法走出朝代变更的伤痛进行对比,使情感呈现得自然而强烈。与此相似的地方还有琅琊台,作者在《琅琊台赋》一文中极力撰写其优美景色,可与沧海相接,可与青天相连,散吏、词人“赋长篇于沐宫之屿”“刻篆记于盖公之堂”^{[5]50}。李焕章在丰富同一景点的记述的同时,仍然站在遗民角度以阐发亡国之悲。

2.3.2 对隐居生活的记述

易代之际,明代遗民群体更加向往陶渊明式的隐居生活,李焕章在云游归来做出同样的选择。他在游隐的过程中仔细思考了自己应该以何种姿态面对清朝,最终明确自身心志,成为一个以文济世的“岩穴之士”。李焕章对于隐居生活的记述主要集中在敬仰贤者的归隐与寺庙中的见闻两个方面。

敬仰贤者的归隐。李焕章认为“辟世辟地,在乱亡之朝十有八九”^{[5]124},这一时期生存愈加艰难的遗民群体更倾向于选择漱石枕流的生活。历代贤者的归隐对于遗民来说是强有力的精神慰藉,致使明清之际的文坛上“和陶诗”的现象层出不穷。李焕章在《八不居士墓铭》中描写的“八不居士”就是道德高尚的隐者,其不为名利也不畏贫苦,一生践行着自己的“八不”之义赢得后世遗民与不屑于功名、厌倦繁杂尘世的人士的敬重,作者谈及每次经过居士的墓都“敬而式之”,由此可见其对贤士隐居的钦佩。这种在历史中传承下来的卓然自立的名士风流为遗民群体提供了超功利的心灵世界,于一方净土中向世人表白自己甘于沉浸鹭朋鸥侣的状态而不进世俗的心志。

记录寺庙见闻。“逃禅”是遗民群体避仕的有效途径。由于社会战乱与由此衍生的生命无常感,遗民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佛道思想麻痹自己,以忘却心中不悦,寻求心理层面的解放。明清之际的遗民参禅已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李焕章也是如此。他在

《〈秋风草〉序》中谈到“余老来归空门”,其游历归来后主要居住于法庆寺内。法庆寺在其文章中出现多次,以《法庆寺赋》为例,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夸赞了法庆寺的优美与安详,由其环境引出的“上报佛恩下遵禅智”成为李焕章云游归来后心境的阐述。文中通过对法庆寺禅意的表达来寄托自己想要摆脱亡国伤痛的思想,此外还提到历史上的掌权者等与政治有关的要素,读者可以从中领会到李焕章想要借接受寺庙中的佛禅思想暂时忘记自己遗民身份的迫切心情。关于在寺庙时所见所闻的人物,李焕章在著作里也有提到,如《与两禅师书》中所记,他与两位禅师谈论关于写文章的故事,因其具有明代遗民与士人的双重身份,作者在隐居期间并未完全沉浸在超脱世俗的世界里,而是将大部分的精力继续投入到写作中。李焕章的诗中也有对“禅”等事物的表达,如《初秋上方晚坐》(二首)中均说到“谈禅不厌寂”“不尽逃禅意”^{[4]192},直接表明自己对于心态放空的期待。静思打坐固然可以用静寂的环境,暂时逃脱作为遗民对自身处境的忧虑和心中不满,但在寻求解脱的路上能找到参禅这一方式又恰恰反证了其心中满满的忧郁。

李焕章自述:“某自丧乱来,不即死,托之文若赋以延岁月。”^{[6]653}他选取上述主题展现自己的生活与遗民心态,这是直击其内心的情感表达,“这是从文学角度进行的历史叙述,是一种心灵史的叙述”^[11]。李焕章试图将遗民文学转化成不朽的精神文化,这也是遗民文人进行文学创作共同的追求,同样是遗民认同的重要表现形式。

3 遗民身份影响李焕章的文学创作风格

《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李焕章的作品“跌宕排奁,气机颇壮,而汪洋纵放,未免一泻无余”^[12],《青州府志》中记载其文章“雄杰有奇气”^{[8]17796},这是其总体的创作风格,以大气磅礴著称。在张尔歧所作《织斋文集》序中有着更详尽的表述:“有超忽奔放,目不及瞬者;有简质浑穆,时见班剥,如古敦彝器者;有靓装炫服,香艳自喜,如好女者;有微吟缓咏,冷挑澹喝,如宗门评唱者;有旋风骤雨、霆霰交下者。”^{[6]619}这段文字将李焕章的文学创作多样的风格充盈的展现出来。

3.1 置身遗民立场:悲凉愤慨

明清易代,遗民群体对于新朝的建立具有抵触情绪,他们对失去故国的痛苦和内心悲凉的表达是直接的。李焕章的作品也是如此,这在张绍潜为《织斋文集》所作序中也有印证,称李焕章的诗文

“当易世之际,感怀沧桑,行吟草泽,不无故宫禾黍之感”^{[6]620}。

悲凉是亡国后由于自身处境的变化反映在文学创作中的风格要素,大多通过写景表现在诗中。如《秋月闻砧》中首句“西风瑟瑟鸣衰草,蒹葭泣露芙蓉老”^{[4]190},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似乎读者已经置身于凄凉的氛围中,与朝气不再的蒹葭、芙蓉一同暴露在萧瑟秋风中,赋情于物,以物拟人,更有唏嘘之意。再如《捣衣篇》涉及“阴风”“凉露”“梧桐”“寒衣”“飞霜”五个令人心生惆怅的意象烘托出此刻作者内心的悲凉,更有“明河遥望情无已,独倚流黄增叹息”^{[4]190}点明怅望的感受,塑造了一幅作者在凉风刺骨的秋晚独坐河边遥想征战的图画。故国就是在这种场景中灭亡,如今到了新朝还是要继续面对,悲戚之感油然而生。李焕章在抒发自己遗民情绪的过程中写作的诗歌风格与杜甫相似,两者同样经历过战乱流离,李焕章之文也有着杜甫“沉郁顿挫”的影子,让人在作者设定的场景中黯然神伤。如《羌笛》中“刀斗声中闻折柳,无端枕上落梅花”^{[4]194},凄凉的意象衬托出沉郁的哀伤,有着深切的悲怆、空寂之感,面对动荡难安的环境,无力改变现状,今昔之慨尤其悲凉。

李焕章对愤慨之情的表达也是不遗余力的,面对清朝的暴力专制统治,其文语言慷慨激昂,有着一股沉于心底的力量。他在《织斋诗自序》中云:“自耳聋后,听声聆音,如隔重垣,诗也文也,愈放胆为之,垂老而不倦,余之为诗为文,盖恃余聋也。”^{[4]188}联系其遭受暴乱后的生活来看,李焕章根据自己的感受大胆发声。他认为作者本身的立志尤为重要,在写作时注重实现文学的情感宣泄功能而不拘泥于其他因素的限制,以抒写在异己环境中的自我感受为主。在《丁卯东阡赋》中,作者阐发了对于当时人们趋向功名富贵的痛切,“于是怒焉,其如醉;嗒焉,其若丧;愈甚,其幽愤,不禁其悲号”^{[5]44},明确表达出“幽愤”之感。再如《书竹山寇事》中详细记述了谢秦遭遇乱贼并与之交战的经过,最后写:

李织斋曰:余在历下,晤谢君某,言其宗人竹山令击贼事,令人愤懑欲狂,故次其本末,俾史氏家采焉^{[5]168}。

文末直接用自己所说的话点明真实感受,其胸中气愤毫无保留地表现出来。李焕章基于遗民立场所作的文章,其悲凉愤慨的风格显而易见。

3.2 演绎遗民情结:委婉含蓄

与上述悲凉愤慨的风格表现不同,遗民群体在特殊时期与特殊环境下如不便激烈地抒发自己的意

志,便会转向一种更为温和的方式,委婉含蓄地书写内心所想或者表达细腻的情感。在这种背景下,李焕章选择运用典故说明某个道理,或借外物的象征意义表现爱憎与心底向往。

3.2.1 擅用典故

典故通过精准概括其历史事件蕴含的意义而更显意味深长,富有感染力。李焕章所选用的典故多与自身遗民身份相关,或关于政治看法,或关于自我生活。《鸿雁赋》中“歌号五袴,岁获三登”^{[5]36}运用了“歌五袴”的典故,最先出自《后汉书·廉范传》,后来以此歌颂地方官吏施行清明的政治。在此赋中作者写“雁塔”“雁行”“雁宕”“雁字”这些关于鸿雁本身的内容后,转而承接了“雁书”“雁阜”“雁门”两个人类活动的定义,且三者代表的都是“忆君王而弗见”“征夫怅望而啸队”“河梁翘首而泪零”等与政治生活相关的伤感失落情绪。随后作者又一次转笔,用“歌五袴”的典故阐述自己的美好向往,整篇文章循序渐进,以象征善政的典故收尾,既显得委婉含蓄又感人至深。在《书屈子〈离骚〉后》一文中运用了“乃心王室”的典故,比喻对朝廷的忠心和对国家的归属,遗民的爱国情怀涌上心头。屈原的《离骚》本就抒发一种美政与爱国主义思想,李焕章为其作跋,使自身的情感表达更加强烈,典故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避免了阐发遗民心念旧朝的宣泄式创作。《锦秋八友记》中引用张志和“泛家泛宅”的典故,形容隐居与游历山水的乐趣。文章通过介绍宋梅谷等八人的闲适生活,人物与优美的风景融为一体,脱离世俗的纷争,这是李焕章所向往的状态,用自己熟知且具有代表性的隐士事迹传达自己对于清朝政治的不满,也重述了选择不仕的原因。

3.2.2 巧用象征

象征是指运用事物的深层意义表现出抽象的寓意或情感。对于遗民文人而言,象征手法的运用通常与作者所处的社会背景有关。李焕章作品中借用象征义的事物有很多,其中“鹤”是出现次数较多的一个意象。“鹤”是中国人自古以来喜欢的动物,它有着吉祥、长寿、高雅、神圣等美好的寓意,尤其被高洁之士钟爱。李焕章现存的诗中有《遗鹤》《怨鹤》两篇,感情基调都是沉郁的,“自是菱三鳧,何须恋九皋”^{[4]192}与“夜半孤鸣意,前身是却非”^{[4]193}两句,借“鹤”的品性比喻自己成为遗民后对明朝的留恋。除诗外,其他文体中也有关于“鹤”的叙述。《仙鹤赋》中主要描述的是鹤之“仙”,是不屑于与雁群为伍、孤山处士般高洁的翩翩君子形象,其中隐含了作者不入仕途、不侍新朝而选择隐居云游的思想。此

外,李焕章还选用了具有讽刺意义的“鼠”,《鼠说》中刻画了一个为了不被吞食而以肉脯谄媚于猫的老鼠,但是最后还是丧命于猫口中,以此说明不要企图打动自己的天敌。结合作者的遗民背景来看,实则是在表达不入仕、不臣服于新朝的信念。李焕章的文章巧用事物的象征义表现自己作为遗民的情感和心态,这种间接表达与直接抒情相应和,使得作品张弛有度。

3.3 书写隐逸生活:朴雅清幽

与政治活动相关,明代后期士人就有徘徊在入仕与世俗之间的迹象,李焕章在明亡后毅然选择成为一名“布衣文人”,坚守遗民外壳包裹下愤世又淡泊的文人风骨,演绎着最贴近黎民百姓的生活情状。在李焕章的诗文中,描述隐居生活的作品笼罩着一层朴雅清幽的气息,似乎读者也徜徉在一片静寂里。以诗为例,《竹林独坐》中“烟雨”“柴扉”“石路”“微风”等意象组合在一起,作者独自坐在静谧的竹林中,思绪随风飘荡,远离让自己心痛的现实生活,塑造了清幽的氛围。虽然在隐居时并未完全走出亡国造成的伤痛,但是在其作品中读者仍然可以感受到李焕章向大自然展露胸怀的释然与轻松。塑造朴雅清净的诗还有《郊外小集》《郊居杂兴》等。以文为例,《织斋大园记》中描写了一个广阔无垠的“庭院”,作者以大自然为园,颇有“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的风范。李焕章在文中描述了牧童、垂钓者等人物,惬意的生活就在面前上演着,闲居之乐一览无余,置身于这样的环境也是构建文章朴雅清幽风格的重要因素。可见李焕章记述归隐生活也在向陶诗靠拢,如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一般,借周围环境来展示悠闲的生活,但于幽静中更易产生家国思绪,蕴藏的故国之思、身世之感也就更沉重。

“遗民是一种生活方式,又是语义系统——一系列精心制作的符号、语汇、表意方式。”^[13]李焕章用多样化的文学创作风格形成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其风格始终以忠义的遗民情结为主要的表现内容,情溢于辞。朝代更替之际,有志之士情感多元、感慨多思,他们心中的理想、观念于文学中构建出自身守节的精神与忠义的人格。

4 结论

李焕章作为明遗民群体的一员,他用文学创作的方式表达自我的遗民情怀,不仅是迎合遗民身份认同的需求,更是为了在清朝统治中找寻属于自己

的文化存在感,也期望在朝代兴亡之际为儒家文化罩上保护层。李焕章对故国有着怀念与惋惜之情,他需要在解决自身感怀的心理需要与维护基本的文学要求之间寻找到平衡点,所以对于文学创作的主题选择,他更倾向于能够承载起遗民意识的忠人义士、生活状态纪实以便表明自己对新朝的愤恨、对旧朝的思念的心态。李焕章并不完全认同“发乎情,止乎礼”的思想,因为文学作品是他倾诉对清朝的痛恨的唯一不受太多限制的途径,也就自然形成了愤慨而又含蓄、清幽的多样写作风格。综观李焕章的文学作品,他将进入新朝之后对故国的缅怀、对新朝的倦怠、物质生活的匮乏与精神生活的富足种种感受交织在一起描述,把自己满怀忠义的遗民情结铺展开来,将皇权易帜后的悲怆忧郁与隐居游历后的自我疗愈诉诸笔端,这些都为我们进一步探析其遗民思想奠定了基础。

参考文献:

- [1]魏红梅.“诸城十老”及其诗歌创作研究[D]. 济南:山东大学,2018:124.
- [2]张兵. 遗民与遗民诗之流变[J]. 西北师大学报(社科版),1998(4):7-12.
- [3]罗惠缙. 从《莒楚斋随笔》五种看刘声木的“文化遗民”情结[J]. 阳明学刊,2008(3):396-405.
- [4]李焕章. 织斋诗[M]//刘爽.《李象先集》整理及李氏交游研究. 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20.
- [5]李焕章. 李象先集[M]//刘爽.《李象先集》整理及李氏交游研究. 南昌:江西师范大学,2020.
- [6]李焕章. 织斋文集八卷[M]//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5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7]蒲松龄. 聊斋志异[M]. 济南:齐鲁书社,1981:715.
- [8]杨士骧,修,孙葆田,纂. 山东通志200卷[M]. 民国七年排印本,1912.
- [9]谢正光. 清初诗文与士人交游考[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6.
- [10]李婧,高明峰. 清初遗民散文中的闲情书写——以张岱、李渔为例[J]. 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21,38(3):43-48.
- [11]左东岭. 易代之际研究的学术价值与难点所在——兼及张晖之《帝国的流亡》[J]. 中国文化研究,2014(1):47-53.
- [12]永瑢,纪昀,主编.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中华书局,1965:1637.
- [13]赵园. 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289.

明清杂剧中女扮男装情节研究

——以徐渭《女状元》《雌木兰》为例

代亦舒

(宝鸡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摘要:以徐渭《女状元》《雌木兰》为核心,结合性别理论与戏剧叙事学,剖析明清杂剧中“女扮男装”情节的文学革新意义。研究表明,徐渭通过易装母题重构女性主体性,既挑战封建性别秩序,亦折射文人阶层对现实压迫的隐喻性反抗。此题材的盛行与明清商品经济勃兴、市民文化活跃密切相关,其戏剧张力源于身份暴露的悬念与性别操演的颠覆性,为古典文学中的性别研究提供新视角。

关键词:《女状元》;《雌木兰》;女扮男装;戏剧冲突;明清杂剧

中图分类号:I207.3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3-0023-06

Plot of Women Disguising Men in Zaju of Ming-Qing Dynasty

by Xu Wei's *Nvzhuangyuan* and *Cimulan*

DAI Yi-shu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 Baoji University, Baoji, 721013, Shaanxi)

Abstract: Focusing on Xu Wei's works *Nvzhuangyuan* and *Cimulan*, the literary innovative significance of the “women disguising as man” plot was analyzed in this paper in the Zaju of Ming-Qing Dynasty through the lens of gender theory and dramatic narratology. It revealed that Xu Wei reconstructs female subjectivity through the motif of cross-dressing, not only challenging the feudal gender order but also reflecting the metaphorical resistance of the literati class against realistic oppression. The prevalence of this them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boom of commodity economy and the vibrancy of civic culture in the Ming-Qing dynasties. The dramatic tension stems from the suspense of identity exposure and the subversive nature of gender performance, which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gender studies in classical literature.

Key words: *Nvzhuangyuan*; *Cimulan*; women disguising a man; dramatic conflict; Zaju of Ming-Qing Dynasty

近年来性别理论与明清文学研究呈现两大趋势:其一,突破本质主义性别观,关注边缘群体的身份建构。通过女性诗文分析指出“女性书写是抵抗性别规训的具身化实践”^[1]。其二,跨性别研究介入历史文本阐释,结合巴特勒理论重审易装文学,揭示“性别越界如何动摇儒家伦理根基”^[2]。“女扮男装”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重要母题,自北朝乐府《木兰辞》至明清杂剧,其叙事形态随社会变迁不断

演进,尽管唐传奇与宋元话本中的易装书写已初具雏形。唐传奇如《谢小娥传》中,谢小娥乔装男子为父夫复仇,凸显女性智勇;宋元话本《合同文字记》里刘安娘扮男继承家业;《快嘴李翠莲》通过服饰转换暗喻性别越界。这类书写多聚焦女性以易装突破“复仇”“守节”等传统伦理框架,虽未深入性别意识探讨,却为明清戏曲系统化书写奠定基础。其叙事动机仍受礼教制约,但已展露市井文化影响下对女

性能力的有限肯定。徐渭的《四声猿》首次将这一母题系统引入杂剧创作,通过《雌木兰替父从军》与《女状元辞凰得凤》重构女性形象,赋予其突破性别桎梏的主体性。本文以徐渭作品为核心,结合性别理论与戏剧叙事学,探讨明清杂剧中“女扮男装”情节如何反映社会转型期的性别观念变迁,并揭示其在文学史上的革新意义。

1 徐渭对女扮男装主题的文学重构:体裁转换与角色革新

徐渭《四声猿》作为明代性别书写的典型文本,其《雌木兰》与《女状元》构成解构性别的双重镜像。细读《雌木兰》中“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间床”的空间重置,通过器物符号的性别属性错置,消解闺阁与战场的二元区隔。女状元黄崇嘏的“状元袍-女儿身”矛盾体,以科场功名颠覆“才德观”的性别预设。叶嘉莹从诗词互文角度,比较《女状元》与李清照《声声慢》,认为黄崇嘏的“才名焦虑”实为晚明士人“仕隐矛盾”的性别化投射。徐渭刻意强化木兰复妆后“出门看火伴”的戏剧性场面,伙伴惊惶反应暴露出性别认知的断裂,印证了社会性别乃权力话语建构的本质。这种性别倒置书写,既是对科举体制的讽喻,亦隐含晚明文人身份焦虑的自我投射。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有“女扮男装”题材相关的文学作品涌现,讴歌女性的才华以及魅力,代表性的就是北朝乐府诗《木兰辞》。唐代是此题材文学作品涌现的又一高峰,作品中出现了众多的女性诗人以及政治家。例如薛涛、鱼玄机、上官婉儿等。唐传奇当中也有众多作品与易装相关,比较典型的有李公佐的《谢小娥传》、皇甫氏的《义侠》。宋元时期封建礼教禁锢女性的个性解放,加大了对女性的约束,因此在这一时期,有关于易装题材的文学作品较为罕见。明中叶商品经济与市民文化兴起,冲击封建传统伦理,促使女性意识觉醒,对于原有的封建传统造成冲击,女性意识开始逐渐觉醒,相关的问题也受到文人的广泛关注,涌现出一大批“女扮男装”题材作品,最具有代表性的莫过于徐渭。

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中提出:“性别是一种通过重复性表演构建的社会规范”^[3],徐渭的创作可视作为对朱迪斯·巴特勒“性别操演理论”的早期实践。徐渭的《四声猿·雌木兰》与《四声猿·女状元》可作为性别操演的典型案例。在《雌木兰》中,花木兰通过易装改容、习武征战等行为重构性别身份,其“出门旧板障,羞杀老瞞婆”^{[4][48]}的自白,暗示性别身份并非天生本质,而是通过社会行为不断构

建的表演过程。女状元黄崇嘏更以科举功名突破性别藩篱,“愿借明光一丈,照此十丈软红尘”^[5]的宣言,实则通过知识话语权的操演解构性别等级。两剧主人公以“扮演-突破-重构”的动态过程,印证了巴特勒“性别是具身化实践”的核心观点。徐渭在礼教森严的明代,通过戏剧空间创造性别流动的可能性,这种艺术实践恰与当代性别理论形成跨时空对话。曼素恩在《缀珍录:十八世纪及其前后的中国妇女》中,从服饰史角度考证明清女性易装的物质条件,指出缠足与男装的矛盾映射了性别身份的双重困境。此外,李孝悌通过分析晚明版画中的易装形象,揭示视觉艺术如何参与性别符号的传播与重构。

在《雌木兰》中,木兰通过易装行为挑战性别本质主义,其“男性身份”并非生理决定,而是通过服饰、言行等符号的重复操演构建而成。例如,木兰易装时自嘲“这衣服呵,怎遮掩的住影纤纤”^{[4][56]}通过服饰符号的错置消解“男外女内”的固有秩序。当木兰褪去红妆跨上战马,其身体成为颠覆性别规范的场域。这种操演性颠覆“男外女内”的固有秩序,揭示性别身份的流动性与社会建构性。此外,徐渭运用布萊希特的“间离效果”,通过角色身份转换迫使观众反思现实中的性别不平等。例如,木兰凯旋后被迫恢复女装的情节,打破观众对“圆满结局”的期待,凸显女性在功业与身份之间的永恒困境。

“徐渭这种以性情为主导的创作个性,具体到戏剧《四声猿》,就表现为在较短的篇幅中,瞬间凝聚最为充沛的情感能量。”^[6]他所创作的杂剧作品《四声猿》集子当中的《雌木兰替父从军》与《女状元辞凰得凤》使得易装主题在明代开始逐步定型,这两折以古代艺术史上的经典故事为蓝本,更加细致地展现了封建父权社会下,女性在社会层面长期以来都被忽视的魅力与才情。徐渭的这两部作品,从男性的视角去阐释当时环境下女性生存的不易。徐渭采用自己独有的笔法,在他的杂剧故事当中,无论是花木兰的凯旋,还是黄春桃的高中,都无法突破世俗的束缚,改变她们“女扮男装”后被发现的宿命。父权社会下,无论女子获得再大的功绩、赏识,都必须屈从于三从四德,阁中方圆,最终只能恢复红妆,嫁人生子,完成世俗所定义的女性职责。

明清易装文学的盛行与资本主义萌芽、印刷术普及密切相关。大木康在《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中指出,书坊主为迎合市民趣味,大量刊行“女扮男装”题材,推动其从精英文学向大众文化扩散^[7]。最初的北朝故事当中,木兰的故事被看作一次“至

纯至孝”的搏命之举,尤其是在“女扮男装”这一情节上,当时的作者选择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只阐述了木兰如何为自己准备的行李,即“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鞿,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8]。然而,关于木兰军中生活的细致描写是有所缺失的,例如木兰如何躲过军中士兵的眼睛,隐瞒自己女子的身份。木兰在军中屡建奇功,返回家乡后奉父母之命与王郎成婚,徐渭的《雌木兰替父从军》的结尾,将木兰塑造成为一个温柔谦逊的女性,剧本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才子佳人传奇小说的窠臼。徐渭的再次创作使得木兰这个角色更加的立体,他笔下的木兰是一位充分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女子。“只是这一件,若要替呵,这弓马枪刀衣鞋等项,却需索从新另做一番,也要略略的演习一二,才好把这要替的情由,告诉他们得知。他岂不知事出无奈,一定也不苦苦留俺。”^[4]⁴⁴从徐渭《雌木兰》的这段描述当中,可以窥见木兰是一个有勇有谋、心思缜密、有自己独特见解的女性形象。

封建礼教的约束下,女性存在的价值被迫削弱,传统女性的社会活动范围被框定在家门之内,女性的人生价值寄托于丈夫和儿子的功名利禄之上,易装行为被看作有悖礼法,是女性的僭越行为,是不被世俗所接纳的。徐渭的《女状元辞凰得凤》是在五代才女黄崇嘏的原型故事基础上创作而来的杂剧。黄春桃(即黄崇嘏)的故事原型最早出现于五代时期金利用所撰写的《玉溪编事》。故事从唐五代开始经过宋元明清,广泛见诸画本及小说当中,随着时代的转变,黄春桃的故事也从述乡贡士演变成为了女状元。他应试参加科举之时说:“我这般才学,若肯去应举,可管情不落空,却不唾手就有一个官。”^[3]⁶³黄春桃父母早亡与其奶妈相依为命,凭借自身才学想要博取功名,此等自信及其所透露出的想要与男儿决一胜负的决心,是在以往的任何文学作品中所不曾出现的女性形象。这种女性魅力与唐传奇当中才子佳人剧情有所不同,唐传奇当中女性普遍貌美、多情、柔顺,而徐渭笔下的黄春桃人格独立,心智成熟,拥有自主的意识与对于权利的主动争取,这种理想主义的妇女观在当时的封建社会环境下具有开拓性。

综上所述,无论是《木兰辞》亦或者《女状元》从诗歌、小说到杂剧的体裁转化,徐渭对于其故事叙述、体裁的转变与故事的重新演绎具有重要的开拓性意义。徐渭从男性的角度撰写女性对社会价值的渴求与实现以及对于权利的争取,对于当时处于封建社会环境下的女性具有重要的积极影响。徐渭通

过杂剧形式重构易装主题,不仅是对传统故事的创新,更暗含对封建性别秩序的批判。这一批判性视角也为分析其社会文化意义奠定了基础。

2 性别秩序与文人理想:女扮男装情节的社会文化意涵

男尊女卑的观点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的普通大众。男权当道的社会环境下,女性的价值和意义一直被贬低。女扮男装题材在当时戏曲创作中被广泛使用。儒家经典《礼记·内则》中记载有“男女不同裳”。女子着男装有违礼教,被视为不守妇道。“男女不杂坐,不同施枷,不同巾栉,不亲授”^[9],这不仅是《礼记》制定的文化礼仪标准,同时也是“男女有别”观念衍生出的男女大防思想的理论依据,潜藏着“男尊女卑”的社会规训意识。东汉班昭的《女戒》更是成为当时女性的沉重枷锁。服饰所代表的是男女之间不可跨越的地位鸿沟这种观点直到唐天宝年间才发生改变,女性的易装行为表达了当时女性对于传统封建礼教的挑战。“女扮男装”不仅是个性化的表现,它还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女扮男装”是女性对男权社会的抗议手段,同时也体现了社会开放和经济繁荣的特点。

明清时期,随着封建经济中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市民阶层逐步壮大,开始出现批驳宋明理学的热潮,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礼教思想。明朝中期“女扮男装”已经成为常态,女子不再是后宅争斗的主角,而是走向人前,利用女扮男装后的身份,保家卫国,争取功名和权利。女性男装人物的存在使得现实中不得志的文人,可以在故事中一展身手,成全其理想抱负。《旧唐书·舆服志》记载:“俄又露髻驰骋,或有着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10]女性从外形上改变自己,利用男子身份踏入社会,确实改善了女性的现实生存环境,满腹才华得以施展,家族利益也能够得以维护,但女性在其中所受到的心理伤害却也是无法忽视的。她们必须谨小慎微地生活,努力适应男性的社交方式和生活,神经时刻处于紧绷状态,每每如履薄冰。

徐渭笔下的《雌木兰》《女状元》在原有的故事基础上进行拓写。木兰替父从军十余年竟无人发现其是女子,虽然其中有艺术成分的存在,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思想。身份塑造会特意突破传统的性别定位,在张扬女性特有才情的同时,也在力求探询出女性实践自我的途径^[11]。明末凌濛初创作的《二刻拍案惊奇》中的《同窗友认假作

真,女秀才移花接木》一卷中的女扮男装考取功名的闻蜚娥,清代陕西剧作家王筠创作的《繁华梦》中的主人公王梦麟,“生非男子,不能耀祖光宗;身着裙钗,无路扬名显姓……虽然爹爹现任为官,享受荣华,我身终是女子,焉能出人头地?”做梦由女转男才能够走上仕途光耀门楣。可见在当时封建男权压迫下的女性价值被不断压缩,“女扮男装”的盛行也反映出女性意识的逐渐觉醒。“女扮男装”行为在当时社会环境下,是女子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行为,同时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重要联系。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人们在物质上得到满足之后,就会进而追求精神世界的丰富。横向对比徐渭的《雌木兰》与元杂剧《窦娥冤》,可见易装与直谏作为女性反抗策略的差异:窦娥以死明志,依托天道申诉冤屈;木兰则通过性别伪装主动争取话语权,其抗争更具主体性。纵向对比唐传奇《谢小娥传》,谢小娥易装仅为复仇工具,最终回归闺阁;而徐渭笔下的黄春桃通过科举实现自我价值,其易装行为指向对制度性压迫的批判,标志着明清女性意识的深化。

3 戏剧冲突与女性主体性:徐渭作品的叙事策略

在众多的艺术作品当中,“女扮男装”故事是对于世俗眼光和陈规成说的有力反击。“女扮男装”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礼教的束缚,是女性意识的有力体现。挑战传统的规训,“女扮男装”争取功名与权益,是女性智慧和胆识的有力体现。徐渭笔下的黄春桃所代表的是女性对于实现自我价值的渴望,对于封建礼教不满,想要冲破桎梏的坚韧女性形象,敢于去追求自身的理想并努力付诸行动的女性典范。

3.1 悬念设置与身份暴露的张力

“女扮男装”故事运用到戏剧当中能够准确地吸引目标受众的目光,具有很强的艺术价值。“女扮男装”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悬念性,能够使得受众对于后续故事情节演绎产生浓厚的兴趣。这一剧情本身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就是猎奇的体现,吸引受众关注的焦点,也聚焦了主人公的易装行为如何瞒天过海,从而达成夙愿。受众愿意看到悬念揭晓的时刻,这也为戏剧本身增加了更多的观赏性和吸引力。

徐渭的《雌木兰》中拓写了诗歌《木兰辞》,使得剧情更加完整和跌宕,悬念的设置也更加适用于戏剧舞台。徐渭在《雌木兰》中的细节设置,使得故事的发展更加具有悬念,演绎的过程也更加焦灼。

《女状元》中的情节设置与《雌木兰》亦是有着异曲同工作用。“女扮男装”求取功名的悬念设置,使得剧情与角色紧密相连,吸引受众的同时推动故事的发展。徐渭的这两部作品,关注到了悬念设置的合理性与逻辑性,文本的扩写使得故事更具有神秘性。“替父从军的花木兰、科场夺魁的黄崇嘏、驰骋疆场的李杰妹、为爱化蝶的祝英台,这些广为流传的“女扮男装”佳话成为了小说、戏曲中的题材典范,甚至是‘标志性情节’。”^[12]徐渭笔下无论是黄春桃还是花木兰,因时代的束缚都不得不以男子的装束示人,以便达成自身的目的和理想。女性在当时的环境下不得已扮作男装,以隐藏自己的身份,这一情节不仅给剧作品带来了人物关系的复杂性,也为后续的故事剧情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明末清初,众人对于才女是给予充分的肯定和欣赏的,因此能够看到花木兰和黄崇嘏这样有才华的女性角色,然而“女扮男装”取得功名后短暂的喜悦,最终仍需面对身份暴露的现实困境。

3.2 女性角色的解构与再诠释

明末清初众多剧作家的目光开始转向被忽略和压抑的女性群体,写她们对美好爱情的勇敢追求,写她们文韬武略的优秀才干。众多的作家以“女扮男装”为故事的切入点,让一直被礼教所束缚的女性以男人的身份出现在大众视野,使得女性意识在小说、戏剧当中得到充分的展现。

无论是替父从军的花木兰亦或者是“女扮男装”求取功名的黄春桃,在徐渭笔下都是鲜活的,有生命力的,拥有理想抱负、机智勇敢的女性角色,不似前人笔下女性角色的单一化。他所撰写的花木兰和黄崇嘏人物是复杂的,是有思想和自主意识的。这也充分证明了徐渭超前的女性观。在《雌木兰》当中,木兰请出父母与弟妹前来,表达自己想从军出征,讲道“妹子、兄弟,也就去不得了?”“似孩儿这样去得去不得?”^{[3]47}木兰并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诉求,而是诱导其父母讲出木兰从军这一现实问题,可以看出木兰的机敏和聪慧的女性形象。徐渭通过木兰的忠孝双重属性,构建了理想化的女性道德典范,但其结局仍受制于‘三从四德’的伦理框架,暗示个体抗争与制度性压迫的不可调和。由于木兰父亲有病在身,又曾是一名千夫长,“他今年华已老,衰病多缠。想当初搭箭追雕穿白羽,今日呵扶藜看雁数青天。”“这就是今日俺该替爷的报头了。”^{[3]44-45}木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忠孝的两全。徐渭还将木兰与历史上有名的孝女秦休和缙紫相媲美,使得木兰的形象更加饱满高大。

任何一种作品都是创作者与其所处时代相互碰撞的产物。徐渭笔下的木兰与黄春桃的故事无疑是作者的某些人生经历,受到当时社会状况的影响只能通过杂剧作品的方式进行表达。无论是木兰还是黄春桃,她们有着不同的人生和背景,但这些角色的身上都带有徐渭的身影以及当时他所处时代的特征。他用自己的笔客观地展现了处于封建时代的女性形象,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举动。

4 解构与重构:论徐渭杂剧中女扮男装母题的现代性基因

在明代中叶戏曲史上,徐渭《四声猿》中《雌木兰》《女状元》两剧犹如惊雷,炸开了传统性别秩序的裂缝。“女扮男装”这一古老叙事母题,在徐渭笔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思想深度与艺术张力。四百余年后的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一文化现象,会发现徐渭的性别书写中蕴含着超越时代的现代性基因,这些基因在后世文学创作中不断裂变,形成了独具东方特色的性别叙事传统。

4.1 性别符号的解构与重构

徐渭笔下的木兰与黄崇嘏,通过易装实现了对传统性别符号的颠覆性解构。当木兰褪去红妆跨上战马,当黄崇嘏放下绣针执起朱笔,她们所打破的不仅是服饰的表征,更是对“男尊女卑”社会秩序的挑战。这种解构在清代《再生缘》中达到新高度,孟丽君以宰相身份参与朝政,将女性的政治智慧发挥到极致。不同于前代作品中易装女性最终回归家庭的叙事惯性,徐渭创造的女性形象始终保持着主体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在近代《秋瑾》等戏剧中得到延续,革命女性的男装造型成为反抗封建礼教最有力的视觉符号。

4.2 身份认同的多重悖论

“女扮男装”叙事天然携带的身份困境,在徐渭剧作中呈现出独特的戏剧张力。《女状元》中黄崇嘏“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传奇经历,暗含着知识女性对科举制度的解构与嘲讽。这种身份错位的荒诞感,在民国时期白薇《打出幽灵塔》中得到延伸,女主角通过易装逃离封建家庭,却在革命阵营中遭遇新的性别困境。当代作家李碧华在《霸王别姬》中更进一步,将易装者的性别认同与戏曲行当的程式化表演相融合,创造出令人窒息的悲剧美感。这些创作都延续着徐渭对身份政治的本质思考。

4.3 现代性基因的传承变异

在当代影视创作中,徐渭播下的现代性种子结出了异彩纷呈的果实。《新白娘子传奇》中叶童反

串许仙的表演,既是对戏曲传统的致敬,也是对性别本质主义的消解。王家卫《东邪西毒》中林青霞的雌雄同体造型,将性别模糊提升到存在主义层面。这些创作突破传统易装剧的喜剧框架,深入探讨后现代语境下的性别身份。值得关注的是,网络文学中“女尊文”的兴起,表面看似是对传统性别秩序的颠覆,实则暴露出消费文化对性别议题的扁平化处理,这与徐渭剧作中深刻的社会批判形成鲜明对比。

从徐渭笔下的木兰从军到当代屏幕上的性别狂欢,“女扮男装”母题始终在解构与重构中寻找新的表达可能。这种跨越时空的对话揭示:真正的性别解放不在于服饰的置换或身份的扮演,而在于打破固化的认知框架。徐渭杂剧留给后世最宝贵的遗产,不仅是那些惊世骇俗的易装情节,更是敢于质疑既定秩序的批判精神。在性别议题日益复杂的今天,这种精神依然闪耀着穿透历史迷雾的思想光芒。

5 结论

以杂剧为载体,利用文学的力量传播。徐渭是最早将“女扮男装”故事引入到戏曲文本当中的剧作家,使得艺术加工下的故事情节更加合理,在叙事结构与叙事模式上进一步拓展。徐渭的创作理念亦体现在《玉禅师翠乡一梦》中,女性角色红莲以情欲挑战宗教禁欲主义,与木兰、黄春桃形成“反抗三重奏”。清代李渔《怜香伴》继承徐渭的易装叙事,通过崔笺云与曹语花的情感纠葛,进一步解构性别二元对立,印证徐渭对后世剧作家的深远影响。替父从军的木兰和女状元黄春桃都是经历了从女性易装成为男性之后被识破女性身份又回归女性身份的过程,徐渭的这种艺术创作使得故事的情节发展更加具有新意。徐渭的“女扮男装”叙事实现了双重颠覆:其一,以易装为媒介解构性别本质主义,赋予以女性角色政治参与与文化表达的权利;其二,通过杂剧形式突破传统叙事模式,将个人价值实现置于忠孝伦理之上。然而,本文未涉及舞台表演对易装情节的视觉化呈现,未来可结合戏曲演出史进一步探讨。徐渭的创作提示我们,易装不仅是女性的抗争策略,亦是失意文人理想投射的载体——借由女性之身,诉自身之志。徐渭在内的一众文人对于女性的角色与地位开始了重新思考,在故事情节的发展上,将直接叙述更改为更加具有艺术效果的一波三折,增加其戏剧冲突。“女扮男装”的故事母题本身就是打破常态生活的新鲜感,而母题的生命在于其不断地重复繁衍,这离不开某种特定民俗心理及文本表现的有意无意的作用^[13]。徐氏笔下的“女扮男装”题

材故事,相较于人物本身,在空间上拓展了文字创作的艺术之美。在徐渭之后,“女扮男装”为主题的故事大量的涌入到了戏曲创作当中,其在“女扮男装”母题故事引入戏曲之后的艺术加工,为此题材的戏曲创作探索出了广阔的天地。但是,徐渭剧作中“解构未竟”的困境(如女性最终回归家庭),恰是当下性别平等的镜鉴。若仅停留于个体身份的表演性突破,而无视制度性改革,则难以实现真正的性别正义。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拓展至跨媒介领域(如戏曲舞台的性别表演、影视改编中的身体政治)。徐渭通过易装女性的“错位凝视”,赋予边缘群体批判主流秩序的能力,这对当下性别议题的启示在于:应重视边缘视角的颠覆性力量。例如,女性在科技、政治等传统男性主导领域中的“闯入”,不仅是个人成就,更是对性别权力结构的挑战。徐渭的创作提示我们,边缘群体的生存策略(如易装、身份伪装)实为对压迫性制度的创造性反抗。

参考文献:

- [1]高彦颐. 闺塾师[M].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56.
- [2]孙康宜. 性别与经典:女性文学研究新视野[J]. 文学评

论,2015(3):45-52.

- [3]朱迪斯·巴特勒. 性别麻烦: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M].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
- [4]徐渭. 四声猿[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5]徐渭. 徐渭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83:247.
- [6]陈远洋. 徐渭戏剧研究[M]. 北京: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207.
- [7]大木康. 明末江南的出版文化[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118.
- [8]郭茂倩. 乐府诗集全鉴[M]. 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9:50.
- [9]礼记[M]. 胡平生,张萌,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7:27.
- [10]刘昫,赵莹. 旧唐书·舆服志[M]. 北京:中华书局,1975:1957.
- [11]刘军华. 明清女性作家戏曲之社会性别错位现象透视[J]. 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46-50.
- [12]盛志梅. 清代女性弹词中女扮男装现象论析[J]. 南开学报,2004(3):21-28.
- [13]王立. 中国文学主题学——江湖侠踪与侠文学[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178.

(上接第5页)发展史上的奇迹,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上很多国家谋求改革发展、探索现代化之路提供了借鉴和全新选择,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具有重大贡献。应在充分理解和把握其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中,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对中国式现代化所蕴含的独特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理论和实践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7]12},开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之花,结出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果,展现出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

参考文献:

- [1]《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编写组. 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495.
- [3]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22.
- [4]习近平. 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 求是,2023(17):4-11.

- [5]习近平. 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J]. 求是,2023(16):4-8.
-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11.
- [7]《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编写组.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M]. 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24:15,12.
- [8]习近平. 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J]. 求是,2023(20):4-9.
- [9]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21-07-02(2).
- [10]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 人民日报,2018-05-05(2).
- [11]习近平.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J]. 求是,2023(11):4-7.
- [1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91.
- [13]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65.

朱自清写景散文艺术美探析

张子怡,任 强*

(淮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摘 要:以朱自清最有代表性的三篇写景散文《春》《荷塘月色》《绿》为研究对象,探讨朱自清写景散文的自然之美、诗情之美与形式之美。朱自清写景散文自然之美体现在自然的形貌、动态、气韵之美。诗情之美体现在意象与情趣相契合、情感的真挚抒发、人与自然和谐等方面。形式之美表现在语言的绘画美与音乐美、句式运用、语气语调等方面。朱自清写景散文以细腻、清新、灵动的笔调和真挚、诗意、和谐的文调形成独特的艺术美。

关键词:朱自清写景散文;自然之美;诗情之美;形式之美

中图分类号:I20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3-0029-07

Analysis of the Artistic Beauty in Zhu Ziqing's Landscape Essays

ZHANG Zi-yi, REN Qi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HuaiBei Normal University, HuaiBei, 235000, Anhui)

Abstract: Taking his most representative landscape essays, *Spring*, *Moonlit Lotus Pond* and *Green*, as research objects in this paper, it explored the natural beauty, poetic beauty and formal beauty in Zhu Ziqing's landscape essays. The natural beauty of Zhu Ziqing's landscape essays is reflected in the beauty of the form, dynamism and charm of nature. The poetic beauty is reflected in the combination of imagery and interest, the sincere expression of emotion and the harmony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he formal beauty is manifested in the pictorial and musical beauty of language, the use of sentence structures and the tone and intonation. Zhu Ziqing's landscape essays forms a unique artistic beauty with a writing style of delicate, fresh and vivid, as well as literary tone of sincere, poetic and harmonious.

Key words: Zhu Ziqing's landscape essay; beauty of nature; beauty of poetry; beauty of form

朱自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散文大家,对其散文艺术成就的研究有很多。吴周文指出朱自清在艺术构思上注重“文眼”的设置,抒情上追求真挚美、绘画美、理趣美,在语言风格上提倡“谈话风”,这些特点赋予了其散文独特的艺术魅力^[1]。写景散文是朱自清散文中比较重要的一类,张炳隅较早探讨了朱自清《绿》《荷塘月色》等写景散文综合运用多种修辞技巧,特别是通感,创造出新颖奇特的艺术效果^[2]。秦宗亢从体物写真、诗情画意、比照衬

染、动态造型、巧喻传神等几个方面分析了朱自清散文的写景艺术^[3]。关坤英通过对《荷塘月色》等写景散文的分析,揭示了朱自清写景散文的朦胧美特质及价值^[4]。还有研究者从景物描绘、层次布局、情景融合、语言技巧等方面分析朱自清写景散文的艺术特色^[5],以及从概念隐喻的角度探讨朱自清擅长于使用形容词和静态词进行景物描写,以便呈现出强烈的画面感^[6]。这些论文从朱自清写景散文的写作特色、审美追求、概念隐喻运用等方面进行了

收稿日期:2024-12-31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学校质量工程“四新”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2023sx067);安徽省新时代育人质量工程项目(研究生教育:“任强研究生名师工作室”)(2024yjjsmsgzs029)。

作者简介:张子怡(2001-),女,安徽亳州人,硕士研究生;任强(1966-),男,安徽濉溪人,教授。E-mail:1300994307@qq.com

探析,但朱自清写景散文的艺术美方面还有值得深入挖掘的空间。

孙绍振曾说:“解读作品的目的,不但要体悟自然之美,而且要体悟诗情之美和形式之美。”^[7] 本文将以朱自清最有代表性的三篇写景散文《春》《荷塘月色》《绿》作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这一系列散文的自然之美、诗情之美与形式之美,为朱自清写景散文的解读提供新的视角,力争更为全面地分析朱自清写景散文的艺术特色,揭示朱自清写景散文的独特魅力。

1 自然之美

“夫宇宙万物,各得其美,曰自然美。”^[8] 自然无声,不能言传自己的美,作家却能以笔为媒介表现出自然的美。当怀有主观审美心境的作家遇到了客观的自然,用笔将自然形貌、动态、气韵之美展现出来,自然之美于是就跃然纸上。

1.1 自然形貌之美

《庄子》中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9]¹⁶⁹ 天地不能用言语传达自身的美,作家却可以用笔表现出来。在朱自清的笔下,自然万物可化无形为有形,化无声为有声,化无色为有色,化无味为有味,化无感为有感。阅读朱自清《春》《荷塘月色》《绿》等写景散文,能领略到其中的自然形貌之美。

在《春》中,朱自清写“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欣欣然张开了眼”,赋予了万物愉悦、欢快的神态,使读者能够直观地感受到大自然在春天所展现出的清新、明媚且旖旎的风貌。文中“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偷偷地”写出了小草顽皮与小心翼翼的神态;“嫩嫩的”是指小草质地的柔嫩;“绿绿的”是指小草的色泽:朱自清从神态、质地、颜色等多个角度,将小草稚嫩且顽皮的形貌展现得淋漓尽致。文章还描写了春花“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写出了春花的色彩和形状,将花朵的丰富与艳丽形象地勾勒出来了;“花里带着甜味儿”,不仅表明花朵散发出迷人的香气,而且暗示着花朵具有甜美的韵味^[10]²¹⁻²²。

《荷塘月色》中荷叶与荷花的形貌是柔美的。荷叶像“亭亭的舞女的裙”,裙子倒是常见之物,但此处突出是“‘亭亭的舞女’的裙”,更让人在联想与想象中为荷叶再增添几分美丽。荷叶还是“田田的”,既表现了她们彼此相连的层次美,又给她们增添了古色古香的韵味。层层荷叶之间,分布的是白色的荷花,这些荷花的神态是“袅娜”的,“羞涩”的。

月光的照耀更凸显荷花的光泽和神韵,她们像“明珠”“星星”“刚出浴的美人”,清新自然,美丽动人,颇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感。月光下,“叶子和花仿佛在牛乳中洗过一样”洁白无瑕,“像笼着轻纱的梦”又为荷叶、荷花增添了几分朦胧的美^[10]¹⁸⁻²⁰。

在《绿》中,梅雨潭绿的形状像一张极大的荷叶平铺着,清雅脱俗。光泽是“闪闪的”——“像涂了‘明油’一般”,给人的触感是柔软的——“令人想着所曾触过的最嫩的皮肤”。在神态上,具有“离合的神光”,极富魅力^[10]¹⁵⁻¹⁷。能够看出,梅雨潭的绿在形貌上是年轻的、具有吸引力的。朱自清细腻地从形状、光泽、触感、神态等角度描写梅雨潭绿的形貌,使梅雨潭绿的形貌立体化、可感化,摹写出梅雨潭绿的美丽和魅力,展现了梅雨潭绿的风姿。

朱自清运用细腻的笔触,从形、色、味、感多个角度成功地将自然形貌之美定格在文字之中,形象细腻的景物描写使得读者能够透过文字在脑海中想象、欣赏自然景物的形貌,激发出内心对自然美的感知与热爱。

1.2 自然动态之美

钱钟书《管锥篇·周易正义》说:“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11] 在散文《春》中,朱自清用春草、春花、春风、春雨等“象”,构建了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意境。在《荷塘月色》中,用月色、荷叶、荷花等“象”营造了一种朦胧而宁静的意境。在《绿》中,用绿“象”,传达出了生命力与活力。这些意象在作者笔下,不仅给人以形象的美感,而且在动态上也展现了独特的魅力。

《春》开篇就写了人的心理动态和自然的动态变化:“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不仅传达出人们对春天的热切期盼,而且塑造了春天伴随着东风悄然而至的动态形象。“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写春草“钻”出来,化静为动,展现了春草顽强向上生长的态势,赋予了春草生生不息的动态之美。写春花“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可以看出野花娇俏的姿态,展现了春花俏皮灵动的动态美。这些动态描写,展现了景物的生机与活力,使读者能够察觉到这些景物的生命力,感受到春天的气息。

《荷塘月色》捕捉了荷叶、荷花、荷香、流水、月光、树影等的动态变化。微风拂来,荷叶随风摇曳,“更见风致”。微风过处,荷花香气氤氲,更加迷人。此时,优雅的荷叶与美丽的荷花之间都有一丝颤动,这种颤动让整个荷塘都充满了动态的活力。又如月

光“泻”在荷叶和荷花上、青雾“浮”在荷塘里等。这些自然景物的动态描写,能够在读者脑海中形成一幅幅动态画面,增强景物的生动性和感染力。

《绿》中梅雨潭的绿会“招引”人们,会“松松的皱缬着”“轻轻的摆动着”。皱缬时“像少妇拖着的裙摆”,摆动时“像跳动的少女的心”,无论是“少妇”还是“少女”,都是在强调梅雨潭绿的年轻与活力。这些使得梅雨潭绿的动态形象具有一种轻盈而活泼的气质,赋予了她独特的活力与生命力,增添了她的美丽和魅力。

刘勰《文心雕龙》言:“辞为肤叶,志实骨髓。”^[12]¹⁹³朱自清对自然景物动态美的生动塑造,离不开他对自然景物炽热的情感与敏锐的观察力。他真正做到了以眼观物、以心观物,故而能得其形,得其神,才使得景物如此之真。

1.3 自然气韵之美

所谓“气韵”,意味着超越了客观物象外在的形貌,指向物象的内在精神和独特风韵。在朱自清的笔下,春天中的万物充满活力,荷塘中的景物充满灵气,梅雨潭的绿充满稚气。

《春》的活力体现在大自然中万物复苏,“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体现在春草顽强“钻”出土地、破土而出的韧劲;体现在春花争先恐后地开花;体现在蜜蜂嗡嗡地闹着、蝴蝶自由地飞、鸟儿在歌唱;体现在新翻的泥土散发的气息;体现在春雨中田间默默耕作的农夫身上;体现在“城里乡下,家家户户,老老小小”都出来“各做各的一份事”。朱自清以全景式的描写展现了万物在春天中的活力。

在《荷塘月色》中,自然景物具有了人的意识,充满了灵气。荷塘四面的树,“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几段空隙,像是特为月光‘留’下的”。一般“留”字的主语和宾语是人,例如“我为你留下”,但是此处的主语是树,宾语是月光,仿佛树有情、月光也有情似的。在荷塘月色的这个夜晚,荷花在“‘羞涩’地打着朵儿”,荷叶在“肩并肩”地挨着,光与影在谱写和谐的旋律,荷塘中的景物似乎都具有了生命气韵,在读者面前展示着自己的内在精神。

梅雨潭的绿“仿佛一张极大极大的荷叶铺着”,充满奇异;又如“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着实可爱;还“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看不透的清一色;更“仿佛蔚蓝的天融了一块在里面似的”,非常鲜润。在朱自清的笔下,梅雨潭的绿“如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稚气未脱,她是美丽、可爱、让人难以捉摸的,充满着独特的风韵。

歌德曾说,作家应遵守自然,研究自然,摹仿自

然,并且应该创造出一种毕肖自然的作品来^[13]。毕肖自然要求作家不仅能描摹自然形貌,而且要在作品中表现自然之气韵。在朱自清的笔下,自然万物因形貌与气韵的和谐统一而显得韵味无穷。

2 诗情之美

郁达夫评价朱自清的散文“满贮着那一种诗意”^[14],可谓精准捕捉了朱自清散文的特质。朱自清本人在进行文学创作时,也极为重视“逼真”和“如画”这两个美学概念^[15]。但他不是像写实主义画家那样强调对自然景物的还原,而是以诗人的眼光去观赏自然中的万物,并将自己真诚的情感倾注在客观物象和文字中。朱自清写景散文的诗情之美体现在意象与情趣相契合、情感的真挚抒发、人与自然和谐等方面。

2.1 意象与情趣相契合

朱光潜《诗论》说:“‘情趣’简称‘情’,‘意象’即是‘景’。”^[16]情景契合便会达到诗的境界。朱自清的写景散文可谓是情景契合的典范。从情趣与意象的配合上看,《春》主要是情景吻合、情文并茂,《荷塘月色》主要是即景生情,《绿》则主要是因情生景、因情生文。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在中国的文化中,春天蕴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如朱熹《春日》:“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17]可见春天在人们心目中是值得追寻的,是美丽的。《春》开头连用两个“盼望着”,将人们内心对春天的期盼之情淋漓尽致地挥洒在文字里。接着,朱自清又极尽笔力,运用文字描写充满生机的春草、俏丽的春花、温和的春风、喜人的春雨以及充满希望的迎春之人,突出春天万物和谐、愉悦的状态。朱自清将内心对春天到来的喜悦与美好的春日图景相交融,充分展现了春天的生机与美好。

《荷塘月色》即景生情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无边的荷香月色”里、在独处的时光中,朱自清短暂地忘记了自己“颇不宁静”的心情,感受到了久违的自由。另一方面是他由眼前的荷塘月色美景想到故乡江南采莲的场景。即景生情,景色与情趣相伴相生、相互影响,正体现了刘勰《文心雕龙》所说的“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12]¹⁸⁴。外在的景物与内在的情趣互相影响、互相渗透,诗意便由此产生。

《文心雕龙》有言:“缀文者情动而辞发。”^[12]³²⁹《绿》开篇就表达了作者对梅雨潭的绿的情感——

惊诧。朱自清因情生文,在行文过程中,极尽所能地描绘了梅雨潭绿的美丽,并坦率地表达自己想拥抱这“绿”,愿意用手拍着她、抚摸着她,更愿意掬她入口、吻着她,还要送梅雨潭的绿一个名字——女儿绿,深深表达了对梅雨潭的绿的宠爱。

意大利美学家维科曾说:“诗最崇高的工作就是赋予感觉和情欲于无感觉的事物。”^[18]当作家将自己的情趣投射到自然之中,二者将在审美的过程中实现主客交融,作品不仅会展现自然之美,而且会流露出作者内在的诗情。

2.2 情感的真挚抒发

《尚书》说“诗言志”,《毛诗序》进一步阐释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19]也就是说诗作是由心声真挚抒发借助文字创作而成。意象与情趣相契合会让读者因主客统一而感到“美”,情感的真挚抒发则会让读者感到“真”。正如孙绍振所说“诗的美不仅仅是客观的真实,而且是主观的真诚”^[20],朱自清的写景散文之所以具有诗情之美,或许是因为他足够真挚,因而总能以真情实意感染、打动读者。

《春》抒发了充满童趣与希望的诗情。童趣体现在将春天中的万物儿童化,写春花说它们“你不让我,我不让你”,写蜜蜂说它们嗡嗡地“闹”着,写鸟儿说它们“呼朋引伴”“卖弄清脆的喉咙”,写春天说它像娃娃、像小姑娘。希望体现在春天中富有生机的春草在春风中顽强生长,体现在农夫的勤恳中,体现在人们“一年之计在于春”的观念中。朱自清在《春》中真实而充分地展现了自己的童趣,也真挚地表达了对生活积极的态度。

在《荷塘月色》中,朱自清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绪,文章开头便坦率地表达自己“颇不宁静”。之后,随着时空的转变,感到“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里”。在这“另一世界里”,他无论是感受自由——“一个人在这苍茫的月下……便觉得是个自由的人”,还是感受落寞——“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抑或任思绪肆意流淌——“忽然想起采莲的事情来了”,“于是又记起《西洲曲》里的句子”,这些都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王国维《人间词话》说:“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21]在朱自清感到自由时,他笔下的“月下荷塘”之景既优美又典雅。在他落寞时,路灯似乎都没精打采。在他任思绪肆意流淌时,他所想到的是欢快与有趣的采莲往事。这种真实的表达能够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他在“神与物游”,以及主客之间融彻无间、天籁与心声和谐相应的状态,这种表达既增

添了“景之美”,又让读者感到“情之真”。

《绿》中情感的真挚抒发不仅体现在朱自清即景生情——对梅雨潭绿的描写与赞美上,而且体现在他对梅雨潭名字的一番见解上。在第二自然段中,朱自清写道,梅雨瀑从山上冲下来撞到岩上的棱角,形成水花。这些水花远远地看上去像是白梅,梅雨潭便由此得名。但朱自清却认为这些水花更像杨花——“轻风起来时,点点随风飘散,那更是杨花了”。朱自清可谓是真正做到了“我手写我心”,他细腻地观察,真诚地表达,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让读者深感其作品之“真”。

2.3 人与自然和谐

《庄子》中言:“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9]13}这一思想深刻体现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重视。朱自清的写景散文是这一理念的文学体现,在他的笔下,自然不再是纯粹的客观之物,而是有感知、有灵性、有情感的人类之友,其作品中处处流露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在《春》中,人与自然的和谐得到了生动地描绘。人们在草地上嬉戏——或坐、或躺、或打滚、或踢球、或赛跑——展现了人与自然最亲密的互动。在春天,人和花一同“赶趟儿”。春风的温柔如同母亲的手在抚摸着您,鸟儿的歌唱与牧童的笛声共同交织成春天的乐章……这些细节体现着景物的生长与人的成长互相映照,共同彰显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

《荷塘月色》则通过作者在自然中的心境转换,体现了自然对人的陪伴与心灵疗愈作用。朱自清内心“颇不宁静”时,他眼中的路是“幽僻”“阴森森”的,夜晚是“寂寞”的,此时景物如同他的好友因他的“颇不宁静”而黯淡了下来。随后,他在自然中“超出了平常的自己”,暂且来到自由的境界,开始以审美的眼光看待景物。于是,景物在他审美的心境下变得美丽动人。清华园的荷塘月色因朱自清而闻名,朱自清又因这方荷塘月色而享有片刻的自由,体现着人文与自然的相得益彰。

梅雨潭的绿对于朱自清而言并不是一种色彩,而是他心目中的女儿。在对绿的描写过程中用的是“她”而非“它”,文章最后更是直面梅雨潭的绿,称呼其为“你”“可爱的”“女儿绿”,亲密的称谓彰显了朱自清对绿的喜爱与宠爱。在朱自清眼中,梅雨潭的绿是醉人的、奇异的、可爱的。作为绿的追寻者,朱自清愿意“揪”着草、“攀”着岩石、“探身下去”,“鞠躬”过一个石拱门,费尽力气也要走到她的身边。朱自清更愿意“抱”住她,用手“拍”着她,“抚

摩”着她,“掬”她入口,“吻”着她。这些充满感情的动词,生动地表达了朱自清对梅雨潭绿的宠爱与对大自然的深情。

朱自清正是以诗人般敏感而细腻的心观察、观赏自然,继而坦率地将真情实感倾注于笔端,从而创作出具有诗情之美的散文。阅读朱自清的写景散文,所能领略到的不只是自然的风采,还有作家真挚的情怀。

3 形式之美

自然无私地向朱自清展现其美好,朱自清用心、用笔记录下自然之美,并为其增添了光彩。朱自清的文字不仅仅是对自然美景的描绘,更是对自然之美的赞歌。自然以其独特的方式展现美丽,朱自清以敏锐的观察力和卓越的语言驾驭能力将这份美升华。朱自清卓越的语言驾驭能力体现在其写景散文语言的绘画美与音乐美、句式灵活多变、语气语调的丰富与变化等方面。

3.1 语言的绘画美与音乐美

朱自清在《山野掇拾》中说:“作文便是以文字作画,他叙事,抒情,写景,固然是画,就是说理,也还是画。”^[22]在给俞平伯的信中他强调,艺术语言必须具有“既能悦目,又可赏心,兼耳底,心底音乐而有之”的魅力^[23]。这表明,朱自清在创作过程中致力于使语言具有绘画和音乐双重美感。在朱自清的写景散文中,这种双重美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散文《春》描绘了富有生机的春草图、俏丽的春花图、温和的春风图、静谧的春雨图和彰显着活力的迎春图。朱自清在描写各幅图景时,描写得非常细腻,例如,在春花图中,用丰富的色彩——“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由高到低的构图——树上的花、花下的蜜蜂和蝴蝶以及地上的野花,描绘出了百花争春的画面。在春雨图中,写春雨“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用一连串比喻句塑造春雨密、亮、细的特征。并通过“人家屋顶上全笼着一层薄烟”,突出春雨密的特征。通过“树叶子绿得发亮、小草青得逼人的眼”,突出春雨亮的特征。通过“安静而和平的夜、静默的草屋”,突出春雨细的特征。春雨不像春花有各样的名称、形状、色彩、气味,因此更难描绘。朱自清在总括出它的特征——细、亮、密之后,用人间的情形凸显其特征,契合了具象表现绘画理论——种种印象的叠加使得难以描绘的事物生动可感,可见其画面描写功力之深。与此同时,“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像牛毛,像花针、像细丝”既运用了比喻,又运用了排比的修辞手法,整

体来看是长句,具体到每一个分句又是短句。排比的使用使得文章朗读起来具有节奏感,能增强朗读的感染力和表现力。长短句的交错使用则增强文章的节奏感和韵律感,使得文章语言具有音乐美。

《荷塘月色》中月色与荷塘中的各种景物交织成了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有月下小径图、月下荷塘图、荷塘月色图、荷塘四面图,以及朱自清脑海中的江南采莲图。这些图景各有各的特色,月下小径是静谧的、月下荷塘是优美的、荷塘月色是朦胧的、荷塘四面是幽静的、江南采莲是欢快的,各具特色的图景增添了文章的绘画美。《荷塘夜色》除了图景多外,所使用的叠词也多,文中共使用了 26 组叠词。这些叠词有描写人物状态的,如“‘日日’走过的荷塘”“‘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悄悄’地披了大衫”。这些叠词的使用,生动表现了人物的生活状态与夜晚的静谧。叠词中也有摹写景物状态的,景物的状态包括静态和动态两种。描摹景物静态形状的叠词有“蓊蓊郁郁”“淡淡的”“曲曲折折”“田田”“层层”等,描摹景物动态的叠词有“渐渐地”“缕缕”“脉脉”等。《文心雕龙·物色篇》中提到:“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漉漉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嘒嘒学草虫之韵。”^{[12]309}朱自清可谓深谙此道,这些叠词的使用既摹写了人物和景物的状态,又增强了朗读时的节奏感,增添了文章的音乐美。

散文《绿》中,对梅雨潭有关景物的描写,体现了作者用语言绘画的高超艺术。梅雨亭“仿佛一只苍鹰展着翼翅浮在天宇中一般”,使读者能够联想到苍鹰展翅天宇的画面。“被扯成大小的几绺”的瀑布,“飞花碎玉般乱溅着”的瀑流,“晶莹而多芒”溅着的水花“像一朵朵小小的白梅,微雨似的纷纷落着”。朱自清运用“几绺”“飞花碎玉”“晶莹”“多芒”“小小的白梅”“微雨”等词语,形象勾勒出一幅雄伟壮观的梅雨潭飞瀑图。此外,“绿”本是一种无味、无感、无声的色彩,但是朱自清却用语言描绘出了梅雨潭绿的形状、光泽、色彩浓度和纯度,展现梅雨潭绿的浓郁、绿的纯净。这些对梅雨潭绿细腻的描绘增添了文章的画面感。在语言的音乐美方面,作者在第三段对梅雨潭绿细致的描写中,多次使用语气词,如“呀”“呢”“么”等,既能传达出作者对梅雨潭绿的情感,又使得文章朗读起来抑扬顿挫,增添了文章的音乐美。

3.2 句式的灵活与多变

句式是指句子的结构形式,它包括句子各个成

分的排列顺序和组合方式。法国作家布瓦洛曾说,一句漂亮话之所以漂亮,就在于所说的东西虽是每个人都想到过的,但所说的方式却是生动的、精妙的、新颖的^[24]。朱自清在其写景散文中,正是运用灵活且多变的句式,使语言表达得生动、精妙、新颖。

《春》在句式上长短句相结合,颇具形式之美。散文《春》主要通过调整语序和口语化两种方式使得长短句相结合、文章内部形式增多。春草图第一句话正常语序应该是“嫩嫩的、绿绿的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但这样的语序无法形成抑扬顿挫的语调,也无法突显语言的节奏感。将定语“嫩嫩的、绿绿的”后置,既实现了长短句的结合,又形成了短促而明快的语言节奏。类似定语后置的例子还有春雨图中“还有地里耕作的农夫,披着蓑,戴着笠的”,颂春部分“春天像小姑娘,花枝招展的,笑着,走着”。文中简练的口语化表述有“瞧去”“赶趟儿”“杂样儿”“不错的”“可别恼”“看……”“刚起头儿”等,这些口语化的表述不仅使文章形成长短句相结合的形式,而且使得文章内容更加生动有趣,使读者感到亲切自然。

《荷塘月色》同样运用了长短句结合的句式。在抒写自己时,朱自清多用短句。例如“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我爱热闹,也爱冷静;爱群居,也爱独处”“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在描写景物时,多用长句。例如“层层叶子中间,零星地点缀着些白花,有袅娜地开着的,有羞涩地打着朵儿的;正如一粒粒明珠,又如碧天里的星星,又如刚出浴的美人”,这句话运用了拟人、博喻等手法,细致地描写了荷花的神态、形状。朱自清采用长句描写景物、短句抒发自己心声的形式,与文章内容上语言的含蓄蕴藉相契合,彰显着《荷塘月色》的形式之美。

在散文《绿》中,仔细阅读之后便会发现,在第二段落中,朱自清在客观陈述自己的行踪和介绍梅雨潭时总是采用短句,例如“梅雨潭是一个瀑布潭”“我们先到梅雨亭”“亭下深深的便是梅雨潭”。短句后面,往往接着对这些景色描述的长句,这样的句式选择使得散文重点突出。在第三段落中,短句颇具口语化的色彩,朱自清多运用口语化的短句表达对梅雨潭的爱,例如“那醉人的绿呀!”“可爱的,我将什么来比拟你呢?”“我舍不得你;我怎舍得你呢?”这些短句夹杂在对梅雨潭绿描述的长句中,此处长短句结合凸显了朱自清对梅雨潭绿的亲昵与喜爱。

朱自清写景散文的句式灵活多变,增添了文章的节奏感,增强了语言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在朱自

清的写景散文中,句式的灵活多变使得文章形式与文章内容的精神气韵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能够看出朱自清驾驭语言文字的功力之深。

3.3 语气语调的丰富与变化

语气是指通过有声语言的高低、强弱、快慢、虚实等声音形式把句子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准确地表达出来的语言气息^[25]。语调则是说话或朗读时,句子有停顿,声音有轻重快慢和高低长短变化的总称^[26]。朱自清写景散文句式的灵活与多变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语气、语调的丰富与变化。同句式的灵活与多变一样,语气语调的丰富与变化也是朱自清散文形式之美的重要组成部分。

语气和语调的选择会影响着文本情感的传达。《春》中语气的欢快与语调的恰当处理,能够使人更易感受到春天的活力与美好。例如:“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这句话中“朗润”“涨”“红”重读,可以突显出春天万物复苏、生机勃勃的气象。朗读时,在主语与谓语之间适时的停顿,能够进一步突出景物的主体性和生命力。以“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为例,在“风”与“轻悄悄的”、“草”与“软绵绵的”之间巧妙地停顿,可以赋予风和草以生命的主体性——仿佛它们两个是具有主观意识的独立个体,在自然中以和谐、舒适的姿态存在着。

朗读《荷塘月色》时,语气和语调应随着朱自清情绪的变化而变化。在表达朱自清“颇不宁静”时,应选用沉闷的语气与缓慢的语调,以衬托出他的不安。当朱自清在荷塘月色的美景中暂且寻觅到平静与自由时,应选择轻松的语气与平缓的语调,以表现他在自然美景中短暂的放松与愉悦。在读到“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时”,又应转为低沉的语气与缓慢的语调,以传达出其在外界热闹与内心孤独的强烈对比中的失落感。朱自清即景生情,因此在朗读时,应不断调整语气和语调以准确传达出他的情绪。

《绿》中丰富的语气词一定程度上意味着这篇文章语气和语调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朱自清在第三段对梅雨潭绿细致地描写中,多次使用语气词,如“那醉人的绿‘呀’”“这是怎样一个妄想‘呀’”“居然觉着有些远‘呢’”“其余‘呢’”“我怎舍得你‘呢’”“好‘么’”,这些语气词的使用,既能传达出其对梅雨潭绿的情感,又使得文章朗读起来抑扬顿挫。在这篇文章中,语气词“呀”“呢”分别出现了5次,“么”出现了1次。这些语气词或表达惊叹——“居然觉着有些远呢”“满是奇异的绿呀”,或表达反

问——“我舍不得你;我怎舍得你呢”,或表达亲切——“我从此叫你‘女儿绿’,好么”。能够看出,这些语气词的使用使得文章的情感层次更加丰富。

绘画能绘其形,却不能传其声。音乐能传其声,却不能绘其形。唯有文字既能绘形,又能传声。朱自清细致入微地观察、摹写自然景观,使得“风景如画”成为现实。他对语言、句式、语气的灵活选择、运用,赋予了文章节奏感和韵律感,使读者朗读时能够感受到音乐般的流动、和谐,这些均彰显了朱自清写景散文的形式之美。这种对形式之美的追求,不仅增强了写景散文的艺术感染力,而且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能够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作者的情感与态度,从而获得更加丰富的审美体验。

4 结论

朱自清的写景散文不仅具有细腻描绘的自然之景、真挚和谐的诗情韵味,而且具有灵动的形式之美。阅读这些写景散文,能够深切感受到“物象有限,而象外之旨无限”,能领略到朱自清独特的笔调和文调。在笔调方面,朱自清具有高超的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能够选择精准的字词、修辞、句式、语气等,精确传达出自己的所思所感;还具有清晰的思绪,能够巧妙构思,合理布局文章,安排文章结构,因而具有形貌逼真、气韵生动、摇曳多姿的笔调特点。在文调方面,朱自清情感真挚、坦率,为人真诚、质朴,使其写景散文具有情感真挚、诗意盎然、文化底蕴深厚的文调特色。正是这份真诚,朱自清赋予了其写景散文以浓厚的艺术感染力,使之成为现代文学中的瑰宝。

参考文献:

- [1] 吴周文. 论朱自清的散文艺术[J]. 文学评论, 1980(1): 102 - 111.
- [2] 张炳隅. 有情有趣亦新亦奇——从《绿》《荷塘月色》看朱自清散文的修辞艺术[J]. 当代修辞学, 1982(1): 35 - 39.
- [3] 秦宗元. 谈朱自清散文的写景艺术[J]. 河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6(4): 53 - 57.

- [4] 关坤英. 朱自清散文的朦胧美——从《荷塘月色》谈起[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1987(5): 104 - 109.
- [5] 刘学明, 范义臣. 试论朱自清写景散文的艺术特色[J]. 重庆工学院学报, 2003(2): 101 - 103.
- [6] 阳花荣. 朱自清写景散文中的概念隐喻研究[D]. 贵阳: 贵州大学, 2021: 1.
- [7] 孙绍振. 名作细读——微观分析个案研究[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9: 5.
- [8] 丰子恺. 绘画与文学[M].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5: 1.
- [9] 萧无陂. 导读译注. 庄子[M]. 长沙: 岳麓书社, 2021.
- [10] 朱自清. 朱自清散文集[M].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8.
- [11] 钱钟书. 管锥篇[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2.
- [12] 刘勰. 文心雕龙(全译本)[M]. 王更生, 译.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21.
- [13] 朱光潜. 西方美学史[M].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24: 388.
- [14] 郁达夫. 郁达夫散文名作[M].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4: 126.
- [15] 朱自清. 朱自清讲文学[M].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 102 - 112.
- [16] 朱光潜. 诗论[M].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22: 63.
- [17] 朱熹. 朱熹诗文选译[M]. 黄坤, 译注. 成都: 巴蜀书社, 1990: 79.
- [18] 维柯. 新科学[M]. 朱光潜,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103.
- [19] 孔颖达. 毛诗正义: 卷第一[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6.
- [20] 孙绍振. 审美阅读十五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6.
- [21] 王国维. 人间词话[M]. 苏州: 古吴轩出版社, 2012: 5.
- [22] 朱自清. 朱自清序跋书评集[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3: 144.
- [23] 时萌. 闻一多朱自清论[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2: 164.
- [24] 郭东斌. 主编. 格言大辞典[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0: 751.
- [25] 孙青艾. 主编. 普通话简明教程[M].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89: 143.
- [26] 黄伯荣, 廖序东, 主编. 现代汉语: 上册[M]. 6 版.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104.

士人风度对魏晋时期舞蹈美学特征的影响研究

韩丽^{1*}, 李梓林²

(1. 安徽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2. 安徽医科大学团委 大学生艺术教育中心, 安徽 合肥 230000)

摘要:分析了魏晋时期舞蹈的美学风格及魏晋士人风度对其审美的深远影响, 魏晋舞蹈艺术表现出气韵生动、自然抒情的特点, 重视“以形写神”来表达内在神韵, 折射出当时士人风度与玄学思想的交融。魏晋士人通过自觉调和舞蹈的形式与内容, 将舞蹈艺术引入更高层次的审美表达, 奠定了古典舞“雅正之道”的美学基准。此种美学范式在“人的主题”之框架下, 推动了舞蹈功能的拓展与创新, 成为后世舞蹈艺术创作与欣赏的基石与参照系, 树立了舞蹈艺术的独特审美典范。

关键词:士人风度; 魏晋舞蹈; 美学特征; 审美

中图分类号: K235; J7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297X(2025)03-0036-07

Influence of Scholar's Demeanor on th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of Dance during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HAN Li^{1*}, LI Zi-lin²

(1. School of Music,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nhui;

2. University Student Art Education Center, Youth League Committee,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Hefei, 230000, Anhui)

Abstract: The dance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embodied an aesthetic characterized by charm, naturalness, and lyricism, emphasizing a refined and graceful beauty. Its expressive techniques aimed to depict spirit through form, reflecting the intellectual and spiritual ideals of the scholars' demeanor of the time. The “scholars' demeanor” during this period consciously harmonized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dance, aligning it with an elegant moral path, aesthetic principles that deeply influenced the creation and appreciation of dance across subsequent generations. These principles became core to classical dance's enduring aesthetic spirit, sparking new reflections and practices within the “human-centered” framework, and established an unprecedented standard for later eras.

Key words: scholars' demeanor; dance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 aesthetics

艺术的发生与发展总是嵌入于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之中,特别是在哲学思潮的催生下,艺术思潮对艺术创作及审美具有直接且深远的影响。在政治动荡、社会变革的背景下,魏晋士人普遍具备高超的文化素养和广博的学识,他们不仅在文学、艺

术、哲学等领域取得了卓越成就,还在美学思想上有所创新。王弼和何晏等将老庄思想与儒学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魏晋玄学,对士人们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玄学对“言”“意”“象”的追求,使士人在文学和艺术创作中更加注重内在精神和形象意境的

收稿日期: 2024-07-28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5YJC760036); 安徽省质量工程“六卓越一拔尖”舞蹈表演人才培养计划(2023zybj007)。

作者简介: 韩丽(1981-),女,安徽阜阳人,教授,博士; 李梓林(1998-),女,山东枣庄人,硕士研究生。E-mail: hanli_81@sina.com.cn

表达。这一时期士人以其独特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对当时的美学思想和文学艺术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

1 魏晋士人风度的精神内核与艺术表达

1.1 魏晋士人风度的精神内核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时期,社会动荡、政权更迭频繁。在这样的背景下,士人阶层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士人多具备高超的文化素养和广博的学识,他们不仅在文学、艺术、哲学等领域有深厚造诣,还在政治上发挥重要作用。魏晋时期玄学兴起,代表人物王弼、何晏等将老庄思想与儒学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魏晋玄学。这一时期文学繁荣,出现了“建安风骨”和“太康文学”。士人阶层在文学上不仅是创作者,更是传承者和评论者,他们通过诗文表达思想情感,也通过文学作品影响社会风尚。士人在书法、绘画等艺术领域也有突出贡献。王羲之的书法被誉为“书圣”,他的《兰亭序》被视为书法艺术的巅峰之作。顾恺之的绘画作品则在人物画领域开创了新风,影响深远。这些艺术成就不仅反映了士人阶层的个人才华,也展示了他们对美学的追求和理解。

“魏晋风度”一词专指魏晋时期名士们展现出的独特行为风格,主要特征为率真坦诚、超脱世俗、清俊雅致,体现出对个性自由与精神解放的高度追求。魏晋时期的社会动荡及玄学思潮的兴起,促使名士们摆脱了传统儒家伦理的束缚,追求更为个性化和洒脱的生活方式。饮酒、清谈以及纵情山水,成为这一时期名士阶层广泛推崇的生活实践。这些活动不仅反映出他们对精神自由与自我解放的渴望,还蕴含了名士们对世俗权力的抗拒及对生命本质的哲学探讨。在饮酒和清谈中,名士们通过探讨玄理、思辨人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精神氛围与文化现象,而纵情山水则表现出对自然的热爱与对超越世俗纷扰的向往,进而构建了魏晋时期独特的精神风貌。

1.2 魏晋时期的艺术表达

魏晋时期是文化与艺术自觉的时代,在《世说新语》中记录着这一时期追求自由、充满热爱、富有智慧的一群士人的精神风貌,被后世称为“魏晋风度”。“魏晋风度”作为一种社会风习,影响到当时文学和艺术的各个方面,在舞蹈领域中的表现尤为突出,对后世舞蹈风格与审美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鲁迅在《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道:“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1]

这一对艺术的见解,体现了自三国曹魏时期以来,乐舞逐渐摆脱了礼教的束缚,部分解脱了其作为统治工具的功能定位。这一转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曹操、曹丕父子对天命论的怀疑态度及对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批判与鄙弃。在此背景下,曹魏政权设立了“清商署”这一机构,专门收集、整理民间俗乐与俗舞,推动了乐舞形式的多样化和世俗化。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统治者对传统礼乐制度的突破,也促成了音乐与舞蹈艺术在思想上的解放与繁荣。

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乐舞发展的重要转折时期,与两汉经学相比,魏晋哲学是充满理性与自由的;与制礼作乐相比,魏晋艺术是感性与抒怀的。宗白华认为:“这是强烈、矛盾、热情、浓于生命色彩的一个时代,使我们联想到西欧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2]209}可见魏晋时期的艺术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艺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并且这种思想对于这一时期的艺术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魏晋时期建安(今南京)的士族们没有不爱饮酒赏舞的,他们沉醉于情意缠绵的乐舞宴席之中聊以自慰,希望暂时摆脱现实的悲惨苦闷。伦理道德分崩离析,唯有及时享乐才能暂时忘记哀伤,于是“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古诗十九首》);“百年之命忽若倾,早知迅速秉烛行”(《晋白紵舞歌诗》)。世道艰难,永无餍足地寻求享乐、山水栖息,不过是对于既富贵又忧患的矛盾处境中产生的一种新的思想境界,表面的逍遥自在和内隐的思考、痛苦与挣扎,是其真性情与当时虚伪的礼法社会之间不肯妥协的过程,这也促使了魏晋时期的舞蹈内核与功能发生了飞跃式的解放与变化,它有别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这种高度依赖于崇尚精神上的自由导致文学和艺术诞生了具有魏晋风度的美学思想。

2 魏晋士人风度对当时乐舞风格的影响

魏晋时期出现了与当时社会精神高度契合的舞蹈,如《白紵舞》《鸂鶒舞》等,《白紵舞》原是三国吴地的民间歌舞,因白色紵麻舞衣为该舞的特色服装而得名,以舞袖为特征,舞姿轻盈、柔婉^{[3]82}。白色紵麻做成的白紵舞衣轻盈飘逸、纯白清澈,舞者清雅脱俗,很好地与舞衣配合融为一体,崇尚自然、素雅,飘逸且悠然,把自然美与人格美体现得淋漓尽致。《鸂鶒舞》是模仿鸂鶒动态的舞蹈,它在魏晋时期民间流传广泛,据说东晋时期太傅谢安的堂兄谢尚善于此舞。唐朝卢肇曾作《鸂鶒舞赋》,对谢尚所跳《鸂鶒舞》进行了生动的描述。谢尚之舞鸂鶒,表现

了魏晋士人越“理”任“情”、违时绝俗的人生态度。表演时谢尚脱去外套,扔掉帽子(“褫貂裘,岸章甫”),继而“屈伸俯仰,旁若无人”,委实表现出率性任真的“魏晋风度”。舞蹈中,谢尚不仅惟妙惟肖地模仿出鸬鹚的动态,而且通过对鸬鹚的传神表演,表达了那种如鹤之孤傲、如云之高洁的意蕴,飘逸娴雅,超凡脱俗^{[3]87}。

这些舞蹈作品均在本质上反映着与魏晋时期整个文学艺术相一致的时代特征,可以说魏晋风度与魏晋舞蹈交相呼应,共同诠释了这一时期“为艺术而艺术”的自觉性。至此魏晋时期的舞蹈风格形成了独特的审美典范,成为中国舞蹈美学中重要的研究资源之一。

2.1 生动气韵的审美典范

在中国传统艺术发展历程中,气韵一直扮演着书法、音乐、戏曲等多个艺术领域的基石角色。几乎所有的艺术门类均受到“气韵生动”原则的深远影响,而舞蹈亦不例外。气韵为这些艺术门类注入了独特的审美内涵,这种多层面、跨领域的气韵传承与影响,不仅加深了对传统艺术本质的理解,也为舞蹈这一特定艺术领域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背景,使其在表达和传承中更加深邃而多元。首先,“气韵”体现在表现人物的状貌与风度,也可以理解为在有限的肢体动作和时间空间里,呈现出一种无限的、打破时空的、超乎圣人所能达到的境界与神情。李泽厚说:“气韵生动时表现出人的内在的精神气质、格调风格,而不是外在的环境、事件、形状、姿态。”^[4]其次,魏晋舞蹈中的“气韵”体现在舞姿舞容与动作节奏的相互配合之中。以流畅的气造就自然的神韵,可以说“韵”是“气”之到位的终极显现。再次,舞蹈中的韵谓之“韵味”,还能体现在舞者的服饰、动作等外部特征与思想精神风貌等内部特征的浑然一体,从而达成一种飘逸俊朗、形神兼具的舞蹈美,这种气韵生动的审美范式与当时文人的思想不谋而合。

在《庄子·至乐》中有一段描述:“不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5]这段话是庄子在给惠子解释为何妻子离世庄子却不哭的原因,其中表达了庄子的生命观。他认为人本来就是无形的,在境遇之中幻化出来“气”,而“气”又化为“形”,再至生命与死亡和四季的轮回没有区别,幻化游走在天地之间。所以,庄子在讲述生命往复的道理时,就已经提出了一种无限的、不可穷尽的“气之论”。“气韵生动”的命题最早见于南朝画家

谢赫(生卒不详)的《古画品录》一书^[6]。谢赫提出了在绘画艺术中共有“六法”,这在中国的绘画史上影响极其重大,其中“气韵生动”就放在“六法”的首位,这是中国古代画论乃至中国古典美学体系中的极其重要的核心范畴。如宗白华说:“气韵,就是宇宙中鼓动万物的‘气’的节奏、和谐。绘画有气韵,就能给欣赏者一种音乐感。”^{[2]50-51}钱钟书也曾提出,谢赫所陈述表达的“气韵”乃是为人物所散发出来的内在的“神韵”,他通过“以生动释气韵”的方式来诠释其内在的意韵,其中“气韵生动”则指图中人物展现出“栩栩如活之状”。这表明,谢赫所强调的气韵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概念,而且是通过生动活泼的表达方式,使人物形象更具活力和逼真感。这样的论述不仅深化了对气韵的理解,还强调了其在人物描绘中的实际应用,使观者更加贴近和感受到作品所传达的神韵。由此分析来看,一方面气韵在于对呼吸节奏的把握,另一方面则在于对人物形象的描写,这都与谢赫在当时所受到的社会思潮有关。自从曹丕设立九品中正制以来,人物品评成为社会风尚,讲究脱俗豁达的精神风貌成为魏晋时期的审美理想。气韵生动体现魏晋时期人的自觉这一主题,主要表现在注重美化人的形象与气质,这一观点塑造了千百年来中国古代艺术都注重传神、表现含蓄、韵味悠长、言不尽意的风格特点。庄子的“气论”观点具有开创性作用,他认为生命现象的本源就是气,在庄子哲学中衍生出的魏晋玄学“言不尽意”形成了新的美学思想,让人高度重视“气韵”,但是又超乎神色,无法捕捉却只能意会。

《拂舞》是魏晋时期流传于吴地的舞蹈,为执“拂”而舞,“拂”为道家的法器“拂尘”,表演者借此道具演绎不同角色,来达到飘飘欲仙的情景,起到烘托氛围的作用。现以《宋书乐志校注》卷四中《拂舞歌诗五篇》之《白鸠篇》附录如下:

翩翩白鸠,再飞再鸣,怀我君德,来集君庭。
白雀呈瑞,素羽明鲜,翔庭舞翼,以应仁乾。交交鸣鸠,或丹或黄,乐我君惠,振羽来翔。东壁余光,鱼在江湖,惠而不费,敬我微躯。策我良驷,习我驱驰,与君周旋,乐道亡余。我心虚静,我志沾濡,弹琴鼓瑟,聊以自娱。陵云登台,浮游太清,扳龙附凤,日望身轻。^[7]

虽然“拂舞”的舞姿舞容现今已不可能完全复原,但是从舞辞中仍然能窥探到当时“拂舞”表演时超凡的气韵之美。在其艺术意境的构建和韵味的表达上,从舞辞二、三解可以看出“拂舞”与《白符舞》或者《白鳧舞》的渊源颇深,其舞蹈动作必然带有

鸟类自由飞翔的率真感,呈现出清新自然的舞蹈风貌。此外,在“拂舞”的表演中运用了拂尘作为道具,非常具有特色和意味。拂尘是道家与佛家的法器,在佛家中象征着去除人世间的俗物烦恼,佛经的经典书籍描述菩提老祖出场时,往往执白拂上堂为百姓谈法,即为“秉拂”;而道家长老外出游历江湖,常常随身携带拂尘作为法器,让世间芸芸众生为之敬仰,树立仙风道骨的形象,拂尘也就成了象征道教道士的身份符号特征之一。拂尘更有洗去尘埃的作用和洗去尘世烦忧的象征性意义,例如白居易诗作《长斋月满携酒先与梦得对酌醉中同赴令公之宴戏赠梦得》写道:“斋宫前日满三旬,酒榼今朝一拂尘。”^[8]所以在表演“拂舞”时使用拂尘,使得表演能够营造出超凡脱俗的玄妙意境。

“拂舞”最广为流传的时期正处于西晋王朝岌岌可危、衣冠南渡到建安偏安一隅的时期,东晋时期的门阀政治作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特殊的统治手段,其弊端可想而知。此后中国历史上迎来了政治上最混乱、百姓最痛苦的二百年,政权更迭频繁,百姓居无定所。在曹魏政权的精神解放之下,老庄道家思想成为一把玄学的钥匙,让无所归依的人们找到了心灵的寄托,门阀氏族追求及时享乐,清谈逐渐流行,一股虚无的思潮在社会中散播开来。“拂舞”浸润其中显然受到深刻影响,其舞蹈的气息和动作紧密连接,以气之流畅化为韵味,把握住了淋漓挥洒、百态横生的舞蹈美的特点。发展至刘宋,虽然刚健清丽的风貌已经难寻踪影,但是仍然保留着魏晋时期的君子风度,其精神内核获得升华,舞蹈的雅化体现了其深厚的中和与气韵之美,将当时人们内心对自由的向往、对自然的敬畏和对高贵品质的崇尚展现得淋漓尽致。“拂舞”的舞辞多为宁静悠远、空灵明净、自然豁达的基调,创造出虚实结合、富有韵味的意境,舞中描绘着当时士人阶层的人生感悟和与人生志趣相对应的内容,与我国古典美学体系中对于“气韵”的表达和审美期待相当吻合。舞蹈对于人的品格风度极尽描写,其舞辞更是传神地描摹了当时士人的浪漫与淡远。后期,魏晋舞蹈在宫廷雅化后,尽管由于统治者的审美偏好而导致当时的舞容发生了较大改变,但是其魏晋时期的精神内核仍然保留。《巾舞》《白紵》《巴渝》统属魏晋时期的“杂舞”,“杂舞”是在宫廷进行表演的民间俗舞,文中记录了此类舞蹈演出风格的变化过程,在南朝之前的舞蹈服装的材质多为轻纱,款式为大袖、裙长至脚踝以下,舞者着舞服舞动之时体现出飘逸摇曳、婀娜婉转的曼妙舞姿。

2.2 形神俱佳的艺术理想

东晋顾恺之是中国古代画论第一人,他的艺术思想是以玄学思想为主,受王弼“言不尽意,象不尽意”观点的启发,意识到语言和形象无法有效地表达语意,无论多么生动的形象都不能完全抵达意象,有限的“形”不能表现无限的精神,最终还是要归结到对“神意”的追求。

简单来说,即无论刻画的形象多么惟妙惟肖,都无法完全捕捉意象的本质。有限的形式无法完全抵达无限的精神境界,因此最终的追求还是要归结到对“意”的探索。顾恺之在人物画实践中所呈现的艺术贡献不仅体现在他对玄学形神美学的应用,更重要的是他将这一理论上升为绘画实践的指导原则,深入研究了中国古代传统绘画中的神韵表现方式,提出“以形写神”“传神写照”等美学命题,将形与神相结合,追求人物形象的内在意境与精神特质的真实表现。顾恺之可谓是玄学美学时期在形神艺术方面的杰出代表,这一“形”与“神”的辨析在魏晋的艺术品评中同样是一场精彩而复杂的讨论,涵盖了绘画、舞蹈、文学、音乐等多个艺术领域。

舞蹈艺术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在“形”与“神”之间找平衡。“形”指的是舞蹈的外在形式、造型和动作,这包括舞者的身体动作、舞蹈的编排结构、舞蹈动作的技术要素等,更多地呈现出一种线条感。舞蹈的形式要素直接反映在观众眼前,是可见的、具体的。例如舞者的舞步、动作的流畅性、编舞的结构,都构成了舞蹈的“形”层面。“神”强调的是舞蹈的内在精神、情感和意境,它关注舞蹈所传达的情感、思想和艺术意义。在舞蹈中,神韵表现为舞者通过动作和表情传递情感、表达思想,并在观众中引发共鸣。“神”是舞蹈的灵魂,是超越形式的艺术内涵。

傅毅在《舞赋》中描写道:“罗衣从风,长袖交横,绰约闲靡,机迅体轻,体如游龙,袖如素霓。”^[9]这段描写生动地再现了袖舞的线条感;“将流将引雁双行”也许可以理解为一种流动的舞蹈调度,如大雁般成群结队且有秩序的队形,这是白紵舞辞中为数不多的描写调度的诗句,且在晋代多人白紵舞中出现。白紵舞拂、抛、扬等动作时,必须借助“气”与“力”,气从腰出,舞时如水银泻地,长袖飒纚,奋而生风,一气呵成。“气”与“力”的支撑,造就了白紵舞的“形”,有“长袖交错”“舒意自广”的畅快感以及“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流动感。白紵舞之“线形”可谓是“笔走龙蛇”。而南朝宋刘铄的“状似明月泛云河,体如轻风动流波”是线性感的另一种动态美,使用了生动的比喻和抽象的意象,以展现舞

蹈的优雅和流畅。“状似明月泛云河”通过将舞者的状态比喻为明月泛起在云河之上,传达出舞者在舞台上的静谧。“明月”作为自然界的美好象征,为表演赋予了清丽的氛围,而泛动在云河之上则描绘了舞者在舞蹈中的轻盈和灵动。“体如轻风动流波”通过将舞者的身体比喻为轻风,舞蹈动作则如同流水波澜,表现了舞者舞蹈时身体的轻盈和舞姿的流畅。这样的描绘展现了舞者在舞台上如同自然界的风和水一样,具有令人陶醉的美感。

2.3 古朴自然的表现特征

道家思想渗透在魏晋南北朝的文艺作品之中,老庄以“道”来解释万事万物,崇尚自然,反对任何形式的人为雕琢;主张无为,追求自然而然;主张“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10]等,道家思想对魏晋时期的文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虚实结合形成了魏晋文化的美学基础。嵇康《琴赋》中有言:“夫所以经营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丽,而足思愿爱乐矣。”^[11]王弼的“大美配天而华不作”,宗炳的“山水质而有趣灵”,陶渊明的“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等说法都是对老庄“美在自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魏晋时期的士人阶层沉醉于建立一种纯粹的本体,渴望在有限的空间达到无限的精神状态,即身体有限而意识无涯。其在美学上体现为发扬一种率真自然、不拘一格的飘逸美。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向来崇尚“法天贵真,不拘于俗”的君子品格,这种品格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由老子提出来,而在魏晋时期已经形成一定的风气,它引导着人们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去欣赏山水,寓情于自然,在山水自然中获得审美愉悦感。其实对于大自然的深厚情感不是士人阶层所独有的,而是魏晋时期主流思想的主要特征,在嵇康、阮籍、陶渊明的思想中均有体现,成为这个时代通向美学的重要命题,其中最基本的特征是自然被赋予道德精神的属性。在记载魏晋六朝的文学专著和艺术作品中,处处可以看到自然主义的影子。

在魏晋时期的舞蹈中,很多舞蹈的意象都来源于大自然的生物,并且运用艺术的形式寓情于物,表达出古朴纯真的审美理想。这与汉代充满生活气息的现实性舞蹈不同,魏晋时期的舞蹈崇尚率真、飘逸、娴雅的特征。以《鸬鹚舞》为例,它是魏晋时期民间流行的一种模仿鸟类动作形态的舞蹈,《晋书·谢尚传》有记载:谢尚“善音乐,博综众艺”,深受东晋开国丞相王导器重。某天,谢尚赴王导府上参加宴会,王导对他说:“闻君能作《鸬鹚舞》,一坐倾想,宁有此理不?”谢尚欣然答应,“便著衣帻而舞。

导令坐者抚掌击节,尚俯仰在中,旁若无人”^[12]。谢尚的表演就是通过对鸬鹚动作形态模仿的外在形式,去肯定它内在的追求自由、高贵、优雅的精神品质。从《鸬鹚舞赋》的描写可以想象出谢尚的舞蹈技术高超,只见他容光焕发、精神抖擞,双臂舒展作飞翔之态势,忽而腾飞、忽而低伏,其动作奔放飘逸、流畅自然、惟妙惟肖,获得了满堂喝彩。结尾一句“然后知鸿鹄之志,不与俗态而同尘”点出了《鸬鹚舞》最核心的精神内涵。对于魏晋士人而言,自然与艺术都是一种载体,是寄托情怀与志向的载体。由此可见,《鸬鹚舞》是一种化身自然、赋予自然人格意义的仿生性舞蹈,在人们与自然和谐的互动中,体悟到了“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艺术境界。这些反映在舞蹈艺术作品中,均是借用自然之美来表现内心的志向与情义,以此来摆脱世俗给予人的种种枷锁,最后达到物我合一的精神境界。当然,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政治背景来看,与其说是陶醉,不如说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麻痹。魏晋舞蹈中关于自然和人格的解读,与现代人追求的民主与尊严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体现出不同时代人们对于自由这一理想的追求和向往。

2.4 深情善感的内涵探索

雅乐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式微与俗乐的兴盛标志着人们对于乐舞的审美偏好发生了深刻变化。不再单一强调雅乐的高贵与庄重,而是更加注重俗乐的轻松愉悦。这种转变首先归因于统治阶层对俗乐的热衷和推崇,其次则在于士人阶层音乐舞蹈的自主发展。这一系列变革形成了一股“以悲为美”的时代审美风尚,在此过程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乐舞的美并非仅限于庄重激昂,而在于表达多样的情感和体验。这种审美风尚的形成不仅改变了乐舞的表达方式,也反映了人们对于生活品质的追求和对情感表达的多元化认知。

“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是魏晋名士王廋的临终之言,王廋出身于江南一带的顶级士族琅琊王氏,其祖父为东晋开国丞相王导,史称“王与马,共天下”。相传王廋曾登上茅山,一时内心悲恸哭着咏出此句,传诵千古。有学者认为“这句 10 字名言堪称魏晋时代关于人生问题的最高宣言”,当时文人的深情作为显著的美学特征,是在特殊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中孕育出来的一种对于生命情感的执着,具有中国哲学中所言之“情”的深刻内涵^[13]。这深沉的情感融入到魏晋时期士人的精神境界和日常生活中,转化为一种宽广的对生命的深刻思考和情感体验。他们对于天地万物都保有悲悯的关切,

这种关切是一种不带有任何功利色彩的深情,充分表现了“一往深情”的精神品格。从表面看,或许是消极苦恼的思想状态,其实恰恰是对生命最深情的留恋。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将“人的觉醒”作为魏晋时期反映在文艺美学思潮的基本特征,这种觉醒通过文艺作品清晰而直接地被反映出来,对于世事如棋、人生短促、节气转换的体悟与哀叹,都朴实无华直陈肺腑地表现出来,是一种对于自然万物短促无常的伤怀。这种对于离别和生死的重视,对于时间的感受,从三国时期到刘宋,从门阀氏族到皇家贵族,在相当一段长度和广度中发散开来,成为这个时代最为代表性的声音。

抒情是魏晋舞蹈的主要特征,《白紵舞》就是这一时期中最典型的例子。《白紵舞》因为表演者身穿一种细而洁白的苧麻衣而得名,故而它不是一个特定的舞蹈剧目,而是因为舞蹈服装的特殊性而得名。三国归晋后,此舞蹈便流传到了晋朝各地。经考察《白紵舞》的舞容来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对于图腾“鸟”的崇拜,三国吴地人以“白鹤”作为图腾,既是崇尚鸟类自由的状态,更是认为鸟类被赋予了上天的力量,可以沟通生者与逝者亡灵。东晋之后,《白紵舞》进入宫廷,编入“清商乐”,成为上层人士消遣娱乐的重要项目,是当时宫廷宴饮的必要歌舞,《白紵舞》不仅受宫廷皇室所爱,更是得到了门阀氏族和士人阶层的热切欣赏,士人们把《白紵舞》看作是自娱自乐和抒发情感的重要途径,《白紵舞》也浸润在当时的审美风气下,形成了清丽淡雅、飘素回风、抒情言志的舞蹈风格。

从当时大量描写的白紵舞辞可以窥探到《白紵舞》的意蕴:例如“低鬟转面掩双袖”描绘了舞者低垂的鬟髻,随着转动的头颈微微摇曳,双袖掩面;“鬟”是环形的发卷;“低鬟转面”即低头转面,接以“掩袖”,表现了温婉内敛的神韵。这一动作不是技术,而是情感表达;“长袖拂面心自煎”描绘了长袖拂过舞者的脸庞;“拂”有挥、甩动和轻轻擦去的意思。在这里“拂袖”是一个挥动且幅度较小的动作,以腰部发力只动小臂,并且辅以舞者悲伤的情绪;“罗袿徐转红袖扬”描述舞者动作的速度,徐转表示动作缓慢、流畅,进而“扬袖”快慢结合表现出动作的张力;“扬袖”动作幅度较大,且在空中形成一条弧线,呈现一种线条感。这些诗词描写了白紵舞的舞蹈表演姿态与动作的婀娜多姿,从侧面能感受到其体态所表现的内涵。《白紵舞》蕴含的魏晋“情”素主要可以分为“眉目含情”和“抒情言志”两种。

用眉眼来表达情绪是魏晋南北朝舞蹈表演时一

种重要的表现手段,在舞姿中时不时目挑心招、缓送秋波,一会儿流转笑眸,一会儿含情脉脉,独具风味,舞辞抓住了舞蹈表演过程中的动态美,舞者的情感性通过眼神的转换与流动全然焕发出来,能够让观赏者通过舞者的眉眼感受舞蹈传达的情绪,使《白紵舞》的表演更加具有生动性、表情性和感染性。舞蹈不再是单一的形式,而注入了丰富而充沛的内心情感和人文内涵,这是魏晋时期文学艺术所表达的“人的自觉”的重要体现。顾恺之有言:“四体妍媸,本无关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这给当时的文化艺术以全新的思路,即在对于人物形象塑造时,外表形态的逼真是其一,最为重要的是要通过外在形象表达其内在的情绪、精神品质与内涵,也充分肯定了眼神在舞蹈表演中传情达意的作用。

汤惠休《白紵歌二首》曰:“少年窈窕舞君前,荣华艳艳将欲燃。为君娇凝复迁延,流目送笑不敢言。长袖拂面心自煎,愿君流光及盛年。”这首诗完美地描写了舞者在表演时舞姿体态以及舞者生动细腻的心理活动,刻画这位女子羞于吐露爱情的娇痴情态。美丽的年轻舞者一出场,其曼妙窈窕的舞姿和华丽雍容的服饰映入观者眼帘。她的表演技艺精妙,但当她起舞时看到心仪的少年,内心却难掩其难以言表的忧愁。她担心光阴易逝、容颜易老,想趁着青春年少向对方表达爱慕之情,但是由于阶级差距过大不敢开口。这里为了描写人物的情感,将眼睛作为心灵的窗户,生动刻画了其含情脉脉的动态性。为了心上人,她目光娇凝、舞步迁延,但那番情意却只能在目光中流露,在微笑中暗送,而不敢言传。她希望用眼睛传达、暗送秋波,但心里内心局促,焦虑不安,故而飘舞摇曳、以袖遮面,掩盖着内心的挣扎^[14]。在汤惠休《白紵歌二首》中,仅仅几句诗歌却把如此复杂而矛盾的内心情绪描写得淋漓尽致,将《白紵舞》的艺术性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种暧昧朦胧的气氛,极大增强了《白紵舞》的感染力,为眼神在舞蹈传情达意时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3 魏晋舞蹈美学思想的历史延续性

魏晋时期的士人阶层在思想和艺术中主动参与塑造了当时的舞蹈美学风格,这是一种通过历史过程逐步形成的审美建构。魏晋时期文学艺术家们的艺术境界造诣高超,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尊重个性、崇尚自然,更因为他们对于自然、友情、爱情都是注重其中的“情”意。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提出:“晋人艺术境界造诣的高,更主要的还是他们的‘一往情深’。”^{[2]222}特别强调了晋人的深情,特别是对朋

友的挚爱中赋予了人格美。这一时期在与白纻舞相关的舞辞中对于“情”也是有所体现的。早在先秦时期,“清商”就被用来区分音乐风格。清商曲因伴奏的弦乐和管乐,以及较高的声调,具有较为哀怨的风格。清商乐虽然被划归为俗乐,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占据了主导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生主题以悲伤为主,因此,悲乐成为这一时代的主要音乐氛围。在音乐创作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作品以悲伤情感为主要表达形式。这种音乐风格与当时流行的建安诗歌所体现的“慷慨悲凉”情感氛围相呼应,彼此相得益彰。这种悲伤情感在音乐和诗歌中得到了深刻而细致的表达,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文艺创作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一时期的琴曲也以清丽哀伤为主,嵇康在《琴赋》中记载了“清商”“清徵”,皆为哀伤的曲调。其中也有“时劫擿以慷慨”^[15]的语句,指出琴曲有哀怨伤感的特点。“悲风”“清音”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其次,魏晋时期爱情主题再一次在文学艺术中兴起,魏晋舞辞中蕴含着动人的男女情爱,大大提高了其抒情性的表达。舞辞中对思妇、怨妇的情态及其内心世界作了深入细腻的刻画,寄托了作者深切的同情,既是对当时社会现实问题严肃的反映,也是在坎坷人生中的深刻思考,较之其他朝代的舞蹈艺术,魏晋舞蹈在抒发真性情、真情感上是走在前列的。

魏晋文艺受主观情感倾向的影响,抒情山水诗出现在文学中,山水画在绘画中开始独立。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舞蹈回到了原本属于自己的情感王国。情感表达是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舞蹈赋予情感生活的视觉形式,是情感生活的艺术投影。魏晋南北朝主情艺术观念的兴起,是我国文化艺术发展史上的一大进步,它深深地影响了舞蹈美学的发展方向,从而带来了舞蹈的返璞归真。

4 结论

“士人风度”这一中国古典士人生活态度的界定包含着丰富的生态审美意蕴,魏晋士人虽然生在分裂割据、门阀混战的时代,却勇于和封建道德理论标准作斗争,勇于挣脱权威与皇家的桎梏,勇于怀疑和否定繁琐的汉代经学规范的制度与准则,展现出一种直面生命生离死别的率真秉性,面对消沉而黑暗的统治宁折不弯慷慨就死的人生境界,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来阐释魏晋风度,这样的美感赋予这个时代最为独特的头衔。

在魏晋时期,《世说新语》是记录魏晋风度的关键文本,率真质朴、飘逸俊朗的情感,在文字语言中清晰可表,这些特点在舞蹈中主要表现为深情的一面。虽然这种洒脱的艺术人格在舞蹈的表现中总是难免掺杂着宫廷文化的萎靡之感,但是它的确对魏晋风度有所体现,魏晋风度对于舞蹈审美的塑造起到重要的作用,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精神,在《鸛鹄舞》《白纻舞》《拂舞》等舞蹈中均有体现。我们可以从舞蹈中去窥探士人风度的神韵,了解士人风度对当时社会文学艺术的塑造作用,确立了中国古代哲学美学不可取代的地位,为历代学者所仰慕。同时,在审美精神和艺术表达的传统浪潮中,魏晋舞蹈树立了高山,影响着每个时期的文学艺术家们,成为遥远的绝响。如何将舞蹈重新演绎出土人风度的气质与内涵,是我们今天仍然需要坚持研究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 [1] 鲁迅. 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84.
- [2] 宗白华. 美学散步[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 [3] 《中国舞蹈史》编写组. 中国舞蹈史[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82.
- [4] 李泽厚. 美的历程[M].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97-98.
- [5] 杨建峰. 庄子[M].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18:264-265.
- [6] 丁羲元. 谢赫《画品》的再认识[M]//中国画研究:第四期. 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181.
- [7] 沈约. 宋书·乐志校注:卷四[M]. 苏晋红,萧炼子,校注. 济南:齐鲁书社,1982:310.
- [8] 汝晶晶. 《宋蜀刻本唐人文集·孟东野文集》字词零札[J].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2(6):39-42.
- [9] 李月亮. 汉代歌诗舞蹈性研究[D]. 聊城:聊城大学,2023.
- [10] 庄周. 庄子[M]. 方勇,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5:31.
- [11] 文选:卷十八[M]. 萧统,选. 李善,注. 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378.
- [12] 房玄龄,褚遂良,许敬宗,等. 晋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4:2069.
- [13] 朱文俊. “应物象形”语义下的中国传统绘画[J]. 书画世界,2024(2):67-68.
- [14] 田彩仙. 六朝“白纻舞歌辞”的发展及审美价值[J]. 文艺研究,2006(8):98-103.
- [15] 郭谔墨. 斫琴家茅毅对琴人斫琴传统的继承研究[D]. 济南:山东工艺美术学院,2018.

巢湖民歌腔音列形态结构分析研究

伍和友

(巢湖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安徽 合肥 238000)

摘要:基于王耀华“旋律结构-腔音列”理论,从调式结构、腔音列类型等多个维度对巢湖民歌展开分析。研究表明:巢湖民歌多徵羽调式,其腔音列结构呈现双重特性,根据曲目音列种类可划分为单一性腔音列与复合性腔音列两种类型。通过调式结构与腔音列类型的多维解析,阐释了巢湖民歌旋律音调的核心构成规律。

关键词:巢湖民歌;音列形态;腔音列;徵;羽

中图分类号:J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3-0043-08

The Form and Structure of the Rhythm Sequence in Chaohu Folk Songs

WU He-you

(School of Teacher Education, Chaohu University, Hefei, 238000, Anhui)

Abstract: Basing on Wang Yaohua's theory of "melodic structure/tone series", it provided an in-depth analysis of Chaohu folk songs from multiple dimensions in this paper, including modal structure and types of tone series. It found that the Chaohu folk songs have predominantly features of the Zhi(徵) and Yu(羽) modal structures, their tone series structure exhibits 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wo types: single-type tone series and composite-type tone series by the variety of tone series in the melodies. Through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modal structure and tone series types, the core principles was analyzed about governing the melodic intonation of Chaohu folk songs.

Key words: Chaohu folk songs; tone sequence form; tone sequence; Zhi(徵); Yu(羽)

2006年5月,安徽地方传统音乐——巢湖民歌经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进入第一批保护名录。作为“农耕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巢湖田秧山歌久负盛名,另有号子、地方小调、舞歌、风俗歌、童谣以及曲目数量不多的宗教音乐等。巢湖民歌曲调以最为常见的五声音阶为主,兼有七声。其音乐作品以旋律细腻华美、曲调柔婉妩媚而著称,总体表现为既有代表性的秧歌体裁,同时在与毗邻区域民歌艺术的碰撞过程中逐渐发展形成的一种多元化的音乐形式。

1 地域性差异对巢湖民歌风格形成的影响

在幅员辽阔的中国版图上,复杂多样的自然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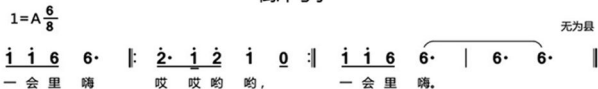
件催生出风格迥异的音乐形态——西北高原的苍茫戈壁与交通闭塞孕育出《走西口》《花儿》等高亢粗犷的声腔体系,歌者通过舒缓自由的延长音宣泄生存压力;而在黄河沿岸丰沛的水系滋养下,《黄河船夫曲》以极具律动的切分节奏展现流域子民坚韧乐观的生命意识,《黄河大合唱》更以恢弘的调性对比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音乐符号,二者共同印证着“水土既形,民风乃成”的文化地理学定律。

巢湖民歌大多由劳动人民自发创作,这些作品或为统一劳作创编(号子),或为抒发情感、记录生活场景(秧歌)。表演者通常为田间劳动者,巢湖民歌旋律简单易记,广为传唱。

环境深刻塑造着民歌的生态基因。同样是号

子,巢湖的《倒冲号子》(见谱例1)与四川的《拼命号子》(见谱例2)风格截然不同。巢湖号子曲式结构简朴,结构短小,一字一音,采用节奏摇曳、极富抒情效果的6/8拍,节奏型简单规整,句逗清晰;多为八分音符与带附点的四分音符的时值分配,先紧后松、前短后长的趋长规律形态,节奏更显摇曳、栩栩如生的船歌特点。由于主要在劳动时演唱,全曲音域仅四度,最高音为小字一组的si,音与音之间行进平和,多为同音进行、大二度级进或三度小跳。富有巢湖地域风格的“三声腔”曲调结构,全曲由la-do-re三音贯穿始终,整首作品洋溢着江南水乡的音乐特色。

倒冲号子



谱例 1



谱例 2

四川号子选择了音乐律动更强的2/4拍,长短点、切分点组合节奏形态以及休止符的穿插运用,打破常规平均划分的强弱动态规律,音乐的推动力更强,不稳定的动感给人跳跃、活泼的感觉。其整曲音域宽六度,最高音达到小字二组的mi,旋律采用以上折线为主的组合形态(六度的上行大跳后紧接四度下行大跳,形成一个明显的转折,称为折线形态)。通常来说,四度以上的大跳旋律形式在北方号子音乐作品里出现的几率较高;而南方号子多以三度小跳或级进为主。作品以mi-sol-do三音贯穿始终,简单的旋律结构印证号子鼓舞士气、统一劳作的实用性特点。

号子的节奏与劳动工种的劳动强度密切相关。巢湖地处丘陵,四周无险滩恶水,湖面辽阔而平缓,作为全国第六大淡水湖泊的巢湖,素有“八百里巢湖”之美誉。在这种水乡文化滋润中形成的号子节奏稳定且富有诗意,音乐风格充满江南特色;相比之下,黄河船夫的工作环境极为恶劣,他们面对的是一条变幻无常、波涛汹涌的黄河,稍有不慎,他们就可能面临生命危险。正是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黄河船夫们创作的音乐作品节奏更具艺术感染力。

审美体现的是一种历史进程^[1]。一个民族或

地区需要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历经包括自然环境、审美情趣、社会风俗、语言风格等各种因素的影响^[2],才能形成当地具有典型意义且为大多数人所熟知,或是说在本地区较突出的而为别的地方少见并口传心授的特征性腔音列,这包括当地常用的三音列和四五声音阶、旋律音调,也包括那些未成形的音乐动机^[2]。

巢湖人依山傍水、临泽而居,他们的性格普遍具有细腻婉转、温柔可人的特质。通过对比巢湖、四川两地的号子作品可以看出:巢湖号子在节奏上呈现一种规整与平稳,曲调舒缓而悠扬;四川号子则气势磅礴、雄浑有力。

2 腔音列结构在巢湖民歌中的运用

本文通过微观结构视角,对巢湖民歌中的号子、秧歌两大类进行腔音列结构分析,探究音列在音乐结构中的特殊功能^[1]。

2.1 号子腔音列结构形态分析

号子是中国传统民歌的重要类型,其音乐形态与劳动场景高度关联,具有鲜明的节奏性、功能性与集体性。《吕氏春秋》记载,原始人遇到需要集体协作的劳动,为了统一节奏,提高参与者的积极性,劳作者们常常发出用来协调与指挥劳动的吆喝或呼号声^[3],此时的号子初具雏形,但仅具有实用性;后期,这些带有节奏性的吆喝、呼号声逐渐被劳动人民美化,衍变为一种能够缓解情绪、释放心理压力的艺术形式,最终发展为我们今天所见的号子^[4]。

巢湖号子种类丰富,包括船夫号子、艄公号子、木排号子、舂米号子、划舟号子、打夯号子、搬运号子等。这些劳动时的吆喝、呼号声,旋律铿锵有力富有强烈的节奏性,其曲调通常与巢湖地区的方言、音调紧密结合,朗朗上口,具有浓郁的地方生活气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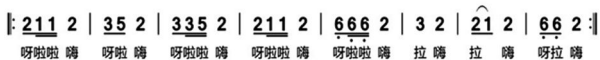
2018年出版的《巢湖民间歌曲集》收录号子作品28首,这些作品大多篇幅简短,结构朴素,体现了号子清晰明了的音乐特点(见谱例3-谱例5)。

王耀华在《中国传统音乐结构学》一书中指出,最小的音乐构成单位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单音构成的音组^[2],三音构成的音组最为常见,这样的音列结构统称为三音列。

现对《巢湖民间歌曲集》中的二十八首船夫号子音列结构进行分析(见表1)。

小摇橹号子

1=F $\frac{2}{4}$ 巢县



谱例 3

1=G $\frac{2}{4}$

开船号子

无为最

1=G $\frac{2}{4}$

扯绳

编鼓

3̣3̣2̣ 3̣ | 3̣·1̣ 2̣2̣ | 3̣·1̣ 2̣ | 3̣5̣ 3̣5̣ | 3̣2̣1̣ 2̣2̣ | 3̣·1̣ 2̣2̣ | 3̣·1̣ 2̣ | 3̣5̣ 3̣5̣ | 3̣2̣1̣ 2̣2̣ |

兄弟们好，呵呵嗨哟，呵呵嗨哟，我们把猫 拉起 来哟，呵呵嗨哟，呵呵嗨哟，顺风手篙 把船 开哟

2̣ 1̣ | 2̣ | 2̣ 1̣ | 6̣ 1̣ | 1̣ 2̣ | 6̣ 1̣ | 6̣ 1̣ |

呀 喂 哟 呀 喂 哎 哟 喂 哎 哎 呀 喂 哟

谱例 4

谱例 5

表 1 二十八首船夫号子音列结构

曲名	音列结构	音域
扯绳	低音 La-do-升 do-re	四度
打蓬号子	中音 do-re-mi-fa(弱拍)sol-la(经过音)	六度
撑篙号子	低音 re - mi-fa(弱拍)sol-la 中音 do-re	八度
小摇撻号子	低音 la-中音 do-re-mi-sol	七度
摇撻号子	低音 sol-la 中音 do-re-mi-sol	八度
摇撻号子	低音 la-中音 do-升 do-re-mi-sol	七度
转棹号子	低音 la-中音 do-re	四度
开船号子	低音 sol-la-si-中音 do-re-mi-sol	八度
蜜蜂钻天	中音 do-re-mi-sol-la-高音 do	八度
一捆柴	中音 do-re-mi-sol-la	六度
螺丝旋顶	低音 la-中音 do-re-mi	五度
倒冲号子	低音 la-中音 do-re	四度
三把上顶	中音 mi-sol-la-高音 do	六度
板头号子	中音 do-re-sol-la	六度
四句头	低音 sol-中音 do-re-mi-sol	八度
做排	低音 la-中音 do-re-sol	七度
渡缆子	低音 la 中音 do-re	四度
扳梁	低音 sol-la-中音 do-re-mi	六度
八句头	低音 mi-sol-la-中音 do-re-mi-sol	十度
摇撻	低音 la-中音 do-re-mi-sol	七度
绞车	低音 sol-la 中音 do-re-mi-sol	八度
拉锚号子	中音 do-re-mi-sol	五度
起运号子	低音 la-中音 do-re-mi-sol-la	八度
甬篙号子	低音 la-中音 do-re-mi-sol-la	八度
蜜蜂钻天	低音 sol-中音 do-re-mi-sol	八度
歪歪子	低音 la-si(弱拍)-中音 do-re-mi	五度
打蓬号子	低音 sol-中音 do-re-sol	八度
撑篙号子	低音 sol-la-中音 do-re-mi	六度

可见,号子的结构受劳动强度、协作需求与节奏律动的直接影响,形成“分层呼应”的框架布局。

2.1.1 引子式起腔

常以单音(如“嘿哟”)或短小音型(如纯四度上行跳进)起始,音域集中,音调简洁。起音、结束音

多为调式主音,乐段的独立性不强,音乐往往随劳动的终止而结束。号子在曲调材料上有反复使用的特点,多以三声音阶(或四声音阶)行腔(创腔)为歌,很多时候,三声音阶或四声音阶^[4]就是民歌旋律形成的核心结构。

2.1.2 主体段落的循环性与变奏性

受劳动条件与劳动内容的限制,巢湖号子曲式结构简单,大多为单乐段、领唱段(核心音调):由领唱者即兴发挥,音列相对自由,常含装饰性滑音与高亢长音。和腔段(固定回应):集体齐唱,音列紧缩,多重复固定音型(如三度内音程)。音域总体不宽,二十八首作品中,除一首作品音域达到十度,其余均在八度以内;旋律行进以同音反复、级进、小跳为主,部分作品旋律以大二度的级进反复构成,便于演唱朗朗上口。

2.1.3 尾声的收缩性

与欧洲音乐的功能性不同,中国民歌使用各种类型的腔音列,相邻的音均为小三度或大二度的音程关系,基本上不存在半音倾向性,绝大多数属于中二度。正是由于腔音列缺乏半音倾向性,它们在音乐中保持了基本平等的地位。对巢湖二十八首号子音级使用频率的统计显示,“fa、si”仅在个别作品弱拍上出现一两次,“mi-fa”、“si-do”的半音级进运用也不多见,多结束于主音(如徵调式 sol),音列回归稳定,音域收窄,节奏放缓,标志劳动间歇或结束。

按照调式结构音列排列顺序,出现频率最高的结构是低音 la-中音 do-re-mi-sol,其次为低音 sol-la-中音 do-re-mi,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巢湖地区音乐多徵主、羽主调式形态(见表2)。

表2 巢湖调式音列

常用调式	音列结构
主调式音列	低音 la-中音 do-re-mi-sol(羽调式)
副调式音列	低音 sol-la-中音 do-re-mi(徵调式)

2.2 田秧山歌腔音列结构形态分析

冯光钰先生在其论著《中国同宗民歌》中,总结出同宗民歌六种“同宗”类型,其中一种类型表现为词曲大同小异——以原有母体为基础,唱词内容、曲调大体不变,旋律与当地方言、语调、音调有机结合,经由民歌手的“二度创作”,衍生出与母体大同小异的变体^[4]。如《孟姜女哭长城》《茉莉花》《小白菜》,在全国众多省市广为流传,但其核心音列保持一致,不受文化差异影响。

由此想到,流行于巢湖区域(包括巢县、含山、无为、肥西等)的田秧山歌,是否也与那些同宗民歌类似?是否以某一首田秧山歌为母本,结合具有典型意义的地方性音调(音列)编创而成?

作为巢湖民歌中最具代表性的地域音乐——田秧山歌,是一种介于山歌和号子之间的特殊歌种,又

称“秧号子”。在全国范围来看,田秧山歌主要流行于江浙一带的水稻文化区域,以插秧、除草、薅秧等农事生产活动为主要表现内容。它包含描述劳动场景的“喊秧歌”、赞美自然风光的“肥东秧歌”以及讲述爱情的“全椒秧歌”等。

在巢湖田秧山歌中,有一首传唱度极广的作品《绿浪滚滚迎面来》,它是以巢湖南岸田秧山歌的原始素材为基础改编而成。歌中“口唱秧歌喜插秧”等唱词,生动展现了劳动人民愉快劳作、期待丰收的景象。全曲采用 5/4、4/4、2/4 三种节拍交替,这样节拍交替使用是秧歌的显著特点。与《一支秧歌一趟秧》高亢明亮曲调不同,“绿浪”曲调更为委婉细腻,通过小幅的跳跃,赋予了旋律鲜明的节奏感,生动模拟了栽秧时的劳作场景。

《巢湖民间歌曲集》秧歌曲目《喊秧歌(一)》(见谱例6)以简单质朴的节奏,轻松明快的音与音的级进,乐曲开头 do-la-sol 三音的下行小跳,搭配弱起节奏和三拍的延长音,趋长规律形态(乐句或乐汇从短音点组合开始,趋向于某个长音点,先紧后松,使音乐进行更有动力)的节奏特征,完美地展现了“喊秧歌”的音乐特色,仿佛随着插秧人的一声吼,天际随之破晓。乐曲开头音列顺序使用如下:do-la-sol-mi-sol-do-la-do-re-sol-mi。

1=C $\frac{4}{4}$ 喊秧歌(一) 巢县

太 阳 出 来 哟 哟

谱例 6

作品《喊秧歌(二)》(见谱例7)开头旋律使用了 do-re-la-sol-sol-la-do-re-sol-mi 十个音,与第一首作品相比,节奏从 4/4 的复拍子转换为 2/4、4/4 的变换拍子,通过前后倚音润腔的运用,改变旋法形态。依据“腔音列”构建理论,绝大多数民歌作品都是在腔音列核心基础上,通过反复、倒影、逆行等创作手法丰富和扩充整体音乐结构^[2]。观察音符的排列,可以看出基本音调相同,核心结构为 do-la-sol-do-re-sol-mi。

1=C $\frac{2}{4} \frac{4}{4}$ 喊秧歌(二) 巢县

太 阳 出 来 哟 哟

谱例 7

目录中的第三首秧歌《太阳出来一点红》(见谱例8)在巢湖地区的烔炀河一带发现,乐曲旋律在润腔加花的基础上,通过延长音和节奏变化扩充乐句形态,改变结构(第二局结尾跨小节的 mi)创作新变

体,使音乐层次更加丰富。do-la-sol-do-re-sol-mi 这种具有典型意义的巢湖秧歌音列结构清晰可见。

1= E $\frac{4}{4}$

太阳出来一点红

太 阳 出 来 也 哟 哟

谱例 8

对《巢湖民间歌曲集》前三首秧歌作品(该曲集中收录的所有巢县秧歌)进行调式音列分析,按照音高顺序列出作品中所使用的音(见表 3)。

表 3 13 首秧歌调式音列

曲名	使用音数量
《太阳出来一点红(一)》	sol-la-高音 do-re-mi
《太阳出来一点红(二)》	sol-la-高音 do-re-mi-sol-la
《春雷一声遍地响》	sol-la-高音 do-re-mi-sol
《春风又到巢湖边》	sol-la-高音 do-re-mi-sol
《风里传来桂花香》	sol-la-高音 do-re-mi-sol
《绿浪滚滚迎面来》	sol-la-高音 do-re-mi-sol
《司集一派好风光》	sol-la-高音 do-re-mi-sol
《这头栽秧那头青》	sol-la-高音 do-re-mi-sol-la
《山歌好唱口难开》	sol-la-高音 do-re-mi-sol
《蓼子开花打白苞》	sol-la-高音 do-re-mi-sol
《喊个秧歌来玩玩》	sol-la-高音 do-re-mi-sol
《月亮出来照粉墙》	sol-la-高音 do-re-mi-sol
《柳集秧歌》	sol-la-高音 do-re-mi-sol-la

从窄音域、五声性音列与音程动力性三个维度对巢湖田秧山歌展开分析如下。

2.2.1 窄音域框架下的五声性表达

巢湖田秧山歌的音列结构呈现出鲜明的“简而不陋”特征。受劳动呼吸的生理限制(如插秧、车水需短促换气)与方言声调的语音约束(巢湖方言声调平均音高差较小),其音列多在四至五度内展开,通过五声性音阶的巧妙组合实现情感传递。

巢湖秧歌大部分为单乐段结构,或者是单乐段的扩充结构。起、承、转、合的四乐句是最基本的结构形式。通常第一句曲调舒展,表现手法自由,由歌者根据情感表达的要求可进行自由延长,是本地的基本曲调。其他曲调大多是这一曲调的衍生、发展。三音列因其结构简练、易记易唱,成为田秧山歌的基础音列模式。这种“简而不陋”的三音列核心骨架,通过徵-羽-宫(sol-la-do)型实现劳动号令的节奏驱动,采用角-徵-羽(mi-sol-la)型构建抒情对唱的婉转

线条。在叙事性段落中,商-角-徵-羽(re-mi-sol-la)与羽-宫-商-角(la-do-re-mi)四音列拓展了表现维度,但仍保持着不超过八度的音域框架。

三音列的狭窄音域(多不超过五度)使歌者无需大幅调整声带张力,以确保长时间劳作中嗓音的稳定性,同时通过音程跳进(如四度)维持音乐动力。少数高腔段落突破常规音域,通过“甩腔”技巧实现情感升华。如《栽秧号子》领唱句“太阳(哟)出山(呐)——”中,核心音列 sol $\rightarrow$ la $\rightarrow$ do $\rightarrow$ la(G-A-C-A)通过八度大跳(sol $\rightarrow$ sol)瞬间拓展音域,高音区的持续颤音模拟烈日炙烤的视觉意象,展现歌者的即兴创作能力。

2.2.2 徵羽调式的功能分化

田秧山歌的调式选择绝非偶然,而是劳动场景、集体心理与地域审美的共同产物。

十三首秧歌作品中,以 do 音开头的作品有四首(以大跳的方式解决至 sol 音);以 re 音开头的作品有三首(其中两首最终解决至 sol 音);以 sol 音起始的作品有四首;以 la 音开头的作品两首(其中一首随后级进至 sol 音)。在十三首作品中,有十一首尾音落在徵音,其余两首分别落在羽、宫二音,呈现出宫倾徵、角倾羽调式色彩,少量作品有商倾徵现象。

徵调式以其主音 sol 的稳定性与属音 re 的动力性,成为高强度劳动场景的首选,是集体劳作的力度象征。如《太阳出来一点红(二)》中,持续强调 sol-re 五度框架(G-D),领唱句以 sol $\rightarrow$ re $\rightarrow$ sol 的跳进循环模拟夯具起落,属音 re(D)作为不稳定音推动乐句向主音解决。徵调式终止式 re $\rightarrow$ sol(D $\rightarrow$ G)的强解决倾向,促使参与者节奏同步。

羽调式(主音 la)作为个体抒情的婉转载体,多用于劳作间歇的抒情段落,其阴柔特质与巢湖水域文化形成深层呼应。以《这头栽秧那头青》为例,核心音列 la-高音 do-re-mi(A-C-D-E)构成“窄音域羽调四音列”,通过 do $\rightarrow$ re 大二度与 re $\rightarrow$ mi 大二度的连续级进,营造涟漪般的旋律线条,隐喻水田波纹的视觉意象。

2.2.3 音程跳进与级进的辩证统一

田秧山歌通过音程结构的动态平衡,在劳动实用性约束中开辟出丰富的表现空间。其音程运用呈现“领跳进、和级进”的鲜明分工,形成张力与松弛的戏剧性对比。

领唱者作为劳动指挥者,常使用大跳音程强化号召力。如《绿浪滚滚迎面来》起腔句“嘿-哟!”以 sol $\rightarrow$ do(G $\rightarrow$ C)四度上行瞬间提亮音色,有效穿透田间环境噪声。领唱旋律多围绕 sol-re(G-D)五度

框架展开,如《山歌好唱口难开》核心音型 sol→re→sol→mi→re,通过五度跳进(sol→re)确立调性中心,小三度下行(mi→re)增添悲怆色彩,映射劳作者对体力劳动的复杂情感。

集体和腔部分以级进音程维持节奏统一。如《春雷一声遍地响》和腔句 mi→re→do(E-D-C),连续大二度下行形成“叹息式”音调,既缓解领唱句的张力,又通过主音 do(C)的稳定收束为下一劳动周期积蓄能量。《喊个秧歌来玩玩》和腔固定音型 la

→sol→mi(A-G-E),小三度+大三度的迂回重复进行,在有限音域内制造律动感,体现节奏维稳功能。

统计显示,巢湖田秧山歌中徵调式(主音 sol)占比超60%,羽调式(主音 la)约占30%,二者构成调式体系的主体。巢湖流域“水陆相间”的地理特征,使羽调式与“水”的柔性产生符号关联。调查显示,歌者普遍认为羽调式“像湖风般轻柔”,徵调式则“如夯碛般刚劲”(见表4)。

表 4 徵羽调式音列

巢湖秧歌常用调式	音与音度数关系
徵色调式音列(re-mi-sol-la-do)	大二度-小三度-大二度-小三度
羽色调式音列(mi-sol-la-do-re)	小三度-大二度-小三度-大二度

地方传统音乐通常以某个腔音列为核心完成音乐结构的基本布局,在音乐展开过程中也会偶尔引入一些新的音乐元素,但大多作为点饰或附加结构存在。正是“基础核心结构”的这种凝聚力,形成了民歌音乐的典型特征,并彰显出民歌的地方色彩与风格。“基础核心结构”普遍存在于民歌中的这一现象,是一个具有共性的音乐特点^[6]。

3 巢湖民歌典型性音列类型

中国拥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音乐“核心结构”或“核心音调”。在同一民族内部,依据音乐结构的多样性,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多个音乐色彩区,这些区域之间的音乐形态差异,主要源于其“核心结构”的不同。例如,陕北地区的音乐以双四度框架(sol-do-re-sol)为特点;甘肃地区则有超宽腔音列(do-re-sol)、窄腔音列(re-mi-sol)以及级进音列(do-re-mi)。此外,还有壮族的“双声”歌^[2]、苗族的“高山音”等特色音乐形式,尽管称谓各异,但它们拥有一个稳定的基础核心——腔音列。江南地区的民间音乐多细腻柔美,除调式多采用徵羽调式外,窄腔音列(re-mi-sol)和级进音列(do-re-mi)的大篇幅使用也是其重要特色。

巢湖民歌结构根据其使用的音列种类(见表5)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单一性腔音列与复合性腔音列两种类型。

表 5 腔音列种类

类别	三音列
增腔音列	do-mi-升 sol,降 la-高音 do-mi
大腔音列	Do-mi-sol,sol-si-高音 re,

	fa-la-高音 do
宽腔音列	Mi-la-高音 re,la-高音 re-sol,
	La-高音 re-mi,mi-la-si
	Re-sol-高音 do
	Sol-高音 do-re,do-re-sol
近腔音列	Do-re-mi,sol-la-si,fa-sol-la
窄腔音列	低音 La-中音 do-re,re-fa-sol
	Mi-sol-la,si-高音 re-mi
	低音 Sol-la-中音 do,do-re-fa
	Re-mi-sol,la-si-高音 re
小腔音列	La-高音 do-mi,do-ni-la,
	mi-la-高音 do
减腔音列	升 Do-mi-sol,la-高音 do-降 mi

3.1 单一性腔音列在巢湖号子中的使用

任何音乐的创作都带有一定程度的初始基因,像西方音乐中常说的“音乐动机”,中国传统音乐提及的“典型音调”以及本文讨论的巢湖民歌“腔音列”,都与王耀华音乐结构学理论不谋而合:传统的地方民歌创编表面上看似无章可循,但其内在的音乐结构材料规整统一,存在着严密的逻辑联系。而这逻辑关系背后最核心的就是腔音列的运用,理论上一个腔音列可以衍生变化发展出无数个音乐作品。

号子的劳动强度决定了音乐的表现方式。普列汉诺夫在其著作《论艺术》中写到:“原始社会,各式各样的劳动有着相对应的歌,其曲调也常常极精准地适应着该劳动所产生的特有的生产律动。”从某

种程度上来说,民歌是真实生活场景的艺术再现,承载着一定的现实意义。

巢湖地区的号子节奏简单,旋律朴素,主要采用二拍、三拍和四拍三种节拍形式,其中以二拍、四拍子居多。演唱形式多为一领众和,齐唱旋律简短,有的重复领唱旋律,有的仅唱衬词。领唱者的曲调高低转折与合唱者交相呼应,重叠形成两个、三四个声部,气势庞大壮观。巢湖民歌《码头工人抬货号子》(见谱例 9)是一首典型的 2/4 拍作品,采用一领众和的演唱形式。全曲仅使用八分音符、四分音符两种时值,全曲无实际意义的唱词,领唱部分的音区跨度达到七度(以提振士气),而齐唱音区仅三度(do-re-mi 三个音),采用单一性的近腔音列。

1=A $\frac{2}{4}$

码头工人抬货号子

无为最

2 6 | 2· 0 | 2 6 6 | 2 3 3 | 2 5 5 | 1 2 |

嗨 嗨 | 嗨! | 嗨 嗨 嗨, | 哈 嗨 嗨, | 哎 嗨 嗨, | 嗨 嗨,

1 2 | 1 2 | 5 2 | 1 2 | 1 2 | 1 2 | 2 0 |

嗨 嗨, | 哈 嗨, | 嗨 嗨, | 嗨 嗨, | 嗨 嗨, | 嗨 嗨 | 嗨!

谱例 9

指挥者往往也是号子的领唱者,负责领唱号子的陈述部分,旋律通常上扬进行,或高亢嘹亮,有呼唤号召、提示集体劳动准备动作的功用。而和唱部分则是简单的重复词或衬词,音型固定单一,变化较少或无变化,节奏性强,常是同一节奏型的反复吟唱。

通过对 103 首号子曲谱分析发现,号子作品绝大多数为徵调式,采用中国的民族五声调式结构,偶尔穿插偏音 fa 和 si 的使用;以商音或宫音开头,结尾多数落在徵音上;旋律线条通常较为简洁,以突出劳动号子的节奏感和号召力;领唱部分的旋律线条向上扬起,形成一种向上的动力感,而齐唱部分则以重复的音型和节奏,形成一种稳定而有力的背景支撑。其音乐结构以大腔音列(do-mi-sol)、窄腔音列(低音 la-中音 do-re、mi-sol-la、re-mi-sol、低音 sol-la-中音 do)加以少量近腔音列(do-re-mi)构成,其中和唱部分以二三度(窄腔、大小腔)较为常见。这是因为:集体性的劳动对参与者的体力以及动作协调性要求极高,稍有不慎便可能危及生命,例如最为繁重的搬运与抬石头号子,根本目的是为了统一劳动步伐、提升士气、齐心协力完成搬运任务。因此在演唱中难以兼顾其音乐性。

在窄腔音列的使用中,常在上方添加倚音进行修饰,尤其在徵音、宫音延长或停顿时,用角音、羽音作下方三度小跳润饰;音乐框架多以“顶针”“连环扣”等衔接手法进行扩充发展;若出现大跳音程,必

定在大跳之后作反向级进^[7]。

这种单一性腔音列的使用,不仅体现了劳动号子的实用功能,也展现了其独特的音乐魅力。

3.2 复合型腔音列在巢湖秧歌中的运用

与号子相比,山歌的实用性功能处于次要地位。巢湖田秧山歌秉承了江南音乐的婉转细腻,音乐音域较窄,旋律大多在四五度范围内环绕进行,密集与宽松节奏型交替使用,形成了一种松紧交替的音乐律动。从短至几十秒(如上下两句体的巢湖渔船号子)到长达三四分钟的巢湖秧歌,运用一至三种类型腔音列的结构形式最为常见。

依照王耀华老师音乐结构理论,中国音乐体系腔音列类型共有 9 种,巢湖民歌主要使用其中的一至三种。以巢湖秧歌中的代表作品《一支秧歌一趟秧》(见表 6)进行谱例分析,该作品源自巢湖北乡司集流传的田秧山歌曲调,除去前奏、间奏,实际演唱部分为 38 小节,使用的 4/4、2/4 变换拍子,其中前 14 小节除了一小节为 2/4 拍,其余均为 4/4 拍。

表 6 《一支秧歌一趟秧》腔音列

三音列	类型
re-sol-mi	窄腔音列
re-do 低音 la	窄腔音列
sol-mi-la	宽腔音列
do-re-mi	近腔音列
sol-mi-re	窄腔音列
do-低音 la-re	宽腔音列
sol-mi-re	窄腔音列
do-低音 la-sol	窄腔音列
低音 la-中音 do-re	窄腔音列
mi-re-do	近腔音列
低音 la-中音 do-re	窄腔音列
低音 sol-la-中音 do	窄腔音列
re-do-低音 la	窄腔音列

巢湖田秧山歌的叙事逻辑深度嵌套于农耕生活的时空节奏律中,形成独特的音列戏剧结构。以旋律发展三个音为一组进行分析,前十四小节中,以近腔音列(Do-Re-Mi)构建调性基础,开篇用(Re-Mi-Sol)级进模拟晨曦中劳作的渐进状态,其平稳音程暗合农具入土的规律节奏。通过窄腔音列(sol-mi-re)与宽腔音列(do-低音 la-re)的纵向叠加,实现“劳动-歌唱”的对话性叙事。全曲除了第四组跟第十组采用了近腔音列(do-re-mi),其余均使用了三个音距

离不超过四度的窄腔音列,窄腔与近腔高频率的交叉使用,是巢湖民歌音列结构的一个显著特点。

除了窄腔音列和近腔音列的频繁交替使用外,歌曲后半部分还出现了大腔音列(do-mi-sol)的运用,大腔音列则以四度跳进(Do-Sol)托起领唱旋律,这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旋律的张力和表现力。

复合型腔音列的运用还与歌词内容紧密相关,

通过不同类型的腔音列形态来表达不同的情感和意境(见表7)。如可以通过在某些段落运用窄腔音列的重复和变化,传达出一种劳动的节奏感和紧张感;而在另一些段落适时引入宽腔音列,可以营造出一种悠扬和抒情的氛围。这种腔音列的灵活运用,大大丰富了音乐的表现力。

表7 各音列音乐色彩、文化寓意

音列类型	典型音列	音乐功能	文化隐喻
增腔音列	Do-Mi-升 Sol	制造紧张感,暗示调性游离	农事艰辛的戏剧化呈现
大腔音列	Do-Mi-Sol	构建明亮基调,强化庆典氛围	丰收喜悦的情绪外化
宽腔音列	Re-sol-高音 do	拓展音域空间,增强舞蹈动势	模拟插秧动作的幅度与节奏
小腔音列	La-高音 Do-Mi	注入婉转色彩,平衡大跳音程	女性劳作的柔美特质
减腔音列	升 Do-Mi-Sol	制造不协和音响,预示情节转折	天灾人祸的符号化暗示

巢湖田秧山歌的复合型腔音列体系不仅是农耕时代音乐美学结晶,也是地域文化的活态基因库,为当代非遗提供了“守正出新”的范式参考。复合型腔音列的运用,使音乐在保持传统特色的同时,又能表达更高层次的艺术情感需求。它不仅体现了音乐的多样性,同时反映了地域文化的高度融合。

4 结论

巢湖民歌作为江淮农耕文化的音乐活化石,其音列特征深植于方言声调系统与劳动呼吸节奏之中。这种结构形态不仅是对集体劳作节奏的精准呼应,也是对地域性审美表达的凝练。其音列体系以“窄音域、五声性”为核心,通过音列构成、调式分布与音程动力性的有机组合,构建起兼具实用功能与艺术价值的音乐语法。

本质上,巢湖民歌是农耕文明在声学维度的智慧结晶。其窄音域结构降低了传唱门槛,五声性音列维系了文化认同,而音程动力性又可以平衡劳作需求与情感表达。这既是对自然规律的遵循(呼吸

限制),也是对生命力量的礼赞(艺术超越),在实用性框架中绽放出惊人的审美可能性。保护传承此类音乐范式,不仅关系到音乐形态的存续,更是对农耕文明集体记忆的激活与重构。

参考文献:

[1] 杨匡民. 民歌旋律地方色彩的形成及色彩区的划分[J]. 中国音乐学,1987(1):105-117.

[2] 王耀华. 论“腔音列”(上)[J]. 音乐研究,2009(1):5-14.

[3] 张雪丽. 音乐寄寓里的长江意象:无为船工号子与放排号子的生命记忆[J]. 黄河之声,2020(24):4-6.

[4] 冯光钰. 中国同宗民歌散论[J]. 人民音乐,1997(7):19-22.

[5] 蒲亨强. 论民歌的基础结构——核腔[J]. 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87(2):42-46.

[6] 谷燕林. 苗族民间音乐元素在长笛组曲之《游方歌》中的实践与运用[D]. 昆明:云南艺术学院,2020.

[7] 荣蓉. 新时代背景下安徽民歌传承路径[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2(5):151-156.

中唐士人元结造园思想刍议

张延林

(梧州学院 宝石与艺术设计学院, 广西 梧州 543002)

摘要:以元结营建的园林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研究、现场踏勘、文本细读和归纳分析,对元结的造园活动、造园思想及其当代启示进行梳理。研究发现元结一生主要营建了七处园林,其造园思想包含适自保闲的造园纲领、逐奇寻胜的相地勘察、因地制宜的整治裁成、耕钓自足的园居追求、漫浪隐逸的园林精神和救时劝俗的园林志趣,在审美性景观发掘、多元化景观物象和教育性景观建构三个方面给予当代景观设计以重要启示。通过对元结造园思想的系统分析,深化了对其中唐造园文化的认识与理解,同时也为当代提供历史经验和借鉴。

关键词:士人;古典园林;元结;造园思想

中图分类号: TU98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297X(2025)03-0051-07

Yuan Jie's Garden Building Thought in the Middle Tang Dynasty

ZHANG Yan-lin

(School of Jewelry and Art Design, Wuzhou University, Wuzhou, 543002, Guangxi)

Abstract: Taking the gardens built by Yuan Ji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t summarized and refined Yuan Jie's gardening activities, gardening thoughts and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field survey, text reading and inductive analysis in this paper. It showed that Yuan Jie mainly built seven gardens in his whole life, and his gardening ideas include the gardening program of self-preservation, the survey of the landscape in search of novelty, the regulation and cutting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the pursuit of self-sufficiency in farming and fishing, the garden spirit of seclusion and the garden ambition of saving time and persuading common people. Some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were gave to contemporary landscape design in three aspects: Aesthetic landscape exploration, diversified landscape image and educational landscape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Yuanjie's gardening thought, it deepens the understanding of his gardening culture, and provides historical experience and reference for solving the problems faced by contemporary gardening.

Key words: scholar; classical gardens; Yuanjie; gardening ideas

士人园林指以文人士大夫为创造主体,追求诗情画意、赏心悦目、寄托理想、标榜信念、陶冶性情、表现隐逸的审美旨趣,以游憩和居住为主要功能的园林空间。士人园林作为私家园林中的一个重要类型,是自然美和艺术美深度融合的典范,其将山、水、植物等自然元素与建筑、书法、绘画、诗文等传统艺

术进行融揉,创造出浸润文人趣味的“本于自然,高于自然”的空间环境。士人园林自魏晋南北朝发轫,唐宋时期蓬勃发展,明清时期臻于成熟,直到封建社会瓦解而消失。

学术界对于士人园林的专门研究始于20世纪九十年代,国外学者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士人园

收稿日期: 2024-08-21

基金项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23FWY028); 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科研基础能力提升项目(2023KY0697)。

作者简介: 张延林(1994-),男,河南平顶山人,讲师,硕士。E-mail: 990142363@qq.com

林文化、园林文学、园林视觉文本等方面,国内关于士人园林的研究主要围绕园林审美、艺术精神、人文内涵、典型案例等展开。学术界对于中唐士人园林的相关研究只涉及中唐园林风格转型的概括性总论,尤其特别关注白居易、柳宗元的造园实践,仅有寥寥数篇文章涉及到李德裕、裴度、牛僧孺等人的私家园林。对元结造园的相关论述只是在研究唐代士人对永州地方人居环境开发的过程中被间或提及,且只围绕浯溪园林的营造而对元结的造园思想进行简要分析,研究不够深入和具体。因此,本文选取中唐早期士人代表元结所营造的全部园林为研究切入点,全面分析、系统探讨其独特的造园思想,以期对现有研究进行有益补充和完善,并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大唐文化提供部分园林景观设计视角的理论基础。本文探讨元结的造园思想,围绕的造园实例以私家园林为主,但考虑到其所营造的公共园林也受到了其造园思想的影响,所以也将带有

公共属性的园林纳入到研究范围内。元结造园的相关思想散见于其园林诗文中,其子和其友的相关诗文文献中也有部分体现。研究以上述园林文献为主要材料,同时结合历代史志和今人研究的成果对研究内容进行佐证。

1 营建活动

元结一生主持或参与了多项园林设计(见表1),自从他十七岁跟随辞官的父亲元延祖归隐商余山开始,造园活动一直没有停止。元结营建的园林主要分布在鲁山、武昌、九江、祁阳、道州、连州等地,有一部分属于自己的私人园林,例如商余山余中谷园林、祁阳浯溪园林、武昌樊山退谷茅舍等,另外一部分则归属于公共园林,例如右溪园林、连州海阳湖等,上述园林兴建于其人生不同的时期,呈现出各具特色的景观面貌。

表1 元结主要造园活动及相关园林文献

时间	所在地	营建园林	园林类型	园林位置	相关园林文献
天宝九年(750)	鲁山	余中谷园林	私家园林	县城东南三十五里商余山下(河南省平顶山市鲁山县马楼乡探花崖南淝河西岸碾盘庄村)	《述居》《水乐说》
乾元元年(758)	浔阳	襄溪宅园	私家园林	浔阳湓江畔(今江西省九江市瑞昌龙开河)	《襄溪铭(有序)》《送王及之容州序》《与襄溪邻里(有序)》《喻襄溪乡旧游》
宝应元年(762)	武昌	樊山家宅	私家园林	武昌樊山下退谷旁(今湖北省鄂州市西山退谷伍家垅)	《漫歌八曲(有序)》《杯樽铭(并序)》《杯湖铭(并序)》《樊上漫作》《退谷铭(并序)》《漫酬贾沔州(有序)》
广德二年(764)	道州	城东小石山宅园	私家园林	道州城东(今湖南省永州市道县东门乡北门村和东门村附近)	《惠阳亭作(有序)》《五如石铭(并序)》《宸樽铭(并序)》《七泉铭(并序)》《宸樽诗》《引东泉作》《石鱼湖上作(有序)》《游漓泉示泉上学者》《宴湖上亭作》《夜宴石鱼湖作》《石鱼湖上醉歌(有序)》
永泰元年(765)	道州	右溪	公共园林	道州城西(今湖南省永州市道县濂溪街道东阳社区附近)	《游右溪劝学者》《右溪记》
大历二年(767)	祁阳	浯溪园林	私家园林	祁阳县东、湘水之南(今湖南省永州祁阳市浯溪镇浯溪公园)	《欸乃曲五首(有序)》《浯溪铭(有序)》《岵台铭(有序)》《瘠颐铭》《东崖铭(并序)》《右堂铭》
大历三年(768)	连州	海阳湖	公共园林	桂阳县城东北二里、顺山附近(今广东省清远市连州北湖洞、番禺路、连州大道周围)	《海阳泉》《曲石舂》《望远亭》《石上阁》(两首)《海阳湖》(两首)《盘石》(两首)《湖下溪》(两首)《夕阳洞》《游海门峡》

1.1 商余山余中谷园林

颜真卿《唐故容州都督兼御史中丞管经略使元君表墓碑铭并序》：“父延祖，清静恬俭，历魏成主簿、延唐丞。思闲，辄自引去，以鲁县商余山多灵药，遂家焉。”^{[1]187}元结父亲元延祖在开元二十三年(735 年)选择商余山进行归隐，元结便跟随其父开始了山居生活。元结营造自己的园林则始于天宝九年(750 年)，在此之前元结参加科举以失败告终，便以“多病习静”为由回乡隐居，并准备修建私人的第一个家宅园林——余中谷园林(见图 1)。余中谷是商余山和少余山之间的一片山谷，谷中开辟了大片的农田，有泉水流经，水流向东南方与肥溪合流，出谷后又与灤水合汇流入澧水(今沙河)。由此来看，余中谷所在的位置自然山水条件是比较好的，这可能也是元结选择卜居在此的原因之一。元结对于此处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和改造，“乃相与占山泉，辟榛莽，依山腹，近泉源，始为亭庑，始作堂宇”^{[1]85}，修剪杂草、平整土地，在靠近山腹和泉源的位置修筑了亭、堂等建筑，来满足日常起居生活的需求。其整体布局较为简单，以家宅为中心呈现出山环水抱的基本模式，反映出亲近自然、融入山林的情感趋向。此后的三年，元结在此耕艺山田，察记水石、草木、虫豸，享受山水隐逸生活之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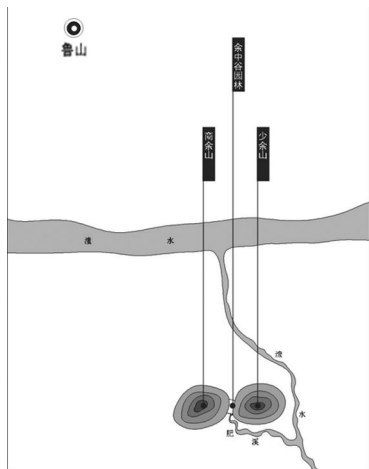


图 1 余中谷园林所在位置

1.2 九江灤溪宅园

天宝十四年(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安禄山占据洛阳后，为了躲避战乱，元结先逃难至武昌猗玗洞，后又召集邻里二百余家奔向襄阳，一路颠沛流离，最后于乾元元年(758 年)举家迁居于九江灤溪。灤溪又称湓江、湓水，曲折回环，溪源在瑞昌西南方向的青山下，东流经瑞昌县城南至九江市西，北汇长江。元结安家于灤溪之滨(见图 2)，隐居村落之中并自称漫叟，房屋北面有邻居赠送的闲园，有溪有

园，以此实现“耕钓自全”。此处宅园具有典型的乡村景观特征，依水修筑的房屋使船只可以停靠在家门口，周围种植了大量的竹子，房屋掩映在绿丛当中，袅袅炊烟生起，若隐若现，俨然一派静谧的田园村居风光。从现有园林文献记载看，元结对于灤溪宅园没有进行太大的营建和改造工程，可能是因为时局动荡和家庭丧乱带来的不安，使其没有心思去思考这方面的事情。另外也可能是受到其父的告诫影响，元延祖曾对元结言：“而曹逢世多故，不得自安山林，勉树名节，无近羞辱。”^[2]因此元结在灤溪宅园只待了一年便结束了隐居生活，在乾元二年(759 年)经洛阳至长安，入朝为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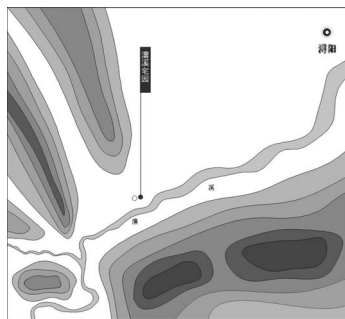


图 2 灤溪宅园所在位置

1.3 武昌樊山退谷家宅

宝应元年(762 年)五月或稍后，元结以侍亲为由辞官，以著作郎身份归隐于武昌，安家于樊口(今湖北省鄂州市西山西侧)。元结选择归隐于武昌樊口可能与其在安史之乱时逃难至武昌猗玗洞(今湖北省黄石市西塞山区狮子山上)的经历有关。他对武昌的环境是比较熟悉的，同时可能与时任武昌令的孟士源有一定关系^[3]。樊山又称郎亭山，在武昌县城西五六里外，西临樊水，北靠长江，是名副其实的山水形胜之地。樊山西侧有环樽石、自环亭以及环湖，环湖方广一二里，湖中菱、荷、菰、蒲等水生植物众多，自然生态良好。环湖西南是退谷，退谷中泉水激荡、寿木荫郁，寿藤缠绕在树木之上，更显幽深。因此，元结选择了将家宅安于退谷之中(见图 3)，修筑茅舍以供居住，引寒泉入庭中，种植大片山竹环绕家宅。从布局风格来看，此处宅园与商余山余中谷园林较为相似，同样是选址在两山之间的山谷地带，且有充足的水源满足日常所需。所不同的是此处园林所临近的江水更为宽阔，从而可以获得更好的观景体验。元结在退谷隐居期间，多在大回和小回进行垂钓，或者在城东郊以及江北的夕阳城进行耕作，但这种山林生活也是持续了一年多便结束了，因为他在广德元年(763 年)九月被授予道州刺史，不久

后便离开武昌赴道州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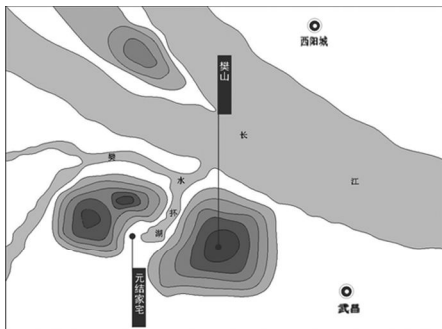


图3 樊山家宅所在位置

1.4 道州右溪与城东小石山草堂

元结在道州所营建的园林主要有两处,分别是右溪园林和城东小石山草堂(见图4)。元结到任道州后,招集因贼乱流亡的百姓,率劝贫弱,修复城池和房屋,畚种山林,百姓得以生息。待局势稳定下来后,元结开始在城郊开辟一些公共园林供人游玩和逸民教化之用,其中最为典型的的就是右溪。永泰元年(765年)春或者稍后,元结在道州城西发现了一条曲折的小溪,因其位置在州右,所以命名为“右溪”。溪水两岸布满怪石,并且沿岸种植有许多竹子。元结对此溪非常喜爱,于是对其进行了景观开发,在疏凿芜秽、清理脏乱之后修建亭宇,并搭配种植了松树、桂树以及香草等植物,从而获得良好的景观效果,使其成为当地有名的公共园林,百姓时常在此游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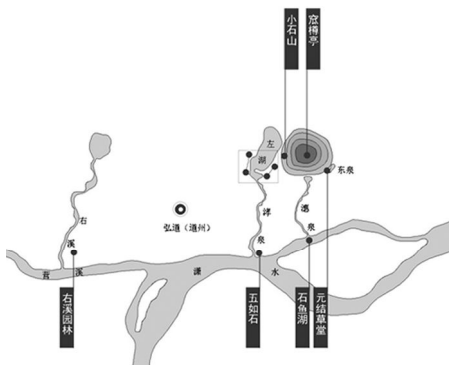


图4 右溪和小石山草堂所在位置

此外,元结也在城东左湖东侧小石山山巅修筑了窠樽亭,在山曲部分营建了草堂,并以此为中心向东和向南进行了一系列的造园活动。左湖在道州城东,左湖旁有五处泉水清流旋沿相凑,元结将它们分别命名为漫泉、湫泉、沔泉、洩泉、湫泉。湫泉向南并入潇水,在水流交汇处的边岸有一个不可名状的怪石,元结将其命名为五如石,石中孔穴众多,并且

有泉水涌出,故命名为七胜泉。除了上述的五处泉水之外,元结还发掘了发源于小石山的湫泉,并在其北侧修建了湫泉亭,湫泉向南流入石鱼湖,与东洲岛相接。还有就是泉源同样在小石山的东泉,元结将其引来垂流在庭院当中,使得宅园更具山林气息。这种将建筑与水体结合起来营造动态水景的做法具有鲜明的创新特质,在白居易营造庐山草堂时也被运用起来。

1.5 祁阳浯溪园林

大历二年(767年)二月,元结自衡州回道州的途中经过湘水之滨的祁阳浯溪,发现此处景色奇异,当其同年四月再次来到浯溪时,再次深切地感受到这里水胜、山怪、石异,于是便决定安家于此(见图5)。元结考察了溪水东北部的怪石之后,在其最高处修筑了岵台以登高远眺。在岵台和浯溪之间的溪口东侧异石之上修建了瘠廌,来观看远山清川,听水声松吹。从空间布置来看,左为溪,右为台,廌居中,通过对物质要素的精心安排,构成了一个居于山水之间的隐喻^[4]。在岵台下修筑中堂作为日常起居之场所,凿山修路,铺设了通往岵台山巅的磴道,并在岵台北面的窠尊石上建造了窠尊亭,中部的回鲜处设置右堂作为书房和客房之用。元结在建造这些景观的时候,还都专门写了铭文镌刻在崖石上,以示后来者。同时,在大约从今宋樟沿浯溪北岸至《溪园铭》的范围内^[5],元结营构了自己浯溪园林的南园部分,作为种蔬、蒔药之地,修建了石渠引溪流入南园以方便灌溉。园中的建筑大多较为简单朴素,与周边的兰花、松树、竹子等植物有机地结合起来并融入在自然当中。从整体布局来看,观景建筑多布置在临江的山崖之上,居住建筑则是修筑在山崖的南岸,与南园部分结合起来成为日常生活的中心。而此后的几年,元结在这里读书种药、饮酒垂钓、弹琴长啸,过着隐居山林的闲适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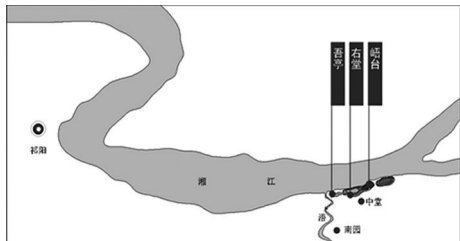


图5 浯溪园林所在位置

1.6 连州海阳湖

大历三年(768年),元结为水部员外郎摄连州刺史。来到连州后他,游历了连州的多处山水胜地,被这里的秀美风景深深吸引,期间在城北的北山下

发现了群泉——海阳泉,泉自水石中喷涌而出,形成了大片的低洼沼泽地。元结让人进行疏凿贯通、拦泉蓄水^[6],从而涨泉为湖,水中列岛,形成了占地达五百多亩的海阳湖(见图 6),方便灌溉周围的农田,同时又在湖上修建了湖光桥和湖光亭,供人游赏之用。海阳湖东侧的顺山(今巾峰山)山顶有平整的巨石^[7],元结在这块巨山之上修筑了山阁,供人凭栏远眺。山间有飞瀑流出,景色奇异,元结也在此处设置了亭轩以便连州百姓悠游林泉。以海阳湖为中心,元结继续向北、向西、向南开发了湖下溪、夕阳洞、海门峡等景点,进行了较为丰富的风景营造,使其成为一个具有多元景观意象的集群式公共园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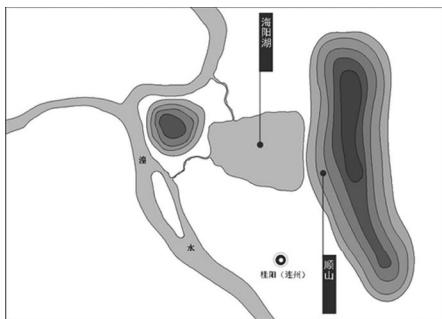


图 6 海阳湖所在位置

2 造园思想主旨

2.1 适自保闲的造园纲领

“适自保闲”是元结提出的造园纲领,他强调通过构筑园林体验身心惬意的愉快感觉,以此来实现幽静闲居的生活状态。“适自保闲”思想包含了两部分内容:一是通过造园体会生活真谛,达到“惬心自适”的心理状态;二是通过艺术造园的创作途径,抽身退出或逃避政治漩涡^[8],实现自由休闲的生活状态。元结认为要达到“惬心自适”的心理状态,一方面需要“上顺时命,乘道御和,下守虚澹,修己推分”^{[1]85},通过造园寻求自身内在的精神和体味生活的真谛,在“内顺元化”“外娱太和”^{[1]84}的过程中,使因时事和自身困境造成的心理障碍得到舒畅缓解;另一方面,士人可以借助园林内部的云山林泉,以“纵心目”“自畅达”^{[1]166-167},从而获取生命的愉悦与慰藉。与此同时,元结认为造园为中唐备受时局动乱影响的士人提供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或选择,它将士人从繁忙的公务中解脱出来,“不为物累”“与世忘情”。元结选择在浯溪安家是从自己的喜好和实际需求出发的,他想要将浯溪园林作为安放自身的退休养老之地,才对溪流进行了改造,修建了中堂、庖廛、右堂等建筑,并在南园种植了大量蔬菜瓜果来满足日常所需,进而在美好的园林景观中获

得心灵的放松和赏玩之趣。这种“适自保闲”的理念在中唐士人中比较流行,白居易就是按照这种理念修筑了自己的庐山草堂和履道里宅园,他更是把构园称作“营闲事”。

2.2 逐奇寻胜的相地勘察

相地选址是构建园林的首要考虑因素。在自然环境的选择上,元结认为应该把园林修筑在山水奇异的形胜之地。形胜具有五个方面的条件:一是地偏。元结认为构筑园林要选址在地偏境幽的城郊或山林地,“僻在幽远,尤宜往焉”^{[1]156}。其所营建的余中谷园林是在鲁山县城东南三十五里商余山下,樊山家宅在武昌樊山下退谷旁,城东小石山宅园和右溪分别在道州城东、城西,浯溪园林在祁阳县东,海阳湖园林在桂阳县城东北二里、顺山附近,“复在郊郭外,正堪静者居”^{[1]47}。二是山怪。浯溪园林(见图 7)毗邻湘水,有三座秀丽怪奇的山峰,分别为西峰、中峰和东峰,这些山峰大都是“临渊断崖,夹溪绝壁”^{[1]165-166}。元结在江上发现此地“山实殊怪”,“爱其胜异”,所以才把自己私园修建在此山林之中。三是石殊。这些石头一部分是山石,一部分是水石。山石有“怪异难状”的朝阳岩石、“浯溪东北升余丈”的怪石以及道州城东小山石上“状类不可名”的“巉巉小山石”等;水石有右溪当中“欹嵌盘曲,不可名状”的溪石、湫泉之阳“左右前后及登石颠均有如似”^{[1]163}的五如泉石以及海阳湖中“状类皆自殊”的湖石等。四是溪古。右溪和浯溪分别是道州城西和祁阳县东一条名不见经传的小溪,是潇水和湘江的支流部分,且都是“溪古地荒,芜没已久”,但也正是这份苍古隔绝了人事俗尘而深受士人喜爱。五是木异。右溪两侧“佳木异竹,垂阴相荫”^{[1]159},小石山宅园旁“异木几十株,林条冒檐楹。盘根满石上,皆作龙蛇形”^{[1]45}。这些奇异的树木植被对于构园具有十分重要的辅助作用。



图 7 浯溪园林怪殊的山峰和溪水

2.3 因地制宜的整治裁成

园林营造是在对原有自然环境进行整治的基础上增加部分人工建筑和设施来满足物质和精神需求的过程。元结认为园林已经选择在山水形胜之地,

不需要再进行过多的工程建设,而应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采取“因地制宜”的方法来修筑亭园。其对园林的整治裁成主要分为四个方面:一是因山构屋。余中谷家宅构筑在商余山和少余山之间,退谷茅舍修筑在樊山之下,道州城东草堂安置在小石山的山曲部位,祁阳浯溪园林作为起居空间的中堂建造在岨台之下,皆遵循着上述造园手法,以便获得清幽的山林野趣。二是因石构亭。“郎亭西郭有藁石,石临樊水,漫叟构石颠以为亭”^{[1]123}。无独有偶,元结在浯溪溪口也修筑了亭子“当乎石上”,同时又在岨台北面的窳尊石上建造了窳尊亭,在石巔构筑亭宇时充分利用山石的自然特性,既可以提供休憩、观景的场所,又能起到很好的点景作用。三是因泉涨池。元结建构浯溪园林的南园部分时,设立了一道水渠拦截了部分泉水,“因泉涨池”,从而实现方便灌溉庄田的目的。道州小石山草堂周遭亦是如此,引山泉水入园,“筑塘列圃畦,引流灌时蔬”^{[1]47}。连州海阳湖延续了这一手法,疏凿拦蓄海阳泉,扩泉为池,形成了风景秀丽的海阳湖。四是因木夹户。元结对于自然树木的处理,基本遵循着因木夹户的准则,屋宇通常修建在松、竹、寿木等树木环绕的地方,采用“异木夹户,疏竹傍簷”^{[1]167},以此来“掩映轩户”,并且会根据需要增添一部分植物来完善景观部分,“植松与桂,兼之香草,以裨形胜”^{[1]159}。

2.4 耕钓自足的园居追求

元结认为园居生活应该“师陶潜”“修耕钓以自资”“耕钓自全”,才能达到真正的适意状态。首先是耕艺山田。元结最早隐居的商余山余中谷园林,有大片的良田,“可耕艺者三数夫。有泉停浸,可畦稻者数十亩”^{[1]185}。元结退隐在武昌樊山退谷期间,经常在城东郊耕种农田,甚至跑到江北去开荒。元季川曾回忆起小时候和元结一起在余中谷的生活“养葛为我衣,种芋为我蔬”,从侧面验证了这一点。其次是渔钓水畔。“樊水欲东流,大江又北来。樊山当其南,此中为大回。回中鱼好游,回中多钓舟。”^{[1]32}“水石相冲激,此中为小回。”^{[1]33}樊水与长江交汇的水流激荡处形成了大回和小回两处鱼群聚集的地方,元结退居樊山退谷茅舍的闲暇之余经常在此垂钓。“思欲委符节,引竿自刺船。将家就鱼麦,归老江湖边。”^{[1]38}其在道州右溪以及城东小石山草堂游玩居住期间也是如此,以渔翁自比,享受闲舟垂钓的安逸生活。

2.5 漫浪隐逸的园林精神

中唐士人所营造的园林是他们在选择入世和出世之间最好的精神寄托,元结所营造的园林处处体

现出漫浪隐逸的园林精神。从结构上来看,漫浪是园林精神的内在含蕴,隐逸是园林精神的外在呈现。首先,漫浪是元结提出来的新的园居思想,具有很强的创新性。漫浪的含义包含荒浪和诞漫两部分,具有顺心自然、自由随性、不受约束、轻松放纵之意,其强调通过体味园林山水来感受生命哲学和生活乐趣,这种思想“打破了士人功成身退的人生模式,融合了诸子百家的优长,尝试着把具有一定对立性的儒、道思想进行融合,并且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功”^[9]。其次,隐逸是元结在丘壑园林中寄托身心的处世方式,园林内部景观类型丰富,水石辉映,“尤宜逸民,亦宜退士”^{[1]149}。元结这种漫浪隐逸精神与同样寓居在永州的柳宗元不同,虽然两个人都选取幽僻怪异的山水构建园林来熏陶情操,但元结是自得其乐的状态,为自己获得幽静深美的安身之所备感欣喜^[10],而柳宗元则更多希冀借助这些幽寂孤清的环境意象来排除愤懑和忘却痛苦。隐逸的主题一直贯穿于元结的生命历程中,从最开始的习静于商余山余中谷,到后来的隐退武昌樊山山谷,以及祁阳守孝期间隐居在浯溪等,其所营建的园林处处透露出隐逸安闲的精神文化气息。

2.6 救时劝俗的园林志趣

传统士大夫是儒家礼治的坚定维护者,元结当然也不例外,一方面将儒家理想、君子之道与园林当中的水、建筑等景观元素进行比德并融为一体。元结认为异泉“其当不可下,穷高流焉”^{[1]94},显君子之德。灋溪如似具有君子之道的让者,所以才在其周围进行园林营构。元结整治道州左湖周围的环境时,分别用湑泉、汭泉、洳泉等来命名发掘的泉水,以清澈的泉水来隐喻儒家纯正的义理内涵^[11],希望百姓欣赏和饮漱泉水的同时能够得到启发,劝引世人共同重建儒家仁义的道德秩序。元结以兴建茅阁纳凉遮阴来类比“贤人君子为苍生之麻荫”^{[1]139},亦是如此。另一方面,元结还采取将景点名称和记述景点的铭文镌刻在山石上的方式,使其能直观地被世人所看见,这些记载景点名称和园林景物的铭文无时无刻不在彰显着元结救时劝俗的园林志趣。不同时期他创作的《灋溪铭》《七泉铭》《浯溪铭》《岨台铭》《大唐中兴颂》等都在标举社会良好伦理道德,宣扬君子之德行,以儒家仁、义、礼、智、信与道家静和、谦让、清惠与淳朴等为主要内容进行道德劝诫^[12]。

3 元结造园思想的当代启示

3.1 审美性景观发掘开拓形胜基址

园林景观的选址关乎园林的整体格调,对于内部氛围的营造也至关重要。当今社会景观设计所面临的场地周边环境是非常复杂的,场地性质和状态也多呈现模糊性和多样性,许多设计师特别是新人设计师往往无从下手。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我们或许可以从中唐士人元结造园思想得到完美答案。元结认为自然万物本身是有自己的特质和美感的,需要怀有审美性的心理去揭示其“自然性”,才能够获取完整且合理的精神认知。这种审美发现可以帮助设计师更好地识别场地的固有属性,设计师可以通过感官体验作当下直接的参与去感知自然生命的原始状态,从深层次上体会和感受场地原有的场所精神,各个要素间的连接状态以及精神面貌等都可以与场地的信息交流中得到有效的反馈,这种反馈可以加强景观设计师对于场地的识别程度,对场地进行设计和改造的思路也会越来越清晰,而通过这种审美体认和景观发掘必然会开拓出具有形胜之美的园林基址。

元结的这种理念在深受其影响的潇湘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道县龙村、江永黄家村和蓝山雷家岭等湘南很多村落基本上都是依照这种审美性发掘去进行选址与设计布局的,非常讲究背靠山前临水,讲究山脉水势,从而形成一个山环水抱、云雾萦绕、林木交织、溪清鱼跃的人居胜景^[13]。

3.2 多元化景观物象加强身心体验

具有丰富内容的景观会加强人们的游赏体验,在美好的园林环境中陶冶身心,进而获得精神境界的升华。反观当下许多景观设计的案例,存在着诸多单一类型景观元素的叠加和部分特色景观空间缺失等现象,导致人们对于空间的意象认知并不清晰,难以从心理上产生愉悦感受。中唐士人元结在这方面就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其在处理山石要素的时候,不仅选择依山建宅,而且将怪石纳入到园林景观体系中,充当房屋的基座或者石桌,亦或是选择独置或列置的方式以供欣赏。对水的处理也是多样化,采用因泉涨池、涨泉为湖、石渠蓄水、引泉垂流等多种方式营造出动态和静态相结合的水体景观。亭、堂、茅舍和草堂等不同类型的建筑既可以满足日常生活,又可以作游赏宴宾之用。常绿植物、落叶植物以及水生植物相搭配的植物群落,更增添了景观空间的生机和活力。同时,这些景观要素有机结合起来,可以满足耕艺山田、临池垂钓、游息宴集等多元化的园林活动。这些活动“作为体验性行为习性涉及到感觉、直觉、认知、情感、评估、社会交往、社会认同及其他心理状态”^[14],形成一个持续不断的动态

体验序列,使人们生理和心理、物质和精神的多层次需求都得到了满足。基于人的需求出发,从根本上去满足人类对人居环境的心理需求,从而创造出多元化的体验空间,加强人们的身心体验,这很值得当代景观设计师借鉴和学习。

3.3 教育性景观建构增进文化认同

公共园林不仅是自然与人工要素集汇的景观空间,而且还是公众接受社会美育的重要场所。我们更要重视其“陶冶性情、净化风俗、和洽地方的教化意义”^[15]。但当今的园林景观设计大多忽视了这一点,园林空间的社会和文化功能有待进一步发挥。中唐士人元结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起了典范,其在进行园林营构的时候非常注重景观建构的教育性,比如以儒家仁孝之道命名的泉水,以及追颂尧舜所建立的祠亭,还有在朝阳岩、浯溪等石壁上镌刻的饱含儒家义理的铭文,无处不在彰显宣扬儒家礼治,倡导通过园林景观建构来时刻进行道德教化和社会美育,在当时确实起到了化育民心、稳固地方治理和增进官方认同的作用。对于当今的景观设计而言,可以借鉴其造园理念和手法,将景观创构与公众教育结合起来,以增进文化认同。元结曾在桂林象鼻岩刻下“水月洞”三个字,其他文人的石刻铭文更是多不胜数。象山景区在进行景观设计的时候就充分地挖掘了这些石刻的文化价值和教育价值,通过多方位地展示这些石刻作品,“传承中华文化,让游客在游玩中了解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增进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16],这些做法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

4 结论

造园在中唐时期已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士人主持和参与造园促使了中国古典园林的艺术风格发生了转变。在这场造园风格变革的进程中,元结以其独特的造园思想开启了艺术化造园的先声,为同时代和后世的文人造园树立了杰出典范。元结一生营建了商余山余中谷园林、九江瀼溪宅园、武昌樊山退谷茅舍、道州右溪与城东小石山草堂、祁阳浯溪园林、连州海阳湖等诸多私家园林和公共园林,其提出的“适自保闲”的造园纲领、逐奇寻胜的相地勘察、因地制宜的整治裁成、耕钓自足的园居追求、漫浪隐逸的园林精神、救时劝俗的园林志趣等构成了其造园思想的多个维度,展现出了一定的时代性和进步性。对于当今的景观设计而言,可以借鉴元结的造园智慧,通过审美性景观发掘开拓形胜基址、多元化景观物象 (下转第 81 页)

乡村生态振兴的价值分析与提升路径

——以河南焦作为例

李文瑛^{2*}, 王颖^{1,2}

(1. 安徽科技学院 管理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2. 蚌埠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通过探讨乡村生态振兴的经济价值、伦理价值及功能价值,发现目前乡村生态振兴面临农村生态环境的退化、政策制度不完善、经济发展水平滞后和农民素质有待提升等约束因素。因此,以焦作为例,聚焦于乡村生态振兴的内在动力与逻辑,通过对焦作乡村生态振兴实践的剖析,为资源枯竭型地区的绿色经济发展和生态修复提供借鉴,助力乡村生态振兴。

关键词:乡村生态振兴;价值分析;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3-0058-05

Value Analysis and Improvement Path of Rural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Taking Jiaozuo City of He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LI Wen-ying^{2*}, WANG Ying^{1,2}

(1. School of Management,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ngbu, 233030, Anhui;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ngbu University, Bengbu, 233030, Anhui)

Abstract: By exploring the economic value, ethical value and functional value of rural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it found in this paper that the countryside is currently facing such constraints as the degradation of r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imperfection of policy system, the lagging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quality of farmers to be improved. Therefore, it took Jiaozuo city of He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focusing on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and logic of rural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and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practice of rural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in Jiaozuo, it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of resource-depleted area, and aid rural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Key words: rural ecological revitalization; value analysi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指出“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乡村生态振兴是我国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构成,是新时代生态文明战略实现的有效路径^[1]。坚持乡村生态振兴

能够有效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和人居环境,保护乡村自然资源,发展乡村生态产业^[2]。当前亟需治理乡村生态问题,实施乡村生态振兴战略,深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生态经济的发展,是治理乡村的核心工作^[3]。

如何有效推进乡村生态振兴?这一问题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从不同维度对此进行了深入探讨。生态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与乡村产业结构优化

收稿日期:2024-10-28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安徽省科研计划编制项目(2024AH040339)。

作者简介:李文瑛(1972-),女,安徽砀山人,教授,博士;王颖(2001-),女,河南焦作人,硕士研究生。E-mail:357975117@qq.com

升级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全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是实现产业兴旺的关键环节^[4]。在促进产业振兴的同时,探索科技创新与绿色发展战略深度融合的新路径,构建具有竞争力的绿色农业产业体系意义深远^[5]。树立绿色发展理念激发乡村经济新增长活力,并反映出其作为乡村全面振兴核心驱动力的深层逻辑^[6],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根本性革新。在新时代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的背景下,人才与生态振兴在巩固脱贫成果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城乡居民生活品质的提升和肉制品消费需求的增长,农村畜禽养殖业与部分工业企业规模的持续扩张,引发了土地过度开发和新的生态问题,对农村生态环境构成了新的挑战。针对乡村在污染治理方面存在的短板,需积极推广科学合理的农耕与畜牧模式,完善乡村政策体系,推动生态科技创新^[7]。

乡村地区作为生态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其生态环境的保护与修复对生态平衡具有重大影响,社会态度改变及资源回收才是实现未来可持续的关键^[8]。同时,通过积极执行生态绩效,采取相应的生态措施能显著减少环境污染,促进物种多样性,对生态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为确保长期满足生态要求,在环境问题严重的地区,需采取可行性措施补充现有法规和激励政策的不足^[9]。

目前乡村生态振兴已取得阶段性成就,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以生态旅游、绿色农产品加工等为代表的生态产业从高速增长进入高质量增长阶段,农民在共享生态振兴成果的同时,也增强了获得感和幸福感,生态意识得到显著提升。但资源枯竭型地区 and 老工业地区在乡村生态振兴方面仍面临诸多困难,这些地区在长期工业化和资源开发过程中,造成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产业单一等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把资源枯竭型地区、老工业地区等特殊类型地区发展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推动资源枯竭型地区 and 老工业地区生态振兴,不仅是提升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生态振兴战略实现的重要手段。

焦作作为一个典型的农业为主导、资源枯竭型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美的生态环境。但由于历史原因和发展观念的局限,这些宝贵的生态资源往往被低估甚至忽视,未能充分发挥其在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鉴于此,本文以河南焦作为例,探讨乡村生态振兴的价值分析、约束因素

和实现路径。结合焦作生态振兴现状,审视生态资源的价值,探讨乡村生态振兴的价值提升路径,助力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绿色产业发展,实现生态振兴与乡村经济发展的有机融合。

1 乡村生态振兴的价值分析

1.1 乡村生态振兴的经济价值

实施乡村生态振兴战略,既有助于改善和保护生态环境,又具有显著的经济价值。各级政府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积极保护和恢复乡村生态环境,有力推动了乡村旅游业的发展;乡村旅游的繁荣不仅为农村经济带来了显著增长,而且促进了乡村基础设施的完善以及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实施乡村生态振兴战略能有效促进农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能进一步提升农产品的品质及其附加值,保障农民的收入实现稳步增长,这对推动乡村经济繁荣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焦作曾是河南主要的煤炭工业中心,经济发展依赖煤炭产业。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煤炭资源枯竭和环境问题加剧,焦作面临转型压力^[10]。煤炭开采会引发地面塌陷、水位下降和环境污染,影响居民生活和生态系统。焦作面临资源枯竭和环境的压力,需探索新的发展道路。而旅游业作为绿色、低碳、可持续产业,成为焦作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近年来,政府推动乡村古镇和云台山风景区开发,在 2023 年端午节假期期间,焦作迎来了 251.91 万人次的游客,旅游综合收入达到了 12.87 亿元。相较于 2019 年,这两个数字分别实现了 223.40% 和 230.38% 的显著增长。2023 年中秋和国庆假期,焦作文旅市场接待游客 755.27 万人次,旅游收入达 36.93 亿元,显示了其旅游市场的繁荣和吸引力。景区举办新春喜乐会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表演等活动,丰富了游客体验。据《焦作日报》报道,2024 年春节假期,焦作接待游客数量达 985.65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到 57.68 亿元,实现游客数量与旅游收入的双重丰收,生态旅游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1.2 乡村生态振兴的伦理价值

乡村生态振兴不仅关乎经济的繁荣和农业的现代化,更蕴含着深刻的伦理价值。它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观,推进乡村生态振兴,对于改善农村居民的生活环境与品质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焦作在转型发展的过程中,通过实施矿山复绿、水土保持、水源涵养等工程,整体环境状况得到了极

大改善。据焦作市人民政府公布数据,截至 2022 年底,焦作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已圆满完成。河道治理覆盖 29 公里,矿山综合治理的面积达到 7395 公顷。通过工程恢复和新增的湿地面积达 220 公顷,水土流失治理面积为 68.7 公顷,林地面积新增 2395 公顷,草地面积新增 582.39 公顷,土地整治面积新增 59.86 公顷,有效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质量。

乡村生态振兴的伦理价值不仅在于对生态环境的修复,还体现在生态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焦作通过挖掘和整理当地古村落、古树名木、民俗文化等生态文化资源,巧妙结合现代科技手段,打造了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文化品牌,不仅拓宽了生态文化的传播渠道,提升了其知名度和影响力,更在无形中传递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伦理理念。通过修复与保护生态环境、开发生态旅游产品、创新生态文化以及推动生态产业融合发展等措施,为当地经济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1.3 乡村生态振兴的功能价值

乡村生态振兴注重保护和恢复乡村生态系统,维系生态平衡,丰富生物多样性,从而推动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焦作在推动乡村生态振兴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通过创新实施“农村人居环境+”策略,以打造美丽宜居的村庄为目标,全面开展了农村人居环境的整治工作,农村地区的垃圾处理、污水处理、厕所革命以及村容村貌得到明显改善,极大地提升了乡村的整体形象。焦作还大力推进绿色低碳转型战略,致力于构建“森林焦作”,开展全方位、大规模的植树造林美化活动,绿地面积达到 2000 多公顷,绿化覆盖面积达到 2363 公顷,区域绿地率和绿化覆盖率分别达到 37.9% 和 44.1%,人均绿地面积达到 8.81 平方米^[11]。以绿色生态为主题的发展模式减轻了环境污染,遏制了生态恶化、保护了珍贵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营造了宜居的自然环境,推动了“森林+‘六化’+森林乡村和特色小镇+森林旅游康养+乡村旅游+林业产业”的发展。同时积极推广乡村旅游,形成了“农业+旅游”“林业+旅游”“文化+旅游”等多种融合发展模式。这些模式不仅丰富了旅游产品的内涵和外延,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2 乡村生态振兴价值提升的约束因素

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农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严重,阻碍了生态经济发展,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也限制了振兴步伐,部分农村地区经

济基础薄弱,缺乏足够的资金投入和资源配置能力,使得生态治理和保护难以有效实施。由于缺少先进的环保技术和专业人才的支持,使得一些创新性生态项目难以推进。因此,必须正视这些约束因素,深入剖析其产生的原因,并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以解决,以确保乡村生态振兴的顺利推进。

2.1 农村生态环境受到破坏

农村生态环境正面临巨大挑战。因人类长期的农业生产活动致使生态失衡,农村地区的水资源、土地资源和森林资源遭受了严重破坏,农业面源污染是焦作农业生态环境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随着农业生产的集中化和规模化,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持续上升,这些化学物质通过农田径流和渗漏等途径进入水体,引发了水体富营养化和地下水污染等一系列问题。与此同时,迅猛发展的畜禽养殖业也导致了畜禽粪便、废饲料、兽药代谢等污染物的排放问题。若这些污染物未经妥善处理即直接排放,势必对农业生态环境产生严重破坏。

农业水资源短缺和水质下降是焦作农业生态环境面临的另一大挑战。焦作地处北方,降雨量相对较少,水资源短缺问题一直存在。鉴于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等污染源的排放,农业灌溉用水的水质逐渐变差,不仅对农作物的生长及产量造成影响,亦对农产品的质量与安全构成威胁^[12]。焦作在农业废弃物的处理和利用上也存在明显不足。农业废弃物包括秸秆、畜禽粪便等,这些废弃物若未经有效处理,不仅占用土地,还可能造成二次污染。当前焦作在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领域面临技术与资金的双重障碍,致使大量农业废弃物未能得到妥善处理,这一状况不仅对农村的生产活动和居民生活造成了不利影响,同时也制约了乡村生态振兴战略的实施。

2.2 农业政策制度有待完善

在乡村生态振兴过程中,农业政策制度起到关键作用。审视当前状况,农业政策制度在某些方面仍需完善,并存在政策效力递减现象。

焦作在农业政策制定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往往出现偏差和脱节现象。尽管政府在制定农业政策时投入了大量机会成本和资源成本,但在部分区县的环保监管执行过程中出现了疏漏和盲区。在焦作市部分农村地区,仍存在垃圾乱堆乱放、污水横流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民的居住环境和身体健康。政府相关部门监管力度的不足以及对违法行为惩处的力度不够,导致环保政策在乡村地区难以得到有效执行。在农业政策制定过程中,未能充分考虑乡村地区的实际状况与需求,导

致政策内容与现实情况脱节,从而无法有效解决农村环境问题。焦作现行的政策激励体系不健全,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激励措施不到位,对农民和企业的支持力度有待加强,农民和企业参与生态保护项目的动力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乡村生态振兴的进程。

2.3 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焦作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较于城市地区偏低,农村地区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传统农业占据主导地位,而现代化农业技术和相关产业的支持力度尚显不足。这种产业结构的单一性引发了农产品附加值偏低、农民收入增速缓慢等一系列问题。同时,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匮乏,使得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潜力难以得到全面释放。由于缺乏多元化的经济支撑,使得农村经济在面对市场波动时显得尤为脆弱。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特别是交通、水利、电力等关键领域尚待完善。由于交通不便直接提高了农产品的运输成本,水利设施不健全降低了农业生产效率,而电力供应不稳定则制约了农村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这些基础设施的短板使得农村地区在吸引投资、扩大生产规模等方面面临困难。农村人才流失也是导致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重要原因,由于城乡发展差距较大,许多优秀人才选择离开农村前往城市发展,这使得农村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等方面缺乏足够的智力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乡村生态建设的创新力和实际效果^[13]。

2.4 农民素质有待提升

提高农民素质对推动农业现代化、增加农民收益和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等方面至关重要。在文化水平方面,焦作的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农村地区中学及以下学历人口占比较高,而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口数量则相对较少。农村劳动力普遍缺乏现代科技知识和市场意识,难以适应现代农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这自然限制了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的提升;在思想观念方面,部分农民的思想较为保守,缺乏创新和市场观念,他们往往固守传统的经营模式,对新技术和新方法的接受度较低。这种保守的思想观念阻碍了农民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要求,限制了他们有效利用市场资源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的;从环保意识层面来看,农民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认识尚浅,环保意识亦需进一步加强。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部分农民存在过度使用化肥、农药等问题,导致土地污染和生态环境破坏,制约了乡村生态经济的发展。加强农民群体的生态文明教育,培养具备环保意识的高素质农民,是实现乡村生

态振兴的紧迫任务^[14-15]。

3 乡村生态振兴的价值提升路径

实现乡村生态振兴的关键在于寻求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均衡点。乡村生态振兴不仅能够提升农村生态环境的质量,还将为农村地区开启新的发展契机,推动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这是一条既能够满足当代人需求,又将惠及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路径^[16]。

3.1 发展绿色生态农业

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与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应将乡村绿色生态发展视为和美乡村建设的核心。通过引入先进的农业科技,推广节水灌溉技术、绿色种植、作物轮作等,提高土地的利用率和生物多样性,以便有效减少农业面源污染,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在促进循环农业发展方面,政府应大力推行秸秆还田处理和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等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政策。这些措施不仅可以有效实现农业废弃物的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还有助于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提高农业资源效率,为农业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地方政府应积极响应国家推广新能源的号召,鼓励利用太阳能、风能和生物能,实施分布式能源系统和绿色供暖项目,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减少对传统化石燃料依赖,降低污染,为农村绿色发展奠定坚实基础^[17]。

3.2 完善农村政策体系

实现乡村生态的持续振兴,必须进行科学规划和合理布局。在制定具体的生态保护和恢复政策时,需要充分考虑各乡村的实际状况和资源特色,以确保所采取的措施既符合生态规律,又能带来长远利益。政府应高度重视农村政策体系的完善,明确农业农村发展目标、任务和措施,引导农村产业转型升级,优化农村经济发展结构,同时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在完善农村政策体系的过程中,要注重深化农村改革,通过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进一步释放农村发展的活力,增强农村经济发展的动力。通过举办培训班、发放宣传资料等切实有效的宣传方式,向农民普及政策知识,提高农民的政策意识和参与度。

农村政策体系应具备足够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以应对乡村发展的持续变化,并制定出最佳方案。在制定政策过程中,必须深入进行农村调研,准确把握乡村的实际情况,确保政策与乡村需求紧密对接,有效解决实际问题。政府还需强化政策执行监督与检查,确保政策得以切实实施并发挥其预期效果。

3.3 加大农村发展资金投入

政府和企业要为乡村生态振兴项目提供资金支持。为了更有效地推进乡村生态建设和农业发展,可以设立专门的农业生态基金,用于资助乡村生态建设、生态农业发展等项目,政府通过财政预算或设立专项资金的方式,为农业基金提供初始或持续的资金支持;企业通过捐赠或投资方式筹备农业基金,更好地促进企业积极参与乡村生态振兴项目;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发行债券、农业基金等途径,拓宽农业发展的资金来源。

同时要成立专门机构,即设立独立且专业的农业生态基金管理机构,负责基金的募集、管理、投资等。制定投资决策、风险管理、收益分配等方面的基金管理制度,以确保基金的安全和高效运作。建立健全监管机制,对农业基金的投资方向、使用情况加强监督和检查,确保资金的安全和合规使用,定期对农业基金的使用效果进行评估,为基金管理制度的调整和优化提供依据。

3.4 培养高素质农民群体

农民是乡村生态振兴的重要参与者,需推动其观念更新和素质提升。农民应当深刻理解生态振兴的多维度价值,积极投身于乡村生态产品的开发与价值创造,为乡村生态振兴贡献力量^[18]。各级政府应建立农业技术培训基地,提供包括农作物病虫害防治、高产栽培、加工、营销、安全追溯、机械操作、乡村旅游等全方位培训;同时利用互联网推广“云上智农”平台,结合线上线下培训,确保农民群体能够便捷学习现代农业知识,提升技能素质。通过培训不仅能培养出一批既有文化底蕴又具备专业技能、既擅长经营管理又懂得市场运作的新型农民,还能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促进乡村人才振兴战略的实现。

生态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与先决条件,唯有实现生态振兴,方能为乡村振兴提供有力的支持,推动乡村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乡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19]。全面厘清乡村振兴的价值逻辑,积极探索实现乡村生态振兴的有效路径,政府应不断完善政策体系,加强政策引导,充分调动社会资源,激发农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共同推动乡村生态振兴取得显著成效,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参考文献:

[1] 张平,王曦晨. 习近平乡村生态振兴重要论述的三维解

读:生成逻辑、理论内涵与实践面向[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1):1-7.

[2] 包晓斌. 乡村生态振兴:总体目标、重点任务与推进对策[J]. 湖湘论坛,2023,36(5): 45-55.

[3] 阿柔娜. 内蒙古自治区乡村生态振兴问题研究[D]. 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23.

[4] 盛雨潇. 乡村产业振兴的理论溯源、科学内涵和实现路径[J]. 南方农机,2024,55(22): 96-99.

[5] 何龙斌.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助推乡村产业振兴:基本逻辑、内在机理与实现路径[J]. 农村经济,2024 (1): 64-73.

[6] 郎宇,王桂霞. 生态资源价值化助推乡村振兴的逻辑机理与突破路径[J]. 自然资源学报,2024,39(1): 29-48.

[7] 雷明,于莎莎. 乡村振兴的多重路径选择——基于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的分析[J]. 广西社会科学, 2022(9): 1-14.

[8] SQUIRE G, WATSON C. Agricultural ecology research: Its role in delivering sustainable farm managing ecological trade-offs-research to practice[J]. Aspects of Applied Biology, 2011, 109: 1-6.

[9] Ch I . Agricultural ecology and animal welfare 1994 to 2005 [J]. Agrarforschung (Switzerland), 2005, 12 (11-12): 526-531.

[10] 杜泽兵. 资源枯竭型城市生态需求、供给与补偿体系研究[D]. 焦作:河南理工大学,2022.

[11] 王冠. 资源型城市转型生态可持续性分析——以河南省焦作为例[J]. 生态经济, 2016, 32(4): 53-56.

[12] 李志浩,白雪. 乡村生态振兴的理论指引、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J]. 安徽乡村振兴研究, 2024, 3(2): 106-112.

[13] 江亚琦,魏世梅. 论乡村生态振兴的实现路径[J]. 洛阳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38(5): 39-43.

[14] 吕宇晶.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推进乡村生态振兴的逻辑、困境与路径[J]. 改革与战略, 2023, 39(4): 77-88.

[15] 孙建红. 推进乡村生态振兴的必然逻辑、现实难题与破解路径[J]. 智慧农业导刊, 2024, 4(12): 181-184.

[16] 何龙斌,王海鑫. 乡村产业振兴与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逻辑关系、耦合机理与协同路径[J]. 经济纵横, 2023 (11): 88-94.

[17] 刘儒,何莉. 以绿色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目标任务、基本依循与路径优化[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4(3): 1-10.

[18] 翟艳. 乡村生态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机理与实践路径[J]. 经济研究导刊, 2023(23): 12-14.

[19] 曹立,徐晓婧. 乡村生态振兴: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发展路径[J]. 行政管理改革, 2022(11): 14-22.

安徽省数字经济政策文本量化与耦合分析

马 铮,程广华*,姚 瑶,陈方旻

(淮南师范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安徽 淮南 232038)

摘 要:通过 LDA 模型对安徽省各地数字经济专项政策文本进行文本挖掘,探究地方政策主题,对比省级政策侧重点开展政策互动分析。研究发现,安徽省地方政策聚焦产业数智化转型,创新数据要素开发利用模式,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和强化政府资金支持;对比耦合分析发现,安徽各地还需深挖数字经济赋能地方产业潜力,创新数据要素流通机制,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强化地方政策供给,以促进安徽省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数字经济;LDA 模型;文本挖掘;安徽省

中图分类号:F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3-0063-07

Text Quantification and Coupling Analysis of Digital Economy Policies in Anhui Province

MA Zheng, CHENG Guang-hua*, YAO Yao, CHEN Fang-mi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uainan, 232038, Anhui)

Abstract:Through LDA modeling, text mining of digital economy special policy texts across Anhui province was conducted, local policy themes were explored, and policy interactions were analyzed in comparison with provincial policy focuses. It found that local policies in Anhui province emphasiz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industries, the innovation of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mode of data elements, the acceleration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government financial support. The comparative coupling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potential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need to be further explored by localities in Anhui province to empower local industries, the mechanism for the circulation of data elements needs to be innovate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must be strengthened. These actions will aim to enhance the supply of local policies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in Anhui province.

Key words:digital economy; LDA modeling; text mining; Anhui province

当前随着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5G 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创新取得突破,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发展催生出新业态和新模式,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与变革。数字经济作为一种颠覆性的新型社会经济形态,存在三维复合的经济增长效应^[1],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也成为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关键变量^[2]。但当前数字经济也面临数字鸿沟^[3]、数据要素流通不畅^[4]、数字平台垄断^[5]等问题,需要中央和地方制

定数字经济政策以发挥规制作用。为此,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我国数字经济要素链、产业链、价值链、制度链走向深度耦合,为数字经济发展明确方向。安徽省拥有多重国家战略叠加优势,数字经济发展潜力巨大。近年来安徽省及各地政府制定了一系列聚焦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文件。基于前述背景,已有的各地数字经济政策对数字经济起到的作用如何?各地数字经济政策主题聚焦何处?数字经济省级政策与各地政策互动如

收稿日期:2024-10-24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24AH053239,2024AH053237);淮南师范学院质量工程项目(2023hsjyxml2)。

作者简介:马铮(1989-),男,安徽无为,讲师,硕士。E-mail:mazheng_ahu@163.com

何?这些都值得关注。大数据时代依托机器学习、聚类分析以及文本挖掘等技术,可实现对政策文本等非结构化数据的分析,提升政策治理效果,持续推动公共决策优化^[6]。LDA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模型作为非监督机器学习方法,是一种对文本主题进行建模挖掘的三层贝叶斯产生式概率模型,广泛应用于政府开放数据等政策文本的主题发现^[7]。本研究以LDA模型为研究工具,通过对安徽省各地数字经济政策进行文本挖掘,明晰其数字经济发展的侧重点,并从省地联动视角探索政策耦合互动关系和存在的问题,为后续安徽省数字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参考。

1 相关研究综述

1.1 政策文本分析方法研究

当前政策文本分析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文献计量法以及文本挖掘法。内容分析法是一种介于定性与定量之间的半定量研究方法,在基本的文本分析框架之上制定量化标准,并采用人工打分和编码的方式,识别和测度文本的单元结构和内涵。进入数字时代,Nvivo、ROST CM等计算机编码工具应用于内容分析法^[8-9],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编码效率,但尚存在主观性较强和不确定性程度高等问题^[10]。文献计量法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政策质性分析过程中出现的价值偏好误判,从政策文献的外部结构特征和部分内容特征出发,对政策发布机构、政策间引用关系、政策主题词关系等政策特征进行分析^[11],但分析效率和深度不佳。为解决此类问题,文本挖掘法大量应用于政策文本分析当中。其通过对文本进行预处理,采用文本向量化表示,再使用数据挖掘、机器学习、可视化技术等方法,提取大规模文本集合中隐含的、潜在的知识或模式,该方法可应用于主题分析、文本分类、信息抽取等相关领域^[12]。文本主题分析是利用自动生成或抽取的主题对文本的主要内容进行概括,LDA模型则是获取政策文本主题分布的经典方法^[13],该方法还广泛应用于网络舆情^[14]、新闻话题^[15]、情感分析^[16]等领域。但通过文献梳理发现,运用LDA模型对特定省份数字经济地市层面的政策研究亟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

1.2 数字经济政策研究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以数字化信息为关键资源,依托互联网平台,以数字技术为主要驱动力^[17]。有效的数字经济政策体系有利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18]。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研究热点,但相

关政策研究还不够系统,研究主题侧重于数字经济政策体系建设以及政策文本量化分析等领域。

数字经济政策体系研究主要包含政策体系构建和完善。首先是构建整体政策体系。陈万钦结合数字经济发展趋势,从加快数字经济发展顶层设计和总体布局以及功能性政策等五个方面构建专用政策体系,从要素政策以及财税政策等四个方面构建通用政策体系^[19]。其次,我国数字经济区域发展不平衡,需根据区域不同来调整政策供给以完善政策体系。任保平等认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应强化基础设施建设,东部地区要关注数字经济创新能力提升^[20]。张倩等则认为西部地区还需结合国家发展战略规划,强化数字金融、数字产业集群和营商环境建设^[21]。吴文生等认为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应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全产业链数字化创新发展,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促进地区新质生产力发展^[22]。地方数字经济政策有利于推动本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由此可见,省、地市经济发展还需基于地方特点进行针对性政策供给,以完善地方数字经济政策体系。

随着数字经济专项政策的陆续出台,学界主要围绕政策主题、效率评价等方面开展政策文本研究。在政策主题研究中,杨巧云等以省级数字经济综合政策文本为对象,认为省级政府数字经济综合性政策侧重于应用创新和供给型政策工具的使用^[23]。其他学者进一步细化相关研究,认为省级数字经济政策主题包含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生态产业、数字技术应用、创新发展、政府部门、数字资源、市场活力等领域^[24-25]。陈美等运用LDA主题模型,研究发现我国省级数字经济政策文本主题包含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深化重点产业数字化转型以及优化省级数字基础设施等多个主题^[26]。还有学者从数字经济发展任务^[27]、发展与安全“孰轻孰重”^[28]等创新视角探究数字经济政策主题。政策评价研究也逐渐引起关注,有学者基于PMC指数模型对全国或部分省份数字经济政策文件进行量化评价^[29-31]。

1.3 文献述评

通过对数字经济政策相关文献的梳理可见:首先,当前我国数字经济政策研究以定性的政策供给研究为主,多以研究国家和省部级政策文本为研究对象,虽然各地市及区县发布了众多数字经济相关政策,但缺乏特定省份地市和区县的政策文本研究;其次,对于数字经济政策文本的研究侧重解读和评估,结合大数据方法对政策文本进行分析的研究较少;最后,LDA模型当前在市场营销、舆情分析等领

域较多,数字经济政策研究相对较少,有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鉴于此,本研究创新之处在于拓宽数字经济政策研究至安徽省地市层面,采用 LDA 模型进行非结构化文档集合潜在主题挖掘,分析安徽省各地政策潜藏的主题信息和结构特征,进而探究该地市与省级数字经济政策的耦合和优化。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框架

本文基于优化后的词典分词构建 LDA 模型分析框架。首先,采集安徽省数字经济相关政策法规文件,整理汇总成政策文本原始语料库;其次,基于 Python 语言,对文本进行停用词处理,并运用优化后的词典方法进行分词处理;再者,运用 LDA 模型挖掘数字经济政策文本的主题特征词,并进行聚类 and 绘制词云图,且基于高频词汇以及主题聚类情况确定主题结构;最后,对比安徽省省级政策,探究省级

与地方政策之间的匹配程度,并探讨安徽省数字经济的政策优化。具体研究框架如图 1 所示。

2.2 数据来源与收集

本文基于安徽省政府和 16 个地市政府的门户网站、北大法宝数据库以及百度搜索引擎等,采集安徽省及其辖区市县级政府出台的数字经济专项政策文本作为语料库。在政策文本采集过程中,主要遵循以下三项原则:一是选取与数字经济直接相关的政策文件,即文件标题中包含“数字经济”。对仅在文本内部笼统或粗略提及数字经济的政策文件不予采用;二是政策文件类型为法律法规、条例、白皮书、行动计划、实施办法、意见、建议、通知等,不包含领导讲话、会议纪要、政策解读、新闻报道等文件;三是政策文件来自于公开渠道。通过收集安徽省各地数字经济政策文本,经过多次筛选、核对后,本研究最终收集到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之间的政策样本 39 份,如表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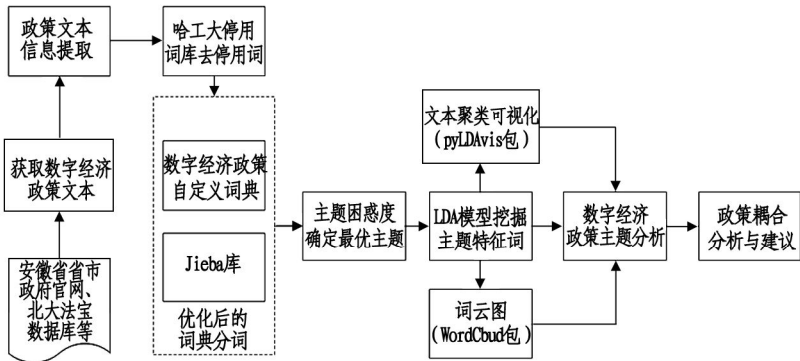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框架

表 1 2018 – 2023 年安徽省各地数字经济政策文本

序号	政策名称	发布文号	发布机构
1	关于印发《合肥市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20 – 2025 年)》的通知	合政〔2020〕13 号	合肥市
2	关于印发加快发展数字经济行动方案(2022 – 2024 年)的通知	淮府办〔2022〕9 号	淮南市
3	关于印发铜陵市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	铜政〔2019〕33 号	铜陵市
4	关于印发蜀山区“十四五”智慧城市和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的通知	蜀政办〔2023〕2 号	蜀山区
.....			
39	关于印发池州高新区数字经济产业园建设行动方案的通知	贵政办〔2021〕24 号	贵池区

2.3 研究方法

政策文本聚类的核心在于根据相关政策文本记录,辅助政策制定者提升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政策文本量化研究,尤其是聚类分析需要基于政策词表提升分词准确度,并通过优化算法,提升结果的精确度。因同义词和多义词歧义问题以及高频

孤立词问题,传统主题发现方法难以取得理想效果。LDA 模型生成“文档 – 主题”和“主题 – 词”概率分布,通过对文本主题结构及其分布进行深度量化分析和可视化展示,相比而言,更适用于多主题政策文本的潜在语义关系挖掘,为政策文本分析提供了语义降维和主题结构探索的新方法,具体模型如图 2

所示。本文采用 LDA 模型的优势体现在:在传统文本分析的基础上,引入数字经济自定义词典,减少原有词典分词判定偏差,使文本分析更加专业化;针对政策文本这一特殊文本类型,模型降低了数据维度,另外该模型泛化能力很强,针对大规模政策文本分析能够体现其优越性^[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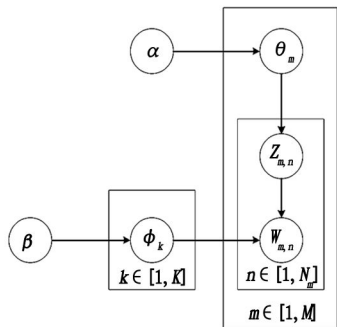


图2 LDA 模型政策主题挖掘

LDA 模型政策主题挖掘步骤如下:

首先,根据 Dirichlet 分布得到政策文本 m 主题分布 θ_m 和主题的词分布 ϕ_k ;其次,从 θ 的多项式分布中随机选择主题 z ,概率为 $P(Z_{m,n} = k)$,从该主题的多项式条件分布中随机选择一个词 $W_{m,n}$,概率 $P(W_{m,n} | Z_{m,n} = k)$,该政策文本中词的概率分布可以表示为 $P(W_{m,n}) = P(W_{m,n} | Z_{m,n} = k) \cdot P(Z_{m,n} = k)$;最后,如此循环得出文档——主题概率分布 θ 和主题——词概率分布。其中, θ_m 、 ϕ_k 分别为 K 维、 N 维向量, M 是所有文本数量 ($m \in [1, M]$), K 是所有主题数量 ($k \in [1, K]$), N 是语料库中所有词语的数量; $Z_{m,n}$ 是政策文本 m 中第 n 个词的主题, $W_{m,n}$ 是政策文本 m 中第 n 个词, N_m 是政策文本 m 的所有词语数量; α 、 β 分别是 θ_m 、 ϕ_k 的先验分布参数。 θ_m 、 ϕ_k 、 $Z_{m,n}$ 都是未知的隐含变量, $W_{m,n}$ 是已知变量。

3 安徽省数字经济政策文本挖掘

本文将收集的安徽省数字经济相关政策文本作为量化分析的语料库,后续还需经过文本预处理、LDA 主题数量确定以及 LDA 主题结构分析开展实证研究。

3.1 文本预处理与主题数量确定

在政策文本采集后,基于 Python 语言,采用哈工大停用词库对文本进行去停用词处理,运用 Jieba 库对文本开展分词处理。文本预处理过程中导入数字经济政策的自定义词典,提高分词准确度。文本预处理后,本文使用 Python 中 Sk-learn 库对标准化

语料库进行 LDA 主题建模。在建模时,提取每个主题下的 1000 个特征词语,通过文本向量化筛选高权重词汇,并预设主题个数及相关参数。基于此,本文采用主题困惑度模型计算最优主题数量,困惑度表示文档所属主题的不确定性,困惑度最小时,主题数量最为合适。一般情况下,可以根据困惑度曲线的拐点,或者根据“手肘法”进行最优主题数的确定。本文通过“手肘法”判断,并利用 Python 通过 pyLDAvis 库实现聚类 and 可视化分析,结合政策文本实际聚类分析,发现主题数量 4 为 LDA 模型最优主题数,其主题聚类如图 3 所示。在主题聚类结果中,圆圈表示主题,圆圈大小表示主题对应的文档数量,圆圈距离越远说明主题相似性越低。结合图 3 可见,在主题数量为 4 时,主题 1 分别与主题 2、3 存在部分重叠,这是因为数字经济中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等主题内容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另外企业数字化与产业数字化关联性也较强。从主题特征词来看,相关任务和措施的确存在部分相似关键词,但各主题能够展示数字经济政策分类要点,因此判定主题数量确定适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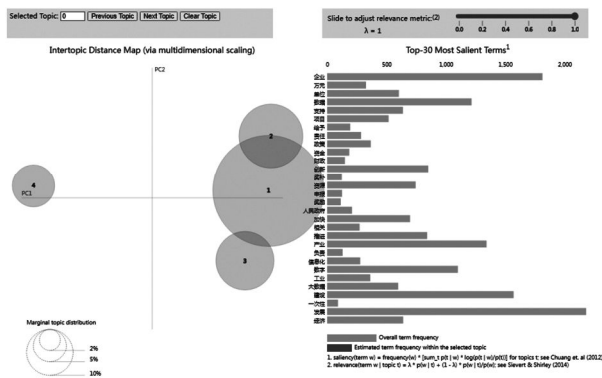


图3 最优主题聚类可视化结果

3.2 LDA 主题结构分析

(1)主题词云图分析。

基于 LDA 模型最优主题数,确定安徽省数字经济政策主题特征词,选取 TOP100 的特征词进行可视化分析,绘制整体文本的特征词云图,如图 4 所示。结合词云图可见,“数字经济”“发展”“建设”“产业”“企业”“单位”等词汇出现的频率靠前,符合政策制定与发文的规律,“数据”“大数据”“平台”“技术”“创新”“智慧”等词汇出现的频率较高,体现政府数字经济工作的基本思路和关切点。



图 4 主题特征词词云图

(2)主题结构分析。

通过 LDA 主题模型分析,安徽省数字经济政策文本分为 4 个主题,每个主题下归类出排在前 15 的高频特征词,相关主题词反映了政策侧重点,具体如表 2 所示。

表 2 主题及排在前 15 的高频特征词分布

编号	主题名称	特征词
1	深化产业数智化转型	发展 数字经济 建设 产业 企业 数字 智慧 服务 推进 平台 数据 应用 技术 数字化 加快
2	创新数据要素开发利用模式	数据 数字经济 创新 建设 产业 企业 资源 发展 平台 大数据 数字 应用 服务 领域 城市
3	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	单位 企业 责任 发展 数据 建设 数字经济 数字 加快 推进 产业 平台 经济 支持 培育
4	强化政府资金支持	企业 万元 支持 给予 项目 5G 财政 资金 奖补 政策 发展 奖励 申报 负责 一次性

4 安徽地方政策与省级政策耦合对比分析

安徽省人民政府颁布《加快发展数字经济行动方案(2022 - 2024 年)》文件,明确指出产业数字化转型迈上新台阶、数字产业化水平显著提升以及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的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和措施包括数字科创、产业数字化转型、数字产业能级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数据价值提升行动任务 5 点 19 项,具体如表 3 所示。

该行动方案参照了国家《“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总体定位,立足安徽省实际,着眼于解决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与《“数字安徽”建设总体方案》中数字经济部分内容保持一致。直观来看,该行动方案囊括了地方政策文本主题。通过深入分析,可以从政策层面分析各地数字经济政策与安徽省政府要求的匹配程度,并提出以下建议:

4.1 深挖数字经济赋能地方产业潜力

数字经济的高渗透性、高融合性和高协同性,对传统产业具有赋能效应^[34]。主题分析结果反映安徽省各地数字经济政策关注数字技术的充分应用,

根据特征词——主题表进行分析,结合陈美等^[26]以及张存阳等^[27]的研究,主题 1 命名为深化产业数智化转型,反映安徽省各地推进数字经济注重“量质齐升”,关注数字技术发展与创新,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结合中国信通院的研究^[33],主题 2 命名为创新数据要素开发利用模式,彰显安徽各地不断强化数据资源处理能力,构建大数据产业图谱,强化高质量数据要素供给,鼓励各方创新数据开发利用模式;结合陈美、孙瑞乾^[26]的研究,主题 3 命名为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能够看出安徽各地注重落实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体责任,整合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战略落地;结合雷鸿竹等的研究^[25],主题 4 命名为强化政府资金支持,凸显安徽各地政府通过财政补贴、专项资金等形式,鼓励企业开展数字化信息化项目,为 5G 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支持。

推动实体经济全要素数字化转型,大力推进地区数实融合,符合安徽省级数字经济发展的战略导向。省级政策侧重基于工业互联网开展模式创新,推动产业链升级,但地方还需强化落实。因此,各地首先应依托区位和资源禀赋特色,整合地方产学研资源,全面对接安徽省十大新兴产业和各地市主导产业发展需求。其次,加快推进安徽羚羊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发挥工业互联网推动产业模式和企业组织形态变革的作用,培育地区“专精特新”企业,加快形成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智慧文旅体等安徽地区特色产业生态。深度挖掘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效能,打造中国式现代化产业体系^[18]。

4.2 创新数据要素流通机制

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数据要素流通机制创新有利于释放数据价值,提供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33]。主题分析结果反映数据价值提升备受关注,安徽各地政策提出加快医疗、教育、交通、金融等行业数据归集共享,契合《“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 - 2026 年)》政策要求。政策主题和文本分析的结果反映了当前地方政策在数据要素流通方面

存在短板。为推进数据要素的开放和共享,数据要素交易流通机制仍需持续完善^[7]。因此,安徽各地首先应加快公共数据市场供给,推动公共数据有序开放,推进公共数据授权运营。其次,需与省级数据要素流通平台互联互通,打破“数据孤岛”,加快形成数据集成的省级统一数据平台,为地方数据交易

提供合法、安全环境。最后,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数据价值创新过程,建立健全数据管理与保护机制,同时还需建立激励机制,推动数据交易市场健康发展。最终打造开放、共享、共生的数字生态体系,加快数据要素的流通和数据价值的提升^[34]。

表 3 安徽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行动方案(2022 – 2024 年)》中的任务与措施

编号	任务	措施
1	数字科创行动	构建高水平创新体系
2		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
3		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
4		推进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改造
5		推动服务业数字化转型
6	产业数字化转型行动	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及应用
7		基于工业互联网开展模式创新
8		强化产业基础
9		推动产业链升级
10		大力发展电子信息制造业
11	数字产业能级提升行动	加快发展软件和信息服务业
12		支持数字产业集群发展
13		建设泛在高速网络体系
14		优化 5G 网络覆盖
15		部署新型智能化计算设施
16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行动	提升安全保障服务水平
17		强化高质量数据要素供给
18		探索政府数据授权运营
19		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交易流通

4.3 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企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主体和驱动力量,主题分析结果与省级政策均强调传统企业需要进行数字化转型。企业依托数字基础设施开展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其综合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是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的载体^[4]。目前安徽各地还需强化 5G 网络、算力等基础设施建设。首先,安徽各地需全面升级网络基础设施,积极布局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融合基础设施。其次,鼓励企业与高校、研究所等科研机构建立长期合作机制,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提升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1]。最后,强化政府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同时积极探索数字金融对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支持作用。

5 结论

在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如何将文本挖掘与政府数字经济政策制定与优化有效结合备受关注。通过 LDA 模型对安徽省各地数字经济政策进行主题挖掘,解决针对数字经济政策文本内容定性分析的不确定性等弊端。通过政策主题分析,明确当前安徽省各地数字经济政策的侧重点,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标省级政策,探寻省地政策之间的耦合与互动关联,并提出针对性建议。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地方数字经济政策主题聚焦企业与产业数字化、要素价值化以及政府资金支持,遵循了省级发展战略的要求,但还需深挖数字经济赋能地方产业潜力,创新数据要素流通机制,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

挥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培育数字新质生产力,从而推动安徽省地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吴茜,姚乐野. 数字经济、创新驱动与区域经济增长[J]. 软科学,2023,37(6):63-70.
- [2] 徐康宁. 世界数字经济的发展格局与基本趋势[J]. 人民论坛,2023(6):85-89.
- [3] 彭刚,高劲松. 数字经济、数字鸿沟和城乡要素配置——基于我国 257 个城市的实证研究[J]. 调研世界,2023(6):71-82.
- [4] 魏江,刘嘉玲,刘洋. 数字经济学:内涵、理论基础与重要研究议题[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21,38(21):1-7.
- [5] 赵驰,周勤,王飞,等. 基于价格竞争的数字平台隐形垄断[J]. 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25(4):59-70,155.
- [6] 周阳,汪勇. 大数据重塑公共决策的范式转型、运行机理与治理路径[J]. 电子政务,2021(9):81-92.
- [7] 陈玲,段尧清. 我国政府开放数据政策的实施现状和特点研究:基于政府公报文本的量化分析[J]. 情报学报,2020,39(7):698-709.
- [8] 谭春辉,谢荣,刘倩. 政策工具视角下的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政策文本量化研究[J]. 电子政务,2020(2):111-124.
- [9] 陈一涵,励晓红,吕军,等. 残疾人健康管理相关政策变迁分析——基于 Rost CM 软件的政策文本分析[J]. 中国卫生事业管理,2022,39(5):321-324,339.
- [10] 郑新曼,董瑜. 政策文本量化研究的综述与展望[J]. 现代情报,2021,41(2):168-177.
- [11] 李江,刘源浩,黄萃,等. 用文献计量研究重塑政策文本数据分析——政策文献计量的起源、迁移与方法创新[J]. 公共管理学报,2015,12(2):138-144,159.
- [12] 汪大钊,化柏林. 政策文本量化研究综述[J]. 科技情报研究,2023,5(1):92-105.
- [13] BLEI D M, NG A Y, JORDAN M I.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J]. The Journal of Machine Learning Research, 2003(3):993-1002.
- [14] 王晰巍,李聪聪,孙哲,等. 重大突发事件下网络舆情传播中社会群体主题演化图谱构建研究[J]. 图书与情报,2024(2):80-91.
- [15] 杨洋,江开忠,原明君,等. 新闻话题识别中 LDA 最优主题数选取研究[J]. 数据分析与知识发现,2022(11):72-78.
- [16] 张成元,刘云珂,赵炳清,等. 基于在线文本情感分析的“唐文化”目的地形象挖掘研究[J]. 计量经济学报,2023,3(2):387-407.
- [17] 李晓华. 数字经济新特征与数字经济新动能的形成机制[J]. 改革,2019(11):40-51.
- [18] 余文涛,杜博涵,翁明芳. 数字经济政策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机制与经验证据[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74(5):95-107.
- [19] 陈万钦. 数字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研究[J]. 经济与管理,2020,34(6):6-13.
- [20] 任保平,贺海峰.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布及其特征[J]. 统计与信息论坛,2023,38(8):28-40.
- [21] 张倩,任保平. 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状态、路径与政策[J]. 宁夏社会科学,2023(4):118-125.
- [22] 吴文生,荣义,吴华清. 数字经济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研究[J]. 金融与经济,2024(4):15-27.
- [23] 杨巧云,乔迎迎,梁诗露. 基于政策“目标-工具”匹配视角的省级政府数字经济政策研究[J]. 经济体制改革,2021(3):193-200.
- [24] 唐兴霖,雷李念慈. 基于政策文本的数字平台治理工具配置逻辑研究[J]. 理论探讨,2023(6):66-75.
- [25] 雷鸿竹,王谦. 中国地方政府数字经济政策文本的量化研究[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2(5):91-94.
- [26] 陈美,孙瑞乾. 政策工具视域下我国省级数字经济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基于 LDA 的主题社会网络分析[J]. 情报杂志,2023,42(11):174-182.
- [27] 张存阳,李晔,沈自强,等. 我国数字经济政策制定与实施的省际差异——基于省级规划的文本量化分析[J]. 科学与管理,2023,43(1):51-59.
- [28] 姚怡帆,许正中. 地方政府数据治理的注意力配置差异与内在逻辑——基于发展与安全“孰轻孰重”的视角[J]. 电子政务,2024(3):68-80.
- [29] 王伟光,宋洪玲. 数字经济支持政策工具的量化评价——基于省际层面政策的文本分析[J]. 中国科技论坛,2023(6):97-107.
- [30] 蔡冬松,柴艺琳,田志雄. 基于 PMC 指数模型的吉林省数字经济政策文本量化评价[J]. 情报科学,2021,39(12):139-145.
- [31] 王琛,赵燕清,张铭君. 面向山东省数字经济政策文本的量化评价研究[J]. 山东科学,2024,37(5):111-121.
- [32] 张东鑫,张敏. 图情领域 LDA 主题模型应用研究进展述评[J]. 图书情报知识,2022,39(6):143-157.
- [33] 中国信通院.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 年)[EB/OL]. (2024-08-27)[2024-10-08].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408/t20240827_491581.htm.
- [34] SANDBERG J, HOLMSTROM J, LYYTINEN K. Digitization and phase transitions in platform organizing logics: Evidence from the process automation industry[J]. MIS Quarterly, 2020,44(1):129-153.

“双碳”背景下企业 ESG 表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刘园春*, 吴艳艳

(蚌埠学院 财务处,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以融资约束为中介,运用固定效应模型,采用 2009–2022 年微观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企业环境、社会、治理(Environment, Social, Governance, ESG)表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良好的企业 ESG 表现可以有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融资效率,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ESG 表现在国有企业、中小企业和房地产行业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效果更强烈。

关键词:企业 ESG;融资约束;全要素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F2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3–0070–07

The Impact of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by the “Carbon Peaking and Carbon Neutrality”

LIU Yuan-chun*, WU Yan-yan

(Finance Office, Bengbu University, Bengbu, 233030, Anhui)

Abstract: Based on financing constraints, the fixed-effect model was used to empirically analyze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by using the panel data of micro enterprises from 2009 to 2022.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good corporate ESG performance can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can act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by alleviating corporate financing constraints and improving financing efficiency. In addition,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ed that ESG performance has a stronger effect on improving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the real estate sector.

Key words: corporate ESG; financing constraints;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双碳”战略提出以来,我国加快降低碳排放步伐,引导绿色技术创新,提高产业和经济的全球竞争力。新发展阶段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指导实践。在这一背景下,党中央创新性地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ESG 是环境(Environment)、社会(Social)、治理(Governance),作为一种关注环境、社会、治理的企业投资理念和评价标准,逐渐融入企业具体实践,它不仅要求企业关注自身经营,还要承担环境和社会责任,减少环境污染。自我国正式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来,绿色低碳

发展逐渐成为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作为市场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应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通过技术创新达到环境、社会、治理的共赢,提升内在价值,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基于此,将企业 ESG 表现与全要素生产率置入同一研究框架,探究良好的企业 ESG 表现能否有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以及如何以企业 ESG 表现为引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融资效率,能为企业提升创新能力、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1 文献回顾

关于企业 ESG 表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宏观层面常用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法主要是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以及随机前沿分析法(SFA),二者主要运用于地区或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1-3]。微观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法主要包括 Olley-Pakes 法(OP法)、Levinsohn-Petrin 法(LP法)、最小二乘法(OLS法)、固定效应法(FE法)等。OLS法可能会产生同时性偏差和样本选择性偏差,尽管FE法通过引入企业个体的虚拟变量可缓解同时性偏差,但同时会消除时间变动带来的信息,因此OLS法和FE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的适用范围较为局限。Olley和Pakes最早提出了两步一致估计法,将企业的当期投资作为不可观测生产率的代理变量,解决了同时性偏差问题^[4]。王贵东利用OP法测算了1996-2013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出不同行业的资本产出弹性处在0.2-0.4之间,劳动产出弹性处在0.3-0.6之间^[5]。Levinsohn和Petrin针对OP法存在的变量单调性问题,发展了新的估计方法(LP法)^[6]。该方法利用中间品投入的数据替代当期投资,为后续研究扩展了代理变量的选择空间。使用销售额减去增加值作为中间品投入,估计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成为新的研究方向^[7]。

二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分析。产业集聚角度分为“专业化经济”和“多样化经济”,“专业化经济”可以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多样化经济”不具备这一功效^[8]。环境规制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存在明显的“倒N型”关系。当环境规制强度较弱时,全要素生产率降低,随着环境强度的增加,全要素生产率逐步提高,超过一定阈值时,全要素生产率又会下降^[9]。金融发展分为金融规模和金融效率,金融规模的扩大和效率的提升均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且金融效率的提升作用效果更明显^[10]。政府补贴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为激励效应,在激励进入效应下,政府补贴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抑制作用;在激励退出效应下才具有促进作用^[11]。近年来随着微观企业数据可得性的提升,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企业自身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12-16]。

三是企业 ESG 表现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目前企业 ESG 与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现有文献主要从企业创新、环境因素等角度分析二者关系。企业 ESG 建设主要通过释放创新效能,进而改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17]。而在环境不确定性的情况下,ESG 责任履行对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存在非对称性。在高环境不确定性下,企业 ESG 责任履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主要通过成本管控水平来决定,而低环境不确定性下,主要由投资水平决定^[18]。此外,ESG 信息披露也可以通过提高创新产出、提高员工信任水平和优化企业人力资本结构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19]。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在微观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方法中,LP法能更好地扩展代理变量,对研究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属性更具有价值。本文亦主要采用LP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同时选择OLS法、FE法和OP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用于稳健性检验。已有研究表明二者既有简单的线性机制,亦有复杂的非对称机制,学界对此尚无准确定论,本文重点验证 ESG 表现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相关性机制,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以融资约束为中介,采用2009-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探究 ESG 表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探索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与处理

为使数据口径保持一致,以2009-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并对数据进行以下处理:剔除区间内数据缺失的样本;剔除金融业上市公司样本;对数据进行1%和99%分位的缩尾处理。最终得到15554个样本观测值。本文ESG指数采用华证ESG评级综合得分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其他财务数据来自CSMAR和RESSET数据库,采用Stata17软件进行处理。

2.2 变量说明

2.2.1 被解释变量

全要素生产率(TFP)。借鉴杜传忠等的研究观点,选择LP法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20],如公式(1)所示:

$$\ln Y_{it} = \delta_0 + \delta_L \ln L_{it} + \delta_K \ln K_{it} + \delta_M \ln M_{it} + \text{controls}_{it} + e_{it} \quad (1)$$

其中 Y 为企业营业收入, L 为员工人数, K 为固定资产净额, M 为营业成本加上销售费用、管理费

用、财务费用减去折旧摊销和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2.2 解释变量

企业 ESG 表现(ESG)。华证指数参考国际主流方法和实践经验,结合中国国情与资本市场特点构建华证 ESG 评级体系。根据指标体系测算的综

2.2.3 中介变量

融资约束(FC)。借鉴顾雷雷等的研究成果,采用 FC 指数测算融资约束程度^[21],如下所示:

$$P(Q UFC = 1 | Z_{it}) = e^{Z_{it}} / (1 + e^{Z_{it}}) \tag{2}$$

$$Z_{it} = \varphi_0 + \varphi_1 SIZE_{it} + \varphi_2 LEV_{it} + \varphi_3 (CASHDIV/ta)_{it} + \varphi_4 MB_{it} + \varphi_5 (NCW/ta)_{it} + \varphi_6 (EBIT/ta)_{it} \tag{3}$$

其中 SIZE 为企业总资产的对数,LEV 为资产负债率,CASHDIV 为当年发放的现金股利,MB 为企业市账比,NWC 为净营运资本,EBIT 为息税前利润,ta 为总资产。首先以上下三分位点确定融资约束虚拟变量 QUFC,大于 66% 定义为低融资约束组,QUFC = 0;小于 33% 定义为高融资约束组,QUFC = 1。随后进行 Logic 回归,拟合出融资约束发生概率 P,定

合得分将评级分为 C-AAA 共九个等级,本文采用华证 ESG 评级得分作为解释变量,分值越高说明企业 ESG 表现越好。

义为融资约束指数 FC(取值为 0 - 1 之间),FC 值越大,说明融资约束问题越严重。

2.2.4 控制变量

参照盛明泉等、黄先海等研究,设置以下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上市年限(AGE)、盈利能力(ROA)、经营能力(CIR)、偿债能力(LEV)^[19-22]。变量说明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说明

类型	名称	符号	说明
被解释变量	全要素生产率	TFP_LP	LP 法测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对数值
		TFP_OLS	OLS 法测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对数值
		TFP_FE	FE 法测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对数值
		TFP_OP	OP 法测算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对数值
解释变量	企业 ESG 表现	ESG	华证 ESG 评级得分
中介变量	融资约束	FC	FC 指数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E	企业总资产的对数值
	上市年限	AGE	企业上市年限的对数值
	盈利能力	ROA	净利润/总资产
	经营能力	CIR	总资产/营业收入的对数值
	偿债能力	LEV	年末总负债/年末总资产的对数值

2.3 模型构建

通过构建面板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分析,设定模型,如公式(4)、公式(5)、公式(6)所示:

$$TFP_{it} = \alpha_0 + \alpha_1 ESG_{it} + \alpha_2 SIZE_{it} + \alpha_3 AGE_{it} + \alpha_4 ROA_{it} + \alpha_5 CIR_{it} + \alpha_6 LEV_{it} + \varepsilon_{it} \tag{4}$$

$$FC_{it} = \beta_0 + \beta_1 ESG_{it} + \beta_2 SIZE_{it} + \beta_3 AGE_{it} + \beta_4 ROA_{it} + \beta_5 CIR_{it} + \beta_6 LEV_{it} + \varepsilon_{it} \tag{5}$$

$$TFP_{it} = \gamma_0 + \gamma_1 ESG_{it} + \gamma_2 FC_{it} + \gamma_3 SIZE_{it} + \gamma_4 AGE_{it} + \gamma_5 ROA_{it} + \gamma_6 CIR_{it} + \gamma_7 LEV_{it} + \varepsilon_{it} \tag{6}$$

模型(4)分析企业 ESG 表现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重点关注回归系数 α_1 ,若值显著大于 0,则企业 ESG 表现可以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模型(4)的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模型(5)和模型(6),模型(5)将模型(4)中的被解释变量替换为融资约束,研究企业 ESG 表现与融资约束之间的相关性;模型(6)在模型(4)的基础上加入中介变量,探讨企业 ESG 表现、融资约束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3 模型结果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 所示。样本总量为 15 554 个,LP 法测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值为 2.149,最小值为 1.345,最大值为 2.564,说明不同企业之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一定差异。ESG 的平均值为 4.122,最小值为 1,最大值为 8,说明不同企业之间的 ESG 表现存在较大差异。融资约束(FC)

的平均值为 0.341,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0.983,说明大多数企业都面临融资约束问题。通过控制变量的数值,发现 A 股上市公司在规模、盈利能力、经营状况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表 2 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	样本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TFP_LP	15554	2.149	0.133	1.345	2.564
TFP_OLS	15554	2.406	0.123	1.721	2.724
TFP_FE	15554	2.460	0.122	1.780	2.763
TFP_OP	15554	2.069	0.132	1.325	2.505
ESG	15554	4.122	1.094	1.000	8.000
FC	15554	0.341	0.258	0.000	0.983
SIZE	15554	8.018	1.354	2.197	13.223
AGE	15554	2.917	0.343	0.693	3.784
ROA	15554	0.037	0.130	-1.683	10.032
CIR	15554	0.628	0.739	-2.423	7.475
LEV	15554	-0.805	0.534	-4.250	2.618

3.2 回归分析

3.2.1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ESG 表现、融资约束与全要素生产率回归结果

变量	(1) TFP_LP	(2) TFP_LP
ESG	0.008*** (11.805)	0.004*** (9.189)
SIZE		0.028*** (43.959)
AGE		0.132*** (91.492)
ROA		0.018*** (6.564)
CIR		-0.092*** (-101.101)
LEV		0.010*** (8.777)
_cons	2.116*** (744.327)	1.591*** (280.256)
N	15554	15554
R ²	0.010	0.617
F	139.350	3881.422

注:*** $p < 0.01$,** $p < 0.05$,* $p < 0.10$ 。

表 3 中列(1)为未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列(2)为加入全部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可知,无

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ESG 表现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均显著为正, R^2 由 0.01 增加到 0.617,进一步验证了模型的合理性。ESG 的系数为 0.004,表明良好的 ESG 表现可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3.2.2 稳健性检验

替换被解释变量。考虑到单一的变量测算方法可能带来的计算误差,为进一步验证企业 ESG 表现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分别采用 OLS 法、FE 法和 OP 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回归结果如表 4 中的第(1)、(2)、(3)列所示。替换被解释变量后,ESG 表现与全要素生产率的系数分别为 0.003、0.003 和 0.005,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因此 ESG 表现对全要素生产率主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将 ESG 表现滞后一期(DES_g)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4 中的第(4)、(5)、(6)列所示,第(5)列为未添加中介变量融资约束的回归结果,第(6)列为添加融资约束的回归结果。由回归结果可知,滞后一期的 ESG 表现的回归系数与前文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说明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后,回归结果依旧稳健。

3.2.3 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

“ESG 表现-融资约束-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列(1)为自变量、控制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企业 ESG 表现与融资约束系数为 -0.001,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良好的 ESG 表现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问题。列(2)为加入自变量、控制变量和

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回归结果,ESG 表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 1% 的水平上仍显著正相关,说明融资约束在 ESG 表现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起到部分

中介效应。良好的 ESG 表现可以改善企业 and 经济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有效缓解融资约束情况,有利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表 4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TFP_OLS	(2) TFP_FE	(3) TFP_OP	(4) ESG	(5) TFP_LP	(6) TFP_LP
ESG	0.003 *** (9.380)	0.003 *** (9.294)	0.005 *** (9.731)			
DESG				0.342 *** (41.830)	0.003 *** (7.531)	0.003 *** (7.557)
SIZE	0.034 *** (64.497)	0.037 *** (72.336)	-0.001 (-1.086)		0.028 *** (42.063)	0.025 *** (37.221)
AGE	0.118 *** (97.108)	0.114 *** (96.852)	0.164 *** (98.792)		0.132 *** (83.347)	0.128 *** (82.126)
ROA	0.014 *** (6.324)	0.014 *** (6.274)	0.019 *** (6.031)		0.015 *** (5.820)	0.015 *** (5.999)
CIR	-0.069 *** (-90.209)	-0.066 *** (-88.291)	-0.094 *** (-89.709)		-0.091 *** (-99.618)	-0.094 *** (-103.868)
LEV	0.012 *** (12.299)	0.012 *** (12.641)	0.016 *** (11.805)		0.011 *** (9.722)	0.000 (0.399)
FC						-0.056 *** (-23.950)
_cons	1.824 *** (379.506)	1.865 *** (401.226)	1.647 *** (250.886)	2.710 *** (79.088)	1.594 *** (257.122)	1.643 *** (256.467)
N	15554	15554	15554	14443	14443	14443
R2	0.652	0.665	0.536	0.116	0.604	0.620
F	4508.196	4769.603	2781.796	1749.756	3385.251	3108.275

注:*** $p<.01$ ","** $p<.05$ ","* $p<.10$

表 5 融资约束的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1) FC	(2) TFP_LP
ESG	-0.001 *** (-0.418)	0.004 *** (9.328)
SIZE	-0.059 *** (-27.251)	0.024 *** (37.922)
AGE	-0.106 *** (-21.283)	0.125 *** (87.621)
ROA	0.006 (0.679)	0.018 *** (6.886)
CIR	-0.048 *** (-15.209)	-0.095 *** (-106.285)
LEV	-0.191 *** (-48.349)	-0.002 * (-1.845)

FC		-0.064 *** (-27.312)
_cons	1.004 *** (51.226)	1.656 *** (275.083)
N	15554	15554
R ²	0.254	0.636
F	817.811	3605.170

注:*** $p<0.01$,** $p<0.05$,* $p<0.10$ 。

3.3 异质性分析

3.3.1 产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

产权性质的差异可能会带来企业 ESG 表现的异质性。国有企业因其特殊性,理应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投资者预期 ESG 表现好,可能对其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明显促进效果。本文首先按照企业的

产权性质进行分组回归,如表 6 所示。ESG 表现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均显著,这意味着良好的 ESG 表现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均有促进作用,而国有企业 ESG 表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略强,可能是因为国有企业强化了 ESG 表现的信号效应,有助于获得投资者的信任,从而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3.3.2 企业规模的异质性分析

由于不同规模的企业在外部竞争优势、内部管理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

面对 ESG 表现冲击的影响可能不同。本文参考刘金科、肖翊阳的研究,根据企业总资产对数值的中位数将样本数据分为两组,大于中位数的为大型企业,反之为中小型企业^[23]。研究发现,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企业的 ESG 表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显著,且中小型企业的影响效应更强。这可能是因为中小型企业相对于大型企业在融资方面存在劣势,而中小型企业 ESG 表现好,有利于提振投资者信心,缓解融资约束,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

表 6 产权性质和企业规模的异质性

变量	TFP_LP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大型企业	中小型企业
ESG	0.004*** (8.560)	0.003*** (4.734)	0.002*** (6.178)	0.006*** (8.048)
_cons	1.637*** (234.520)	1.525*** (161.270)	1.579*** (190.652)	1.620*** (170.830)
N	9800	5754	7779	7775
R ²	0.617	0.635	0.693	0.580
F	2443.196	1544.367	2639.883	1608.229

注:*** $p < 0.01$,** $p < 0.05$,* $p < 0.10$ 。

3.3.3 所属行业的异质性分析

所属行业也是影响 ESG 表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对样本数据按照上市公司门类进行细分,取样本数量前六的门类进行回归,如表 7 所示。六大门类的 ESG 表现均在 5% 的水平上正向显著,表明 ESG 表现可以有效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的提升。其中房地产行业 ESG 的系数显著大于其他行业,促进效果更明显。信息运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以及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的 ESG 系数分别为 0.007 和 0.006,均在 1% 的水平上正向显著,ESG 表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较好。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采矿业的 ESG 系数均为 0.004,促进作用相对较小。

表 7 所属行业的异质性

变量	TFP_LP					
	制造业	批发和零售业	房地产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采矿业
ESG	0.004*** (7.834)	0.004** (2.262)	0.013*** (5.914)	0.007*** (2.756)	0.006*** (2.685)	0.004** (2.364)
_cons	1.545*** (221.949)	1.674*** (71.966)	1.731*** (64.201)	1.413*** (44.964)	1.449*** (50.346)	1.484*** (49.027)
N	9184	1176	980	770	700	560
R ²	0.661	0.578	0.597	0.556	0.590	0.753
F	2768.039	247.568	223.654	148.115	154.402	261.477

注:*** $p < 0.01$,** $p < 0.05$,* $p < 0.10$ 。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ESG 表现是衡量企业环境、社会责任和企业治理的重要指标,也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衡量标准。本文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以融资约束为中介,采用 2009-2022 年微观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企业 ESG 表现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良好的企业 ESG 表现可以有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融资效率,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此外,异质性分析表明,ESG 表现在国有企业、中小企业和房地产行业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效果更显著。

基于本文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首先,企业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必须重视 ESG 的实践,提高环境保护及社会责任意识,实现可持续发展;其次,充分了解并发挥融资约束的中介作用,利用好融资工具,降低融资成本,提高企业运营效率,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实现高质量发展。此外,政府部门应坚持新发展理念,深刻把握新发展阶段企业的需求,在制定环保政策、财政税收政策时注意考虑企业的异质性特征。针对不同类型、不同行业给予特定的政策支持,优化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鼓励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张军. 资本形成、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中国的转轨特征[J]. 经济研究,2002(6):3-13,93.

[2] 孙广生,黄伟. 全要素生产率、投入替代与地区间的能源效率[J]. 经济研究,2012,47(9):99-112.

[3] 蔡跃洲,付一夫.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中的技术效应与结构效应——基于中国宏观和产业数据的测算及分解[J]. 经济研究,2017,52(1):72-88.

[4] OLLEY G S,PAKES A. The dynamics of productivity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industry[J]. Econometrica,1996,64(6):1263-1297.

[5] 王贵东. 1996-2013 年中国制造业企业 TFP 测算[J]. 中国经济问题,2018(4):88-99.

[6] LEVINSOHN J A,PETRIN A. Estimating production functions using inputs to control for unobservables[J].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2003,70(2):317-341.

[7] 刘莉亚,金正轩,何彦林,等. 生产效率驱动的并购——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微观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

学(季刊),2018,17(4):1329-1360.

[8] 范剑勇,冯猛,李方文. 产业集聚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 世界经济,2014,37(5):51-73.

[9] 王杰,刘斌. 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经验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2014(3):44-56.

[10] 罗良文,孙小宁. 金融发展对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研发投入投入的分析[J]. 江汉论坛,2020(1):31-39.

[11] 韩亚峰,李新安,杨蔚薇. 政府补贴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甄选效应和激励效应[J]. 南开经济研究,2022(2):120-137.

[12] 田巍,余淼杰. 企业生产率和企业“走出去”对外直接投资:基于企业层面数据的实证研究[J]. 经济学(季刊),2012,11(2):383-408.

[13] 高洁超,张越,范从来.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金融资产配置的视角[J]. 金融论坛,2022,27(12):9-19.

[14] 张前程,宋俊秀,张雨琴. 债务期限结构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 统计与信息论坛,2022,37(9):90-105.

[15] 邢劭思. 多个大股东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J]. 经济问题,2022(8):72-78.

[16] 杨向阳,李月月,徐从才. 数字化转型对流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J]. 商业经济与管理,2023(3):5-21.

[17] 王三兴,王子明. 企业 ESG 表现、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J]. 宏观经济研究,2023(11):62-74.

[18] 喻骅,葛军,陈良华. 环境不确定性、ESG 责任履行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 科学决策,2023(10):71-88.

[19] 盛明泉,余璐,王文兵. ESG 与家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J]. 财务研究,2022(2):58-67.

[20] 杜传忠,薛宇择. 研发联盟、开放式创新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4(10):1-20.

[21] 顾雷雷,王鸿宇. 社会信任、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J]. 社会科学文摘,2020(12):55-57.

[22] 黄先海,高亚兴. 数实产业技术融合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专利信息的研究[J]. 中国工业经济,2023(11):118-136.

[23] 刘金科,肖翊阳. 中国环境保护税与绿色创新:杠杆效应还是挤出效应? [J]. 经济研究,2022,57(1):72-88.

乡村振兴视域下凤阳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研究

李延¹, 李晓东^{2*}

(1. 安徽科技学院 农业管理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2. 安徽科技学院 人文学院, 安徽 滁州 233100)

摘要:基于乡村振兴战略, 聚焦凤阳县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这一领域的实践, 探讨了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和农业企业四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类型的培育现状, 针对当地政策、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问题, 提出可行性的培育措施: 完善政策扶持, 拓宽融资渠道, 加强农业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 加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 促进多产业融合发展。

关键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培育措施; 凤阳县; 农业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F3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297X(2025)03-0077-05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Cultivation of Fengyang Country under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LI Yan¹, LI Xiao-dong^{2*}

(1. School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Bengbu, 233030, Anhui;
2. School of Humanities,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uzhou, 233100, Anhui)

Abstract: Basing o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focuses on the practices of Fengyang county in cultivating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four types of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were analyzed such as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family farms, specialized large-scale households and agricultural enterprises. Feasible cultivation measures have been proposed to address issues related to local policies, funding, technology, and human resources. Specifically, policy support should be improved, financing channels should be expanded,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its applic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e training of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should be enhanced, and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ple industries should be promoted.

Key words: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cultivation measures; Fengyang county;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 现代农业的发展成为实现农村经济振兴的关键环节,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推动现代农业发展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这样的背景下,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应运而生, 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产业化龙头企业等类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采用土地流转、托管、入股等方式扩大经营范围, 优化资源配置, 以专

业化、集约化、规模化及组织化的生产方式, 减少生产成本, 推动整体效益增长^[1]。安徽省凤阳县作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发源地, 对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培育现状进行梳理分析, 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能够促进当地农业现代化进程, 促进城乡共同富裕。这既是对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具体响应, 也是探索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实践。

收稿日期: 2024-12-04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 新时代乡村振兴与互联网经济体的战略耦合及实现路径研究(AHSKY2020D65)。

作者简介: 李延(2001-), 女, 安徽滁州人, 硕士研究生; 李晓东(1975-), 男, 山西昔阳人, 副教授。E-mail: lixiaodong255@126.com

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可行性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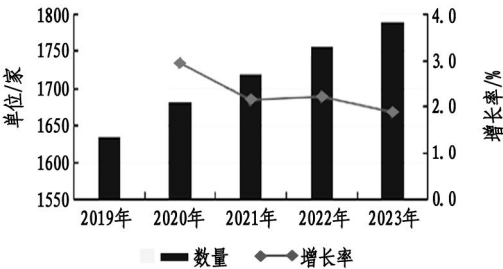
凤阳县有良好的农业生产自然条件与制度优势,作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源地,农业发展历史悠久,但在现代农业进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当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推动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23 年,凤阳县的地区生产总值约为 524.36 亿元人民币,经济总量成功突破 500 亿元大关,显示出强劲的经济实力和发展潜力;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 86.3 亿元,同比增长 5%,其中增加值达 52.4 亿元,同比增长 4.7%;粮食产量约为 85.1 万吨,油料产量 3.5 万吨,蔬菜产量 12.6 万吨;农业机械总动力 132.6 万千瓦,综合机械化水平(主要农作物)为 90.6%,农田水利建设加快,有效灌溉面积 61.06 千公顷,旱涝保收面积 45.16 千公顷^[2]。凤阳县的人口规模适中且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常住人口约为 63.9 万人,户籍人口约为 79.299 万人,为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力资源。

近年来凤阳县政府工作报告中不断强调,要持续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家庭农场和种粮大户,提质乡村产业发展。为促进当地农业发展,凤阳县政府致力于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发展质量。国家与各级政府对当地农业新型经营主体给予了一系列政策支持,加强农业科技研发与应用,提高科技水平,构建完善的社会服务支持网络。

2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模式与培育成效

2.1 农民专业合作社

早在 2006 年,农民专业合作社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凤阳县制定了《新农村建设实验区农民专业合作社促进办法(试行)》等政策,大力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其数量稳步增加,到 2023 年底,总数增至 1790 家,涵盖了 9 万多农户,这些社员相比非社员年均收入增长了 20% 以上^[3](见图 1)。



数据来源: 凤阳县2019-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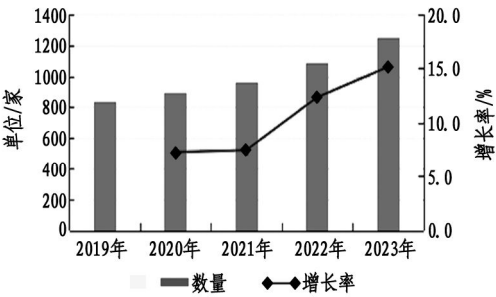
图1 凤阳县 2019 - 2023 年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情况

近年来,凤阳县积极支持农民成立专业合作社,建设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外出务工的农村居民提供了代耕、代种、代收等帮助,缓解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同时通过资源有效整合,搭建了新型农业综合服务平台,为该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包括农资直销、个性化施肥建议、技术培训等全方位服务。此外,政府还通过提供政策指导、资金支持和技术培训等措施,帮助合作社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提升农业经营规模,引进优良品种,提高市场竞争力^[4]。基于此,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长,服务模式不断创新,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逐步完善,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得到推广,有效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增收^[5]。

2.2 家庭农场

凤阳县的家庭农场经营模式多样,既有传统的种植、养殖模式,也有结合互联网销售、生态种养等新型模式。有的家庭农场利用电商平台销售农产品,拓宽了销售渠道,还有一些家庭农场采取“农场+农户”的形式,实行分散供种、标准喂养,统一收购、集体外销,在确保质量不降的前提下满足客户需求。此外,一些家庭农场注重品牌建设,通过注册商标、申请绿色食品认证等方式,提高农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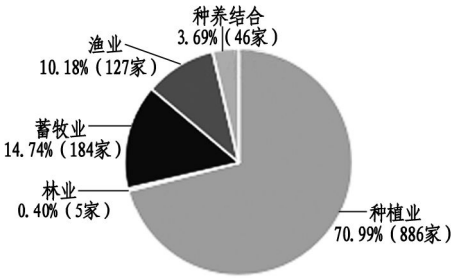
凤阳县家庭农场的发展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见图 2),小岗村村集体经济收入等实现六连增。至 2023 年底,该县已发展到 1248 家家家庭农场,3541 人从事该产业,农产品年销售额总计 3.3 亿元,家庭农场土地经营规模达到 8593 公顷^[6]。



数据来源: 凤阳县2019-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图2 凤阳县 2019 - 2023 年家庭农场数量情况

其中种植业 886 家,以水稻、玉米、小麦、大豆为主。林业 5 家,以园林景观苗木为主。畜牧业 184 家,以养猪、家禽、养牛业为主,渔业 127 家,以水产品为主,包括各种虾类、鱼类、甲鱼、螃蟹等。种养结合 46 家,以种植粮食和养殖相结合(见图 3)。



数据来源：凤阳县2023年重点工作推进情况汇报

图 3 凤阳县 2023 年家庭农场产业类型情况

2.3 专业大户

凤阳县农业专业大户的数量逐年增长,涵盖了粮食、蔬菜、水果、畜禽养殖等多个领域。农业专业大户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如无人机测量、智能灌溉系统、病虫害防治等,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率。例如,小岗村某种粮大户通过流转土地,扩大种植规模,引进优质稻种,提高水稻产量和品质,他还利用互联网在线电商平台分销生产出的农副产品,拓展销售途径,实现了增收致富^[7]。该地专业大户也积极探索产业链上下游的整合,通过与加工企业、销售平台建立合作关系,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例如,凤宝集团与种粮大户达成优质小麦的订购合同,拓宽了优质小麦的生产和销售渠道,增强了农户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2.4 农业企业

凤阳县重视引进和培育农业龙头企业,通过龙头企业的引领作用推动整个产业链条的发展。这些企业拥有较强的技术研发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能够有效连接生产和消费两端,为当地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通过订单农业等方式稳定农民收入。政府通过提供用地、税收优惠等政策支持,吸引优质企业落户凤阳。全县共有 45 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获得市级以上认证,具体分布为国家级 1 家、省级 12 家、市级 32 家,同时孵化了 9 个农业产业化联合体,其中包括 5 家省级联合体。

2.5 目前培育政策成效

从 2011 年起,凤阳县委县政府陆续推出了包括《凤阳县现代农业发展激励政策》(凤发[2011]13 号)和《凤阳县现代农业与乡村振兴发展激励政策》(凤政[2021]4 号)在内的一系列具有地域特色的政策措施,贯彻实施《凤阳县科技强农机械强农促进农民增收行动实施方案(2022-2025 年)》,县政府持续深化农村体制改革,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出台大量方针政策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每年约有 2000 万元财政预算被分配,用于激励在县

域内从事农业的大规模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实体,同时根据种粮面积发放一次性种粮补贴,调动种粮农民积极性,保障农民合理收益。

近年来,凤阳县持续将农业和农村发展置于首要位置,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对新阶段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行了整体规划,加快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重点培育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这两类经营主体,并支持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发展的总体要求。于 2023 年新培育家庭农场 164 家,总数达 1248 家;合作社 33 家,总数达 1790 家。培育市级示范经营主体 13 家,其中家庭农场 11 家,合作社 2 家。培育县级示范经营主体 30 家,其中家庭农场 20 家,合作社 10 家。得益于现代农业奖补政策的推动,凤阳县总铺镇的万亩“五色”水果和官塘镇凤淮村的千亩瓜蒌种植等 57 个特色主导产业基地已具规模,构建了以大户为引领、小户协同,大户经营、小户参与的农业转型发展新模式^[8]。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取得了明显进步,已经成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力量。

3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存在的问题

3.1 土地流转机制不畅与规模经营障碍

虽然凤阳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呈现出多元发展态势,但土地流转不够规范的问题仍然存在。凤阳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规模化发展也受限于此,如合同不规范、流转期限不稳定、价格不透明等,阻碍了农业经营规模的合理扩张,影响其长期投资和发展意愿^[9]。此外,农民对土地流转的保守态度进一步加剧了规模化经营的难度,影响了农业生产效率与效益的提升。凤阳县粮食生产规模化程度不高,与土地流转机制不完善、农业经营主体发展不足等因素有关,普遍存在实力弱、规模小、产品单一等问题,容易受到市场价格波动的影响,且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不健全,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与农户之间利益联结机制不稳定。

3.2 农产品销售渠道单一与品牌建设问题

一方面,农产品销售渠道传统化与单一化,传统销售渠道的局限性限制了农产品的市场覆盖范围,而新型销售渠道如电子商务的发展相对滞后,未能有效拓展市场空间。地区内部及与外部市场的连接性较差,运输成本高,农产品流通速度慢,新鲜度难以保证,限制了农产品销售^[10]。另一方面,部分经营主体缺乏品牌意识,不知道如何建立农产品品牌,

导致产品知名度不高,缺乏市场竞争力。大多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弱,难以通过扩大规模来降低成本,实现规模经济效益。

3.3 政策扶持体系与扶持力度不足

财政扶持是推动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的重要手段。尽管凤阳县政府出台多项政策扶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但政策扶持体系的整合性、衔接性与配套性仍有待加强。部分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脱节现象,导致政策效果未能充分发挥,且当地财政扶持力度不足限制了经营主体的扩张能力,影响了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同时,对于市场拓展、融资、信息等方面的实际需求缺乏支持,影响其发展的可持续性,财政支持体系的分散性与缺乏针对性,也影响了政策效果的发挥。

3.4 融资渠道狭窄与保险滞后

融资难是凤阳县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普遍面临的问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贷款时面临抵押物不足、贷款额度小、期限短、手续复杂等问题,且融资渠道狭窄,主要依赖自有资金。同时,农业保险体系不完善,风险补偿机制不健全,也制约其发展。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的网点布局稀疏,信贷产品设计未能充分考虑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和周期性特点,担保方式单一,抵押物范围狭窄^[11]。许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没有参加农业保险,或保险品种单一,且存在赔偿金额偏低、政府补贴不到位和理赔困难等问题。一旦遭遇自然灾害等风险,就会造成重大损失,加剧了其发展的不确定性。

3.5 基础设施落后与生产规模化程度不高

农机设备的高效利用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关键。凤阳县的农业灌溉系统多为早期建设,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老化,且缺乏持续的资金投入和有效维护管理,导致灌溉效率低下,影响了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大型水利设施失修、小型水利设施陈旧,部分地区地形条件差、交通不便、水源缺失导致农业生产成本较高,特别是对于需要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而言,这一问题尤其明显。凤阳县粮食生产规模化程度不高,影响了粮食生产提质增效,该地具有一定农机化硬件设施和装备实力,但存在使用率不高、资源未充分利用、农机设备配置不合理、维护保养不到位等问题。

4 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策分析

4.1 完善政策扶持体系,强化政策宣传与执行

制定和完善针对新型农村经营主体的扶持政策,包括财政补贴、税收优惠、金融贷款等,降低运营

成本,提高其市场竞争力。结合凤阳县实际,要细化土地流转、补贴、税收优惠等措施,创造有利发展环境。明确政策导向,鼓励规模性、集约性、标准性发展,减少开支,提高竞争力。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与农产品市场体系,提高规范化、标准化水平。加大政策的宣传力度,组织政策解读和培训,提高其政策获得感和满意度。加强对新型农村经营主体的监管和指导,确保合法合规经营,提高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2 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不断拓宽融资渠道

政府财政补贴对四种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类型的培育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要完善相关体制机制,实现精准有效补贴^[12]。鼓励凤阳县金融机构创新产品服务,提供小额信贷、农业保险、股权融资等服务,缓解融资难题。推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农业领域。在拓宽融资渠道的同时,降低融资成本,提高其融资效率,建立农村信用体系,降低其融资门槛,建立风险补偿机制,设立专项基金,减轻财务压力。

4.3 加强农业科技研发,推广现代农业技术

推动农业信息化建设,利用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构建智慧农业系统,对农田环境实时监控和智能调控,提升智能化水平。推广智能灌溉系统、无人机喷洒、作物生长监测系统现代技术,以及智能化、自动化机械设备,从而提高生产效率。推广精准农业技术,根据土壤、气候等条件进行精准施肥、灌溉和病虫害防治,提高农业生产效率^[13]。建立示范园区展示和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加强农业科技研发,鼓励支持农业科研机构、高校开展科技研发活动,攻克技术难题,推动成果转化,构建转化平台,缩短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的距离。

4.4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引进农业专业人才

加强人才的培养与引进,培养新型职业农民。鼓励农民返乡创业,带动凤阳县农村经济发展。依托安徽科技学院等院校、培训机构开展培训,提高经营管理和技术水平,培养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14]。实施人才激励措施,制定更加积极、开放的人才引进政策,吸引高素质农业人才到凤阳县工作,提高人员待遇,激发创新活力。构建人才施展舞台,改善成长发展环境,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和留住人才,建立农业人才库,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

4.5 发展特色农业与品牌建设,推动多产业融合

加强农产品品牌建设,支持凤阳县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创建特色农产品品牌。拓展电商、直播带货等销售渠道,拓宽分销途径,增加市场份额,提高市场竞争力。鼓励支持新型农村经营主体参加农产品博览会、展销会等活动,展示和推广农产品品牌。依托凤阳县特色农产品,如红心茶油、殷涧藤茶等,打造一批有影响力的农产品品牌。发展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等新业态,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向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等领域延伸,延长产业链,实现第一、二、三产业的协同发展。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上下游企业的合作,加强产业链协作,稳定供应链,推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孙月. 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问题研究[D]. 长春:吉林大学,2020.
- [2] 凤阳县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 http://www.sxfx.gov.cn/art/2024/4/16/art_3043_1738392.html.
- [3] 郭艳,姜勇. 农业产业结构现状与优化对策——以凤阳县为例[J]. 黑河学刊,2023(6):7-13.
- [4] 杨书苑,王学鹏. 乡村振兴视阈下安徽省凤阳县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研究[J]. 当代农村财经,2023(3):55-58.
- [5] 徐德明,鲁飞. 凤阳县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衔接调查

(上接第 57 页)加强身心体验、教育性景观建构增进文化认同,从而解决场所精神缺失、空间类型单一景观与社会美育脱节等问题。中国古典园林具有历史阶段性和地域多样性等基本特征,其基本风格的形成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必然经历了不断地多元融合和创新发展的过程。通过探究中唐士人元结的造园思想,可以管窥中唐时期士人园林的营建特色,发掘还原古典园林在中古时代下的兴造面貌,有利于我们对中国古代文人园林发展的整体脉络更加深入地了解,同时也可以为唐代园林复原和当代造园提供参考和指引。

参考文献:

- [1] 元结. 元次山集[M]. 孙望,校. 北京:中华书局,2022.
- [2]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卷 143[M]. 北京:中华书局,1975:4682.
- [3] 肖献军. 重订元次山年谱[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148.
- [4] 孙诗萌. 唐宋士人在永州的“山水营居”实践及对当地人居环境开发的作用[J]. 建筑史,2014(1):95-108.
- [5] 桂多荪. 浯溪志[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67.
- [6] 林广臻. 唐宋岭南州府园林研究[D]. 广州:华南理工

与建议[J]. 安徽农学通报,2023,29(2):10-13.

- [6] 丁忠明,冯德连,张廷海,等. 变迁与创新:乡村振兴战略的本土逻辑与高质量推进——兼论小岗村的乡村振兴实践[J]. 财贸研究,2021,32(4):55-69.
- [7] 刘同山,崔红志,孔祥智. 从“大包干”到现代农业发展:安徽凤阳县的经验与启示[J]. 中州学刊,2019(10):32-38.
- [8] 鲁飞,王书文,颜明利,等. 凤阳县特色水果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建议[J]. 安徽农学通报,2021,27(9):68-69,116.
- [9] 张晓山. 统筹谋划城乡发展深化农业领域改革——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问题重要论述的粗浅体会[J]. 中国农村经济,2016(10):7-11.
- [10] 王小广,钟颖. 金融支持民营经济发展长短策[J]. 农村金融研究,2019(2):9-13.
- [11] 刘守英,王志锋,张维凡,等. “以地谋发展”模式的衰竭——基于门槛回归模型的实证研究[J]. 管理世界,2020,36(6):80-92,119.
- [12] 夏雪. 金融创新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研究[D]. 合肥:安徽大学,2015.
- [13] 祝坤艳,蔚霖. 河南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23,44(2):232-240.
- [14] 许军辉. 安徽省凤阳县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对策研究[D]. 哈尔滨:东北农业大学,2021.

大学,2019:118.

- [7] 黄山长. 中日千年接力考证元结连州《海阳湖》组诗[J]. 岭南文史,2018(2):11-19.
- [8] 葛承雍. 华夏文化的丰碑:唐都建筑风貌[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118-119.
- [9] 肖献军. 论元结的“漫家”思想及其思想史意义[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4):177-184.
- [10] 周玉华. 论元结、柳宗元山水游记的文化精神[J]. 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0(3):69-72.
- [11] 周玉华. 浅论元结的山水观[J]. 学习月刊,2008(24):32-33.
- [12] 彭小乐. 论唐代鲜卑族后裔元结山川铭的道德劝诫[J]. 贵州民族研究,2017,38(11):194-197.
- [13] 张官妹. 试论元结柳宗元的园林思想对湘南古村建设的影响[J].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0,31(11):59-60.
- [14] 翟艳,张梦娇,孙亚男. 环境心理学视阈下城市商业街景观之设计[J]. 学术交流,2013(6):184-186.
- [15] 刘宁. 从刘禹锡《海阳十咏》看地方公共园林书写的诗文之异[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162-172,208.
- [16] 杨军,王俊喆. 公园景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研究——以桂林象山景区为例[J]. 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2(2):21-31.

红色文化解说中语篇元话语的元语用分析

宋彬彬

(滁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 安徽 滁州 239000)

摘要:以大别山红色文化解说词为研究语料,从元语用视角对红色文化解说词中语篇元话语的使用情况及其反映的元语用意识进行探讨,发现红色文化解说员使用了话题提示、语篇阶段/框架、信息预告、语篇连接、语篇参与等五类语篇元话语,体现出解说员注重理清解说内容的逻辑关系、确保解说话题和解说进程清晰明了、承诺进行疑惑解答或信息补充、重视语篇参与管理的元语用意识,研究以为红色文化解说员提升解说语篇的组织能力和管理会话参与能力提供一定的启发。

关键词:语篇元话语;元语用;红色文化解说词

中图分类号:G249.27;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3-0082-05

Metapragmatic Analysis of Discourse-oriented Metadiscourse in Red Culture Commentary

SONG Bin-b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uzhou University, Chuzhou, 239000, Anhui)

Abstract: The red culture commentary in the Dabie Mountains region was used as the research corpus in this paper, and the use of discourse-oriented metadiscourse in red culture commentary was explored from a metapragmatic perspective. Besides, the underlying metapragmatic awareness was analyzed. It found that discourse-oriented metadiscourse such as topic markers, frame markers, predicators, transitions, and engagement markers were used, which reflect red culture commentators' metapragmatic awareness of clarifying the logical relationship within the commentary discourse, ensuring the clarity of the commentary topic and process, promising to tackle confusion or supplement information, and emphasizing discourse participation management. It was hoped to provide some inspiration for red culture commentators to enhance their organizational skills in red culture commentary and their ability to manage conversation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discourse-oriented metadiscourse; metapragmatics; red culture commentary

元话语是说话人/作者用来管理和组织话语、标识其对命题信息或听者/读者态度和立场的重要语言资源^[1]。语篇元话语是元话语的一种类型,包括提示话题类、标示语篇结构/框架类、信息预告类、语篇连接类和参与类元话语,反映出说话人/作者关于会话参与或语篇组织的元语用意识^[2],能增强语篇的逻辑性、条理性、引导性和互动性。元语用是语言使用者对语言使用本身的一种自反意识,决定和影

响着语言使用者的元话语选择^[2]。也就是说,在交际过程中,语言使用者会在自己元语用意识的支配下,选择使用相应的元话语手段进行语篇组织和人际互动。语篇元话语恰恰是说话人/作者关于会话参与或语篇组织的元语用意识的具体话语表现。

红色文化解说的主要目的是让听众了解某一地方的红色文化,产生情感共鸣,激发干事创业的热情和决心。众所周知,一场实地红色文化解说常常持

续二三十分钟,甚至更长时间,因此语篇信息量较大,解说员必须注重整个解说语篇的逻辑性、条理性和互动性,以便帮助听众更好地理解信息,与解说员产生互动。探讨红色文化解说词中使用的语篇元话语及其体现的元语用意识,能帮助我们深度了解解说员如何进行语篇组织和会话参与维持,并实现成功解说。然而通过检索文献发现,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红色文化的翻译与对外传播^[3-5]、话语体系构建与传播^[6-7]等方面,鲜有从元话语与元语用方面进行研究尝试。

有鉴于此,本研究以大别山红色文化解说词为研究语料,从元语用视角对红色文化解说词中语篇元话语使用情况及反映的解说员的元语用意识进行探讨,旨在丰富相关文献研究,助益红色文化解说效果的提升。

1 语料来源与处理

研究者以实地走访的形式参观了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黄麻起义和鄂豫皖苏区纪念馆、金寨县革命博物馆、大别山革命历史纪念馆等四个大别山区域红色教育基地,邀请8名优秀解说员对所在基地的红色文化进行解说(每个基地2名解说员,由基地相关负责人根据解说员的业务能力进行推荐)。研究者在征得解说员同意的前提下,对其解说词进行录音,录音总时长为355分钟(每位解说员解说时长不等)。并对解说音频进行文字转码,得到文字语料71520字。

鉴于元话语识别的语境依赖性^[2],本研究采用人工识别方式,对语料中语篇元话语进行人工识别,剔除不充当元话语功能的语言标记,例如连接两个名词而非小句的“和”“或”。在此基础上,统计出整个语料中语篇元话语总数及其各个子类标记语的使用数量和比重。

2 元话语分类

关于语篇元话语的分类,不同研究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尝试。例如,Hyland认为,过渡标记语(but, and, so)、框架标记语(my purpose is, to conclude, firstly, secondly, finally)、内指标记语(see above, as mentioned in Chapter 3,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证据来源标记语(according to XXX, XXX said)、语码注释标记语(such as, in other words, namely)都可以用来组织语篇,引导读者按照作者期待的方式去解读语篇信息,并将这五类元话语称为交互式元话语^[1]。

李秀明对汉语元话语标记的分类基本参考了Hyland关于元话语的功能分类方法。他将汉语元话语分为语篇功能元话语和人际功能元话语两大类。其中语篇功能元话语充当组织话语、调控言语行为的作用,包括四小类,即话题结构标记语(话说、上回说到、其次、最后)、衔接连贯标记语(由此可见、推而广之、无独有偶、话又说回来、顺便说一句)、证据来源标记语(据悉、诚如……所言、正如……说的好)、注释说明标记语(即、也就是说、换句话说)^[8]。与Hyland的分类不同的是,为了方便分析元话语在具体文本中的使用情况,李秀明将Hyland元话语分类中的内指标记语并入了衔接连贯标记语之中。

陈新仁基于元语用相关理论将元话语分为七类,其中的语篇元话语是说话人/作者关于会话参与提示或语篇组织的元语用意识的体现。语篇元话语包括五个子类,分别是话题提示类标记语(My topic/focus today is ..., by the way)、语篇阶段或框架标记语(firstly, secondly, at last, in Section 2)、预告后文信息标记语(in the following section)、凸显语篇连接标记语(however, therefore, in addition, meanwhile)、表达参与和提请或阻止对方参与标记语(Let me say a few words, Note that..., Please listen/look at..., Shut up)^[2]。

为了便于对大别山红色文化解说词中的语篇元话语进行元语用分析,本研究采用陈新仁的分类办法,对大别山红色文化解说词中的语篇元话语进行分类(见表1)。第一类为提示话题类语篇元话语(现在所看到的是……、下面要讲解/介绍的是……、让我们一起走进……),用于标示解说员即将开始某一话题的讲解或转换话题;第二类为语篇阶段/框架类元话语(首先、接下来、下面、最后、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用于提示解说内容进行的阶段或先后次序,为听众提供清晰的信息解读框架;第三类为信息预告类语篇元话语(后面会讲到……、后面会介绍……),旨在告知听众后面将会听到他们想要听到的信息,降低当前阶段因信息不足而产生的焦虑;第四类是语篇连接类元话语(然而、因此、但是、如果),用以标示语篇内部上下文之间的逻辑关系,使得整个篇章衔接有序;第五类为参与类语篇元话语(让我们一起……、请看这边、请这边走、请注意……、让我们结束……),表达解说员积极争取参与会话的意愿,以及邀请或阻止听众参与会话,实现或关闭互动交流的想法。

这五类语篇元话语的使用有利于引导听众理解

红色文化解说词内部的逻辑关系,使听众清楚地知道解说的话题以及解说内容的先后次序,并按照解说员的期待积极参与解说过程。

3 红色文化解说词中语篇元话语使用情况

研究发现,所整理的大别山红色文化解说词中共有语篇元话语 593 个,每千字约 8.29 个。表 1 显

表 1 各类语篇元话语的数量与百分比

类别	功能	实例	数量/篇	占比/%
提示话题	提示话题选择、转换或走题	现在所看到的是……、下面要讲解/介绍的是……、让我们一起走进……	106	17.88
标示语篇阶段或框架	标示语篇进行的阶段或框架	首先、接下来、下面、最后、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展厅一、展厅二	150	25.29
预告信息	预告后文信息	后面会讲到……、后面会介绍……	10	1.69
凸显语篇连接	凸显语篇内部的逻辑关系	然而、因此、但是、如果	260	43.84
提请或阻止参与	提请或阻止参与语篇交际	让我们一起……、请看这边、请这边走、请注意……、让我们结束……	67	11.29

进一步分析语料发现,语料中使用比重最高的语篇连接类元话语主要用于介绍红色革命战争等前因后果(由于、因此),对比战争的预期结果与实际结果(然而、但是),组织和附加关联的解说信息(不仅、而且、并且、除了……之外)等;语篇阶段或框架类语篇元话语主要用于提示听众将要解说的红色文化内容的先后顺序和并列关系,以及解说语篇发展的进程(首先、接下来、最后、展厅一、展厅二);提示话题类语篇元话语主要用来引出解说员要解说的话题/内容(现在所看到的是……、下面要讲解/介绍的是……、让我们一起走进……),引导听众跟着讲解员的思路和节奏了解和感知红色文化;参与类语篇元话语主要用来邀请听众一起参观某个红色文化展区、了解某个红色历史事件或人物、参观某件历史文物等,或提醒听众注意身体位置的移动变化(请看这边、请这边走、请注意……),呼吁听众表达某种情感或采取某种行动(让我们一起……,让我们高举……),以及提醒听众解说即将结束(让我们结束……);预告信息类语篇元话语使用较少,主要用来预示解说员在后面要介绍的新的红色文化信息,或对前面已提及的信息做更为详尽的补充(后面会讲到……、后面会介绍……)。

以上语料使用体现大别山红色文化解说员在讲解过程中注重理清解说内容的逻辑关系,确保解说话题和解说进程清晰明了,承诺进行疑惑解答或信息补充,以及重视语篇参与管理的元语用意识。

示,语篇连接类元话语所占的比重最高,为 43.84%,其次是语篇阶段或框架类元话语,为 25.29%。接下来,分别是提示话题类语篇元话语(17.88%)和提请或阻止参与类语篇元话语(11.29%)。使用最少的是预告信息类语篇元话语,比重仅为 1.69%。

4 语篇元话语背后的元语用

如上所述,一场红色文化解说往往信息量较大,为了达到理想的解说效果,解说员在解说过程中,必须关注语篇的组织,以使得信息交流通畅、有效。

4.1 注重理清解说内容逻辑关系的意识

语篇内部的逻辑关系对于语篇理解和意义构建十分重要。尽管汉语的逻辑关系“常常隐设在上下文中,靠人们意会得之”^[9],但这并非说汉语语篇中完全不需要有逻辑连接词。事实上,在汉语语篇中,逻辑关系连接词的恰当使用有助于引导读者更好地理解上下文之间的语义关系,减轻理解信息时所付出的心力,使整个语篇意义的构建顺畅、清晰^[10]。通过使用恰当的语篇连接元话语,帮助听众明确语篇内部上下文之间的来龙去脉,从而更加畅通地理解红色文化。

(1)为了给反动派更大的打击,其余武装决定乘胜追击,攻打商城县城。然而,想要攻下县城谈何容易?

(2)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金寨是立夏节起义的爆发地和六霍起义的主要区域,是……,抗日战争初期,金寨是……,解放战争时期,……,因此,金寨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

(3)在我们纪念馆里,留下姓名、有名可查的烈士是 11 000 多名,而除此之外,还有 9000 多无名之烈士。

(4)1930年6月,鄂豫皖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胜利召开,鄂豫皖苏区红色政权就此建立了起来,给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鄂豫皖边区人民带来一缕希望的同时,也让政权建立者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例(1)中“然而”这一元话语凸显了前后信息的强烈转折,让听众对解说员接下来要说的内容做出了心理预判。例(2)中解说员正介绍金寨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性,使用“因此”这一连接元话语,是对前面所说的金寨在中国革命各个历史时期重要地位的总结和强调,能够引导听众正确认识金寨县在中国红色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例(3)中“除此之外”这一元话语的使用有利于引起听众对附加信息的注意,提醒听众不仅要记住大量有名有姓的烈士,还要记住那些为革命流血牺牲的无名烈士。例(4)中“的同时”和“也”元话语的使用表明前后信息所描述的情况是一种并存的关系,即“希望”与“考验”同时存在,引导听众客观看待新建立的红色政权所发挥的作用和存在的困难。

上述例子表明,大别山红色文化解说员善于通过使用语篇连接元话语,揭示解说词前后文之间的并列、转折、总结、附加关系,引导听众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预测、注意和充分理解解说信息。解说员通过逻辑关系的展示,能够满足听众的理性诉求^[11]。

4.2 确保解说话题和解说进程清晰明了的意识

在信息传递过程中,为了达到理想的传播效果,作者/说话人在说话时有必要使用一定的语言手段,明示话题的引入、转移、结束以及语篇的进程或框架,对话语进行合理组织和解释,提醒听众解说内容走向,为受众理解提供指引和帮助,吸引其倾听^[12-13]。红色文化解说语篇也不例外。为了达到理想的解说效果,解说员有必要在合适的地方使用话题提示和进程转换元话语。研究发现,大别山红色文化解说中使用了相应的话题提示类元话语和信息进程或框架元话语,这体现出了解说员努力确保解说话题和进程清晰明了的元语用意识。

(5)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感受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岁月。

(6)今天很高兴能为大家解说,下面来给大家讲述红军皇麻起义的历史事件。

(7)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形势图,那大别山呢,是位于鄂豫皖的三省交界处,独特的地理位置,在江淮之间形成了一道天然屏障。

例(5)至例(7)中划线部分的语言皆为话题提示类元话语,常常出现在红色文化解说词的开头或中间位置,帮助解说员引入本次讲解的话题或用于

切换到另一个主题的讲解,发挥话题导入或话题“路标”作用^[14]。解说员通过使用这些元话语对话题进行突显,能够实现提醒和引导听众注意接下来所要听到的红色主题和内容的目的。

(8)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辉煌历史部分的展览内容。

(9)整个展厅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风气潮流……,第二部分,星火燎原……,接下来,我们了解的是第三部分内容,辉煌苏区。

(10)该馆藏品主要是革命文物,总数为407件。主要种类有:一、军事用品,如列宁号飞机、大刀、长矛、枪支、红军旗帜等;二、珍贵文献资料,如党政机关的报告、法令、政策及传单、标语等;三、著名烈士遗物;四、珍贵历史照片;五、其他珍贵文物,如各级苏维埃印章、钱币、收税凭单、储蓄证、收条、土地证等。

例(8)和例(9)中“首先”“接下来”两个元话语有利于引导听众按照解说员事先安排好的解说主题或解说路线的先后顺序来了解红色文化内容,使整个解说富有次序性。例(9)和例(10)中“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一”至“五”几个元话语清楚地罗列了鄂豫皖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不同展厅的展示主题和内容、纪念馆馆藏品的种类,有利于引导听众对各展览部分的主题和内容以及馆藏品的类别进行区分。此外,通过使用这种框架式、次序性的标记语,可以使得整个解说条理清晰、十分有序,减少听众的认知负荷,实现更好的解说效果。

4.3 承诺进行疑惑解答或信息补充的意识

在语篇交际过程中,读者/听者往往因背景知识不够或者作者/说话者在当前阶段的解释不足而产生困惑,进而影响到对整个语篇的理解。为此,作者/说话人在说话时,需要充分考虑读者/听者的信息需求,并承诺在合适的会话阶段为读者/听者提供后续解惑答疑和信息补充的机会,使得听众不会因为一时的信息不足而产生放弃继续参与会话的念头,确保话语进程的顺利完成。

(11)我们在后面会了解到,我们的队伍通过此次会议之后,是如何继续坚持武装斗争、取得战役胜利的。

(12)后面我们会去往一间不平凡的房间,相信大家走进的时候都心潮澎湃,激动不已。

例(11)是鄂豫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正在向听众介绍1933年中共鄂豫皖省委决定组建红二十八军、使其继续坚持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的历史。由于该部分是看图讲解,所要讲解的信

息在另外一个展厅有相应的音像资料,因此讲解员在该部分并没有急于讲解,而是说后面会提到具体的战斗故事。讲解员使用“我们在后面会了解到”这一元话语体现出了解说员所做的承诺,有利于澄清在该阶段不予讲解的理由,同时也为听众留下了悬念,满足了听众对具体战斗故事情景的好奇。例(12)中“后面我们会去往”元话语预告了在接下来将要解说的关于“一间不平凡的房子”的故事,能够调动听众的好奇心和注意力。

4.4 重视语篇参与管理的意识

语篇参与管理是指语篇意义构建者在构建语篇意义时,通过使用一些语言或非语言手段,实现对语篇参与者(如作者/说话者、读者/听者)的管理,包括提请参与或阻止参与。相关研究者曾指出,一些在形式上看似独白的语篇(如演讲),在本质上具有对话性和互动性^[15]。红色文化解说语篇也是如此,它在形式上看似解说员的“独白”,但在本质上却是解说员与听众实现互动交流、共同构建语篇意义的过程。因此解说员需要具备管理个人和听众的参与的意识,一方面,通过使用一些提请参与的话语标记,突显自己想要参与或邀请听众积极参与的意愿,使自己 and 听众积极参与到语篇情境中来;另一方面,在必要的时候,及时使用阻止参与的话语标记,提示当前阶段语篇意义建构的结束。

(13)下面请让我为大家一一作介绍。

(14)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鄂豫皖苏区首府博物馆,探访文物古迹,触摸历史文化吧。

(15)请大家看后方,后方就是我们苏家埠战役的场景。

(16)让我们结束今天的讲解吧。谢谢大家!

例(13)中“请让我”用于解说员提请听众允许自己进行解说,表达了自己迫切希望为听众进行解说的意愿,也体现出解说员的礼貌和对听众的尊重。例(14)和例(15)中划线的两个元话语用来引导或要求听众注意视觉和行动的变化,从而跟着解说员的解说思路一起去了解相关红色文化知识。例(16)中“让我们结束”提示听众本次讲解内容的结束,听众将从聆听红色文化解说的情境之中走出来,进入到其他情境的意义建构中去。

5 结论

通过对大别山红色文化解说词中的语篇元话语的使用情况和体现的元语用意识进行研究,发现红色文化解说词中使用了话题提示类、语篇阶段/框架

类、信息预告类、语篇连接类、语篇参与类元话语标记,体现出解说员注重理清解说内容的逻辑关系、确保解说话题和解说进程清晰明了、承诺进行疑惑解答或信息补充、重视语篇参与管理的元语用意识。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对元话语和元语用的认识,为红色文化解说员提升解说语篇的组织能力和管理会话参与能力提供一定的启发。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扩大研究语料,进一步梳理红色文化解说词中各类语篇元话语的高频固化表达,为新手解说员提供学习借鉴。

参考文献:

- [1] HYLAND K. Disciplinary interactions: Metadiscourse in L2 postgraduate writing[J]. 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 2004(13): 133 - 151.
- [2] 陈新仁. 基于元语用的元话语分类新拟[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0(4): 1 - 11.
- [3] 郭磊, 吴赟, 牟宜武. 中国红色文化的多模态翻译传播研究[J]. 兰州交通大学学报, 2021(3): 116 - 123.
- [4] 刘艳华, 曹静.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辽宁省红色文化资源英译研究[J]. 辽宁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1(5): 74 - 76.
- [5] 李小春. 红色文化对外翻译出版: 意义特征、挑战及优化策略[J]. 中国出版, 2024(1): 57 - 60.
- [6] 刘建平, 莫丹华. 实然·必然·应然: 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话语体系建构的三重逻辑[J]. 求索, 2021(6): 29 - 36.
- [7] 毛延生, 喻倩. 中国红色文化话语传播新解: 文化语用学视角[J].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0(1): 33 - 38.
- [8] 李秀明. 汉语元话语标记研究[D]. 上海: 复旦大学, 2006: 78.
- [9] 娄成英. 形合与意合: 英汉语篇衔接的对比[J].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2): 57 - 61.
- [10] 彭一平, 胡韧奋, 吴继峰. 汉语语篇衔接特征的自动分析和应用研究[J]. 语言文字应用, 2023(1): 114 - 129.
- [11] 朱妍. 民初胡适演讲的舆论传播形态: 话语修辞、说理意识、公共空间[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6): 190 - 197, 221.
- [12] 王颖频. 中德领导人新年致辞语篇的元话语特征对比研究[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1): 116 - 128.
- [13] 王伟. 新媒体科普话语亲近性构建: 基于 TED 演讲语篇的词块研究[J]. 外语教学, 2024(4): 46 - 52.
- [14] 郭红伟, 卢加伟. 教师课堂元话语多维功能对比研究[J]. 现代外语, 2020(2): 248 - 259.
- [15] 姜晖. TED 演讲中受众元话语的元语用分析[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20(4): 25 - 35, 147.

少数民族诗歌韵律英译研究

罗慧凡

(丽江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 云南 丽江 674100)

摘要:少数民族诗歌韵律有着独特的民族性和地域性、鲜明的节奏、丰富多样的类型,用韵比较灵活。各个民族韵律各不相同,但是头韵、腰韵和尾韵是大部分民族诗歌都具有的韵律。以民族诗歌的汉译本为例,探讨其韵律翻译模式,对普遍存在的头韵、腰韵、尾韵进行详细分析,探讨其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力图找到其共性和特性以及存在的问题和提升对策。

关键词:少数民族诗歌;韵律;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3-0087-06

Study on Rhythm Translation of Poetry of Ethnic Groups

LUO Hui-f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ijiang Normal University, Lijiang, 674100, Yunnan)

Abstract: The rhythm of ethnic poetry possesses its own unique characteristics, mainly manifested in its distinctive ethnicity and regionalism, distinct rhythm, diverse types and flexible use of rhyme. Each ethnic group has its unique rhythm, whereas three types including alliteration, end rhythm and middle-rhythm are most frequently used in ethnic poetries. According to case study of Chinese version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hythms were analyzed in detail and thei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methods were explored in order to find ou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problems and solutions in the course of ethnic poem translation.

Key words: poetry of ethnic groups; rhythm; translation

近年来,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我国少数民族诗歌外译研究备受关注,从文化到文本,学界对民族诗歌的外译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探讨。在少数民族诗歌翻译实践中,韵律翻译是一个重点和难点。韵律体现了诗歌音乐美的特征,是衡量诗歌水平的一个标准。基于独有的语言、风俗和文化背景,少数民族诗歌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情感,具有抑扬顿挫、跌宕起伏的音乐性特征,其韵律表现形式丰富多样,各不相同。但是在纷繁芜杂的多样性中,可以找到共性和规律。正如王宏印所说,要把不同民族的资料加以比照,加以联系,可能在民族关系中建立新的更大范围的逻辑架构和参照联系,形成综合性的宏观图景为建立中华民族总体文化典籍提

供资料、思路 and 理论^[1]。目前少数民族诗歌的外译主要是汉语文本的外译,其韵律翻译经过了源语文本到汉语文本再到英语文本的过程,本文主要讨论民族诗歌的汉译本,分析其韵律特点、韵律翻译模式,对普遍存在的头韵、腰韵、尾韵翻译进行详细分析,探讨其翻译策略和方法,剖析问题并提出对策,以促进译作质量的提升。

1 少数民族诗歌的韵律特点

诗歌语言的音乐美特征,主要是由诗歌的韵律和节奏决定的。英诗节奏犹如音乐的节拍,由重读音节和非重读音节来区分。英诗的韵律有着音步的抑扬变化,对每行的音步数也有规定。英诗音步讲

收稿日期:2025-01-03

基金项目: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PY202316)。

作者简介:罗慧凡(1980-),女,云南永胜人,副教授,硕士。E-mail:741399069@qq.com

究轻重音节搭配,而汉语诗歌不受这种限制。汉诗格律也包含押韵和节奏,汉诗的格律主要表现有四大要素:用韵、平仄、对仗、字数。汉语律诗要求最为严格,必须满足全部要素。近体诗中的绝句以及词、散曲一般不需要对仗。古体诗相对最为宽松,用韵一般不严格。

少数民族诗歌汉译本和汉语诗歌在韵律、主题、形式、表达方式、文化背景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不同,这些差异反映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化特征。少数民族诗歌在音韵方面具有显著特点。第一,少数民族诗歌韵律类型比较丰富。颜晓英从韵律的角度,对壮族史诗《布洛陀史诗》的翻译进行分析,总结了几种韵律,分别是:腰脚韵、腰头韵、头脚韵、尾韵、腰韵、首韵、头韵等。贺大卫和李一鸣分别对腰脚韵做了界定。刘雪芹以壮族嘹歌为分析对象,指出除了有腰脚韵外,还有头脚韵、脚脚韵(也叫尾韵)^[2]。黄琼英认为,彝语诗歌的韵律原则是“押”“扣”“连”“对”四个基本要素,押韵方式主要是句首韵、句尾韵、句内韵和句间顶韵^{[3]136-137},其中句首韵也就是首韵,句尾韵也就是尾韵。所以具体划分少数民族诗歌汉译本的韵律主要有尾韵、头韵、腰韵、谐元韵、谐辅韵、行内韵等。第二,少数民族诗歌韵律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少数民族诗歌创作与其民族音乐血脉相通,有些诗歌与其民族历史故事、宗教信仰、社会生活紧密相连,带有祭祀、仪式、传说等元素,这些元素在韵律上有着特殊的表现方式,反映了民族的精神面貌和审美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诗歌的表达。少数民族诗歌有着丰富的表现手法,常常运用比喻、夸张、拟人等修辞手法,增强了诗歌的生动性和形象性,深化了音乐美特征。第三,少数民族诗歌具有鲜明的节奏,比如纳西族叙事长诗《鲁般鲁饶》,描写牧儿牧女们田野纵歌时,节奏明快而舒缓;牧儿牧女们抗命逃跑时,节奏快速紧迫;男女主人翁被迫分开时,节奏幽怨绵长;描写男女主人翁殉情时,节奏凝滞,字句间的凄绝气息令人断肠。可见起承转合的节奏,强化了诗歌叙事和艺术特征。第四,少数民族诗歌虽然也追求形式的对称与和谐,但更注重内容上的呼应和联系,在用韵、平仄、对仗、字数方面并无严格规定,用韵比较灵活,自成一体。

2 少数民族诗歌韵律翻译模式分析

近年来,少数民族诗歌的翻译和翻译研究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就翻译模式而言,汉诗英译为少数民族诗歌韵律英译提供了很好的范本。

吴翔林指出,“格律诗的优点是富于音乐美,能增加艺术感染力。格律能增加美感,但是对表达思想感情往往是种束缚。晚清以来,自由诗很流行。两种体裁都各有其相对的长短,最好是都能欣赏,兼收并蓄。”^[4]杨成虎认为,“纵观中国诗歌典籍英译的实践,在翻译方法上,注重保留了文学价值的,多用韵译,注重保留思想价值的,往往用散译。所以,如果在译诗时,能保留韵律和韵味,又能体现其思想价值,则是典籍诗歌英译最理想的境界。”^[5]李玉良等发现,韵律是中西诗学中的共同价值,在韵律翻译方面,多数译者都主张用韵。《诗经》翻译用韵不外乎两种方式:一是沿袭原诗的韵律,二是根据译入语民族的审美情趣,对原诗的韵律进行变通^[6]。列夫维尔(Andre LEFEVERE)提出了七种译诗模式,七种模式中有四种以韵来划分:韵律翻译(metrical translation)、散文体翻译(prose translation)、韵体翻译(rhymed translation)和无韵诗体翻译(blank verse translation)^[7]。朱徽提出韵律翻译的三种方法:一是在传达原诗思想内容的同时努力再现原诗的格律;其二是以格律诗译格律诗;其三是以比较灵活的方式来译格律诗^[8]。许渊冲提出译诗“三美”“三化”“三之”,他认为西方译诗有三派——格律派、自由派、创造派,中国也有对应的翻译风格^[9]。

列夫维尔七种翻译模式让诗歌韵律的翻译有了可以参照的标准,但是列夫维尔模式并没有针对汉语诗歌典籍翻译。许渊冲等主张格律诗体译诗,Waley和王佐良主张自由体译诗,翁显良和Pound主张改译。此外,《诗经》等汉语典籍翻译实践对少数民族韵律翻译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在诗歌翻译领域,格律诗体派、自由诗体派与仿译派的优劣性难以简单界定,任何单一翻译模式均无法实现原诗所有特征的完整再现。“在翻译诗歌作品时,译者不能因韵损义,即过分考虑保留音韵特点而省略、变更原文的意义。”^[10]译者所能做到的至多是再现原诗的韵式,要在译文中求得更微观层次上的一致,一般是不可能的。故原诗和译诗在韵律方面完全对等是不可能的。但是着眼于译诗的音韵之美,尽量做到原诗和译诗的韵律和意境之间更多的和谐统一,是可以达到的。

3 少数民族诗歌(汉译本)韵律翻译

汉译英是当今少数民族诗歌外译的主要形式,源文本翻译成汉语文本之后,必然失去其民族语言韵律格式。经过汉语译者的处理,可能会形成新的汉诗韵律,也有可能不用韵。大部分英语译者通过

汉语文本,再把相应民族诗歌翻译成英语,经历了原诗到汉语再到英语,共经过了两次语际翻译^{[3]21}。最终呈现在英语读者面前的诗歌,能否很好地反映出原诗的韵律特点,首先取决于汉语文本的翻译水平,其次取决于英语译者的水平和中英文化转换等诸多因素,精通汉英双语,熟知源文本和汉语文化以及英语文化,是英译译者的基本素养。

以下是少数民族诗歌韵律翻译的一些典型案例。案例 1-5 选自李昌银主编《云南少数民族经典作品英译文库》,案例 6 选自许明译苗族叙事长诗《刻道》(未出版,经作者同意使用)。

3.1 首韵

首韵是少数民族诗歌常见的韵律形式,分为同行押韵和隔行押韵。许多诗歌通过诗句第一个字的重复,构成首韵。诗歌通过字词的重复,不仅使结构对称,而且能够强化诗歌意义,构成独特的韵律。

例 1

原文:白鹿脱虎爪,/白羊脱狼爪,/白雀脱鹰爪,/白鱼脱獭爪。白的天笑了,/白的地笑了,/白的风笑了,/白的云笑了。

译文:Dong's deer bump away from the tigers,/His sheep run away from the fierce wolves,/His sparrows fly away from the eagles,/And his fish swim away from otters./The sky seems to be laughing in the light,/The land seems to be merry with the crops,/The winds seem to giggle through the trees,/And the clouds seem to grin over the sky.^[11]

以上诗句选自纳西族史诗《黑白战争》,一部用纳西象形文记载在东巴经中的英雄史诗,是东巴文学的经典之作,描绘了古代纳西部落为争夺光明与日月星辰而展开的宏大战争,以及一对青年男女生死相依的恋情。杨世光汉译本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能很好地体现《黑白战争》的精髓,流传最广泛。全诗均为五言,句式尤为齐整,每四句为一个诗节,结构严谨、语言质朴,诗歌涵盖了多种韵律格式,如例 1 诗句原文就包含了首韵、腰韵和尾韵。笔者主要研究其首韵。以上诗句中,通过“白”字的重复,构成隔行押韵的首韵,押 ai 韵。白色的事物,在纳西族中具有吉祥如意的寓意。在《黑白战争》中,一切白色事物为东族所有,术族只能生活在黑暗中。

孙兴文英译本主要采取了归化翻译策略,采用变通的方法翻译韵律。首先,译诗结合原诗文化背景将“白鹿”译为 Dong's deer(东族的鹿)、“白羊”为 his sheep,“白雀”为 his sparrow,“白鱼”为 his fish,指代明确,句式齐整,意义清晰,既符合英语语

法规则,也构成了隔行押韵。其次,译诗通过英语动词词组的活用 bump away,run away,fly away,swim away,翻译“脱”,符合每一种动物的特点,也构成了押韵(away/ə wei/)。再次,在句末,译诗通过名词复数的使用:tigers/ tai gərz/,wolves/w ʊlvz/,eagles/i:glz/,otters/ɑ:tərz/构成隔行押韵,这是通过构词法活用产生押韵。最后,增译和省译等多元化的翻译方法使译诗较为生动,比如在译诗中增加了 in the light,with the crops,through the trees,over the sky 等状语。“白的天”“白的地”“白的云”省译为 the sky,the land,the cloud。相较于《黑白战争》其他英译本,此版本可视为较为成功的范例。

例 2

原文:那是什么东西在发亮?那闪耀金光来自何方?那是海螺树在开花,那金光来自遥远的东方……三天后世界要毁灭,三弟兄一听着了急。三人连忙跪下地,齐向老爷爷讨生计。

译文:What gave off the light?/Where did the flashing golden light come from?/The golden light came from a conch tree blooming;/The golden light came from the faraway east. …/Hearing that in three days the world would be destroyed,/The three brothers became worried./They knelt on the ground,/To beg the old man for ideas to survive.^[12]

例 2 出自普米族创世史诗《帕米查哩》,以上诗句选自第一章《采金光》,这部作品以缜密的结构、跌宕起伏的情节、引人入胜的叙事以及流畅优美的语言,描绘出一幅从日月诞生、人类起源到普米民族诞生与发展的宏大历史画卷。

译文采用自由体译诗,主要使用异化翻译策略。原诗通过字的重复,构成隔行押韵,比如“那”的重复和“三”的重复,构成首韵 a 韵和 an 韵。译诗句式多样,使用简单句,分别有特殊疑问句、陈述句、现在分词结构和动词不定式结构。翻译方法多样,译文中用了省译,省略了“那”,直接使用了 what 和 where 提问的特殊疑问句,后两句为回答,也省略了“那”。“三天后世界要毁灭”译文使用了增译,增加了 hearing that(听说),主语为 the three brothers,和下文更为连贯。译文采用了自由体译诗,结构较为自由,略显松散,同时采取了无韵体译诗,或者说译文没有用韵。译文的优点是忠实于原文,语法严谨,能够很好地展现原诗的意义。

3.2 腰韵

腰韵是汉语押韵的方式之一,韵脚在句子中间,在我国壮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诗歌中较为常见。主要

有行间押韵和隔行押韵,少数民族诗歌中经常用字词的重复构成腰韵。

例3

原文:长到八月二十日,/长到九月二十日,/长到十月二十日,/长到冬月二十日,/长到腊月二十日,/长到正月二十日,/长到二月二十日;/栽下的竹子长成林,/栽下的竹子长得绿莹莹。

译文:The bamboos grew till the twentieth of August,/Till the twentieth of September,/Till the twentieth of October,/Till the twentieth of November,/Till the twentieth of December,/Till the twentieth of January of the next year,/Till the twentieth of February;/At last, the bamboos became a forest,/Glittering green.^[13]

《梅葛》是云南楚雄彝族创世史诗,“梅葛”本为一种彝族歌调的名称,由于采用这种调子来唱彝族的创世史,因而人们将这部史诗称为《梅葛》,它是彝族人的“根谱”和百科全书,记录了他们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此汉译本语言质朴,句式简单,结构自由,口语化特征明显,故事性很强。诗歌中用韵灵活,有的地方押韵很多,有的地方无韵。以上诗句主要是使用字句的重复构成隔行押韵,动词“长”(ang韵)和名词“日”(i韵)分别构成首韵和尾韵,名词“月”(ue韵)重复,数词“二”(er韵)和“十”(i韵)多次重复,构成腰韵。少数民族诗歌常以数字的重复与递进来表示季节更迭的自然时序,既生动展现叙事进程与人物情感的深化,又赋予诗歌结构回环往复的韵律美感。

其英译本在结构上秉承了汉译本特点,自由体译诗,使用异化翻译策略,多用简单句,也比较忠实于原文。翻译方法多样,首先使用了增译,“长到八月二十日”译为 The bamboos grew till the twentieth of August,增加了主语 the bamboos。其次使用了省译,At last, the bamboos became a forest 省略了定语“栽下的”。“栽下的竹子长得绿莹莹”则用现在分词结构 glittering green。其余诗句用 till 引导的时间状语,比较符合译入语习惯,Till the twentieth of...多个平行结构的使用,让句子结构得到优化,也构成了押韵,比如 till/tɪl/隔行构成首韵,但是英语中没有腰韵一说,the/ðð/, twentieth/twentiθθ/, 和 of/ðv/的重复使用,让译文有了音乐美的特点。总体来说,韵律在译文中转换比较成功。

例4

原文:白天、黑夜两朵花,/轮流开在太空间。/白天开花是太阳,/夜晚开花是月亮;/太阳开花月不

明,/月亮开花星不闪;/两花轮流开,/两花难相见。/十年花不谢,/万载花鲜艳。

译文:The two flowers of the day and the night/Bloomed in the universe in turn./The flower of the day was the sun,/The flower of the night was the moon;/The sun shadowed the moon in daylight,/The moon veiled the stars at night;/The two flowers appeared in turn,/They rarely met each other./They bloomed for years,/They glowed for ages.^[14]

彝族创世史诗《查姆》,以生动的笔触描述了天地万物的起源、人类的诞生与发展,是对远古先民生活与社会历史反映最为详尽的彝族古籍,是彝族文化史上最为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的书面作品之一。郭思九等整理的汉译本,是现存流传较广的汉译本之一。该译本句式简单自由,并不规整,韵律形式多样,语言平实自然,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民族风情浓郁。

以上诗句描述了创造日月星辰的场景,把白天黑夜比喻成“两朵花”,通过词语“开”(ai韵)“花”(ua韵)的重复,构成隔行押韵,是典型的腰韵。“开”重复四次,“花”重复八次,其中,“两花轮流开,两花难相见”“十年花不谢,万载花鲜艳”中“花”位置不同。

译文采用了自由体译诗,以归化翻译策略为主。译文以简单句为主,不拘泥于诗歌形式,在结构方面显得松散,韵律翻译也很自由,主要采取了无韵翻译。比如:“白天开花是太阳,夜晚开花是月亮”译为 The flower of the day was the sun, The flower of the night was the moon;“白天开花”转译为“the flower of the day 白天的花”,“夜晚开花”转译为“the flower of the night 夜晚的花”,句式结构相同,有一种对称美。“太阳开花月不明,月亮开花星不闪”原文把太阳和月亮升起比喻为“开花”,译为 The sun shadowed the moon in daylight, The moon veiled the stars at night,其中,shadow 和 veil 都有“遮蔽”之意,译者进行了创译。总体来说,译文句式对称,无韵译诗,用词颇有创意,动词的活用使译文具有层次感。

3.3 尾韵

尾韵指的是诗句末尾的押韵,在一篇诗歌中,一些或全部句子的最后一个字,采用韵腹和韵尾相同的字构成押韵,是少数民族诗歌中使用最多的韵律形式,是构成诗歌音韵美的重要元素之一。

例5

原文:冲过一重浪,/引来一群鱼;/闯过二重浪,/招来二群鱼。/冲过三重浪,/引来三群鱼;/闯

过四重浪,/招来四群鱼。

译文:They rowed over one wave,/But there came forward a school of fish./They rowed over two waves,/But there came forward two schools of fish./They rowed over three waves,/But there came forward three schools of fish./They rowed over four waves,/But there came forward four schools of fish.^[15]

《目瑙斋瓦》是景颇族创世史诗,史诗音韵和格律规整,语言尤其优美,记述了景颇族从远古时代到现代社会的演变历程,其内容涵盖了景颇族的历史、哲学思想、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具有极高的学术和艺术价值。李向前搜集整理的汉译本出版时间较早,用诗歌体记载。全诗语言质朴优美,气势恢宏,故事情节动人,韵律规整且形式丰富多样,较好地保留了景颇族口传特色。

以上诗句中,通过数词的递进,从“一重浪”到“十重浪”推进故事发展,描述了寻找火种的艰难,构成了诗歌多样化的韵律,增强了诗歌音乐美的特点。长诗尾韵成韵方式以同字重复构成隔行押韵,或者为 ABAB,使用 ABAB 格式较多,比如上文就是“鱼”“浪”以 ABAB 形式押韵,循环往复,增强了音乐美特点。

译文主要用归化翻译策略,充分考虑了原文特点,使用简单句,并且用相同的句子结构,句式显得很齐整。译者使用增译,增加了主语 they;“冲过”“闯过”转译为 rowed over,比较形象;“引来”“招来”转译为 there came 句型,符合译入语用法,但是弱化了“引”和“招”的意义。数词的活用比较形象地复现了原诗特点,比如“一重浪”one wave,随着数词递进,到“十重浪”ten waves;“一群鱼”a school of fish,到“九群鱼”nine schools of fish。译文也力求英文句尾押韵,比如上文中,waves/weɪvz/和 fish/fɪʃ/交替重复,以 ABAB 的形式构成隔行押韵,力图再现原诗语言美、韵律美,属于比较成功的译文。

例 6

原文:远古那年代,/开初那时期,/喜尼人聪明,/喜金人聪明,/垦田种稻粮,/杀水牛订亲,/大家来开亲,/寨寨都得亲,/人人都欢喜,/没有谁忧愁。

译文:Back in ancient times,in old days of yore,/When first began the bygone age-old lore,/A person named Xix Nix was very smart,/And the other, Xix Jenb,with a wise heart,/They tilled the land,with rice growing so fine,/And slew buffalo to seal nuptial line./All gathered for the match,in joy they'd bind,/Through distant hamlets,each their kinn did find./Ev-

ery soul rejoiced,in joy they would twine,/No one bore a sorrow,no heart did pine.

以上诗句选自《刻道》,它是一部具有浓郁民族气息的苗族婚姻叙事长诗,是一部规模宏大、历史悠久的苗族古籍,对研究苗族的起源和迁徙、图腾崇拜、数学知识、语言学等具有重要的价值。此汉译本取自 1991 年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的《开亲歌》一书,诗歌的形式为盘歌(antiphonal songs),由两人对唱,一问一答。苗文原文五字一行,带有独特的押韵,其汉译本也为五言,语言质朴优美,结构整齐,有些诗句也带有韵脚,却未能复现苗文的韵律。

以上诗句选自长诗开头《生亲》,“明”(ing 韵)“亲”(in 韵)重复使用,在部分诗句末尾隔行押韵。许明英译本以此汉译本为主,同时参照了苗文原文,对长诗进行了创译,力图在译文中实现“诗意化”。创译“是译者出于表意性书写目的,对原诗进行跨语言的编辑、重组、创作性重写、创意性重构等以实现目标话语的表达性与目的性过程”^[16]。译者借鉴了英诗的模式和句型进行创译,以提升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度。比如“那年代”和“那时期”意义相同,分别译为 in old days of yore 和 the bygone age-old lore,就显得意味深长,意境古朴。“聪明”译为 was very smart 和 with a wise heart,以及“亲”的不同译法,十分灵活。译文通过字词句的活用,在句末形成了押韵:yore 和 lore 押韵,smart 和 heart 押韵,fine 和 line 押韵,bind 和 find 押韵,twine 和 pine 押韵,形成了 AABBCDD 的韵式。故译文句型对称、齐整,并富有音乐美的特征,是较为成功的翻译。

综上所述,少数民族诗歌汉译本有着丰富的韵律形式,其中首韵、尾韵和腰韵最为常见,押韵方式分为同行押韵和隔行押韵,多样化的韵律形式体现了我国少数民族诗歌灵活多变的语言特色和高超的艺术水平,其中成韵方式和形式并无明显规律可循,主要取决于该民族的语言特点、中文译者的语言表达能力等。由于汉英两种语言体系不同,在韵律的转换方面很难对等,其韵律翻译具有如下明显特点。一,大部分少数民族诗歌的英译本为汉译英,属于民族语言到汉语再到英语的语际翻译。二,以自由体译诗为主,其翻译策略有归化和异化,翻译方法多样,主要有省译、增译、转译和创译。三,汉译本中押韵形式丰富,英译本通过英语词类活用和构词法活用,在译诗中构成押韵。四,少数民族文本押韵,汉译文本少押韵,译诗模仿少数民族文本押韵,在译文中形成新的韵律,对汉译本的损失构成补偿。五,平行结构的使用和英语句法结构的活用,优化了译文

的结构和音乐感,提升了韵律之美。虽然自由体译诗对韵律没有要求,但译者对多元化翻译方法的活用,使译文中不乏精彩的韵律,对原诗韵律可谓是一种补偿。

4 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通过多元译诗形式的探索,译诗与原诗能在韵律与意境上实现更深层次的和谐。少数民族诗歌韵律翻译的研究,有利于拓展少数民族诗歌翻译理论,也有利于译者在做好下一步翻译工作、“讲好中国故事”时做出更深的思考。但是我国少数民族诗歌在韵律翻译方面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体现在:

其一,译文强调字面翻译,着重字面意义的转换,而忽略了诗歌深层的象征意义和文化背景,从而造成语境失真。其二,语言风格单一,无法复现原诗的节奏、韵律美,一些汉译本没有诗味儿,英译本就更难复现原诗之美。其三,文化差异很难在译文中再现,从而产生文化隔阂。其四,由于同时精通少数民族语言、汉语和英语的译者很少,在民族语言到汉语,从汉语再到英语的语际翻译过程中,容易造成语言和文化损失,韵律就是其中之一。其五,译文水平参差不齐的现象长期存在,主要体现在同一民族诗歌的不同译本水平不同,同一个译本中,不同译者水平也不尽相同。

少数民族诗歌的翻译不仅涉及语言的转换,更关乎文化记忆的传承与文明对话的深层机制。处理好韵律翻译有助于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诗性转换。第一,进行文化基因的深度解码。“民族文学典籍的翻译已经超越了文学翻译,进入了民族志翻译领域”^[17],译者应扎根源语文化,通过民族志研究解析原诗的图腾符号、历史语境、自然意象等文化要素,通过注释、意象移植等方式弥补文化隔阂,避免语境失真。第二,创新诗歌韵律转换,借鉴格律诗体派、自由诗体派与仿译派,开发“韵律移植五步法”,即:音步分析→节奏建模→押韵重构→声调适配→整体校验;还有“三维注释系统”,正文采用诗性翻译,脚注补充文化阐释,尾注增加韵律分析图谱。第三,创新翻译策略和方法。除了传统的归化和异化策略,尝试创译,也可采用多模态翻译,将口传诗歌与数字媒介结合,通过音视频注释呈现“活态”文化语境。第四,培养复合型译者群体,建立“民族语言-汉语-外语”三重能力培养机制,减少语际转换中的文化损耗。也可以通过合作翻译(collaborative translation),即“两名或两名以上人员共同合作进行的翻

译活动”^[18],组建“民族语言专家+诗人译者+外语专家”的协作团队。第五,提升翻译评价机制并鼓励翻译批评,设立多维度的翻译评价模式,包括文化传承度、诗学审美重构度、跨文化阐释效度、媒介融合创新度、读者接受度、学术增值度等,开发智能评价系统。通过以上方法,提升少数民族诗歌翻译水平,让民族诗歌在文化转换中获得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 王宏印. 中华民族典籍翻译研究概论——朝向人类学翻译诗学的努力[M]. 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2016:77.
- [2] 颜晓英. 从韵律的视角看《布洛陀史诗》不同译本的翻译策略[J]. 民族翻译, 2022(4):30-33.
- [3] 黄琼英.《阿诗玛》翻译传播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 [4] 吴翔林. 英诗格律及自由诗[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3:324.
- [5] 杨成虎. 中国诗歌典籍英译散论[M]. 北京:国防工业出版社, 2012:23-31.
- [6] 李玉良,王冲.《诗经》韵律翻译策略探索——以詹宁斯、许渊冲译本为例[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8(4):53-67.
- [7] 马红军. 从文学翻译到翻译文学[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121-134.
- [8] 朱徽. 中英诗艺比较研究[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0:88-92.
- [9] 许渊冲. 文学与翻译[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80-100.
- [10] 李敏杰,朱薇. 风格传神,译文生辉——评彝族典籍《赛玻嫫》英译本[J]. 民族翻译, 2016(4):62-70.
- [11] 杨世光,整理. 黑白之战[M]. 孙兴文,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20:268.
- [12] 李理,记录整理. 帕米查哩[M]. 汤格·萨甲博,汉译. 刘德周,英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8:2,28.
- [13] 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楚雄调查队,整理. 梅葛[M]. 陈萍,刘怡,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8:90.
- [14] 郭思九,陶学良,整理. 查姆[M]. 徐蔚,熊莺,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8:12.
- [15] 李向前,搜集整理. 目瑙斋瓦[M]. 杨慧芳,陈萍,陶玥,译.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8:369.
- [16] 陈琳,曹培会. 论创译的名与实[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16(6):85-86.
- [17] 刘雪芹. 西南诸民族典籍翻译研究[M]. 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 2016:80.
- [18] 王正. 翻译中的合作模式研究[D].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5.

人工智能时代地方应用型高校卓越土木工程师人才培养

周仁战*, 金园, 张尧, 陈玲玲, 王永辉

(蚌埠学院 土木与水利工程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针对地方应用型高校土木工程专业招生下滑、课程设置不合理、实践教学薄弱等现实问题,探讨了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下优化卓越工程师培养路径。通过构建融合 AI 技术的知识体系、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完善师资队伍、推进校企共建研发中心等举措,形成了多维度联动的人才培养模式,为提升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提供支持。研究表明,该模式有助于高校深化内涵建设、增强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对土木工程专业学生培养具有较强的实践指导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人工智能;土木工程师;培养路径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3-0093-05

Path of Cultivating Outstanding Civil Engineers in Local Applied Universitie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ZHOU Ren-zhan*, JIN Yuan, ZHANG Yao, CHEN Ling-ling, WANG Yong-hui

(School of Water Resources and Civil Engineering, Bengbu University, Bengbu, 233030, Anhui)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al issues faced by the civil engineering major in local applied universities, such as the decline in enrollment, unreasonable curriculum setup, and weak practical teaching, the strategies for optimizing the cultivation paths of outstanding engineers driven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were explored. Through measures like constructing a knowledge system integrated with AI technology, strengthening the practical teaching links,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staff, and promoting the co-establishment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s by universities and enterprises, a multi-dimensional and interconnected talent cultivation mode has been formed, providing support for enhancing students' engineering practical abilities and innovative capabilities.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this mode is conducive to universities' deepening of connotative construction and enhancement of their capacity to serve the regional economy. Meanwhile, it has strong practical guiding value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the cultivation of civil engineering major students.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ivil engineer; cultivation path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探索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工程师培养体系,努力建设一支爱党报国、敬业奉献、具有突出技术创新能力、善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师队伍。”^[1]工程师是推动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

的重要力量,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2]。教育部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以下简称“卓越计划”)1.0 的基础上于2018 年推出了“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3],旨在高等教育阶段培养一批具有突出技术能力、善于解决复杂工

收稿日期:2025-04-07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六卓越一拔尖”项目(2023zybj055);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校企合作实践教育基地项目(2023xqhz075)。

作者简介:周仁战(1982-),男,安徽砀山人,正高级工程师,博士。E-mail: rzzhou@163.com

程问题的工程师队伍^[4]。“卓越计划”为工程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自实施高等教育大众化后,实现人才培养不仅仅局限于量的增加,更应是质的提升,从工程教育大国到工程教育强国的转变,教育部提出了卓越工程师计划,为普通本科高校的发展指明了方向^[5]。土木工程等相关专业作为培养卓越工程师的摇篮,人才培养除了培养具备扎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外,还要具备较强的工程实践和应用能力,强调土木工程施工过程中,能够胜任数字化设计、工业化制作、智慧化施工、智能化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6]。在此背景下,探索卓越土木工程师后备人才的培养路径,是地方应用型高校顺应教育改革潮流、实现自身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不仅有助于高校优化专业设置、更新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还能提升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的能力,增强高校在区域高等教育领域的竞争力。

1 土木工程专业变革

随着我国工程建设进入数字化、智能化新时代,

土木工程专业正面临着重大变革。近年来,智能建造技术、AI 智慧管理、机器人施工等前沿技术在实际工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应用型高校土建专业改革的重要方向。智能建造技术(见图 1)指在建筑工程领域应用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技术,以提高施工效率、质量和安全性。主要包括 BIM、数字孪生、物联网、5G 通信、自动化施工设备等技术。智能建造可以实现施工过程的实时监测、优化管理,并降低人工成本和资源浪费,推动建筑行业向智慧建造方向发展。AI 智慧管理是在建筑工程项目管理中引入人工智能(AI)技术,利用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和计算机视觉等手段,实现施工计划优化、风险预测、安全监控、资源调度和质量检测(见图 2)。机器人施工是指利用建筑机器人代替传统人工完成施工任务,提高施工精度和效率,同时降低人工劳动强度和安全风险。常见的建筑机器人有:机器人砌砖机、3D 打印建筑机器人、无人施工设备、巡检机器人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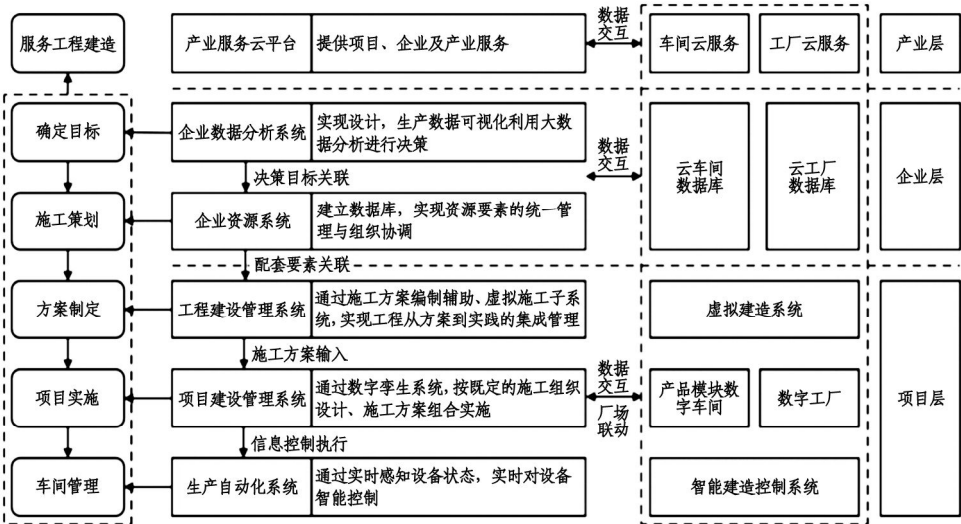


图 1 智能建造技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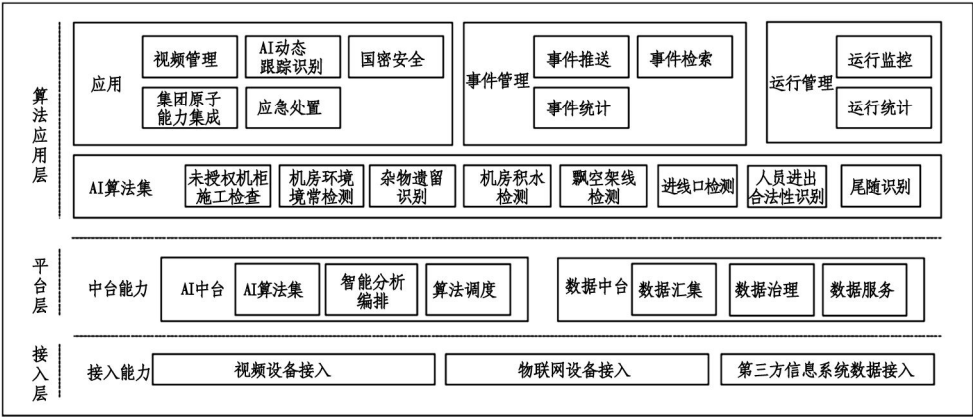


图 2 AI 智慧管理

2 地方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与定位

在中国式现代化历史推进进程中,地方应用型高校要主动对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坚持“四个面向”有组织地集聚资源,做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升级的强力引擎^[7]。在新工科建设中,土木工程专业不仅要传授基础理论和传统施工工艺,更应注重引入智能建造、BIM 技术、人工智能辅助设计及机器人施工等现代技术。

在知识要求方面,土木工程专业学生不仅要扎实掌握数学、力学、材料科学等基础学科知识,为后续的专业学习筑牢根基,还需深入了解土木工程领域的专业知识,如房屋建筑、施工工艺、工程管理等内容;在能力培养上,实践动手能力是核心,学生需具备熟练的工程绘图技能,掌握先进的工程测量技术,能够使用全站仪、GPS 等仪器进行地形测绘、建筑物定位等工作;在素质层面,职业道德与责任感是基石。图 1 展示了从基础理论到高级应用课程的层次架构,明确标示了传统理论课程与新增的智能建造、机器人施工及数字化管理课程的衔接关系,体现了理论知识与现场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思路。

3 现状与困境

3.1 现状

近年来,地方应用型高校土木工程专业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从规模上看,招生人数持续增长,专业布点不断增加。过去一段时期内,地方应用型高校土木工程专业曾显示出一定的规模扩展趋势。但需要指出的是,近期在招生政策调整和行业转型背景下,一些高校已开始优化专业布局,从单纯追求招生数量转向培养具有智能建造和数字化管理能力的高质量人才。在未来 10 年,土木类行业将迎来重大变革,从传统的“粗放建造”模式大步迈向“技术赋能”的新时代。绿色化要求在材料选用和施工过程中注重环保与可持续发展,智能化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提升建造效率与质量。

3.2 困境

3.2.1 课程体系设置合理性问题

当前地方应用型高校土木工程专业课程体系设置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其中课程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较为突出。在传统的课程体系中,理论课程占据了大量的教学时间,以某地方高校为例,其土木工程专业理论课程学时占总学时的比例高达 70%,而实践课程学时相对较少,这使得学生在课堂上主要精力集中于理论知识的学习,如力学原理、结构设计

理论等,缺乏足够的时间去实际操作和应用这些知识。学生往往对建筑材料的性能倒背如流,但在实际施工现场,却无法准确辨别材料质量的优劣,难以将所学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

在新工科建设中课程建设是其核心要素,教学改革改到深处是课程,要在专业课程方面扎扎实实地推进,改课程,建“金课”,探索课程建设新形态^[8-9]。课程结构失衡也是一个关键问题。专业课程学习的过程中课程之间的衔接不够紧密,出现了内容重复或脱节的课程内容。同时课程设置缺乏与机械、自动化等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不能满足新工科要求下的学科交叉、创新人才培养^[10-11]。

3.2.2 实践教学环节有效性审视

学生动手操作能力、专业实践能力、科研创新能力、思维分析能力的提高和工程综合素质的培养由实践教学保证^[12]。实践教学环节在执行过程中有效性不足,形式化问题较为严重。部分高校虽然设置了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设计等实践环节,但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流于形式;重视度不够导致了实践教学内容的肤浅与无益^[13]。图 3 展示了校内实训、校外实习和虚拟仿真实验室三大实践平台的构成及其功能定位,强调了实践教学在培养学生工程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中的重要作用。然而,目前大多校内实训基地虽能模拟工程现场,但设施陈旧、设备更新滞后,难以支持智能建造等新技术的教学需求;虚拟仿真实验室在技术应用上仍较为初级,未能充分利用 BIM、人工智能等现代工具,教学效果有限。因此,迫切需要更新设备、优化资源配置以及深化校企合作,进一步提升实践教学体系的整体效能。高校师资队伍组成很大一部分来自应届优秀毕业生,其次是企事业单位引进的人才^[14]。双师型教师队伍匮乏,严重制约实践教学质量,很多教师从高校毕业后直接进入学校任教,缺乏工程实践经验,在指导学生实践时力不从心。

3.2.3 校企合作协同性评估

校企合作在地方应用型高校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中存在协同性不足的问题,合作流于浅层;校企双方往往基于短期利益开展合作,缺乏长远规划,一旦遇到市场波动或企业经营困难,合作就容易中断,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的积极性不高,参与度低;在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教学过程的实施等关键环节,企业参与较少。以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为例,企业专家参与程度较低,导致培养方案与行业实际需求契合度不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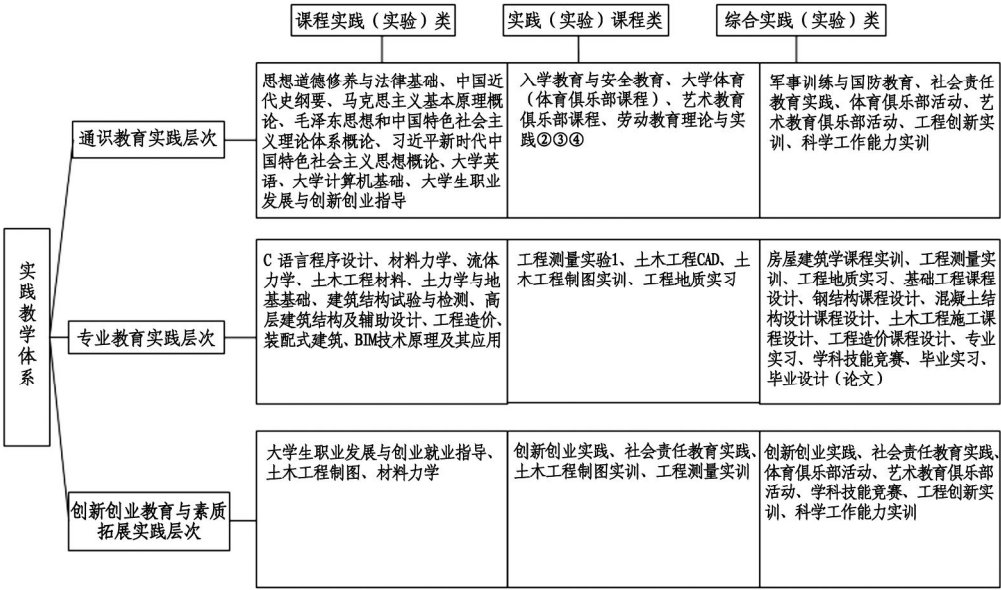


图3 实践教学体系图

4 对策——多主体联动培养模式构建

4.1 知识体系构建

传统土木工程知识:开设工程力学、结构设计、岩土工程、水力学、建筑材料、施工技术为基础课程,为理解和解决土木工程问题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安徽省内土木类高校通过联合开发跨校课程,实现优质课程资源的共享与互补,为学生提供了更为丰富和多元的知识学习平台。

人工智能基础知识:开设人工智能导论、机器学习、深度学习、数据分析与处理等课程,让学生掌握人工智能的基本概念、算法和模型,了解其在土木工程中的具体应用场景和潜力。

交叉融合知识:设置智能建筑设计、基于人工智能的结构健康监测、施工过程智能管理等交叉课程,将土木工程专业知识与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融合,培养学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能力。通过机器学习算法建立材料性能与原材料、生产工艺等因素之间的关系模型,实现对新材料性能的快速预测和优化。

4.2 实践教学环节

实验教学:建立专门的人工智能与土木工程联合实验室,让学生通过实验操作,熟悉人工智能算法在结构分析、材料性能预测等方面的应用,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首先,校内实训基地作为地方应用型高校培养卓越土木工程师后备人才的重要阵地,致力于为学生营造高度仿真的工程实践环境。

其次,校外实习基地——嵌入企业生产环节。校外实习基地为学生提供了直接嵌入企业生产环节的宝贵机会,实现了人才培养与企业实际需求的无缝对接。作为土建施工员,学生负责现场施工的具体指挥与协调,把控施工进度、监督施工质量,处理施工过程中的技术难题与突发情况;作为质量安全员,学生严格执行工程质量标准与安全规范,对施工材料、构配件进行质量检验,确保工程在施工时安全有序。通过这种全方位、多层次的轮岗实习,学生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工程实践经验,还深入了解了建筑企业的运营管理模式,培养了严谨的职业素养与团队协作精神,毕业后能够迅速融入企业,成长为企业的骨干力量。

最后,虚拟仿真实验室——拓展实践边界。虚拟仿真实验室借助先进的计算机技术与仿真软件,为土木工程专业实践教学开辟了全新的维度,有效拓展了学生的实践边界。

课程设计:引入人工智能相关的设计任务,如利用机器学习算法优化建筑结构设计方案,或通过计算机视觉技术进行施工现场的进度监测与管理等,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和创新思维。

实习与毕业设计:安排学生到相关企业实习,参与实际工程项目中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实践。毕业设计选题紧密结合人工智能与土木工程的结合点。

4.3 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培训与进修:鼓励现有土木工程专业教师参加人工智能相关的培训课程和学术研讨会,到企业或科研机构进行挂职锻炼,提升教师的人工智能

技术水平和实践能力,使其能够更好地开展相关教学和科研工作。

引进复合型人才:从国内外高校和科研机构引进既懂土木工程又掌握人工智能的复合型人才,充实师资队伍。建筑行业由设计施工进入全生命周期需要跨专业、跨领域的知识和技能,目前相关人才相对短缺,如利用传感器网络实时采集建筑物的各种数据,如位移、应变、振动等,再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和处理,能够及时发现建筑物的异常,预测结构的退化趋势,为维修和加固提供科学依据。

校企合作师资:邀请企业中具有丰富人工智能

应用经验的工程师担任兼职教师,参与课程教学、实践指导和毕业设计指导等工作,让学生了解行业最新的技术动态和实际应用需求,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4.4 共建研发中心:提升创新实践能力

为进一步提升学生的科研素养与实践能力,依托正在建设的 5G 及人工智能产教融合创新平台,联合企业共建研发中心,为学生提供接触前沿项目、参与技术研发的重要实践平台。表 1 给出了蚌埠学院 2020 - 2025 届毕业生去向,验证了“多主体联动培养模式”下 AI 融入知识体系与实践教学的成效。

表 1 土木工程专业 2020 - 2025 届毕业生去向统计表

年级	毕业人数	升学	机关及 事业单位	征兵	待就业及 创业人数	企业	施工 企业	其他专业 相关企业	其他专业不 相关企业
2025 届(预计)	109	12	4	3	3	87	34	45	8
2024 届	116	9	2	7	9	89	36	40	13
2023 届	113	13	1	2	4	93	75	8	10
2022 届	57	3	1	3	3	47	32	9	6
2021 届	62	2	0	0	3	57	43	6	8
2020 届	68	14	0	0	5	49	40	1	8
总计	525	53	8	15	27	422	260	109	53

4.5 学生满意度调查分析

为进一步验证“AI 知识体系 + 多层次实践教学 + 师资建设 + 共建研发中心”培养模式的实际效果,设计问卷包含 8 项指标:AI 交叉课程加深专业理解、校内实训增强动手技能、校外实习提升岗位胜任力、虚拟仿真实验增强全过程认知、共建研发中心提升素养、双师型教师指导效果良好、培养模式提升就业竞争力、推荐意愿,采用 1 - 5 分 Likert 量表(1 “完全不同意”至 5 “完全同意”),结果如表 2 所示(满分为 5 分)。

表 2 问卷调查结果

序号	指标	同意率/%	平均分/分
1	AI 交叉课程加深专业理解	86	4.2
2	校内实训增强动手技能	94	4.6
3	校外实习提升岗位胜任力	88	4.4
4	虚拟仿真实验增强全过程认知	82	4.1
5	共建研发中心提升科研素养	78	4.0
6	双师型教师指导效果良好	89	4.3
7	培养模式提升就业竞争力	90	4.4
8	推荐意愿	92	4.5

结果表明,实践教学类环节满意度最高,印证了“强化实践教学、深化校企合作”对提升学生动手能力和岗位胜任力的关键作用。AI 交叉课程与双师型教师的高度认可,支持了“知识体系构建”与“师资队伍建设”对提升专业理解与教学质量的论点。共建研发中心环节虽略低于其他指标,但仍处于高水平,表明该平台对学生科研素养的培养具有积极作用,并提示后续可进一步丰富项目主题与导师配比。本调查为多主体联动培养模式提供了量化支持,凸显了 AI 融合与校企协同在提升学生综合竞争力方面的显著成效。

5 结论

围绕人工智能背景下地方应用型高校卓越土木工程师的培养路径展开研究,指出传统土木工程教育在课程设置、实践教学、师资建设和校企合作等方面仍存在不足。通过系统构建包含 AI 技术融合的知识体系、优化师资结构以及依托校企共建研发中心等举措,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工程实践素养。实践表明,该多主体联动培养模式可提升土木工程专业人才的综合竞争力和适应力,为行业智能化转型和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具有推广价值。

(下转第121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三进”背景下高校外语课程思政育人研究

王婷婷^{1*}, 胡汉柱²

(1. 蚌埠学院 外国语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2. 蚌埠学院 继续教育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三进”背景为研究视角,对高校外语类专业课程思政一体化育人模式进行研究分析,以“立德树人”作为外语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提出全员参与并附以立体化的顶层设计,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认知到体验,再到固化,进而常态化地予以熏陶,分别从系统完善“进教材”、润物无声“进课堂”以及潜移默化“进学生头脑”三个层面展开课程思政研究,从而培养具有中国立场、全球视野的现代化外语人才。

关键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三进”;课程思政;高校外语专业

中图分类号:G641;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3-0098-05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 Courses by the “Three Entries” of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WANG Ting-ting^{1*}, HU Han-zhu²

(1. School of Languages, Bengbu University, Bengbu, 233030, Anhui;

2. 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Bengbu University, Bengbu, 233030, Anhui)

Abstract: From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of the “Three Entries” background of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it analyzed the integrated education model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in this paper in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of colleges. Taking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a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it proposed that all members should participate and be accompanied by a three-dimensional top-level design. It is necessary to let Xi Jin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develop from cognition to experience, then to solidification, and finally to normalized edification. The research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should be carried out from three aspects: systematically improving the “entry into textbooks”, subtly implementing the “entry into classrooms”, and imperceptibly achieving the “entry into students minds”, so as to cultivate modern foreign language talents with a Chinese stance and a global perspective.

Key words: Xi Jinping: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Three Entrie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curriculum; college foreign language majors

“三进”是“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缩略,是高校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教学的重要方式,本文立足于高校外语类专业课程思政建设,重点阐释《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三进”背景下的课程思政一体化育人模式的建构,以期对我国高校思政育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应用予以参考和启示。

收稿日期:2024-03-12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蚌埠学院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2024jyxm13)。

作者简介:王婷婷(1980-),女,四川中江人,副教授,硕士。E-mail:172366514@qq.com

1 “三进”外语课程思政的背景

“三进”发展历程最早可以追溯至1995年,国家教委发布了《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指出“把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编成教材,进入课堂,用以教育武装青年学生,为他们今后投身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奠定扎实的思想理论基础”^[1]。1998年中共中央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再次指出,“教育部门要做好邓小平理论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的工作,加强教材编写工作和师资队伍建设。”^[2]2003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通知》中再次强调“要高度重视青年学生的理论武装工作,加强教材编写和师资队伍建设,推动‘三个代表’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3]。同年,教育部下发《关于进一步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工作的通知》,正式明确地用“三进”替代了原来的“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4]。中宣部于2019年末启动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其他语种版本进高校、进教材、进课堂的试点工作。自此全国高校掀起了制定“三进”特色创新教改项目、组建“三进”师资队伍、编写专业教材、修订培养方案、修改教学大纲、完善教学设计、组织集体备课等热潮,“三进”试点工作火热开展中。

就《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三进”外语课程思政育人研究而言,文秋芳阐释了“一体化”思政育人体系

系在“英法双语+专业”国际治理人才培养中的应用尝试,提出由核心和支撑两个子体系构成的思政育人体系^[5]。冯千等以日语翻译鉴赏课程的“三进”导入为例,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三进”课程思政建设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习近平治国理政思想内容的呈现模式,实现从原语到目标语、再从目标语到原语的双向学习^[6]。陈艾舒等以高校英语演讲与辩论课为例,从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学习资源和课程评价等方面着手,提出了促进《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三进”思政内容与专业教学融合的解决路径,进而提出培养学生专业技能的同时须塑造其家国情怀与国际视野^[7]。成昭伟等对《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本融入高校外语教学的必要性和途径进行了探讨,提出其融入途径并以案例举例加以论证^[8]。

2 课程思政一体化育人模式的建构模式与路径

当前我国高校面临着“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时代命题,本文就《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三进”背景下的课程思政一体化育人问题,以“立德树人”作为外语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分别从系统完善“进教材”、润物无声“进课堂”以及潜移默化“进学生头脑”三个层面展开,从而为培养具有中国立场、全球视野的现代化外语人才提供理论参考(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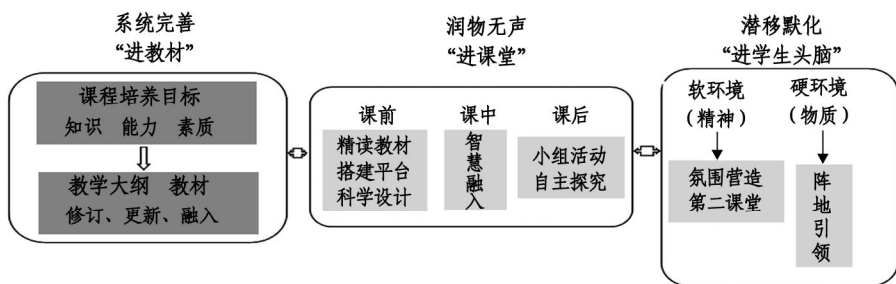


图1 课程思政一体化育人路径

2.1 系统完善“进教材”

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重要观点和内容与外语专业课程知识有机融合,体现在从课程培养目标、教学大纲到教材的系统完善上。

外语专业课程培养目标分别从学生的知识、能力和素质三方面进行设定,明确了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内容有机整合,为教材融入明确方向。其中知识目标以英语专业知识为

主,并依托具体知识适当添加思政元素,如对中国特色的相关术语的表述、理解和传播,在英译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均有融入。能力目标上,要求学生具有跨文化交际能力和国际传播能力,如通过英语传播中国声音,从而能够用英语维护中国立场。素质目标上,要求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造学生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度认同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人文素养。

在教学大纲和教材制定上,全面修订外语专业课程教学大纲,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将多语种版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关于大国外交、文化自信、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阐述恰当地融入到外语专业课程教学大纲和教材中,并对外语专业课程教学内容进行全面修订,对外语专业课程教学内容进行持续更新。

2.2 润物无声“进课堂”

课前,需要理清所授课程的知识、能力、素质,将教材体系成功转化为教学体系,搭建共享平台并科学合理地设计教案、课件、教学日历等,将思政目标予以具象化体现,最后对知识、能力、素质予以清晰地展现。

课中,运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和方法,借助智慧教学平台,向学生展示与授课内容相关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图片、视频、网页信息和与时俱进的思政讯息,丰富课堂形式;充分运用原著《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及英译本中的习近平总书记工作报告、讲话、演讲、书信等作为课堂教学案例、翻译文本、演讲范本、写作模板等,将思政元素润物细无声地融入课堂。

课后,在智慧教学平台上发布《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与授课主题相关的节选音视频及文本资料,以小组活动的形式布置课后任务,鼓励学生自主性探究学习,添加如新闻听说专练、阅读理解、小练笔以及中国特色时政话语翻译等任务,在强化学生外语听说读写译等专业技能的同时,提高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向国际社会传播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增强了学生的文化自信和国家认同感。

2.3 潜移默化“进学生头脑”

“进学生头脑”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思政育人的最终目标,也是教学体系向价值体系转化的关键一环,实施路径主要在于氛围的营造,即育人环境的优化。

这里的育人环境包括软环境(精神环境)和硬环境(物质环境),其中软环境指文化氛围的营造和课外活动的组织。文化氛围如宣扬学校文化、班级文化,鼓励学生以青春之我共筑青春之国家,培养家国情怀;课外活动包括英语角、英语朗诵、阅读、写作比赛、跨文化知识讲座等“第二课堂”类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道德、法制以及国情教育,使其做到“知行合一”。学生在学习中不断提高政治水平,在学习中政治思想得到提高,道德意

识得到提升,法制意识得到增强。

硬环境如党史馆、校史馆建设,发挥好传承和发扬宝贵经验的作用,让学生把奋斗历程铭记在心,从党和学校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真正让学生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提升新思想认同的内生驱动力。

3 “三进”工作的外语类课程思政

以蚌埠学院英语专业第一学期专业基础课“英语阅读”课程的第七单元 The Call of the Wild(《野性的呼唤》)为例,揭示“系统完善进教材”“润物无声进课堂”和“潜移默化进学生头脑”的“三进”融入具体做法。

3.1 进教材

“进教材”主要体现了该课程的培养目标,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思政元素在教学实践达到相应知识、能力和素质目标后的融入。在知识目标方面,以英语专业知识传授为主,结合作品,巴克在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残酷的生存竞争时,表现出惊人的活力和适应力,它不畏艰难,勇往直前。融入相应的思政元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第六部分“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中提到的“改革越往深处走,责任越大;步履蹒跚,勇往直前;不能有丝毫懈怠,一停一停,一歇一歇”(2019 年 7 月 24 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9]。其英文表述为:As the reform goes deeper, it is more necessary to shoulder responsibilities, take swift but steady steps and forge ahead without taking a break, Xi said.

在能力目标方面,第七单元让学生进一步学习记叙文(narration)的写作手法、行文风格;掌握记叙文的基本要素及典型人物的塑造手段;了解自然主义风格(Naturalistic Style)、浪漫主义风格(Romantic Style)、第三人称全知全能的叙事角度(Narrative Perspective of the third-person Omniscient Point of View)、象征手法(Symbolic Techniques)、工笔与白描手法(Elaborate-style and Plain-style Painting Techniques)以及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 Techniques)等常用写作手法,对作品主题即“展现了生命的顽强与坚韧、文明与自然的冲突与融合以及人性与兽性的复杂关系”的烘托作用。通过练习用英语讲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提高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在素质培养目标方面,《野性的呼唤》中的“主人翁”巴克从人类文明的中心——圣克拉拉山谷出发,最终回到了自然的怀抱。这一旅程象征着人类

文明与自然之间的冲突与融合。2019年9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谈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10],强调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即“the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要求学生具备共同体意识,拥有正确的价值取向,从而达到具备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素质目标。

3.2 进课堂

课前,设计 Today in History of the CPC 活动,即“党史上的今天”,让学生搜集上课当天历史上发生的党史故事或具有代表意义的重大事件,可以是中英双语视频、图片或其他双语文本资料,上课时以小组为单位上台展示。如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巡览港珠澳大桥时强调,港珠澳大桥的建设创下多项世界之最,非常了不起,体现了一个国家逢山开路(blaze trails through mountains)、遇水架桥(build bridges over waters)的奋斗精神(the fighting spirit),体现了我国综合国力(China's comprehensive national strength)、自主创新能力(independent innovation capabilities),体现了勇创世界一流的民族志气^[11]。从而引导学生积极关注社情国情和世情,做到授课内容有的放矢、注重实效,充分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使学生形成正确的认识。

课中,《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行文形式本身就具有报告、讲话稿、谈话稿、批示、贺信等多重性,因此课堂上所涉及的各种写作体裁和手法可对比学习和运用。如《野性的呼唤》这部作品使用了生动的隐喻、象征手法,作者在文中向我们展示了极大的想象空间,如“荒野,总是充满金子般的诱惑力”“严寒仿佛冻结了大自然的心脏”“在零下六十五度的气温里,一个人只要在雪里多躺几分钟,就活不了”等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也运用了大量的生动比喻,如“一面镜子”(a mirror),即“要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一面镜子,审视我们各方面体制机制和政策规定”^[12];再如“帅”(General)“车马炮”(Rooks, Knights and Cannons),即“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13]。

课后,安排相应的角色扮演、小组讨论等活动作为课堂知识巩固以及《习近平谈治国理政》思想内化于心的载体。如《野性的呼唤》的作者杰克·伦敦在处理主角和配角时采用的是中国画中的工笔与白描的手法。主要人物是工笔式的浓墨重彩,次要

人物是白描式的一笔带过,让学生完成角色扮演作业录制视频上传至学习平台。教师在点评这个课后活动时引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4]即“Cultural confidence is a more fundamental, extensive and profound form of self-confidence, and it is the most basic, profound and enduring force.”学生在巩固英语专业知识的同时,体会到了中国传统绘画工笔与白描独特的魅力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加强了文化自信。

3.3 进学生头脑

就“英语阅读”课程的第七单元 The Call of the Wild(《野性的呼唤》)而言,“进学生头脑”侧重于育人环境的软环境即精神环境,如文化氛围的营造。文化氛围方面借助该课文使用的象征手法,即作者笔下的阿拉斯加白雪皑皑,荒野广袤而寂静,充满了象征意义。无言的雪野,最严峻的生与死的考验,时时刻刻,严酷无情地面对着任何一个生命。冒险之举于人,则是欲擒故纵,欲罢不能。但只要稍微打破自然规律,就会有最大限度的危险出现。这也反映了作者渴望公正和平等的生活理想。从而宣扬公平、公开、公正的班级文化,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正”的内涵。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让国家变得更加富强,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让人民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是中国人民孜孜不倦追求的理想^[15],即 Making the country more prosperous and powerful, making society more fair and just, and making people's lives better are the ideals that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been assiduously pursuing. 由此培养学生对“公正”这一思想的政治认同和价值认同。

此外,在外语类专业课程中结合知识点展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三进”思政育人,具体说来还可在词汇教学中融入价值观教育、语法教学中培养严谨态度、文本讲解中渗透文化自信与国际视野、口语训练中培养团队合作精神等。如讲到 honesty 时,强调诚信教育,融入核心价值观;语法教学中强调语法规则的准确性和严谨性,培养学生认真、细致和严谨的学习态度;文本讲解中对比中西文化差异,引导学生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加强文化自信;口语训练中注重角色扮演,培养团队合作精神,使学生学会倾听他人意见,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努力。

4 结论

在新时代背景下,高校外语类专业承担着培养

具有国际视野、跨文化交流能力且德才兼备的外语人才的重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三进”为高校外语类专业课程思政一体化育人模式的建构提供了宝贵机遇与丰富资源。

高校通过“三进”工作,推动课程思政在外语类专业落地生根,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的丰富内涵与外语类专业课程紧密结合。从课程目标的重塑,到教学内容的有机融入,再到教学方法的创新以及评价体系的完善。这一模式不仅增强了学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是厚植了学生的家国情怀,坚定了他们的理想信念,提升了政治素养,使学生在掌握外语这门沟通工具的同时,深刻理解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道路和内外政策,具备运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用外语传播中国声音的能力。然而,高校外语类专业课程思政一体化育人模式的建设并非一蹴而就,仍面临着诸多挑战:专业课教师对课程思政的认识和理解不够深入,在教学实践中把握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融合点不够精准;教学资源的整合与共享还需进一步加强,以满足不同课程、不同教学场景的需求;在课程思政教育的个性化与精准化实现上,还需要持续的探索。

今后,各高校要进一步加大教师培训力度,提升教师课程思政意识和能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外语专业课程思政师资队伍。持续深入挖掘《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思政元素,结合时代发展和学生需求,不断更新和优化教学内容,丰富教学资源。同时,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创新教学手段和方法,构建更加完善的课程思政教学平台,实现线上线下教学的深度融合。就外语类专业一体化思政育人而言,教学内容上要做到深度融合和与时俱进,教学方法上注重数字化赋能和跨学科教学,教师队伍方面需提升素养和协同合作,评价体系上要介入多维度和过程性评价,育人共同体上做到大中小衔接和社会资源融入。此外,还需加强校际、校企以及国际合作,拓宽学生的实践渠道和视野,在实践中检验和提升课程思政的育人成效,为培养更多适应新时代需求的复合型外语人才而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1] 国家教委. 关于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思想品德课

教学改革若干意见[Z]. 1995.
[2] 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通知[Z]. 1998.
[3] 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通知[Z]. 2003.
[4]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工作的通知[Z]. 2003.
[5] 文秋芳. “一体化”思政育人体系在“英法双语+专业”国际治理人才培养中的应用尝试[J]. 外语界, 2021(3): 2-8, 30.
[6] 冯千, 张舒怡, 许家金. 基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三进”的日语翻译鉴赏课程思政建设实证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 2022(5): 11-18.
[7] 陈艾舒, 王冰, 张树文. 基于《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三进”的高校英语演讲与辩论课程思政教学实践[J]. 外语电化教学, 2023(2): 10-16.
[8] 成昭伟, 李海英, 李慧.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多语种版本融入高校外语教学的必要性和途径探讨[J]. 中国外语, 2024, 21(1): 101-108.
[9]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EB/OL]. [2019-07-24]. https://www.gov.cn/xinwen/2019-07/24/content_5414669.htm.
[10] 习近平: 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EB/OL]. [2024-09-27].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9/content_6976962.htm.
[11] 习近平出席开通仪式并宣布港珠澳大桥正式开通[EB/OL]. [2018-10-23]. https://www.gov.cn/xinwen/2018-10/23/content_5333803.htm.
[12] 习近平: 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EB/OL]. [2013-12-31]. https://www.gov.cn/ldhd/2013-12/31/content_2557965.htm.
[13] 刘屹. 坚强领导, 盘活强国大棋[EB/OL]. [2017-09-11].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wb/html/2017-09/11/content_1804308.htm.
[14] 习近平.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EB/OL]. [2021-04-15]. https://www.gov.cn/xinwen/2021-04/15/content_5599747.htm.
[15] 习近平主席发表 2014 年新年贺词[EB/OL]. [2013-12-31]. <https://news.12371.cn/2013/12/31/VIDE1388489101240555.shtml>.

中国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的国际经验及实现路径

张海军^{1,2}

(1. 巢湖学院 经济与法学院, 安徽 合肥 238024; 2. 阜阳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 安徽 阜阳 236037)

摘要:持续有序地扩大金融开放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格局的重要内容,而资本项目可兑换在金融改革开放中处于核心地位。针对30年来中国政府出台并采取的一系列促进资本开放的政策和措施进行分析可知,相对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中国资本开放的程度依然较低,进程也相对缓慢,亟须加快改革步伐。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必然伴随着国际资本的流动,会对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和实体经济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需要关注国际金融风险的传递和暴露。从区位和国情看,日本、韩国、俄罗斯和巴西四国在资本开放方面的经验做法,能为我国进一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提供有益借鉴,主要集中在注重资本项目开放顺序、延长资本项目开放时间以及加强资本项目账户的风险防范等方面。

关键词:资本项目可兑换;金融开放;金融风险;跨境资本流动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3-0103-05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the Reform of Capital Account Convertibility in China

ZHANG Hai-jun^{1,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Law, Chaohu University, Hefei, 238024, Anhui;

2. School of Economics,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37, Anhui)

Abstract: Continuously and orderly expanding financial opennes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 opening-up in the new era, and capital account convertibility holds a core position in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Despite a series of policies and measures adop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promote capital openness over the past thirty years, the level of China capital openness remains relatively low compared to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the progress has been relatively slow, requiring an acceleration of the reform process. The reform of capital account convertibility is inevitably accompanied by the international flow of capital, which will have an impact on capital markets, money markets, and the real economy, thus it is necessary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transmission and exposur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ris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tion and national conditions, the experience and practices of Japan, South Korea, Russia and Brazil in the area of capital openness can provide valuable references for further advancing the reform of capital account convertibility in China,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the order of capital account openness, prolonging the duration of capital account openness, and strengthening the risk prevention of the capital account.

Key words: capital account convertibility; financial openness; financial risk; cross-border capital flow

收稿日期:2024-05-18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Q2022D023);安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科研项目(2022AH051692);巢湖学院学科建设质量工程重点研究项目(XWZ202406)。

作者简介:张海军(1992-),男,江苏南通人,讲师,博士。E-mail: strivezhj@163.com

金融市场的开放及其进程始终摆脱不了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提出的三元悖论,即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至多只能实现两种政策组合,这也被称为“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事实上,三元悖论也并不是绝对的,2022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汇率安排与汇兑限制年报》就指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完全实现资本的自由流动,也就是说,世界各国都是处于相对稳定的中间状态。从中国金融制度安排方面看,确保货币政策具有独立性是不容撼动的,在此基础上我国采取了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和对外资本管制的弹性管理的制度(有限资本开放制度),在维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和实现货币政策目标之间寻求均衡状态,这一政策组合也是我国现阶段最优的金融制度安排。当然,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背景下,稳步扩大资本项目开放是必然趋势,也是我国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变局,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保障。

1 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

自 1993 年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提出资本项目可兑换以来,历经 30 年改革深化发展,中国资本项目可兑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何稳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是我国目前亟须解决的重大课题。我国资本项目开放是按照“最迫切的先开放、风险大的后开放”“流入在前、流出在后”“长期在前、短期在后”“直接投资在前、证券投资在后”“机构在前,个人在后”的内在规律,有步骤、有目标地稳步推进^[1]。

第一阶段(1979 - 2000 年):资本账户开放初步探索时期。1979 - 1985 年颁布了多部企业法,制定多项管理规定,放松直接投资部分限制,鼓励外资企业进入,规范外资企业管理,形成直接投资管理体系。这一阶段为吸引外资,采取的是“先进后出、宽进严出”的方式重点开放直接投资项目,未开放证券投资项目,严格控制其他投资项目。

第二阶段(2001 - 2009 年):资本账户开放积极深化时期。直接投资方面:一方面,进一步扩大外资引进力度,不断完善外资管理机制;另一方面,优化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强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2006 - 2009 年出台了系列法规以规范境外投资管理模式、简化管理程序,鼓励国内企业“走出去”。证券项目投资方面:2002 年和 2006 年先后实施 QFII 和 QDII 有条件开通国内外证券投资双向渠道,并不断减少 QFII 和 QDII 制度限制条件来进一

步扩大证券投资项目开放程度。

第三阶段(2009 年至今):资本账户开放稳步推进时期。这一阶段资本账户开放的特点是有“破”有“立”。“破”是逐步放宽并取消对跨境资本流入和跨境金融项目交易的限制,当前已经基本实现了直接投资项目的可兑换。不止于此,国内资本市场一系列重要的改革(如实施深港通、沪港通、沪伦通等),建立并拓宽了国内资本市场与境外资本市场互联互通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证券投资项目的可兑换改革。“立”体现在建立了一系列有助于资本跨境流动的管理机制,主要体现在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管,如将跨境资本流动纳入宏观审慎管理范畴,并探索构建功能监管和宏观审慎管理双支柱的监管框架。

2 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风险

外汇市场、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组成资本流入和流出的全流程,风险沿着资本进出路径传递和暴露,因此资本开放风险具体表现在资本自由流动对外汇市场、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产生的影响^[2]。

2.1 资本市场 - 外汇市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约束

正如上文的“三元悖论”所述,在资本项目未开放以前,我国在外汇严格管制的同时保持着货币政策的独立。但资本项目开放后,若货币当局仍坚持以维护货币政策独立性为主要目标,那么就需要放弃对汇率的管控;若坚持以汇率稳定为主要目标,那么不但无法实现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而且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也难以得到保障^[3]。

2.2 外汇市场 - 金融市场:金融资产价格波动风险

国际资本频繁进入一个国家会导致汇率、利率和股票价格波动,金融资产的波动影响金融市场稳定性。当国际资本大规模进入时,外汇市场本币需求大于供给,本币升值;银行资产负债表扩张,货币供应量增加,利率下降;股票市场流动性增加,股票价格上涨。当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出时,则反之。

2.3 资本市场 - 实体经济:宏观经济稳定性受冲击

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为流入国提供大量建设资金,促进经济发展,但也会引发本国通货膨胀,汇率上升,经济过热,给抵御风险能力较弱的企业带来巨大冲击。当国内利率低于国际利率或其他外部条件发生改变时,资本外逃风险会增加。短期的大规模资本流出将导致国内资金供给不足,偿债能力下降,冲击实体经济(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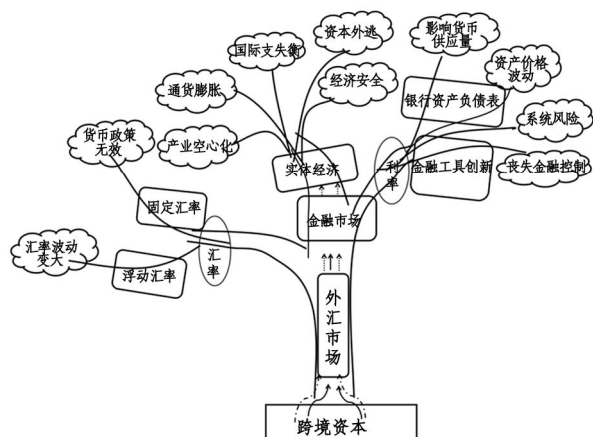


图 1 跨境资本自由流动风险示意图

3 资本可兑换的国际经验

3.1 日本:相机抉择审慎短期资本流入限制模式

日本资本项目开放采取相机抉择与审慎松紧的渐进式开放模式,其开放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开放直接投资(1964 - 1979 年)。1964 年《外资法》的修改,标志着资本项目开放正式开启。1964 - 1972 年简化了直接投资的审批流程,逐渐放松并取消对投资额度、准入条件和投资领域的限制,外汇制度也由固定汇率制度调整为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1972 - 1976 年国际资本投资证券市场管制逐步放松,取消部分个人对外投资限制条件,汇率制度由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改革为浮动汇率制度,同时为了应对 70 年代初期日元升值带来的资本流入压力,日本对短期资本流动出台了临时管制措施(1971 - 1972 年),但在 1979 年直接投资项目基本实现可兑换。第二阶段实现资本项目基本可兑换(1980 - 1997 年)。1980 年颁布了新外汇法,解除日元汇兑限制。1981 - 1984 年,对外直接投资和借用外债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放开个人境外购房和对外日元贷款,允许国外机构投资者进入债券回购市场。1984 - 1989 年,日本对外开放步伐加快,并逐步放开了证券市场的准入,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取消直接投资流入的限制、鼓励外商进行直接投资,并于 1991 年基本实现了外商直接投资的开放。第三阶段资本项目实现完全可兑换(1998 年至今)。1998 年再次修改外汇法,废除了对资本交易限制、汇兑审批以及事前申报制度,实现了资本项目自由化。

3.2 韩国:先“流出”后“流入”模式

韩国资本项目开放分阶段分重点以先“流出”后“流入”模式推进,开放历程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重点开放资本流入项目(1959 - 1980 年)。1959 年开放境外投资。1976 - 1980 年,韩国出台多部法律,鼓励境外直接投资,并同多国签订保护协定以保障海外投资安全与效益。第二阶段(1981 年至今)注重资本流入,多元化开放。1981 - 1997 年,逐步开放了外商直接投资、外债和跨境证券投资。1997 - 2008 年,韩国加速资本项目开放进度,向外资开放所有货币市场工具,简化了外汇交易流程,放开居民外汇交易、境外存款、信托和不动产投资限制,资本交易许可制改为事后报告制。2008 年至今,韩国开始在维持资本项目开放的框架下,引入宏观审慎管理措施应对跨国资本投机性的冲击。

3.3 俄罗斯:激进式“休克疗法”自由化改革模式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开启了“休克疗法”经济改革,走上了激进式的金融自由化改革道路。在资本项目改革开放方面,俄罗斯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建立外汇市场机制,逐步取消对资本项目的管制(1992 - 1998 年)。1992 年开启了外汇市场的建设,并推行汇率制度改革,实行经常项目下统一浮动汇率制度和卢布国家内部可兑换制度,至 1998 年俄罗斯已基本取消了资本项目的管制。第二阶段金融体制自由化改革(1998 - 2006 年)。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为抵御金融风险的肆虐,俄罗斯加强了对资本项目的管制,但随后俄罗斯加大了金融安全建设和金融体制改革的力度。2003 年以后,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步降低以及国内金融环境逐步优化,俄罗斯逐步放开了对资本项目管制,并于 2006 年出台新外汇法实现了经常项目下的资本项目自由兑换。

3.4 巴西:管制与放松相机抉择的渐进式开放模式

巴西于 1962 年开始推进资本项目开放,采取管制与放松相机抉择的渐进式开放模式,其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以外债为开放重点(1962 - 1986 年)。1962 - 1965 年先后出台一系列关于国外直接投资和信贷法律文件,对外资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严格控制^[4]。1973 - 1984 年,巴西大规模举借外债发展经济,从而初步形成以外债为主导的资本项目开放模式。第二阶段经济金融自由化改革,全面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1987 - 2004 年)。1987 - 2000 年先后开放股票市场、债券市场、其他投资项目,建立统一的外汇市场。同时,1992 - 1995 年,为了避免短期内外资大规模流入对金融市场的负面冲击,巴西采取设置金融交易税、对外资流入期限进行限制等临时性资本管制措施。第三阶段(2005 年至今)资本项目自由开放阶段。自 2005 年以来,巴

西进行了几项关键性改革以简化流程、降低限制和引入宏观审慎政策以降低资本流动带来的风险。

3.5 日韩俄巴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经验借鉴

一是资本项目开放分阶段、试点扩面有序推进。从日韩俄巴的资本项目开放历程看,四国资本项目都不是一次性全部开放,而是对资本项目分阶段开放,按照本国经济需求性和风险收益性原则进行资本项目开放次序安排。日韩俄巴四国完成资本项目基本开放平均年限为 30 年左右,在开放顺序上金融机构账户优先于个人账户、直接投资项目优先于证券投资项目,可见需要精心设计、寻求符合本国国情的资本项目开放过程。近年来,中国资本项目开放程度逐步提高,在金融市场准入方面,中国共宣布了三轮共计 34 条对外开放新措施,如取消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扩大外资机构业务范围、放宽外资机构和业务准入条件等,从而强有力地提振了外资金融机构投资的信心;在制度创新方面,我国实施了以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为载体和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建设为载体的模式,即在自贸区内形成金融开放创新先行先试优势,重新破题以对标国际金融市场的高标准要求,如在外商投资领域确立了“负面清单”制度等,同时打造了深港通、沪港通、沪伦通、债券通等双向开放机制^[5]。实际上,未来中国资本市场的开放将进一步加强“互联互通”和金融进一步开放的制度创新。

二是资本项目开放与汇率、利率改革协同推进。日韩俄巴四国在资本项目开放与汇率、利率市场化改革先后顺序选择上虽有不同,但各国采取的汇率和利率政策为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发挥了制度保障和“助推剂”作用,且这些国家并不拘泥于某种汇率或汇率政策,而是根据本国需要灵活采取相应的汇率、利率制度,从而在改革中把握了主动权,维护了国际收支的平衡和外汇储备的稳定^[6]。从日韩俄巴四国资本项目开放的经验看,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到位是资本项目成功实现开放的本质要求,同时还需要有相对发达完善的金融市场作为支撑,更重要的是,要建设一个稳健的金融体系。中国目前已经实现了利率市场化改革,但汇率市场化程度依然偏低,适应国际金融市场的金融体系依旧有待完善。从我国现行金融制度安排角度看,汇率市场化改革与资本项目开放先后推进和协同推进都可以,一方面,在国际热钱投机势力日益高涨的背景下,优先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能有效遏制国际投机资本大规模流动;另一方面,优先实现资本项目开放,也有助于倒逼汇率机制改革提速^[7]。在“谁先

谁后”的问题上并没有定论,但需要评估改革策略对货币政策效果的冲击,并以此确定最优的改革路径。

三是推动市场化的宏微观审慎管理,统筹金融开放和安全。资本项目开放并不意味着放弃管制,日韩俄巴四国在资本项目开放推进过程中都穿插临时管制措施。在资本大量涌入时,采取措施应对“热钱”投机的冲击;在资本持续净流出时,资本管制适时放开。日韩俄巴都引入宏观审慎政策来降低流动资本带来的风险。实际上,日韩俄巴四国都强调了市场化的宏微观审慎管理政策的重要性,如俄罗斯强化金融安全建设和金融体制改革,巴西引入宏观审慎政策等。对中国而言,一是要完善外汇资本市场的逆周期调节机制和跨境资本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实现对资本流动带来的波动风险的市场化调控;二是要提高微观监管能力,做到准确识别非常态化的资本流动,并及时准确地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三是加强监管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借助金融科技对资本项目开放过程进行“穿透式”监管甄别,从而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

4 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策略

基于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现状和借鉴日韩俄巴资本可兑换经验,本文进一步从控制引入“资本活水水量”(资本项目开放顺序)、延长“资本活水管道路”(资本项目开放时间)、加强“资本活水水位”监测(资本项目监测设计),降低和抵御“资本活水冲击力”(资本项目制度改革)等方面,提出我国资本项目开放策略(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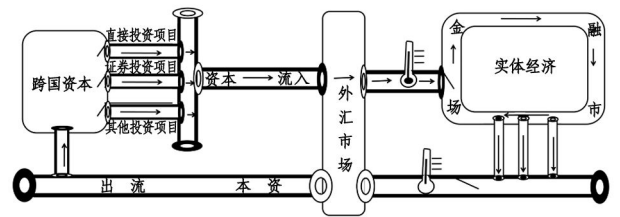


图 2 资本项目开放时资本流动示意图

4.1 从“时间”+“空间”拓展,循序推进

资本项目开放要循序渐进式推进,需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制定推进路线和时间表。对资本项目开放的深度和开放区域的宽度进行组合会产生更大资本项目开放路径选择,提高改革的容错率^[8]。资本项目开放次序和开放地理区域是对资本流入和流出量的一种控制,降低一次性全部开放带来资本

流量过大并危及国内经济金融安全的风险。资本项目开放的时间安排,是延长资本“洪峰”入境时间,为金融和经济赢得准备时间。

从时间上来看,对于我国还没有开放的资本项目中各子项目的开放顺序选择,可以基于风险大小和现实需求的急迫性原则,设定为:资本流入先于资本流出,长期资本流动先于短期资本流动,一级市场先于二级市场,直接投资先于证券投资,机构投资先于私人投资,债券投资先于股权投资^[9]。

从空间上来看,以“人民币普遍接受性”为主线,采取“上海自由贸易区-国内自由贸易区-大中华经济圈-自贸协定区、货币互换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华人聚居地-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全球范围”的资本账户空间推进路径,通过全球区域试点,扩大影响,总结经验,然后在试点区域周边逐步发散,再扩大影响,层层推进。

4.2 抓“利率”+“汇率”改革,协同推进

汇率是调蓄跨境资本的“蓄水池”,是资本进出的“第一道防线”。人民币汇率市场化要求加快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推动人民币在非储备货币区域的交易发展,引导离岸人民币市场向好发展,从而建立全方位、多层次、安全有序、富有竞争力的外汇市场^[10]。利率是调动跨境资本的“水渠”,决定跨境资本的流向,利率市场化驱动资本资源的优化配置,避免“旱”“涝”(资本投机冲击和资本外逃)。利率市场化要完善金融市场,优化国债收益曲线,建立基础利率决定机制,减少对利率的管控。

4.3 优“金融”+“实体”发展模型,整体推进

金融市场是直接冲击面与冲击承受网,金融市场的完善程度和实体经济的发展状况决定了一个国家抵御跨境资本冲击的能力。完善金融市场发展,提升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要发展货币市场和外汇市场等基础市场并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要加强金融产品创新,丰富金融市场交易工具,增加金融市场的产品供给;要优化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发展金融科技;要扩大金融参与主体,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

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是抵御跨境资本冲击的根本条件,经济实力的强大程度与资本项目可兑换风险大小成正相关。实体经济的发展要不断寻找新的增长点,不断调整发展方式,通过增加新的增长点来保持增长动力,通过调整发展方式来优化发展路径。

4.4 靠“监测”+“调控”防范,安全推进

加快构建跨境资本流动的功能监管和宏观审慎

“双支柱”管理体系。一是充分利用利率政策、汇率政策、税收政策、央行货币政策工具等多种方式守住不发生系统风险的底线,维护金融安全;二是要积极丰富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工具箱,精准识别、应对国际金融风险的流入,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跨市场、跨国境传染;三是加强应对短期国际资本剧烈流动的管理,制定有效、及时、可操作的“临时性管制”政策,防范外汇市场剧烈波动的负面影响;四是在风险可控前提下,货币当局需要加快推动经常账户下的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

要加快建立有效的资本项目管理与分析监测体系。一是创新资本项目管理方式,采用市场化的价格型货币政策,如汇率政策、利率政策来调控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资金头寸,慎用、避免频繁使用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二是创新短期资本流动的监测管理与风险预警机制,可以依托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金融科技构建实时监管与预警平台,如推进“监管沙盒”中国化改革、编制跨境资本流动“冒烟”指数,从而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发生。

参考文献:

- [1] 叶亚飞,石建勋. 中国资本项目开放:进程,影响与实现路径——率先实现实体部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可行性研究[J]. 经济学家,2021(8):71-80.
- [2] 周小川. 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前景和路径[J]. 金融研究,2012(1):1-19.
- [3] 叶海生. 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J]. 中国外汇,2021(13):74-77.
- [4] 何碧英,谢钢,易庆玲,等. 资本项目可兑换路径国际经验比较研究及对我国的启示——基于日本、韩国、巴西和俄罗斯资本项目可兑换实践[J]. 区域金融研究,2019(7):57-63.
- [5] 王春,袁晓婷,丁林甜. 资本市场开放对股价同步性的影响:ETF 纳入互联互通的视角[J]. 金融市场研究,2024(1):55-70.
- [6] 曾欢,陈文良. 资本项目可兑换国际经验比较研究及对中国的启示——基于中国周边 4 国可兑换实践[J]. 武汉金融,2016(11):49-54.
- [7] 彭红枫,肖祖沔,祝小全. 汇率市场化与资本账户开放的路径选择[J]. 世界经济,2018(8):149-170.
- [8] 冯丽. 资本项目可兑换与汇率制度改革协同推进的国际经验借鉴及启示[J]. 甘肃金融,2019(10):8-11.
- [9] 巴曙松,冯超. 全球资产再配置中的资本项目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开放[J]. 中国外汇,2019(19):14-17.
- [10] 周诚君. 当前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思考[J]. 中国金融,2019(21):31-33.

脱贫地区乡村人才振兴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赵亚灵*, 尹洁

(西安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4)

摘要:分析了脱贫地区乡村人才振兴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以及驱动农业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和文化遗产的“绿色引擎”的必然要求,新时代背景下,脱贫地区乡村人才资源匮乏、乡村人才流失严重、外来专业人才引进困难以及乡村人才培养力度不足等问题制约着乡村人才振兴。以问题为导向进行脱贫地区乡村人才振兴探索,可以从重视本土优质人才、优化乡村人才发展环境、推动外来专业人才引进工作以及做好乡村人才培育工作四个方面进行乡村人才振兴的路径探索。

关键词:脱贫地区;乡村振兴;乡村人才振兴

中图分类号:F126;F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3-0108-07

Realistic Dilemma and Practical Path of Rural Talents Revitalization in Poverty Alleviated Areas

ZHAO Ya-ling*, YIN Jie

(School of Marxism, X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Xi'an, 710054, Shaanxi)

Abstract: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talents in poverty alleviated areas is a vital guarantee for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achieving moder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areas, and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driving the “green engine”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cultural inheritance. Poverty alleviated areas confront challenges such as scarcity of rural talent resources, severe loss of rural talent, difficulties in attracting foreign professionals, and inadequate efforts in rural talent cultivation, which are restricting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talents. Guided by these issues, explorations into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talents in poverty alleviated areas are conducted, focusing on discussing pathways through four aspects: Emphasizing local high-quality talents, optimizing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for rural talents, promoting the recruitment of foreign professionals, and enhancing rural talent training efforts, all from a problem-oriented perspective.

Key words: poverty alleviated areas; Rural Revitalization; rural talents revitalization

乡村人才振兴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对于提高乡村经济发展水平和改善农民生活质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脱贫攻坚战中,人才的作用尤为突出,持续推动着农业农村的发展。2021年2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指出:“坚持把乡村人

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要求大力培养本土人才,引导城市人才下乡,推动专业人才服务乡村,吸引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健全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1]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大计。”^[2]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加强乡村人

收稿日期:2024-09-16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BKS012)。

作者简介:赵亚灵(1996-),女,河南商丘人,博士研究生;尹洁(1963-),女,陕西西安人,教授,博士。E-mail:759436636@qq.com

才队伍建设。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组织引导教育、卫生、科技、文化、社会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等领域人才到基层一线服务,支持培养本土急需紧缺人才”^[3],进一步提出加强对乡村人才的培育、充分发挥人才的效能与作用、提高乡村人才的知识素养和技能等举措。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壮大乡村人才队伍。实施乡村振兴人才支持计划,加大乡村本土人才培养,有序引导城市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下乡服务,全面提高农民综合素质”^[4],进一步强调了人才对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意义。在新时代背景下,无论是推动城市的持续繁荣,还是促进乡村的全面振兴,人才都是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

1 脱贫地区乡村人才振兴的重要意义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推进乡村振兴为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物质基础、提供制度保障并开拓市场空间,最终还是要依靠乡村人才来实现^[5]。因此,对脱贫地区乡村人才现状进行深入分析,对于制定有效的人才政策、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1.1 人才振兴是促进脱贫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首先,人才振兴有助于为脱贫地区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6]脱贫地区的人才振兴离不开创新发展,创新的核心是人才。在脱贫地区,由于缺乏懂三农、懂市场、懂管理的适用型人才,很多资源和政策难以得到有效利用。因此,强化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对脱贫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这些人才不仅具备丰富的知识和经验,更拥有开阔的视野和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能够为脱贫地区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理念,提升当地的发展水平,从而形成坚实的人才支撑和保障体系。

其次,人才振兴有助于激发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激励人民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内生动力,对人民群众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至关重要。”^[7]针对脱贫地区的实际情况,开展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教育培训和技能培训活动,搭建起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教育培训平台,为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学习机会。在培训过程中,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案例分析、现场教学等方式,让群众在学中干、干中学,真正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这些活动不仅涵盖传统产业的技能提升,而且涉及到新兴产业的技能培训,帮

助当地居民掌握更多的知识和技能,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既能增加他们的就业机会,还能为他们创造更多的收入来源,以增强他们自我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从而提升脱贫地区内生发展动力。

最后,人才振兴是助力脱贫地区实现乡村振兴发展的关键环节。在脱贫攻坚战过程中,人才运用其知识、技能和创新能力,为贫困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人才不仅是推动脱贫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更是确保脱贫成果可持续、防止返贫现象发生的重要保障。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无论是农业技术的推广、工业企业的创办,还是旅游业的开发,都需要有专业人才去实施和管理。因此,需要充分激发乡村现有人才活力,把更多城市人才引向乡村创新创业,培育产生一大批新型农民,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畅通智力、技术、管理下乡通道,造就更多乡村人才,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2 人才振兴是实现脱贫地区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支撑

首先,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人才能够推动农业科技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人才。”^[8]在乡村振兴实施的过程中,农业科技创新是推动农业现代化、提升农业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人才是农业科技创新的主体,只有具备专业知识、技能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才能够研发出适合我国农业发展的新技术、新设备、新品种,从而推动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进一步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增加农业收益。

其次,人才能够促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脱贫地区的人才还能够促进农业产业链的完善和延伸。这些人才不仅具备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而且对市场和农业发展有着深刻的洞察和理解。他们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和资源条件更有效地指导农业生产,引导农民发展附加值高、市场竞争力强的农产品加工业和休闲农业等新兴产业,延长农业产业链,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效益,从而推动农业产业的转型升级,使其农业产业结构向更加合理和高效的方向发展,提升农业的整体效益。这既有助于增加农民的收入来源,也能够为当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进一步推动农村经济的繁荣发展。

最后,人才是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助力农村现代化的核心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4]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必须激发乡村社会的内生动力,加大对脱贫地区人才的培养与引进。结合地方实际,依托

本土资源和独特的文化背景,通过加大乡村教育投入力度,提高乡村地区的教育水平,加强对本土人才的技能培训,提升他们的农业生产技能、经营管理能力和市场意识,使他们能够适应现代农业和乡村旅游业的发展需求。同时,通过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制定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建立乡村创新创业平台,进一步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引入外部智力资源,吸引各类人才到乡村创业就业。

总的来说,人才是脱贫地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通过培养和引进各类人才,可以有效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和应用,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管理水平,进而实现农业农村的现代化目标。

1.3 人才振兴是驱动脱贫地区农业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和文化遗产的“绿色引擎”

人才振兴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是开启农业产业发展、农业新技术推广、一二三产业融合的“金钥匙”,同时也是驱动绿色农业发展、生态休闲旅游、森林康养培育的“绿色引擎”。人才振兴不仅支撑着农村文化传承、数字乡村建设、基层组织管理,而且对于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在农业产业发展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必须有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作为支撑。这意味着,在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必须重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为农业科技创新、农业产业升级以及农业经营模式的优化提供智力支持,从而推动农业产业的持续发展。在生态保护方面,培养具备环保意识和专业技能的人才,让他们更好地参与到乡村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中来,促进提升脱贫地区居民对生态保护的认知和实践能力,使他们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注重环境保护,实现绿色发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在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方面,乡村文化是乡村的精神内核,是振兴乡村人才的重要内容^[9]。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需要培养和引进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创新能力的人才,注重对传统文化的挖掘与传承,同时推动文化的创新发展,让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焕发出新的活力。

人才振兴如同一台“绿色引擎”,在驱动农业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和文化遗产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必须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工作,为脱贫地区推动乡村振兴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2 脱贫地区乡村人才振兴面临的现实困境

2.1 脱贫地区乡村人才资源匮乏

脱贫地区乡村人才结构存在老龄化、文化素质偏低等问题,缺乏具有高学历、高技能的创新能力和现代管理理念的年轻人才,难以满足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际需要。根据相关数据表明,农村劳动力的构成中,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比例极低,每 2000 余名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中,仅有 1 名是农业技术推广人员,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乡村地区人才短缺的问题。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城市化的步伐在近些年持续加速,更多的农村劳动者选择前往城市寻找工作机会。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农村出现了“空心化”现象。农村的常驻居民,尤其是中青年,呈现出明显的减少趋势,同时中青年人才的流失也相当严重。目前,我国乡村人口结构呈现老龄化态势,但由于受教育程度低和职业发展不平衡等因素影响,中青年外出打工人员仍占很大比例,这导致了部分地区出现“空心化”现象。农村地区的专业人才数量明显短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进程中,脱贫地区无论是指导农业生产与经营领域的专业人才、推动农村第二、三产业发展的复合型人才、致力于乡村公共服务的专业服务人才、强化乡村治理能力的治理人才,还是引领农业农村科技创新的科技人才都极其缺乏。在此背景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无疑将面临诸多显著且复杂的挑战。这些挑战既体现在知识技能的不足上,还涉及观念转变、创新能力激发、适应现代农业与乡村治理新要求等多个层面。

2.2 脱贫地区乡村人才流失严重

在过去的 40 年里,中国成为了农村劳动力转向非农行业增长最迅速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在这一时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在 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几乎所有的农村劳动者都参与了农业生产活动。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统计监测调查数据表明,2022 年全国农民工总量 29 562 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 17 190 万人,本地农民工 12 372 万人^[10]。在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衔接进行第三方评估时发现:一方面,由于教育资源分配不均或历史欠账等原因,脱贫地区的乡村人才往往流向更发达的城市或地区,城市在资源配置、就业机会、公共服务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农村青壮年劳动力选择离开家乡外出务工,农业生产主要依靠留守妇女和老年人来维持,这样本地的乡村人力资源相对匮乏;另一方面,除了有部分学生

能够完成高等教育外,因就业机会有限或待遇不高,拥有高中或更高学历以及至少一项专业技能的农民大多数都选择在乡镇之外工作或打工,前往发达地区寻求更好的生活和发展机会,使得当地高素质人才难以留存,这就导致了乡村人才的严重短缺。这种城乡之间的“拉力”与“推力”共同作用,造成了大量的人才流失。这种情况与各个地区都“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作为提高农民收入和助力脱贫攻坚最有力的策略”这一策略息息相关。近年来,随着国家实施脱贫政策的力度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开始重视农村富余人员就业问题,并将之列入当地经济发展规划中。“必须始终从国情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首先要考虑人口基数问题”^[11],我国人口基数庞大,但高素质人才的比例相对较低。在脱贫地区,这一现象更为突出。此外,这种状况不仅影响到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潜力与活力,也成为了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与顺利推进道路上的挑战。

2.3 脱贫地区外来专业人才引进困难

为促进乡村的全面振兴和实现农民的富裕,仅依靠乡村可利用的人力资源储备是远远不够的。这要求必须“创新乡村人才引进方式,不断完善人才引进的相关政策,拓宽渠道分类引才”^[12]。当前,脱贫地区在吸引人才方面缺乏显著优势,很难吸引到企业家、学术专家、技术人员等各种专业人才到农村工作。一方面,乡村地区在生活环境、文化氛围以及产业发展环境等方面存在不足。目前,与城市相比,脱贫地区的大部分乡村在产业、教育、医疗、福利和就业机会等领域都存在显著的差距。这些乡村的经济增长速度较慢,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商业环境不优,同时交通、能源和社会服务的建设也相对滞后。同时,乡村的落后环境对专业人才的吸引力相对较低,他们不愿意待在乡村开展工作,这使得引进外来专业人才变得困难。另一方面,专业人才引进制度不完善。在着手引进专业人才之前,部分脱贫地区的基层政府未能对人才引进的具体类型、内在规律、科学标准及配套政策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这一不足直接导致人才引进缺乏针对性,进而影响了人才引进的成效与精准度。引进专业人才后,部分基层政府未能给予专业人才适当的安置与支持。此外,针对专业人才的管理体系尚不健全,在考核、评价及奖励机制等方面存在不到位和反应滞后的现象,影响了对专业人才的有效激励与管理效果。如果依靠通过制定政策吸引人才,却忽视对人才资源的持续培育与有效利用,那么,即便引进了外来专业人才,

他们也可能因缺乏发展机会与平台而不愿长期扎根农村,为基层发展贡献力量。因此,对脱贫地区而言,外来专业人才的引进,依然是当前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与亟待解决的难题。

2.4 脱贫地区乡村人才培养力度不足

乡村人才培养的力度与成效,对脱贫地区乡村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可以说,乡村劳动力素质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是乡村人才培养策略与实践效果的直接体现。在脱贫地区,由于农村普遍存在文化程度相对落后的现象,加之缺乏系统化、结构化的农民培训体系,导致农民群体的综合素质普遍偏低,其思想观念亦未能与时俱进。脱贫地区的教育基础薄弱也是导致人才培养力度不够的重要原因之一。2018年9月10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13]。而脱贫地区往往教育资源有限,教育质量不高,这直接影响了当地人才的培养和发展。缺乏优质的教育资源,就难以培养出具备高素质、高技能的人才来支撑乡村的发展。激励机制的不完善也是造成脱贫地区乡村人才培养力度不足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脱贫地区,因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许多有才华的青年无法获得应有的回报和认可,于是选择离开家乡去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这种人才的流失,无疑加剧了乡村人才培养的难度。此外,培训机制的不灵活以及公共服务供给与人才需求之间的不匹配,也对脱贫地区乡村人才培养产生了负面影响。培训体系的不足和培训模式的僵化,使得农民等乡村人群难以接触到高质量的职业技能培训和教育资源,从而限制了他们自身能力的提升。而公共服务资源的紧缺和质量不高,又进一步影响了乡村生活的品质和吸引力,更多的人才选择流向城市或其他更发达的地区。

3 脱贫地区乡村人才振兴的实践路径

脱贫地区乡村人才振兴面临着人才资源匮乏、人才流失严重、外来专业人才引进困难以及人才培养力度不足等一系列难题。为此,要实现脱贫地区乡村的人才振兴,就必须采取全方位、多层次的培养策略,不仅要扩大乡村人才的总体规模,而且要注重提升人才的质量与素养,全方位增强农民的知识储备与实践技能,从而全面推动乡村发展的人才基础。

3.1 重视本土优质人才

本土人才是引领村民迈向富裕之路的先锋力

量,也是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因素。需要高度重视并精心培育本土的杰出人才,加强构建本土人才施展才华、创新创业的广阔平台。

一是深入挖掘本土人才资源。围绕现代农业种植养殖技术、电子商务运营管理、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等核心领域,把具备高素质的新型农民、接受过中等高等教育的毕业生、返乡创业农民工、掌握先进科技知识的专业人员以及具备坚韧不拔精神的退役军人等作为本土人才资源的培养目标。同时,深入挖掘乡村中的传统技艺传承者与文化守护者,以及在各行各业中展现出非凡技艺的能工巧匠。采取建立多样化的发展策略,如单位积极推荐、个人主动申报、深入实地的探访交流以及举办技能与才艺展示大赛等,全面细致地筛选出潜藏于乡村之中的“土专家”与“田秀才”。针对这些优质人才,建立详尽的人才信息档案库,实施个性化、精准化的信息管理策略,确保每位人才的信息都能得到及时更新与动态维护,从而实现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与高效利用。这一举措旨在构建一个充满活力、多元共融的乡村人才生态体系,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二是抓好本土人才的孵化与培育工作。脱贫地区各级政府应站在战略高度,精心规划本土优质人才成长的蓝图,构建起融合高等教育、职业技能实训与实战历练为一体的全方位人才培养体系。具体而言,要深耕涉农职业教育这片沃土,鼓励职业院校紧密对接地方产业发展脉搏,精准培育一批能够支撑当地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的实用型、技能型人才,形成教育与经济深度融合、互促共进的良好生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实施新型职业农民素质提升工程。这不仅是提升农业竞争力的关键,也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石。“支持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技术协会、龙头企业等主体承担培训工作”^[14],邀请行业内的领军人物、致富先锋作为讲师,将最前沿的思想观念、最先进的农业技术、最务实的经营策略传授给脱贫地区农民朋友,努力打造一支既有现代知识武装头脑,又能扎根乡土、引领乡村发展的新型职业农民大军。此外,要加强对乡村手工业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各类实用人才的培育与扶持,通过设立大师工作室、传习所等形式,不仅传授技艺,更传承文化,让这些宝贵财富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满足乡村社会多元化、深层次的文化发展需求,为乡村振兴注入更加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持续的发展动力。

三是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在推动农业农村现代

化与乡村振兴的伟大征程中,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是推动脱贫地区繁荣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因此,应该构建一套科学、合理且富有吸引力的人才激励机制,吸引并留住各类优秀人才投身脱贫地区乡村建设,促进“老农民”向具备新时代特征、掌握先进技能的“新农人”转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6]人才激励机制的构建应当是多维度、全方位的,应当正式认定新型职业农民的身份,积极举办“乡村之星”评选活动,提高职业农民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鼓励和支持优秀的人才在脱贫地区施展才华。此外,要提供必要的资金和政策支持,用于支持新型职业农民的教育培训、技术创新和创业项目。进一步优化创业环境,简化审批流程,提供税收减免、土地使用优惠等政策,降低创业门槛和风险,让有意愿、有能力的人才能够安心扎根农村,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3.2 优化乡村人才发展环境

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人才的培养与队伍建设离不开环境的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15]因此,要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基础上,加速推进脱贫地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的现代化进程,打造宜居宜业、生态友好的乡村人才成长与发展的环境,以此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注入不竭动力与活力。

一是改善脱贫地区乡村居民的生活与居住环境。加速推进脱贫地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的现代化进程,进一步夯实交通、水利、电力、通信、教育和医疗资源等方面的基础设施。同时,必须高度重视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在脱贫地区乡村,因历史原因和地理条件的限制,生活垃圾处理、污水处理及环境污染问题需要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通过妥善处理脱贫地区乡村生活垃圾、科学处理污水以及积极应对环境污染问题,逐步缩小城乡生活条件的差距,为脱贫地区乡村人才构建宜居宜业、生态友好的工作与生活环境,从而吸引并留住更多优秀人才投身于脱贫地区乡村振兴的伟大事业中。

二是优化脱贫地区乡村的基础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夯实脱贫地区医疗卫生、教育资源以及交通设施等方面的公共服务体系,以消除人才回流乡村发展的后顾之忧。“依据党的二十大精神,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16]要加大对乡村医疗卫生设施的投资力度,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提高其专业水平和服务能

力,让医疗服务更加贴近民心、温暖人心。同时,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通过建设标准化学校、引入优质教育资源、实施远程教育项目等措施,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注重成人教育和职业培训,提升农民的就业技能和创业能力,为乡村经济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此外,政府应出台更具吸引力的政策措施,如为脱贫地区乡村人才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和职业发展路径,鼓励和支持高校毕业生、退伍军人、返乡农民工等群体投身乡村建设,形成“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的人才生态。

三是积极利用云计算、大数据等先进技术。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优势,构建高效、智能的脱贫地区乡村人才信息平台,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一环。通过构建集信息共享、分类管理与动态更新于一体的乡村人才信息平台,实现人才资源的数字化、网络化管理,这不仅能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还使得人才信息的获取更加便捷、准确。平台能够实时收集并分析乡村人才的分布情况、专业技能、发展需求等多维度数据,形成直观的人才供需分析报告,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这种基于数据的洞察能力,有助于精准识别乡村人才缺口,及时调整人才政策,促进人才资源在脱贫地区乡村的合理流动与优化配置。

3.3 推动外来专业人才引进工作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宏伟蓝图中,对高素质专业人才的需求显得尤为迫切。因此,必须积极构建聚才引智的强大磁场,采用多元化的策略和方式,广泛吸引并汇聚来自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投身于乡村的建设与发展之中,为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不断注入新鲜血液与智慧力量,确保脱贫地区乡村发展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与活力。

一是打造宜人的脱贫地区乡村环境,使其成为孕育人才的肥沃土壤。改善乡村的生活与生态环境,营造充满机遇与挑战、鼓励创新与奋斗的创业热土,使乡村成为吸引并留住人才之地。依托乡村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需精准定位,发挥区域特色,如建立特色农村电子商务孵化中心、生态友好型农业示范园区等,以此吸引与乡村发展需求高度契合的专业人才前来发展。同时,构建尊重人才、崇尚知识的社会氛围至关重要。大力弘扬人才兴村的理念,通过多渠道宣传在乡村振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专业人才事迹,树立典型,提升他们的社会认同感和价值感,让全社会形成尊重人才、珍惜人才的良好风尚。此外,为了更好地吸引并留住人才,还需不断优化乡村的工作与生活条件。这包括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如提供舒适的住房条件、优质的医疗服务以及便利的子女教育资源等,确保外来专业人才在乡村也能享受到便捷、舒适的生活。这一系列举措,将增强外来专业人才在脱贫地区乡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二是构建灵活的人才引进与激励机制。脱贫地区各级政府应制定并实施一系列创新的人才政策,引导各类专业人才汇聚乡村,共谋发展。一方面,强化乡村振兴人才制度的基础建设,明确人才向乡村流动的导向性政策。采取多样化的选拔方式,如组织定向选拔、单位积极推荐与个人主动报名相结合,鼓励市直单位的优秀青年干部深入基层挂职锻炼,确保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备坚实的人才支撑和高质量的执行力度。同时,持续完善脱贫地区“三农”领域专业人才的全链条管理体系,包括培养、任用、激励与保障等多个环节,构建乡村振兴人才制度体系,以此激发专业人才的创新精神和创业激情。另一方面,深度改革脱贫地区乡村人才体制机制,致力于打破传统束缚,优化资源配置。对编制管理、职称评定及人才招录等关键环节进行政策创新,力求消除地域界限、身份壁垒等制约因素,为人才流动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此外,积极探索灵活多样的引才模式,如兼职服务、顾问咨询等,吸引社会各界精英如企业家、设计师、医疗专家、教育工作者及科研学者等,以多种方式参与乡村建设,为脱贫地区乡村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和智力支持。

3.4 做好乡村人才培育工作

当前,脱贫地区青壮年劳动力的持续外流导致乡村人口结构老龄化加剧,同时,劳动力队伍的整体素质也呈现出相对较低的态势。这一现象不仅影响了乡村的活力与发展潜力,也对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构成了一定的阻碍。因此,加强乡村人才培育工作,“制定乡村人才培育规划,落实等同或者略高于公务员待遇政策,切实加快乡土科技人才培养的教育培训。”^[17]

一是健全人才培养机制。一方面,优化教育体系,特别是高等教育与农业相关的职业教育体系,以强化人才培育的根基。这包括在高等教育中强化农业教育的实践导向,鼓励综合性大学增设与农业相关的学科专业,并加速农村职业教育的步伐,确保教育内容与农业产业链紧密对接,从而培育出乡村迫切需求的专业技能人才,填补脱贫地区乡村优秀人才短缺的空白。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并激活现有教育资源,如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等培训机构,发挥其独特优势,并定制化地开展各类乡村人才培训项目,如

手工艺人、传统技艺传承者及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确保前沿思想、创新理念和现代科技能够深入脱贫地区乡村,促进农民教育与职业教育的深度融合,为脱贫地区乡村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

二是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一方面,强化政府财政的主导作用是关键因素。脱贫地区各级政府应将乡村人才培养视为公共财政支出的优先项,明确并强化资金投入的责任机制,设立专项基金以支持脱贫地区乡村人才培养的持续推进,并制定长远的资金规划蓝图,为脱贫地区乡村人才发展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建立健全资金监管体系,确保专款专用,资金精准高效地用于脱贫地区人才培养。另一方面,拓宽筹集资金的渠道。积极倡导并推动社会各界的力量参与进来,采用公开募捐、企业赞助等多元化方式,汇聚起支持脱贫地区乡村人才培养的广泛资金流。此外,探索创新型的融资路径,融合市场化基金、政府财政、担保机制及信贷工具等多种资源,为脱贫地区乡村人才培养注入更加强劲的资金动力,推进缓解脱贫地区乡村人才培养面临的资金瓶颈,以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向农业农村领域倾斜,共同助力乡村人才振兴的宏伟目标。

4 结论

人才兴,则乡村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关键靠人”,“吸引包括致富带头人、返乡创业大学生、退役军人等在内的各类人才在乡村振兴中建功立业。”^[18]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进程中,人是最为活跃且不可或缺的关键因素,而人才则是驱动现代农业蓬勃发展、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引擎。人才振兴在乡村振兴中具有重大意义。只有人才振兴,才能为脱贫地区乡村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为了夯实基层的坚实基础,特别是在脱贫地区,破解人才短缺的瓶颈问题成为关键。推动乡村人才战略的深入实施,需要全方位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精准识别并选拔人才,精心培育以壮大人才队伍,高效利用人才资源以发挥其最大效能,并通过优化环境来确保人才扎根乡村。同时,要创新并完善乡村人才政策体系与管理制度,营造一种崇尚人才、珍视人才的良好社会风尚。让本土人才在乡村发展中找到归属感与成就感,安心扎根;让外来人才感受到服务基层、反哺乡村的价值与温暖,乐于奉献。最终,要将广袤的农村打造成为吸引并汇聚各类人才大显身手的璀璨舞台,借助人才优势的力量,持续驱动脱贫地区乡村振兴战略的稳步前行与繁荣发展。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乡村人才振兴的意见[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21(7): 22-28.
- [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36.
- [3] 习近平.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3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19.
- [4] 习近平.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18, 2.
- [5] 李小云, 唐丽霞, 刘祖云, 等.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的乡村振兴与高质量发展(笔谈)[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1): 1-11.
- [6]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31-32.
- [7] 郑风田. 新时代脱贫攻坚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2: 6.
- [8] 习近平. 解放思想锐意进取深化改革破解矛盾 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推进东北振兴[N]. 光明日报, 2018-09-29(1).
- [9] 陈锡文. 当前农业农村的若干重要问题[J]. 中国农村经济, 2023(8): 2-17.
- [10] 国家统计局. 2022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 [2023-04-28]. http://www.stats.gov.cn/sj/zxfb/202304/t20230427_1939124.html.
- [11] 全国干部培训教材编审指导委员会, 编. 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党建读物出版社, 2024: 49.
- [12] 章文光. 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人才支撑[J]. 人民论坛, 2024(1): 40-43.
- [13] 张力. 改革开放 40 年的中国基础教育: 成就卓著再创辉煌[J]. 中国教育学刊, 2018(11): 3.
- [14] 肖双. 培养造就乡村振兴人才队伍[J]. 群众, 2023(6): 16-17.
- [15] 中共中央宣传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 编.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M]. 北京: 学习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2022: 43.
- [16] 梁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4: 197-198.
- [17] 邱春林. 新时代中国特色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3: 216.
- [18] 习近平在海南考察时强调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 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N]. 人民日报, 2022-04-14(1).

道家“贵身”意识探赜

——从老子到庄子

闫伟

(铜陵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铜陵 244061)

摘要:先秦道家有“贵身”的思想传统,本质上是一种重生意识。老子视“身”重于名利,“贵大患若身”并非“无身”,而是将“轻身”当作人生大患的根源,实际上是一种“贵身”“爱身”的生命价值观。杨朱的人生哲学上承老子下启庄子,“为我”是以“贵身”为指向的利己主义,“贵己”乃是重生意识下的个体主义。庄子提出“保身”“正身”“修身”等一系列具有“贵身”义涵的概念,体现了他对“身”的关注与重视。《庄子·让王》篇的核心义旨是道家的重生思想,庄子通过尧舜“让天下”的寓言诠释老子“身”重于“天下”的观念,以子华子“知轻重”、瞻子“重生”的寓言揭橥“贵身”的重生意识。

关键词:道家;“贵身”;重生意识;老子;杨朱;庄子

中图分类号:B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3-0115-07

The Taoist Consciousness of “Valuing the Body”(“贵身”) from Laozi to Zhuangzi

YAN Wei

(School of Marxism, Tongling University, Tongling, 244061, Anhui)

Abstract: The Taoist school in the Pre-Qin period had an ideological tradition of Valuing the Body(“贵身”), which was essentially a consciousness of valuing life. Laozi regarded the body as more important than fame and fortune. Treating great troubles as if they were related to the body doesn't mean Having No Body(“无身”), but rather takes Treating the Body Lightly(“轻身”) as the root cause of great troubles in life. In fact, it is a life value concept of Valuing the Body and Loving the Body(“爱身”). Yang Zhu's philosophy of life inherited from Laozi and influenced Zhuangzi. For Myself(“为我”) is an egoism directed at Valuing the Body, and Valuing Oneself(“贵己”) is an individualism under the consciousness of valuing life. Zhuangzi put forward a series of concepts with the meaning of Valuing the Body, such as Preserving the Body(“保身”), Rectifying the Body(“正身”), and Cultivating the Body(“修身”), which reflected his attention and emphasis on the body. The core meaning of the chapter Yielding the Throne In Zhuangzi is the Taoist thought of valuing life. Zhuangzi interpreted Laozi's concept that the bod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World through the fable of Yao and Shun Yielding the Throne of the World, and revealed the consciousness of valuing life of Valuing the Body through the fables of Zihuazi Knowing the Weights(“知轻重”) and Zhanzi Valuing Life.

Key words: Taoism; Valuing the Body; consciousness of valuing life; Laozi; Yang Zhu; Zhuangzi

冯友兰提出道家人生哲学具有“为我”的思想传统,“为我”的实质就是重生、贵生,即对个体生命

的重视。先秦时期,道家哲人普遍注重人的生命问题,有学者指出“道家的贵生理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尊生、全生和养生,它们共同构成了道家完整的贵生理论。”^[1]“尊生”是对生命本然价值的追求;“全生”是对“尊生”观念的实际要求,让人尽可能地规避伤害,从而保全性命;“养生”是指通过一定的手段与方法让生命得以“尽年”(《庄子·养生主》),不要使生命“中道崩殂”。以上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的,生命主体只有具备“尊生”的观念,才可具有“全生”的打算,也才可能进行“养生”的实践,三者共同构成先秦道家的重生、贵生意识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具体养生之法。为此,本文拟从“贵身”这一概念入手,试析先秦道家的重生、贵生意识。

1 老子的“贵身”观念

道家的重生、贵生观念首先体现在对生命体——“身”,即身体的重视上。《老子》八十一章、五千余言之中,“身”字出现二十三次之多,凡出现“身”处,老子都是持有肯定口吻并且强调对“身”要爱惜与珍重,主张“观之、修之、存之、保之、贵之、爱之”^[2]²⁰⁷。“观身”“修身”“存身”“保身”“贵身”“爱身”说法虽然不同,但却都指向了对“身”的重视与养护,体现出老子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追求。

1.1 老子视“身”重于名利

出于对生命的重视,老子常将“身”(生命载体)当作人生价值追求的目的,且在“身”与其他事物的比较中凸显“身”之于人的价值。老子以反问的语气说:“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3]¹²⁵老子将“身”与“名”“货”等身外之物相对比,询问世人名利之“得”与生命(“身”)之“亡”比较,哪一个为“病”(即大患)呢!显然,老子认为“身”要比名利等物重要,因名利而身亡(失去生命),乃是不明智的做法。对此,严君平的注解最为恰当,他说:“崇高显荣,吉祥盛德,深閼浩大,尊宠穷极,莫大乎生。万物陈列,奇怪珍宝,金玉珠璧,利深得巨,莫大乎身。”^[4]无论多么大的荣誉、名声与高官爵位以及尊贵、宠幸都不如生命“大”,无论多么稀奇的珍宝、珠玉与贵重利益都无法与“身”相提并论,因为在老子看来,“身”对于生命个体是最为贵重的,有了“身”,一切的外在事物才有意义。憨山在注解《老子》时也说:“役于名利之间,戕生而伤性。与夫贪得而身亡,不若身存而远害。”^[5]由此,老子有“贵身”的思想观念是毫无疑问的。

实际上,老子明言过对“身”的态度,他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3]¹⁴⁷,”修身”意在说明老子是重

视“身”的,否则何必“修身”,直接“轻身”“弃身”罢了。另外,老子还以人君与圣人为例阐明他的“贵身”思想:“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本,躁则失君。”^[3]¹⁷¹“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3]²¹老子提出对“万乘之主”即人主“轻身”行径的批评,认为统治者如果“轻身”则是“失本”的做法,即失去生命之根,那又如何做得了人君。对此,蒋锡昌说:“以身轻天下”,即轻以身为天下,与“贵以身为天下”相反。轻以身为天下,即以身为天下最轻之物也。夫俗君既以身为最轻之物,则纵欲自残,身且不治,又安可受天下之重寄,而为万民所托命乎^[6]。

在蒋锡昌看来,《老子·二十六章》所谓“本”乃“根”之义,“君”乃“道”之义,具体而言,君主“轻身”就会纵欲无度,失去修身之根本,不修身则会躁动,因此失去为君之正道。可见,老子在这一章中所要表达的是警告人们(包含君主与其统治的百姓)一定要重视“身”以及修身,反映的是老子“贵身”的思想理念。而所谓“外其身而身存”,其义更为明显,亦是老子“贵身”观念的体现。老子之所以说圣人要“外身”以至“存身”,也是因为“身”对于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魏源说:“本以先人而后其身也,而人愈贵之;寡欲无求,本以利人而外其身也,而人愈不害之。”^[7]圣人以“外身”而得以“存身”,“身”者,“吾之私也”^[8],以“身”作喻寻求“贵之”“不害之”,说明老子将“身”看得极重。故而,“存身”实际上是老子“贵身”思想的另一种表达。

1.2 老子“无身”乃是“贵身”

对于老子的生命理念,有学者提出:相比“贵身”,老子可能更主张“无身”(与“忘身”同义)。如苏辙说:“先身而后名,贵身而贱货,犹未为忘我也。忘我者,身且不有,而况于名与利与货乎……知贵身,而后知忘我。此老子之意也。”^[9]苏辙认为“贵身”并不是老子的最终之意,因为“贵身”虽然是视“身”贵于世俗名利,但仍然是“有身”而未“忘我”,即“身”对人也可能形成一定的累患,而“忘我”则是对名利、得失,甚至是对自己身体的“忘”,即“忘身”(与“忘我”同义),只有“忘我”,人才可以真正地没有忧患。应当说,从《老子·十三章》原文的字面义看,老子似乎确有以“身”为患的可能,但立足于此章经文的整体之义以及《老子》生命哲学的基本特质而言,“无身”的实质仍然是一种“贵身”理念。“无身”语出《老子·十三章》,其文曰:

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

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3]32}

此章义旨,诸家释译约有三:第一者,认为此章体现了老子“轻身”“弃身”的思想,视“身”为人生大患的根源,故而教人“忘身”(如河上公、王弼、苏辙);第二者,认为老子在这一章中表达的是“贵身”与“爱身”的思想(如范应元);第三者,认为此章的言教对象是君主,所谓“贵大患若身”乃是君主贪恋权位而担忧自己的统治出现危机就像忧虑自己的身体出现异样一般(如吕惠卿、张舜徽)。立足于《老子》生命哲学以及道家“为我”思想传统,第一种理解是从《老子·十三章》文句的字面意义理解而言的,这显然与道家重生、贵生的思想义旨不符,且以“忘身”(或“无身”)解释此章,似乎是受佛教“无我”论的影响。诚如陈鼓应所说:

一个“贵身”的思想却被误解为“忘身”。造成这种曲解多半是受了佛学的影响……有些人把“身”视为“肉体”的同义字,再加上道学观念和宗教思想的影响,认为肉体是可卑的,遂有“忘身”的说法。^[10]

在陈鼓应看来,以“忘身”诠释《老子》“贵大患若身”是受佛教“无我”思想的影响,是用佛学附会《老子》的结果。应当说,陈鼓应此言颇为在理。从《老子》本章的全文看,老子说“贵以身”方可“寄天下”,“爱以身”方可“托天下”,怎么会具有带“厌身”“弃身”意味的“忘身”思想呢!后世解老者以“忘身”解释《老子》此章义旨,除从字面义强说外,很大可能是以佛释老的结果。此外,老子在回答“何为贵大患若身”时用的是陈述语气,并不是一种肯定性的价值判断,所以不能以此简单地认为老子主张“无身”,即“老子说假设人没有了‘身’,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对他构成大患了。这恰恰反映出老子以‘身’为惟一的价值尺度。可见,老子的确是重身的”^{[2]208}。以“身”为人生的、“惟一”的价值尺度是符合老子生命价值观的,这也与“贵身”“爱身”的思想是一致的,故老子的确没有轻视“身”(生命体)的观念,而是极力主张“贵身”与“爱身”。

至于吕惠卿、张舜徽等人的理解,是基于“寄天下”与“托天下”的主体对象来说的。尽管吕、张二人主张“贵大患若身”是指君主对自己统治是否稳固的忧虑,但君主将忧国与忧“身”相并列,从侧面也可看出“身”对于人君的重要性。所以,综合历代诸家的注解,老子所谓“贵大患若身”并不是指佛学化的“无身”或“忘身”理念,更不是“轻身”或“弃

身”的思想。相反,“贵大患若身”恰恰体现了老子“贵身”“爱身”的生命价值观,正如范应元所说:

何谓贵大患若身者,犹言不轻大患,如不轻此身也。倘轻患而不虑患,轻身而不修身,则自取危亡也。是以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故终身无患。^[11]

显然,范应元认为老子此句意在说明“身”之“轻”是人生的大患,因为“轻身”才会“轻患”,才会“不修身”,这才是危险的事,只有存身、修身才是“无患”的根本,可见老子确实是主张“贵身”的。

2 杨朱的“贵身”观念

老子之后,其思想继承者杨朱亦持“贵身”“爱身”与重生、贵生观念。杨朱人生哲学的核心可以概括为“为我”与“贵己”,与老子的“贵身”“爱身”思想是一致的。孟子尝言:“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12],韩非说杨朱是“轻物重生之士也”^[13],《吕氏春秋·不二》云:“阳生贵己”^{[14]405},《淮南子·汜论训》谓杨朱之学为“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15]。所谓“为我”“轻物重生”“贵己”“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皆可证明杨朱与老子一样,都有“贵身”与重生的思想观念。

2.1 杨朱与老庄在重生理念上的一致性

杨朱其人其学在学界争议较大,主要原因是关于杨朱的史料文献较少。不过,据《庄子》记载,杨朱师从老子,其学当属道家,这种观点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与赞成。然《庄子》之文多“寓言”与“卮言”,记载是否可信是个问题。为此,有学者提出杨朱即使不是老子的亲传弟子,但在思想上是继承老子学说的。至于杨朱与庄子的关系,比之杨朱与老子的关系则更为复杂。一般而言,学界普遍认为庄子为杨朱后辈且继承了杨朱的部分思想,尤其表现在人生哲学方面。故而,“杨朱是从老子到庄子过渡的重要环节,在先秦道家思想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16]杨朱与老庄的思想关联主要体现在两者共同持有浓厚的重生理念,这也符合先秦道家哲学的思想特质。

杨朱的重生思想上承老子而下启庄子,是道家重视个体生命价值的反映。据《列子·杨朱》记载:

杨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国而隐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体偏枯。古之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17]

杨朱持有“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的观念,说明在他看来,自己的生命重于

“天下”，是最为宝贵的，这是一种典型的重生思想，即孟孙阳所谓“贵生爱身”（《列子·杨朱》）。杨朱的此种重生理念与老庄的生命价值观是极为相似的。在《吕氏春秋·审为》一篇中，杨朱后学子华子否定“攫手取天下”的事迹，《后汉书·马融传》评曰：“所以然者，生贵于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灭无赀之躯，殆非老庄所谓也。”^[18]马融明确将杨朱（后学）的生命价值理念（“生贵于天下”）当作是老庄思想，足以证明两汉时期的学者就已经认识到杨朱与老庄在重生意识方面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具体说来，杨朱学派与老庄道家在生命哲学层面上（重生意识）的一致性可以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得以管窥：

首先，杨朱主要继承老子的“贵身”“爱身”的重生思想。老子“贵身”理念自不必多言，而杨朱也以“轻天下而贵身”为生命格言，两者无疑具有思想上的继承关系。晋张湛注《列子·杨朱》时言杨朱之学源于老聃关尹，“聃尹之教，贵身而贱物也。”^[17]元吴澄注解《老子》“贵身”一章（第十三章）时也说：“知道之人爱惜贵重此身，不肯以之天下，宁不有天下而轻用其身……贵以身为天下，富以身为天下，老子之意善矣，而杨朱为我之学源于此。”^[19]在吴澄看来，杨朱的“为我”之说源于老子的“贵身”思想，杨朱的“为我”不过是对老子“贵身”的发展，是将关怀对象由自然个体转向生命个体而已，其思想内核完全一致。

再者，杨朱的重生理念对庄子的生命哲学产生了影响。杨朱的“为我”“贵己”不仅在《庄子》中多次明确出现，而且庄子的“保身”“全生”“尽年”之学显然深受杨朱生命哲学的影响。朱熹论及庄学时说：“庄子当时也无人宗之，他只在僻处自说，然亦止是杨朱之学。”^[20]近人严复、钱穆等人亦持此种观点，如严复认为“杨朱为我，庄周养生之所本也”^[21]、钱穆则直言“庄子之学，盖承杨朱而主为我”^[22]。

总之，杨朱的“为我”“贵己”之说上承老子而下启庄子，三人的生命理念的本质都是“重生”，恰如顾实所说：“杨朱取为我，而主张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者，诚道家之行也。”^[23]杨朱“为我”与老庄“无我”（冯友兰语）都是立足于个体的生命价值，在“重生”的动机上，杨朱与老庄没有本质的区别。

2.2 “为我”“贵己”的实质是“贵身”

杨朱生命哲学的核心是“为我”与“贵己”，其思想实质乃是道家传统的“贵身”理念。不过，自战国中期孟子将杨朱之学视为“充塞仁义”的邪说，杨朱

被冠以“一毛不拔”的自私形象，其“为我”之说也被曲解为损人利己的个人中心主义。平心而论，孟子抨击杨、墨与其门户之见有着莫大的关系，他未能客观、同情地理解杨朱的“为我”思想。孟子之后，儒家学者对杨朱之学多存贬义，杨学逐渐走向沉寂，直到近代才得以复兴，得到近现代学者的重新关注与解读。

近代杨学复兴的过程中，学者们对杨朱“为我”“贵己”思想给予了新的理解与评价，强调其与西方现代性观念（利己主义与个体主义）的相通^[24]¹⁹。在这个中西思想交通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深刻认知杨朱“为我”“贵己”之学的思想实质就是道家以“贵身”为核心的重生意识。

一方面，杨朱的“为我”是以“贵身”为指向的利己主义。杨朱“为我”被“误解”为自私自利，其实“为我”是一种利己主义。一般而言，利己主义主要分为三种：损人利己；济人利己；离人利己^[25]⁷⁸。很明显，杨朱“为我”思想属于“离人利己”，这是因为杨朱提出“一毛不拔”“不利天下”的口号，所谓“一毛不拔”是“利己”，“不利天下”则是“离人”。冯友兰认为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与为也”有两种解释：一是轻物重生；二是极端利己，两者各说明杨朱思想的一个方面^[26]。“极端利己”与“轻物重生”实际上具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即“贵身”。《韩非子·显学》篇有云：“今有人于此，义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世主必从而礼之，贵其智而高其行，以为轻物重生之士也。”^[13]韩非以“轻物重生之士”指称杨朱，可算是抓住了杨朱“为我”思想的实质，从“不入危城”“不处军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的论述中都可看出杨朱对己身的珍视，故有学者提出“杨朱生命思想具体展现在其对身的阐释上，此说受到老子的影响”^[27]。所以杨朱的“为我”并不是自私自利，而是一种以“贵身”为指向的利己主义。

另一方面，杨朱的“贵己”是重生意识下的个体主义。《吕氏春秋·不二》谓“阳生贵己”，“‘贵己’就是尊贵自己，可以解释为自尊、自贵、自重，贵重自己的本然之性，保全自己的本然之性（真）”^[28]。杨朱“贵己”重在“己”字之义，与“为我”之“我”皆具生命个体的意蕴，本质上乃是一种重生意识下的个体主义，故有学者提出“杨朱的‘贵己’就是以个体生命为最高价值”^[16]。既然杨朱的“贵己”旨在个体主义，而生命个体不外乎由“形”与“神”构成，所以杨朱异常重视形神问题。《淮南子·汜论训》云：“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

之。”^[15]“全性保真”之“全性”应当与《庄子·养生主》所谓“全生”同义,“生”是指生命,高诱以“形体”^[15]释之;而“真”则是指精神,《淮南子》形神观虽形神并重,但却以“神”为主,故以“真”突出“神”之于人生命修养的重要性。因此,杨朱的“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在于形神的养生,旨在道家“自然”的原则下追求“终其天年”的结果,这是一种重生的思想,当然也是一种有异于孔孟儒家群体意识的个体存在主义。

3 庄子的“贵身”观念

老子、杨朱的生命本然性价值观被庄子继承,形成了“保身”“正身”“守身”“存身”“修身”等一系列关于“贵身”的重生、贵生思想。更为重要的是,在《让王》一篇中,庄子以寓言的形式抒发了他对“身”的珍视以及贵生、重生理念,从这些论述中也可以看出他的这一思想实是继承了老子、杨朱思想。

3.1 庄子对“身”的重视

庄子在《养生主》的开篇就提出“保身”“全生”“养亲”“尽年”,这与老子、杨朱“贵身”、重生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庄子所谓“保身”,是指保养身体,这是对生命的养护,体现了他对“身”的重视。按照《庄子·养生主》的语篇结构,“保身”是首位的,庄子认为人只有“保身”,才可得以“全生”,继而实现“养亲”与“尽年”的目的。憨山说:“苟顺天理,则不贪欲残生,故可以保身;不辱身以伤命,故可以养亲尽年。”^[29]“保身”之所以是第一位的,乃是因为人只有保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生命才可以拥有稳固的形质基础,身心虽然可以两分,但“心”(精神)无疑是寄托于“身”之中的,故只有“保身”,方可“全生”“养亲”与“尽年”。

除“保身”外,庄子还提出了“正身”(《人间世》:“正女身也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30]152})“守身”(《在宥》:“慎守女身,物将自壮。我守其一以处其和。”^{[30]348})“修身”(《渔父》:“谨修而身,慎守其真。”^{[30]905})“存身”(《缮性》:“古之存身者,不以辩饰知……”^{[30]494})“治身”(《让王》:“道之真以治身。”^{[30]851})“活身”(《至乐》:“至乐活身,唯无为几存”^{[30]544})“安身”(《至乐》:“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30]541})“爱身”(《在宥》:“爱以身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30]338})“完身”(《让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也。”^{[30]851})。这些与“身”相关的名词遍布于《庄子》文本中,体现了庄子对“身”的关注与重视。实际上,庄子所谓“正身”“修身”“治身”等说法都是

他“贵身”观念的反映,“贵身”也是他论述最多、最为看重的价值理念,这是因为“贵身”的本质是一种贵生、重生思想,这是道家人生哲学的传统。对此,吴根友认为“道家文化有一种强烈的贵己重生的倾向,这是由其‘道法自然’的生命观决定的,他们提出了贵人轻物、贵己保身的重生论思想”^[31]。“道法自然”内含“人法自然”的意蕴,作为“域中四大”之一的人应当顺应天地自然之道,使自己的生命得以“终其天年”,在“尽年”的生命历程中必须要做到“保身”,而“保身”则一定要具有“贵身”与重生的思想观念。

3.2 “天下”不贵于“生”

《让王》篇首,庄子叙述尧“让天下”于许由、子州支父,舜“让天下”于子州支伯、善卷与石户之农的寓言。尧、舜欲以“天下”让与他人,然被让者皆为“不以天下易生”者,庄子以此提出“天下”不贵于“生”的观念,即所谓“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30]845}。“不以害其生”,即“贵身爱身义也”^{[32]666},”生”或可通“性”,身心不可分离,“性”与“身”亦相关。庄子提出“生贵天下”的主张是对老子“贵身”“爱身”思想的继承,这从庄子在《让王》《在宥》篇的叙述中就可看出,《庄子·让王》曰:“唯无以天下为者,可以托天下也。”^{[30]845}显然,这是对老子“贵身”思想的继承,因老子曾说:“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3]32}而在《在宥》篇中,庄子说:“故贵以身于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爱以身于为天下,则可以寄天下。”^{[30]338}这几乎是对《老子》文句的照搬,只不过是《老子》中“寄天下”与“托天下”的顺序颠倒而已。对此,林希逸说:“贵以其身二句出自老子,而加二于字,亦文之奇处。”^[33]钟泰也认为:“此四句语本出老子,引之以明不得已之义也。”^{[32]222}故庄子征引老子“贵身”之言,实为对其思想上的认可与肯定。

为了突出“身”之于人的贵重,庄子特以“天下”比于“身”,这是由于“天下”对于俗人具有巨大的诱惑,子州支伯等人为了“保身”“治身”而“未暇治天下”,说明他们都是重生之士,隐喻了庄子的生命价值观。对于“天下”,庄子称之为“至重”“大器”,可见这是俗人趋之若鹜的东西,而“不以其易生”者皆为“有道者”。庄子所谓“有道者”是“异乎俗者”,成玄英说:“夫位登九五,威跨万乘,人伦尊重,莫甚于此,尚不以斯荣贵损害生涯,况乎他外事物,何能介意也!”^{[30]845}“天下”是如此贵重,而名利、富贵等外在之物尚比不过“天下”,“有道者”又怎会在意这

些事物呢!对于《让王》“我适有幽愁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30]845},陆西星说:“上言不以重务而伤吾生,下言不以外物而易吾生,总重养生上,所以为道德之书。”^[34]很明显,陆西星是将“夫天下至重也”的“重”理解为“繁重”(即治理天下的任务使人劳心费神),这与后文“况他物乎”语义不搭,实是他误读了此文。不过,陆氏以“重养生”来诠释此则寓言的宗旨则是十分恰当的,庄子“贵身”思想的实质就是一种重生理念。另外,《让王》篇中,庄子通过善卷之口说:“形足以休食,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30]846}所谓“形足”就是《养生主》所说的“保身”而“全生”。庄子认为“形足”而“休食”即可达到“逍遥”且“心意自得”的境界,可见庄子是将“身”的安逸看得尤为重要,实质上是对生命的重视。

3.3 “知轻重”与“重生”

也是在《让王》篇中,庄子叙述子华子“知轻重”与瞻子“重生”的寓言故事,则更加直接表明了他的“贵身”思想以及对杨朱重生理念的继承与发展,其文曰:

子华子曰:“自是观之,两臂重于天下也,身亦重于两臂。韩之轻于天下亦远矣,今之所争者,其轻于韩又远。君固愁身伤生以忧戚不得已!”子华子可谓之道轻重矣。^{[30]850}

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30]858}

在这里,庄子以两则寓言阐明了他的“贵身”、重生思想。一则,韩国与魏国为争夺土地而发生战争,子华子劝谏昭僖侯停战,提出“两臂”重于“天下”,而“身”又重于“两臂”,则“身”自然重于“天下”,故“天下”轻而“身”重也。二则,中山公子牟(魏牟)虽然身隐于江海,但心思宫阙楼阁,瞻子劝其要“重生”,以生命为重则自然可以“轻利”,对身外之物不起私念。从以上两则寓言故事的人物设定以及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看,庄子此处的“贵身”、重生观念是承袭杨朱“为我”“贵己”思想而来:

其一,庄子以子华子之口说“两臂重于天下”,这与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在思想观念与论证逻辑上是极为相似的。杨朱与庄子在“贵身”、重生思想上的一致性,自不必多言;在论证“身贵天下”之理的逻辑方式上,杨朱与庄子亦是非常相似。庄子以“两臂重于天下,身亦重于两臂”说明“身重于天下”的理念时以“攫手必有天下”询问昭僖侯,而据《列子·杨朱》记载,杨

朱亦有“去子体之一毛以济一世,汝不为也”“有侵若肌肤获万金者,若不为乎”^[17]的论述。所以庄子与杨朱在论证“身贵天下”的逻辑方式上几乎是相同的,都带有杨朱学派的理论逻辑色彩。

其二,两则寓言中所持“贵身”、重生观念的人物子华子与瞻子都是杨朱的弟子或思想继承者。据蒙文通、钱穆、孙道升、詹剑峰等前辈学者的考证^{[25]79},子华子与詹何是杨朱的弟子或其思想的继承者。所以从庄子援引子华子、詹何二人的思想主张看,他的重生、贵生观念源于杨朱“为我”“贵己”与“轻物重生”的生命理念。

4 结论

先秦道家学说,除自身蕴含极强的哲理外,最为吸引人的当属它的生命智慧。老子、杨朱与庄子的生命哲学论述虽有不同,但却都主张人在险恶的“人间世”中追求现实性的“贵身”与“长生”。道家“贵身”的本质是重生思想,而“长生”观念亦是如此。道家所谓“长生”即“长生久视”,“长生久视”并非后期道教的不死成仙,而是指生命个体顺应自然生死之道从而得以“尽年”,这与道教的“反自然”(肉体不死、羽化登仙)是截然不同的。道家的重生意识是对生命个体的关注,这不仅成为道家生命修养论(工夫与境界)的思想基础,而且对现代人的生命观具有一定的启迪价值。当下的社会生活中,随着生活压力的增大,人们的生命意义问题、生命健康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关注且亟待探求的人生问题。基于此,道家的“贵身”与“长生”观念将对现代人树立正确的生命价值观,合理看待人之自然生死皆有精神上的积极引导作用。现代化加速的今天,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在于实现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道家的生命哲学无疑具有非常值得研究的价值与意义。

参考文献:

- [1] 肖玉峰. 人生真谛——道家适性人生哲学的现代阐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882.
- [2] 李霞. 生死智慧——道家生命观研究[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3] 王弼. 老子道德经注[M]. 楼宇烈, 校释.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 [4] 严遵. 老子指归[M]. 王德有,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24.
- [5] 憨山. 老子道德经解[M]. 梅愚, 点校. 武汉: 崇文书局, 2015: 89.
- [6] 蒋锡昌. 老子校诂[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8: 177.

- [7] 魏源. 老子本义[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26.
- [8] 吕惠卿. 道德真经传[M]. 林胜利, 点校.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53.
- [9] 焦竑. 老子翼[M]. 黄曙辉, 点校.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113.
- [10] 陈鼓应. 老子注译及评介[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124.
- [11] 范应元. 宋本老子道德经[M].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7: 48.
- [12]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364.
- [13] 王先慎. 韩非子集解[M]. 钟哲,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502.
- [14] 许维通. 吕氏春秋集释[M]. 梁运华, 整理. 北京: 中华书局, 2016: 405.
- [15] 何宁. 淮南子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940.
- [16] 任蜜林. 杨朱的“贵己”思想及其渊源[J]. 老子学集刊·第八辑, 2023: 301.
- [17] 杨伯峻. 列子集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220.
- [18] 后汉书[M]. 黄刚, 译注.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8: 102.
- [19] 吴澄. 道德真经吴澄注[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16.
- [20] 朱熹. 庄子[M]//朱子语类: 卷一二五.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2988.

- [21] 王弼. 严复集[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1080.
- [22] 钱穆. 庄子纂笺[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2014: 8.
- [23] 顾实. 杨朱哲学[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0: 76.
- [24] 闫伟. 杨朱学说的盛衰与活化[J]. 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5): 15–20.
- [25] 闫伟. 杨朱及其思想再考[J].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6): 72–80.
- [26]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7.
- [27] 王敏光. 杨朱个体思想探微[J]. 老子学集刊·第八辑, 2023: 321.
- [28] 孙以楷. 道家哲学研究[M].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10: 17.
- [29] 慈山. 庄子内篇注[M]. 梅愚, 点校. 武汉: 崇文书局, 2015: 59.
- [30] 郭庆藩. 庄子集释[M]. 王孝鱼,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 [31] 吴根友. 道家思想及其现代诠释[M].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 205.
- [32] 钟泰. 庄子发微[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33] 林希逸. 庄子鹖斋口义校注[M]. 周启成, 校注.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 164.
- [34] 陆西星. 庄子副墨[M]. 北京: 华龄出版社, 2018: 326.

(上接第 97 页)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N]. 人民日报, 2021-09-29(1).
- [2] 新华社. 习近平在“国家工程师奖”首次评选表彰之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定科技报国为民造福理想 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服务高质量发展[EB/OL]. (2024-01-19) [2024-04-10].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1/content_6927121.htm.
- [3] 林健. 新工科人才培养质量通用标准研制[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0(3): 5–16.
- [4] 佚名. 深入推进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N]. 中国教育报, 2024-05-11(1).
- [5] 江宇辉.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研究: 阶段划分、热点变迁与未来展望[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4(3): 58–64.
- [6] 李九阳, 陈立, 胡广朝, 等. 新工科建设与工程教育认证相结合促传统专业内涵式发展[J]. 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3(2): 85–89.

- [7] 侍旭. 地方应用型高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的使命担当[J]. 中国高等教育, 2023(11): 24–27.
- [8] 吴岩. 深化“四新”建设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J]. 重庆高教研究, 2022, 10(3): 3–13.
- [9] 马陆亭. 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 从教育理念到范式变革[J]. 中国高等教育, 2022(12): 9–11.
- [10] 曾永庆, 刘晓红, 童小龙, 等. 新工科产教融合背景下土木类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 创新创业理论与实践, 2022, 10(20): 196–198.
- [11] 马丽珠, 田悦, 张明月. 新工科背景下基于“三业融合”的土木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J]. 创新创业理论与实践, 2023, 7(13): 144–146.
- [12] 秦红. 地方本科院校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的实践与思考[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16(2): 91–94.
- [13] GRAHAM Ruth. The Global State of Art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M]. Boston: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2018: 32–38.
- [14] 周珂, 金仁东, 柯红岩, 等. 新工科背景下卓越工程人才培养实践体系建设[J]. 教育教学论坛, 2020(7): 213–216.

近代皖北报刊实践与社会启蒙

——以《皖北民教》为中心的考察

付佳敏*, 陈雨璇, 丁东

(阜阳师范大学 新闻与传播系, 安徽 阜阳 236041)

摘要:以安徽省立第三民众教育馆创办发行的民众教育刊物《皖北民教》为中心进行考察,试图揭示报刊在民众教育普及过程中对近代皖北民众与社会的启蒙。具体而言,安徽省立第三民众教育馆借助报刊,对民众的思想意识、生计活动与社会生活进行重新讨论,从启蒙民族意识、助力民生改良与更新生活观念方面进行了形塑与重构,试图打造出符合社会期待的“新民众”。此项研究构成近代皖北社会启蒙考察的新视角,以此扩充了对近代中国社会启蒙的多维理解。

关键词:《皖北民教》;报刊实践;社会启蒙;皖北

中图分类号:D442.9;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5)03-0122-07

Social Enlightenment and Journalistic Practices in Modern Northern Anhui: An Investigation Centered on *The Folk Religion in Northern Anhui*

FU Jia-min*, CHEN Yu-xuan, DING Do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41, Anhui)

Abstract: It focused on *The Folk Religion in Northern Anhui*, a public education periodical published by the Third Provincial Public Education Center of Anhui in this paper, to reveal how press media contributed to the enlightenment of both the populace and society in modern Northern Anhui during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al dissemination. Specifically, through journalistic practices, the reconstruction of mass ideology, livelihood activities, and social life was systematically implemented by the institution. National consciousness was cultivated through enlightenment initiatives, livelihood conditions were optimized through practical interventions, and modern living concepts were disseminated through educational guidance, collectively shaping the “new citizenry” that aligned with societal expectations. These efforts not only provided a novel perspective for examining social enlightenment in modern Northern Anhui but also enriched the multidimensional understanding of China’s modern social enlightenment movement.

Key words: *The Folk Religion in Northern Anhui*; newspaper practice; social enlightenment; Northern Anhui

20世纪20至30年代,“唤起民众”的民众运动发生了“教育转向”,以“开通民智,改良风俗”为宗旨,政府倡导在各地设置民众教育馆,意在教育民众、训练民众。彼时人们将这个时期称为在全国各

地努力实施民众教育的时代^[1]。在全国民众教育浪潮中,提高民众的文化教育水平是其主要目标,而书报则是对民众进行文化和时政教育的重要媒介^[2]。因此,报刊成为社会启蒙中的重要一环。近

收稿日期:2024-12-18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872-1949)(23&ZD216)。

作者简介:付佳敏(1999-),女,安徽太和人,硕士研究生;陈雨璇(1981-),女,安徽蚌埠人,副教授,博士。E-mail: 909035385@qq.com

代皖北也积极顺应时代潮流,通过报刊将民众教育与社会启蒙相结合,《皖北民教》就是其中典型代表之一。此报刊继承《民众教育》于1934年9月创办,由周德之主编,属于半月刊。创刊于沉寂的皖北,以转载各县消息、宣传民教事业、组织各类活动内容等为核心,承载着皖北地区的民众教育任务。

民众教育繁盛时,全国民众教育馆数量高达1612所,学界关注于此的学者不在少数,而直至朱煜出版《民众教育馆与民族国家意识的塑造(1928-1949)》和周慧梅出版《近代民众教育馆研究》才对民众教育的历史有了明晰的梳理。目前关于民众教育的相关研究共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聚焦于民众教育馆本身的研究。国内最早开始研究民众教育馆的学者是周慧梅,她对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变迁进行了制度分析,认为民众教育馆属于一种政府强制性的制度安排,虽掀起全国教育浪潮,但却因缺少民众自觉最终走向失败^[3]。随后李冬梅从政府、教育体制、社会和民众三个方面对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举步维艰的成长之路进行了分析,在肯定民众教育馆加速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同时,揭示了民众教育是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过程^[4]。第二类是民众教育思想研究。吴洪成和陈兴德以卢作孚的教育实践活动为中心,展现了民众教育与救国、爱国、建国之间的紧密联系^[5]。李玉则是对钮永建的民众教育思想进行了全面探析,认为他在民众教育思想与实践方面的成败,与他所抱定的“党治”原则有极大关系^[6]。第三类是民众教育刊物研究。丁道勇通过《思想新闻》讨论杜威为民众教育所做出的努力^[7]。本文将《皖北民教》为研究对象,力图再现皖北推进民众教育的真实场景,以此探究民众教育对皖北社会所起到的启蒙作用。

1 皖北社会的发展与《皖北民教》的创办

皖北地区,陆路纵横,水路交织,构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其战略地位突出,北扼苏鲁之咽喉,西通豫鄂之要冲。故而,历史上每逢战乱,皖北必成烽火之地,民众深受其害。无纪之师频至,肆意征伐,盘剥良民,无所不用其极^[8]。皖北社会经济屡受摧折的同时,农业发展受天灾影响也不容乐观,“整个皖北地区,自民国元年至民国三十八年间,旱涝之灾与蝗虫之患,几乎岁岁不绝,频仍而至。”^[9]根据1920年、1930年的调查,皖北地区一个包含4至5名成人的农户,其年度生活必需开支至少为220元,这一数额大抵等同于耕作约30亩田地的产出。然而,彼时超过半数的农户,其耕地面积不足20

亩^[10]。在自然条件恶劣、匪患横行、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皖北地区,民众教育更是落后。就科举而言,清代安徽省共有进士1189名,其中江南地区表现尤为突出,皖北地区则黯然失色,如蒙城“民风剽悍,尚武轻文,于前清百年间,无登科及第者”^[11]。

直至1915年,教育部设立通俗教育研究会,公布通俗教育馆规程、通俗讲演所规程、通俗讲演规则等^[12],自此,全国各地开始相继设立通俗教育馆。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推行,政府发现通俗教育馆难以与当时社会发展相契合,因此,改革之声四起。安徽省于1930年颁布了《令通俗教育馆为民众教育馆》的法令,明确指出:“查第二次全国教育会议决议之‘改进社会教育计划’,系以民众教育馆为社会教育之实施机关;本厅决定将各县县立通俗教育馆一律改名为县立民众教育馆。”^[13]1930年10月,皖北地区首所也是唯一一所民众教育馆——安徽省立第三民众教育馆在蚌埠正式成立,开启了为期8年的民众教育事业新篇章。

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的《民众教育馆暂行规程》规定,各省市及县市应分别设立民众教育馆,为实施社会教育之中心机关。此等教育馆需专设出版部门,肩负起编纂日刊、周刊、画报、小册子及其他社会教育相关出版物的重任。安徽省立第三民众教育馆于1934年9月出版并发行《皖北民教》,创刊之时便表明“民众教育的目的原在改造社会,改造社会应顾及地方情形。此后皖北民教办得好或是办得坏,本刊是最好的证人。我们想用它提醒自己,俾得随时奋勉改进;我们更想用它求教于海内同志,俾不至孤陋寡闻而收切磋琢磨之效”^[14]。《皖北民教》以宣扬民众教育为主,普及民众教育的知识,提出民众教育的标准和具体实施办法,主要栏目包括民教消息述要、馆务会议、社会调查纲要、一年来之总馆、民校讲义大纲、工作报告、章则、各县通讯等,内容涵盖研究民众教育工作及其状况、调整各县馆的工作、促进县馆与县馆的合作互助。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民教事业难以为继,《皖北民教》遂停刊。

2 改良思想:构建民族意识

近代以降,探究中国衰微不振之缘由,民族意识缺失常被视作关键所在。梁启超曾说:“而要之吾国民爱国之心,比诸欧西、日本殊觉薄弱焉,此实不能为讳者也。而爱国之心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15]因此,欲挽狂澜于既倒,实现国家昌盛与民族复兴,就要求“从事民众教育的人今后要在中国

无论哪一个地方,无论哪一个中国人的身上,负起培养民众的民族意识这个责任”^[16]。此为当时民众教育馆创办报刊之普遍共识。《皖北民教》作为安徽省立第三民众教育馆的唯一刊物,通过教育叙事来建构民族意识,遂成为了培养皖北民众民族意识的重要媒介。

《皖北民教》叙事内容中关于“民族”的论述,初期多以“文字号召”为主,后来则转向“实践动员”,表现为以《皖北民教》为中心策划举行了一系列与民族意识相关的展览。

2.1 心理动员

即超越教育层面的意义,对普通民众心理进行积极动员。在《皖北民教》的叙事中,民众教育与社会变迁、民族命运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它不仅承载着国民的期望,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基石,更是实现民族振兴的核心要素。因此,“我们欲图民族自救,决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能补救于万一的,我们以为民族自救的根本策略,只有从教育上着手。”^[17]在该层面上,劝诫民众主动接受教育是一种拯救民族的象征,任何有良知的爱国者都应当受教育。除此之外,《皖北民教》还将识字运动与民族自救相联系,对于积极识字的民众,赋予其一种责任感,“我们感觉现在是一个智力斗争的时代,一个民族要求永久生存于世界,就非得个个民众都有相当的智识不可,但是智识是必须文字的,欲求智识,必先要识字。我们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个人的幸福,觉得民族自救和识字运动,都是目前最切要的工作。”^[18]这意味着,个人应该从学习文字进行自我提升,而文盲不仅难以幸福,也不符合民族发展方向。在探讨《皖北民教》今后道路之时,激发民族意识被强调为首要任务,“我们现时的急务,求自力更生;我们现时的目标,在复兴民族。故今后的教育,自应注意于民族意识之提倡与激发,在民众教育尤为需要。”^[19]诸如此类的言论在《皖北民教》中十分常见,体现出报刊宣传的民族意识理念。

2.2 出谋划策

面向民教人员或其他地方各县民众教育馆提出民族教育的策略,以此有效地组织并形成自发的坚强力量,为民族教育的持续发展提供坚实支撑。《皖北民教》一方面针对民众目前受教育现状,积极推动教育目标制定,一篇名为《民族自救运动下的民族教育》的文章写道“我们既已认清民族自救运动的对象就是全体的民众,那么,我们可以看看广大的民众在民族生存中所缺乏的要素是什么?我以为不外是:1、爱国心理;2、奋斗精神;3、生产能力;4、团

体组织。我们要图民族生存要求广大的民众一致起来作民族自救。我们此后应努力的目标是:1、造成爱国心理;2、养成奋斗精神;3、增进生产能力;4、训练团体组织”^{[17]2-3}。另一方面,将民众振作与国家振兴联系在一起加以讨论,“民众不能振作自身事业,而期望他们负责于民族挽救国家,不是痴人说梦吗?”^[20]从而为从事民众教育者建言,“怎样使民众自动呢?依我的愚见分为三点,甲、引起民众敬仰;乙、使民众明了活动的真义;丙、组织团体形成自动的坚强力量。”^[20]除此之外,《皖北民教》还注重青年群体民族意识的培养,在一篇关于民众教育如何进行青年训练的文章中,特别强调青年之于国家的重要意义,“中国危弱之根本原因第二在缺少团体组织。这也就是中国青年对于国家思想认识的不正确,团体信仰不够。现在青年训练,就是从严格的训练中,使青年思想信仰确定并习得团体组织能力。”^[21]

2.3 开展实践

《皖北民教》围绕民族教育开展一系列具体活动,如民族自救运动宣传展览、举办九一八国耻纪念会等。民族自救运动宣传展览在举办之初便明确自身“唤醒民众的立场”“我们举办这个民族自救运动,目的就是在唤起民众注意世界大势、民族盛衰,和列强的实力,藉以知道中华民族目前所处的地位,而所以求自救的途径。”^[22]《皖北民教》中详细记载了民族自救运动从筹办人员、材料收集、材料分类到工作分配的全部过程,以化妆讲演、文字宣传、图表展览、书志陈列四种形式举行,其中通过标语“我们赶快奋发图强以应付目前的危机!要抗御强权暴敌惟有努力民族自救!”^{[22]18}得见民族觉醒之迫切。在报告中再现展览效果,“在这个时期里,我们时刻看到的是民众们俯身昂首,听到的是愤慨声音,也有手提小册,摘录各种表解中的数字,也有摩拳擦掌,伸向书图中的画像——日人——作势,甚有镇天价坐在书桌旁边,目不转睛地阅览那些有关国难的书籍,这些,可以说民众对本馆这次展览中的一切已有了相应的了解,同时对于国家的处境,国际间的外交内政以及军备军事,国际形势都已有了深刻的认识。”^{[22]19}除此之外,《皖北民教》也报道了阜阳民众教育馆举办九一八国耻纪念会的情况,“开幕后,除讲述事变经过及国民应有之觉悟外,并表演《还我河山》《杀敌之孝》等话剧助兴。是晚虽阴雨不止,泥泞载道,而观众较每次开会人数,犹未稍减。”^[23]通过此等活动,《皖北民教》将“国耻”以通俗易懂的形式展示在民众面前,并试图对民众的心理产生潜

移默化的影响,促使其知道中国所处地位的危险,点燃他们心中民族意识的“火”。

3 开展生计教育:助力民生改良

19 世纪中期,以“小农经济”为主的皖北,在“天灾”与“人祸”的共同作用下早已不再“比岁稔,无立锥者或致千金”,取而代之的是“灾民流离失所,卖儿鬻女”乃至“人相食”^[24]。从此时起,皖北人民生计便已成难题,但在民众教育推行之初,政府并未有所意识。直至 1931 年 5 月,中国国民党三届一次临时全会召开,会议提出社会教育之核心,当聚焦于促进生产增长。应依据民众当前的知识水平与实际生活情境,着力提升其生产技能,以此作为教育发展的主轴^[25]。此后,皖北民众教育的工作重心随之发生转移,由原来的识字教育转到生计教育上来。这种以生计教育为目标的民生改良工程,将教育实践与民生需求相契合,有效缓解了长期积压的社会矛盾,推动了皖北地区从生存危机向生产复苏的转变。

民众教育馆作为官方教育组织,自然承担着推进生计教育的职责。因此,在《皖北民教》对皖北民众进行塑造的过程中,民众的生计成了不可忽视的部分。生计教育所涉及的教育对象以成年人居多,男女不限,包括城市平民、农民、商人等,内涵十分丰富,既包括具有职业教育性质的职业指导,还包括经济帮扶、农事改良等内容(见表 1)。

表 1 《皖北民教》生计内容统计表 篇

题材	年代			
	1934	1935	1936	1937
职业	5	3	4	1
农事	8	11	7	0
经济	4	9	7	2

3.1 职业引导

民国时期,全国范围内失业人口庞大,造成此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当时民众大多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缺乏职业技能^[26]。“现在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要他们赶快受到一种短期的补习教育,使获得公民必备和生活必须的基本常识。”^[27]因而《皖北民教》倡导民众积极接受教育,提高就业能力,从而解决自身及其家庭的生计问题。从个人利益上讲,生计教育的意义就是养成民众具有谋生的知识与技能;从国家利益上讲,以深远的目光认清社会需要,成为职业稳定的好公民,就能减少土匪、汉奸的出现,从而安定社会,稳定国家^[28]。可见,在报刊的

叙事中,民众成为社会贡献者的一个途径是拥有一份工作。

在具体的职业引导中,针对无业、无长、无学者,《皖北民教》提倡其积极参加工艺训练班,通过集中学习,使之具有一技之长。工艺训练班授课内容,根据当地的需要及县馆人力财力而定,针对时下社会经济状况,应开设无需大量设备费用者为主,如泥工、木工、裁缝等^[29]¹³⁴。为满足工艺训练班实践性较强的特点,其开设周期一般在四个月至六个月不等,招生规模也较小。不仅如此,民众教育馆认为合理安排上课时间,对于广大参加职业训练的民众来说,意义重大。为了充分保障职业培训班学员的学习时间,在不影响其原有工作、生活的基础之上,灵活设计职业培训的上课时间。“然浴工都是有职业的,既欲教育他们,复欲顾全他们的日常工作,我们既负了民教的使命,自然不能怕辛苦,浴工白天有工作,我们便提早于晨光熹微中来上课每天六时至八时为浴工班的教学时间。”^[30]参与工艺训练班的学生职业技能提升得很快,在社会上的适应能力也很强,大部分学员“毕业后能独立地愉快地操其所习之职业”^[29]¹³⁵。

3.2 农事指导

皖北位于江淮地区,耕地面积占比领先全国。民国时期,受农业传统观念束缚、作物品种退化、农业器械滞后等制约,皖北农业发展停滞,加之自然灾害频发,导致产量较低,这些严重威胁农民生计。“然则如欲农村确得复兴之道,除经济水利土地三大基本问题以外,则为农事指导星罗棋布于乡村是也。”^[31]⁵⁸

《皖北民教》作为教育刊物,借助农村复兴话语,首先阐明农事指导人才的重要性。“农事指导之人才,最为难得;因须有科学头脑,同时须有农夫身手;并须办事干练,以应付复杂之社会;常识丰富,以答民众之咨询;且须口齿伶俐,以肆宣传;身体强壮,以负艰巨;至于文字发表能力亦甚重要,更应有高尚之人格,诚恳之态度,俾得民众信仰,而为其表率。”^[31]⁵⁹其次刊物围绕农田实验、种子选择与耕种方式对民众进行了农事指导。在正式耕种之前,特设立特约农田进行实验,“以特约农田为试验改良农作物,增加生产量,逐步推广示范。”^[32]具体实施是向附近乡村选择地点,并向中央大学农学院购适宜于皖北土地之小麦品种数十斤,按照新法,实地施种,由生计部负责指导,并训练农民^[33]。农田作为农业发展的基石与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与此同时,农作物品种的优劣与耕种方

式的好坏亦是决定农业生产成效的关键因素,影响着作物的产量与质量。为此,《皖北民教》特推广优良农作物品种,并“宣传中耕的益处;指导农家锄草中耕”^[34],推动皖北农业走出困境,同时改善皖北地区农民的生计问题。

3.3 经济帮扶

在生计教育的稳步推进下,城乡民众开始趋向于通过发展农业或小本经营来改变现状,但“本区民众大都属圃农、菜贩、小手工业、小商人,生产力都是极其微弱的,大都是缺乏资本,无法发展其事业”^[35]。为缓解民众资金紧张,鼓励民众发展事业,为此,《皖北民教》一方面阐释经济帮扶的重要性,另一方面给出了具体帮扶方式,即小本借贷的实施办法。小本借贷所拥有正规借贷章程,不仅对借贷者身份进行严格审核,还明确规定借贷流程,所内登记、店铺作保、店主盖章、核实信息不可或缺才可成功借贷,以防骗贷行为的发生,危及小本借贷所资金的安全^[36]。借贷者多为贫苦小贩,凭靠贩卖水果菜蔬得蝇头小利而生存,资金一旦不能周转,便要守着挨饿,甚至做出不端的行为来危害社会秩序^[37]。因此,小本借贷所为其提供资本,不仅能保证小贩正常经营,而且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小本借贷所自成立以来,要求借资营业者,纷至沓来。根据《皖北民教》所统计的数据,借款人职业种类多达 25 种,“以买香烟的为最多,为三十七人,十二月间因为米粮贵,穷苦的多半全以红芋充饥,所以贩卖红芋的也不少,共有三十一人前来借款,买糖果青菜的也很多,至于卖酒卖凉粉的就顶少。”^[38]可见,小本借贷所的成立拓宽了民众获取资金的渠道,不仅在物质层面上给予了实质性的帮助,而且在精神层面上激发了民众自我发展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使得原本因资金短缺而难以维系生计或发展的小型企业和个人有了喘息与成长的空间,强有力地支撑了生计教育的开展。

4 响应“新生活”:重塑生活观念

1934 年 2 月 19 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演讲,提出要从江西省会南昌开始发动一个“新生活运动”,即要使南昌所有的人民,“都能以礼义廉耻为基本原则,改革过去一切不适于现代生存的生活习惯,从此能真正做一个现代的国民。”^[39]新生活运动从“模范南昌”迅速向全国推广,民众教育活动的实施开始集中于塑造具备健康体魄、社会责任感及积极参与社会活动的现代国民。为达此目的,承担“形塑国民”

责任的民众教育馆也从大局出发,认为重塑民众生活观念是成为具备现代国民特质的关键路径。

因此,在“更新生活观念 塑造现代国民”的目标下,民众教育馆通过《皖北民教》刊载了大量有关“健康教育”“社会活动”的文章,以教育话语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推广文化娱乐活动。

4.1 健康生活方式的倡导

作为重塑国民的重要一环,健康生活方式的倡导在民众教育馆的实践中占据了重要地位。通过对健康生活相关知识的系统普及与实践方法的科学指导,《皖北民教》在引导民众生活方式的现代转型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以报刊为媒介的健康教育实践,既是对传统生活方式的革新,也是对国民素质提升的有益尝试。

首先,《皖北民教》倡导“现代民众”养成健康的身体。因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全的意志,有健全的意志,才能成为一个健全的国民”,《皖北民教》在 1936 年连续刊载了有关“健康身体”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多次强调健康的身体需要健康的生活习惯去培养,不仅包括饮食规律、早睡早起、爱好自然,还涵盖养成运动的习惯^[40]。为吸引民众积极运动,《皖北民教》策划举行各种体育竞赛,“如放风筝、踢毽子、越野赛跑、爬山划船游泳竞赛等,尽可能相时相地举行。”^[41]⁵⁷同时在竞赛之余号召民众共同组织业余运动团体、武术团、晨操班^[41]⁶⁰。但这些主要组织以常例大多吸收男性比较容易些,妇女参与甚少。对此,《皖北民教》展现妇女“裹足束胸留发穿耳等恶习至今仍流行各地,妇女们整天的躲在深闺中不见天日,因不能吸收新鲜空气和阳光而弱不禁风”的健康现状,以引起妇女对健康的重视,并针对其开展妇女健康运动^[41]⁵⁷。其次,《皖北民教》从基础建设入手,为民众提供健康保障。在民众教育馆花费十五元设立固定的简单药库,要求里面具有简单的用具和近三十种普通常用药品,并聘请特约医生补简单药库之不足,因为医药乃专门知识,一旦碰到疑难的重症,非药库得以拯救,若敦请学力高明而又有服务热情的医师担任,方可避免意外^[41]⁶⁰。在小蚌埠便设此药库,“备药品二十六种,为民众诊治内外普通病症,现时每日就诊者有七八人,暂免收费,乡民颂德不止。”^[42]¹¹²最后,为养成民众卫生习惯,《皖北民教》呼吁皖北各市县积极组织卫生运动。以蚌埠市基本施教区为例,针对“贫民窟”民众,以宣传、劝种牛痘、展览和扫街等活动形式,向民众灌输卫生常识与方法,领导民众实践卫生生活。与此同时,为民众科普个人与公共卫生常识,涵盖衣服、食物、住

室、厕所等方面,并附常见药品使用说明共十项^[43]。经过卫生运动的开展“所去之垃圾,共达四车,事后并代民众要求公安局设垃圾池四处”^{[42][107]}。

4.2 文化娱乐活动的推广

“文化娱乐活动具有恢复与发展作用,即恢复身心平衡、发展个人能力的作用;以及社会化作用,即帮助人们实现个体社会化的进程。”^[44]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当局对民众文化活动较为关注,与此同时,随着西方传入的新式娱乐活动,新颖奇特,改变了皖北民众的文化娱乐生活结构,民众文化娱乐生活更为丰富多彩。《皖北民教》也大力推广丰富的文化娱乐活动,包括以“阅读”为核心的文化交流以及新兴的看电影等活动。《皖北民教》1936 年共刊发 11 篇文娱类文章,类型覆盖展览、读书、电影、运动等活动(见表 2)。

表 2 《皖北民教》1936 年所录的文娱文章

时间(刊期)	标题
1936 年第一卷第 9 - 10 期	真空管收音机
1936 年第二卷第 1 - 2 期	教育电影
1936 年第二卷第 1 - 2 期	农民联欢会
1936 年第二卷第 3 期	游乐厅与音乐研究会
1936 年第二卷第 3 期	民校毕业同学读书会
1936 年第二卷第 3 期	博物展览
1936 年第二卷第 3 期	图书预览
1936 年第二卷第 4 期	体育竞赛运动
1936 年第二卷第 4 期	妇女健康运动
1936 年第二卷第 4 期	组织武术团、组织晨操班
1936 年第二卷第 7 - 8 期	与定远县立民教馆函(论读书会)

为了宣传阅读活动,《皖北民教》时刻监督皖北各省图书馆和阅报室的建设。为推动图书馆的设置,加强民教人员对图书馆教育的重视,《皖北民教》刊载五篇文章,表明图书馆于民众之关系,“以图书馆的图书为出发的中心,循教育的轨道,来适应,来改变,来创造较为完美的个人生活,较健全的社会建设。”^[45]并重视图书馆馆员的训练,以规范化方式加强图书馆的教育功能。同时《皖北民教》秉承“晚间用以上课之教室,白日无用”的原则设置阅报室,整合空间资源扩大阅读场合以深化启蒙效能。阅报室作为知识传播的场合,兼具教育功能与信息时效性。其中陈列不仅有《申报》《大公报》此类中央报,还有属地方报的《皖报》《皖北日报》,并设有壁报处,三日一期,摘录各报有关国计民生之重要新

闻^[46]。在知识传播的空间建设之外,《皖北民教》也将娱乐活动视为国民性改造的社会治理技术,通过“寓教于乐”的路径实现民众身体规训与精神引导的有机统一。《皖北民教》中提到太和民众教育馆为民众分别聘请武术、京剧、土邦、清音等各种游艺名手登台表演,为民众提供娱乐^[47]。淮北乡为避免民众在消闲时赌博,“每日开唱留声机片,供民众耳听之娱,笑逐颜开,并有象棋陆军棋等,以供大众消遣。”^[46]除此之外,还为民众播放教育电影,“计有高等动物及人体的骨骼,无烟煤、细菌、巡捕、棉花的生长、顽皮伙伴等片,观者两千余人,秩序甚佳。”^[48]同时开展农民联欢会,一面要借以娱乐民众,联络情感;一面更侧重于敬老慈幼,以敦厚风俗^[49]。实践证明,娱乐活动不仅有为民众打发闲时、提供快乐之用,更有传递知识、安定社会之效。

5 结论

以《皖北民教》为中心,本文意在阐述媒介在推动皖北地区社会启蒙进程中的作用。在此过程中,《皖北民教》承载并展现了交织国家、民众与社会三者之间复杂而深刻的叙事。具体而言,通过报刊广泛传播思想教育、生计教育及生活教育的内容,深刻影响并建构了皖北民众的民族意识、生产理念及生活态度。通过《皖北民教》的媒介叙事,国家的社会启蒙理想与皖北地区的具体情境紧密相连,既促进了社会观念的现代转型,又增强了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与参与度,在近代皖北社会变迁中留下了深刻的媒介印记。

参考文献:

[1]周德之.本刊的使命[J].皖北民教,1934,1(1):1.
[2]蒋建国.十年内战时期的阅报组织与公共读报活动的拓展[J].社会科学战线,2023(2):144 - 158,282.
[3]周慧梅.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变迁的制度分析[J].教育学报,2008(2):10 - 15,32.
[4]李冬梅.民国时期民众教育馆举步维艰的缘由[J].求索,2010(12):241 - 242.
[5]吴洪成,陈兴德.卢作孚教育思想及其实践活动述论[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5):154 - 160.
[6]李玉.钮永建民众教育思想研究[J].社会科学辑刊,2018(2):155 - 162.
[7]丁道勇.《思想新闻》与民众教育:杜威的方案可行吗[J].复旦教育论坛,2023,21(1):5 - 12.
[8]于文善,梁家贵.民国时期淮河流域的灾荒及其影响[J].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9):

86-90.

[9]陈业新. 1931 年淮河流域水灾及其影响研究——以皖北地区为对象[J]. 安徽史学,2007(2):117-128.

[10]张安东. 近代安徽人口与耕地状况及变量分析[J].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7(11):60-63.

[11]谢国兴. 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安徽省[M].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1991:642.

[12]李景文,马小泉. 民国教育史料丛刊:世界教育事业·教育制度[M]. 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319.

[13]令改通俗教育馆为民众教育馆 安徽省政府教育厅训令第一八一七号[J]. 安徽教育行政周刊,1930(3):43.

[14]创刊词[J]. 皖北民教,1935,1(1):2.

[15]梁启超. 中国积弱溯源论[M]//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五. 北京:中华书局,1989:14.

[16]郑一华. 民众教育与民族意识[J]. 教育与民众,1931,3(2):217.

[17]黄叔鸾. 民族自救运动下的民众教育[J]. 皖北民教,1934,1(3):2-3.

[18]本馆小蚌埠基本施教区民族自救运动识字运动报告[J]. 皖北民教,1934,1(3):21.

[19]顾良杰. 商榷皖北民教今后应走的途径[J]. 皖北民教,1936,2(7/8):11.

[20]李荣楫. 怎样使民众自动[J]. 皖北民教,1936,1(9/10):2-7.

[21]汤义开. 青年训练实施之研究[J]. 皖北民教,1936,2(6):8-9.

[22]民族自救运动展览报告[J]. 皖北民教,1934,1(3):5-19.

[23]今年来阜阳民众教育馆概况[J]. 皖北民教,1935,1(2):101.

[24]张研,孙燕京. 19 世纪中期以前皖北小农家庭的生计——以凤台县为中心[J]. 中国农史,2003(3):107-113.

[25]荣孟源编. 中国国民党历次会议宣言决议案汇编[M]. 杭州:浙江省中共党史学会,1980:389.

[26]鹿迅. 安徽民众教育馆生计教育研究(1932-1937)[D]. 淮北:淮北师范大学,2024.

[27]钟灵秀. 实施失学民众补习教育的重要及其施行的步骤和准备[J]. 民教辅导,1936,2(7):6.

[28]李荣楫. 生计教育纲要[J]. 皖北民教,1936,1(9/10):79-80.

[29]登毒,扬协民. 与灵璧县馆论工艺训练班等[J]. 皖北民教,1935,1(7):134-135.

[30]半月来本馆业务并志(三)浴工补习班[J]. 皖北民教,1934,1(1):12.

[31]金声. 关于农事指导[J]. 皖北民教,1935,1(4/5):58-59.

[32]本馆特约农田办法[J]. 民教辅导,1935,1(4):53.

[33]半月来本馆业务并志(二)本馆特约农田觅定地点[J]. 皖北民教,1934,1(3):23.

[34]张登寿. 省立第三民众教育馆辅导凤阳县各县社教机关举行春耕运动大纲[J]. 皖北民教,1935,1(3):75.

[35]黄叔鸾. 二年来的集镇民教实验[J]. 民教辅导,1937,2(10):24-35.

[36]安徽省立第三民众教育馆蚌埠市基本施教区民众小本借贷所暂行办法[J]. 皖北民教,1935,1(2):107.

[37]半月来本馆业务并志(四)小本借贷所[J]. 皖北民教,1934,1(1):12.

[38]汤义开. 蚌埠市基本施教区第一年[J]. 皖北民教,1936,2(1/2):9.

[3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五)[M]. 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758.

[40]健康教育目标[J]. 皖北民教,1936,2(4):50-53.

[41]健康教育的实施[J]. 皖北民教,1936,2(4):57-60.

[42]本馆半年来工作总结要[J]. 皖北民教,1935,1(4/5):107-112.

[43]刘知行. 蚌埠市基本施教区之卫生运动[J]. 皖北民教,1935,1(4/5):73-76.

[44]楼嘉军. 娱乐旅游概论[M]. 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29-32.

[45]梓京. 民众图书馆学要义[J]. 皖北民教,1935,1(6):52.

[46]淮北乡基本施教区之部小蚌埠施教区[J]. 皖北民教,1935,1(1):75.

[47]皖北各县民教消息[J]. 皖北民教,1934,1(3):21.

[48]本馆三月份工作述要[J]. 皖北民教,1935,1(2):42.

[49]李荣楫,徐锡行. 淮北乡基本施教区第一年[J]. 皖北民教,1936,2(1/2):69.